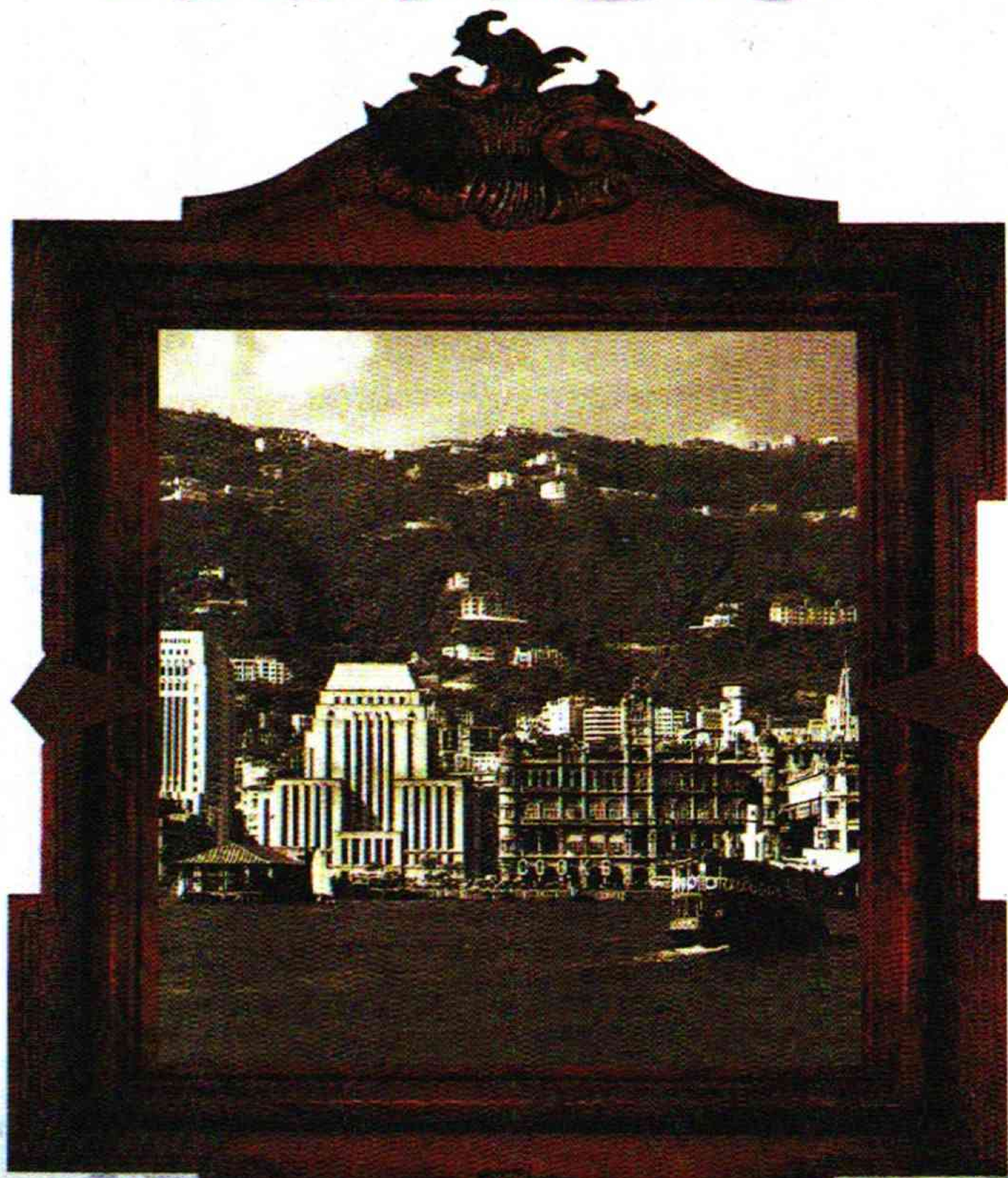
老香港

东方之珠

程乃珊著文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老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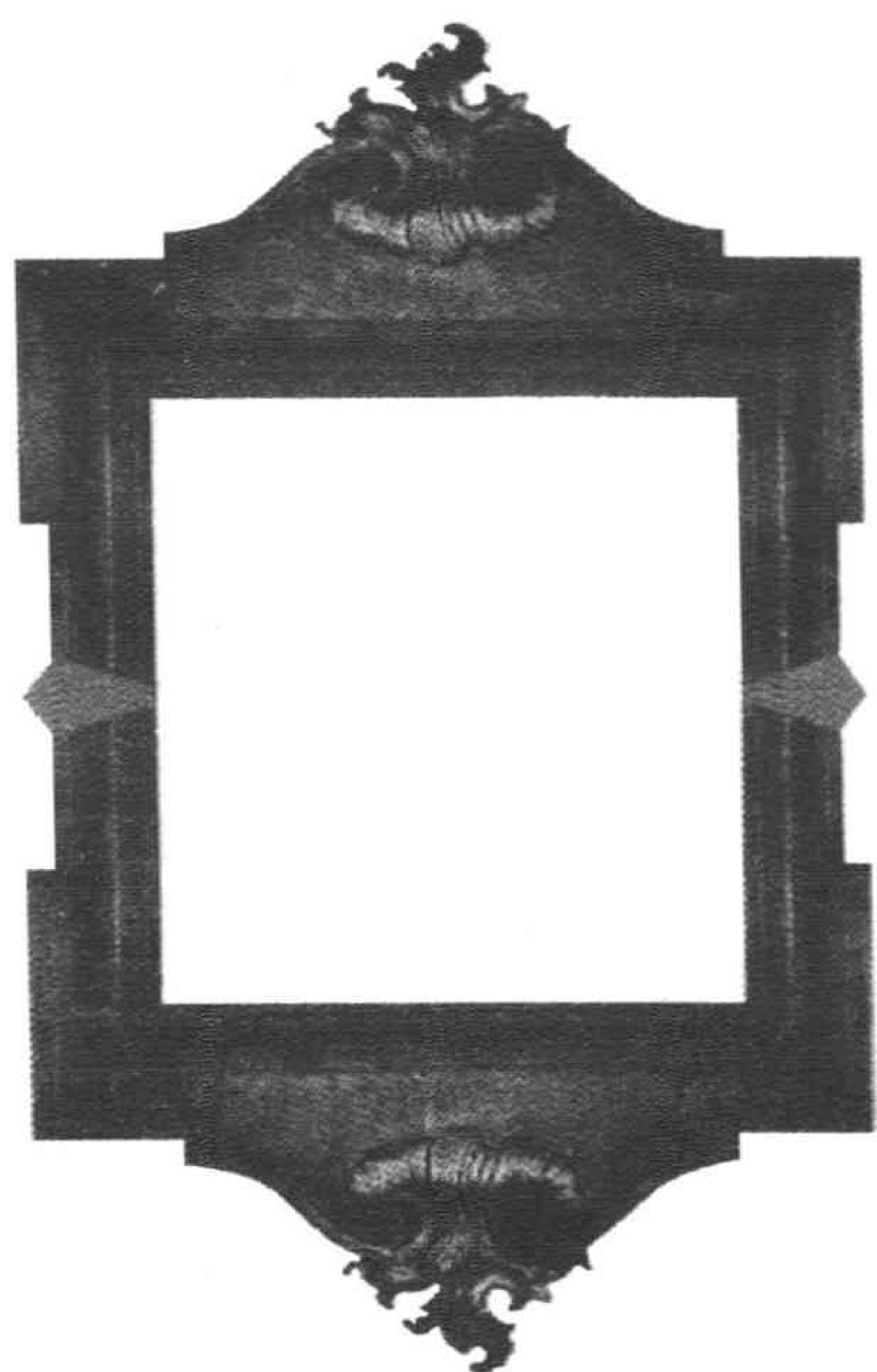
OLD C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香港：东方之珠/程乃珊著．—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9
(老城市)
ISBN 7-5344-1142-4

Ⅰ.老…　Ⅱ.程…　Ⅲ.城市史-香港-图集
Ⅳ.K296.58-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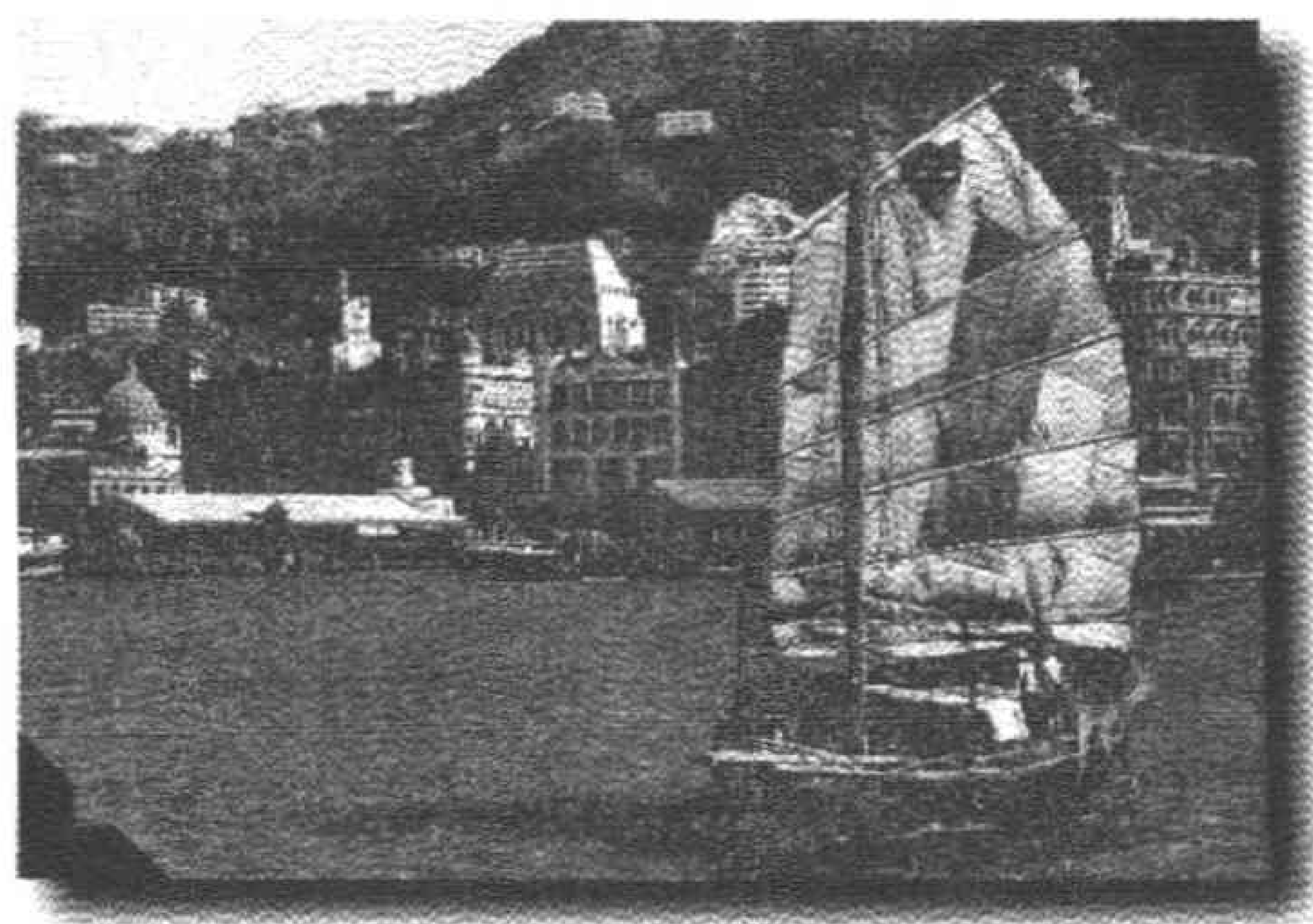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8730 号



老香港

东方之珠

程乃姗　著文



主　　编　朱成梁
副主编　顾华明
　　　　何兆兴
　　　　钱　进
选题策划　叶兆言
　　　　何兆兴
　　　　顾华明
　　　　速　加
编　　委　何兆兴
　　　　顾华明
　　　　速　加
　　　　杜　辛
　　　　张　莹
　　　　戴　雄
装帧设计　顾华明

责任编辑　顾华明

沪港姐妹花
（代序）

总觉得有怎样的城市，便会有怎样的女人。

女人是城市的韵味，是都会风情的演绎。

城市与女人，犹如灯笼里的那一点火，因为有了女人，城市才生动起来。

很小就喜欢逛马路，逛马路与其说是看橱窗，不如说是看女人。

上海的女人真有看头，即使在全国一片“蓝海洋”的年代，上海女人一身合体的蓝，在领口上、袖口上变变花样，配上薄如蝉翼的尼龙花边，照样可穿出风情万种。她们的倩影优雅地穿行在旧租界地的旧建筑中，一时那强硬的政治口号声都给淡化了……上海浓郁的海派之味，历经多次政治风云仍魅力不散，当拜谢上海的女人们！

来到香港后，更喜欢看女人。特别是午饭时分坐在中环置地广场的“喷泉阁”，看穿着合适的衣服、抹着合适的口红、泛着合适的笑容的中环白领丽人，在条条自动电梯上从天而

降……真是幕幕皆风景。

特别喜欢看香港的上海女人，因为文化场景变了，注入了许多异域的元素，一样的上海水土制造的女人感觉又截然不同了。

冷眼看女人，看她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自由与约束之间，出格与规范之间婉转徘徊、挣扎游移，其中的千姿万态，真个是风情万种。众多的都市传奇，原本就是这样产生的。

上海女人香港女人，似是亲姐妹，她们具备十分相似的基因和秉性，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香港女人上海女人，又似一对天敌，所谓“既生瑜，何生亮?”沪港两地的选美舞台和水银灯下，从来是两地女人必争之地。

不论如何，上海女人香港女人，是全中国最有风情的女人，正是她们，创造出沪港两个都会的红尘繁华。

接写《老香港》，很自然地，首先想起香港女人：从香港早年的“茶花”红牌阿姑(茶楼女招待)，到50年代红星夏梦；顺德自梳女的姑婆屋，到今日纵横商界的女强人……还是这句话，“都是风景”。

都说上海女人，可用一个“嗲”字来形容。那么香港女人，则可用一个“姣”字来形容。

还是这句话：什么样的城市，出什么样的

女人。

老上海十里洋场催谷出的女人，是用甩奶油撒上巧克力粉调出来的。那时一个在外国人家中做女佣的，都可以“穿着兔绿绒呢大衣，打扮得像个女学生”(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的模样。笔者也认识这样一位年轻时在外国人家做阿妈的，看她年轻时的照片，也是一样的呢长大衣配旗袍，一双扎带皮鞋，很充得过一般中小城市的小家碧玉了。

香港百年的殖民历史，早期的洋人，与一般港人，即便是高等港人，互相之间，也是格格不入的。世纪初的香港，殖民者的洋风，与以广东人为主的香港浓厚的岭南之风，是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根本无从与刮起十里洋场的海派之风相比。

早期香港，贫富悬殊，哪敌得过有“东方花都”之称的上海?在30年代上海已有“写字间小姐”或职业女性之称时，上海已有相当完整的中产文化，而同时代香港的女人们，一是公馆大族人家的深入简出的少奶奶，一是赤脚穿一双木屐板背兜小孩勤劳耐苦的草根女人，早年香港由英国贵族文化一统天下，中产文化远不及老上海的坚实。

女人作为一个白领群体自成一族，可以讲，香港要比上海足足迟了半个世纪。

直到1971年，香港才正式大规模推出女秘书(女文员)仪容训练计划，并有了秘书节。

而上海早在20年代，已有女速记、女接线生、女店员、女打字员等专业职业培训。

上海白领女性渊源较早，与上海的圣约翰、沪江、震旦、复旦等大学林立有密切关系。反观香港，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全港仍然只得一所香港大学。而且迟至30年代中期，香港大学才开始招考女学生，比上海大学招女生迟一截。

大学是白领的摇篮，香港早期女白领，可谓先天已不足。这样的环境，连香港早期一批立志有所作为的一代新女性，都纷纷北上向上海发展。

抗战胜利后，上海首次招考空中小姐。报名要求是中英文流利，学历起码要是大学肄业。据悉报考之日，上海北四川路邮政总局门口，排起一条由女学生组成的美丽的长龙，组成一道罕见的海上奇观。最后千里挑一，选出八个空姐，其中有三个，是香港来上海读大学的。

所谓人往高处走，早在二三十年代的“老香港”，一时但凡有点财力势力的家族，如有选择，也会选上海而舍香港，如百货业巨头永安的郭家；“第五街”皮鞋之王的黄家；地产

大王甘家……他们的千金小姐们，自然也在上海受催谷成为上海的广东籍新女性，这令香港又流失了部分白领丽人的来源。

有句西谚："女人是灶上的猫，哪里暖和，就往哪里靠。"似颇有贬意。其实，"哪里暖和往哪里靠"，又有何不妥？

胡蝶、阮玲玉、陈云裳等一代影坛大明星，个个都是广东籍，但令她们大红大紫的，却不是与她们语言生活习俗相近的香港，而是上海。

东方巴黎——上海，是那些决意活出彩虹的女孩神往之地。连在1933年全运会上争得名次的被誉为"东方美人鱼"之称的香港游泳运动员杨秀琼，在上海扬起的风头，也远胜过香港。可见香港女人如欲攀上枝头做凤凰，光靠一味的"姣"，是不能成名的。

生来先天不足，后天机会又缺乏，不靠磨劲勒劲，再加点邪气，或者还有点霸气，不这样，面对殖民者和南国封建大男人传统双重摧残的香港女人，想飞上枝头做凤凰，谈何容易！

气质这个词本来颇为抽象，但一个都会却是最能真实地反映她的子民的气质，特别是都会女人的魅力和气质。

这些娇艳的南国女子，纵使不是玻璃丝袜

高跟皮鞋，也是一身自制的碎花布料收腰窄袖小袄的，下配飘飘然大裤管的唐装，赤脚一双高跟描金大红漆的木屐，其万种风情，掀得维多利亚港碧波万顷，丝毫不亚于十里洋场上的上海小姐。“文革”前一部小说《三家巷》，对此有十分细致的描写。

要回顾“老香港”的昔日风情，就要沿着这些“老香港”女人遗留在历史时空的脂粉香寻觅，这些来自老字号“广生行”的花露水味和胭脂红香包装起来的“老香港”女人，即使比不上“夜巴黎”的幽香和“密斯佛陀”的洋气，但配上她们的一对自然的、不受束缚的、赤裸在描金木屐内的、十只脚指甲涂得猩红的大脚板，还有那几乎要给爆棚的、很小家气的碎花大襟贴身小布袄，那份红尘娇艳，又岂是一身舶来品装身、言语中夹几句“打令”、“康丽”（亲爱的、甜心）洋泾浜的上海嗲妹妹所能比得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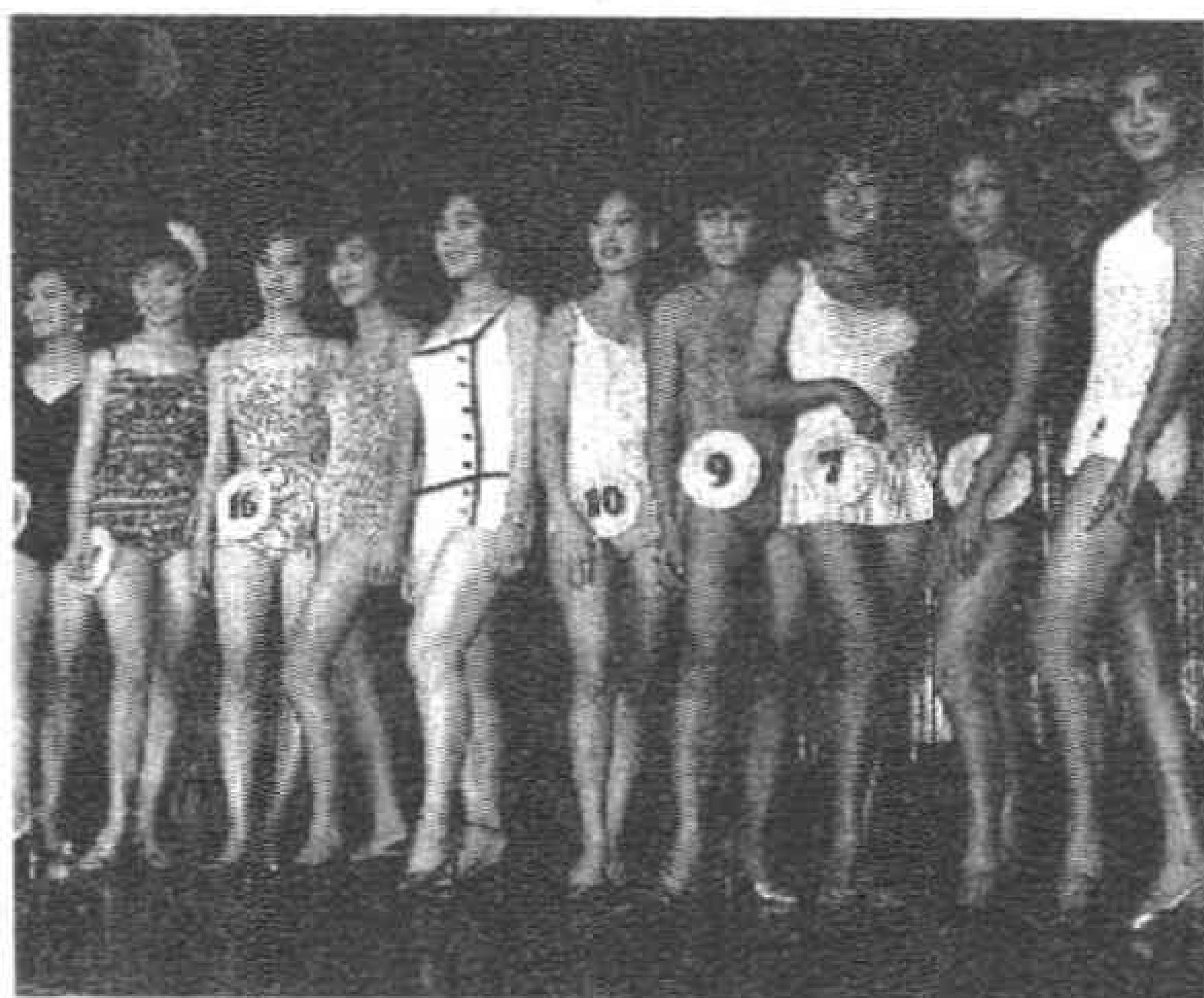
“老香港”女人的“姣”，造就了香港的灯红酒绿与富有特色的娱乐业。

因为香港城市的发展史，70年代是一道分水岭；正如内地城市的发展史，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一样。因此，笔者在划定“老香港”的界限，觉得划到70年代，城市的沧桑感反而会有更强烈的对比回顾。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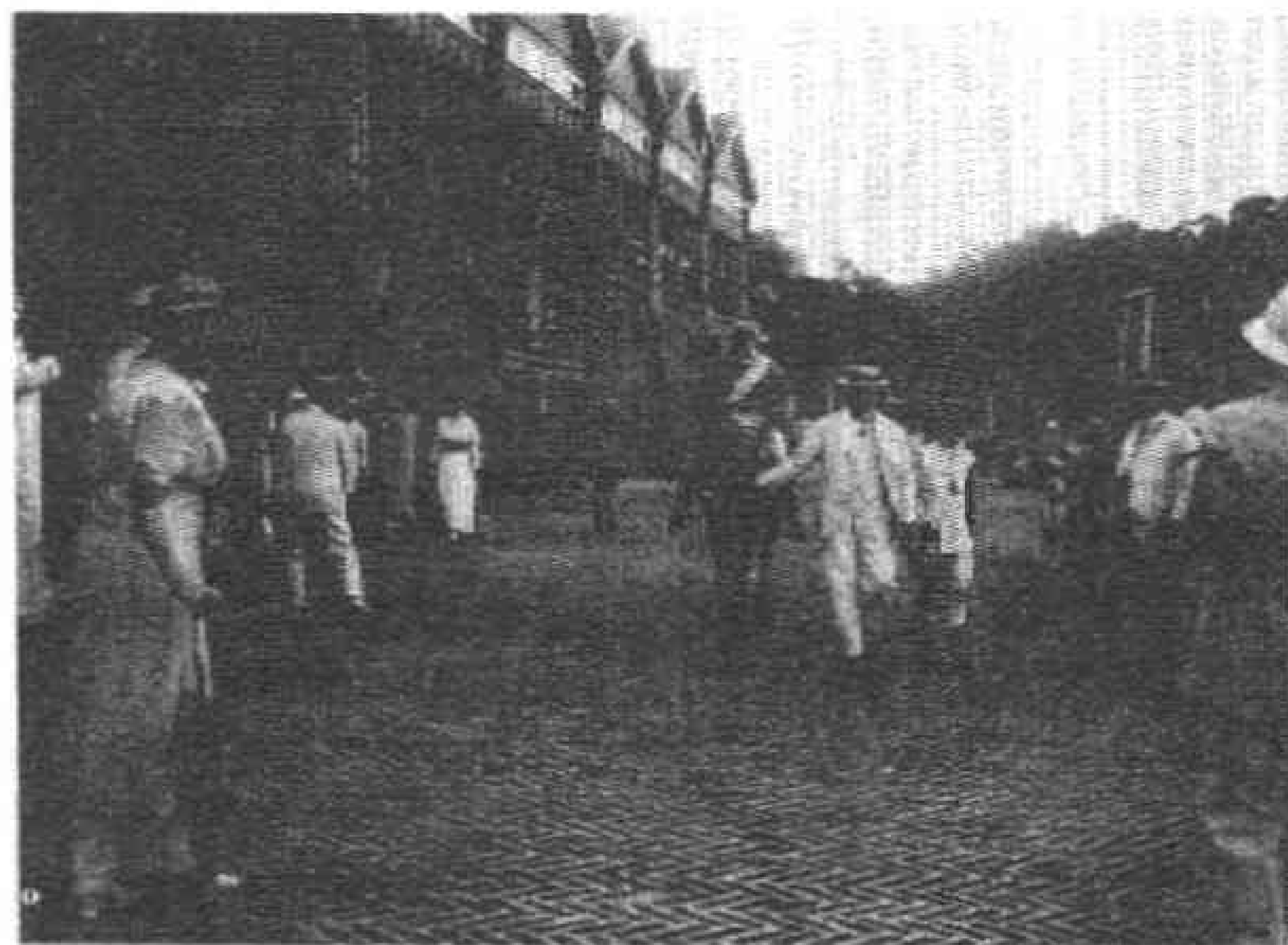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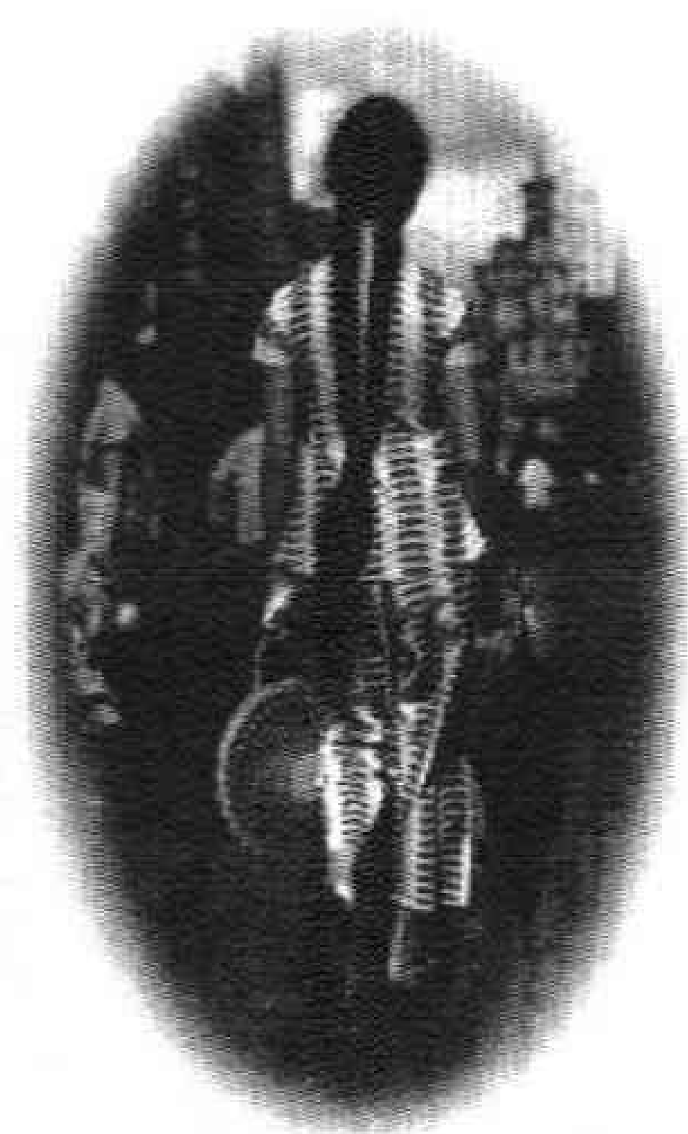
第五章





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上环德辅道中。



第一章





香港维多利亚港全景。



1860年的香港全景。



香港街头仍有不少穿着熨烫得笔挺的白衣黑裤、后拖大辫子的自梳女佣。

“七姊妹”的故事

香港北角区，有一条“七姊妹”道。这块地皮的变迁，在香港众多地段之中，可推第一。

这里原是一个海湾。香港城区，本是不断地填海而成。“七姊妹”道是二次大战后才填海而成。

其实今日的香港北角，地名是英国人取的。一直以来它的土名就称“七姊妹”。

“七姊妹”，这个名字听来香艳浪漫，其后面却是一个不畏封建强暴的烈女故事。

南国妇女，有“自梳”风气，在广东顺德一带尤为普遍。所谓“自梳”，就是不嫁，独身。

自梳女一般都拖着根大辫子，在香港以帮佣为生，尤以顺德女佣工最受欢迎。可以讲，自梳妈姐，是香港最资深的职业女性。她们不靠老公不靠

父母，只靠自己一双劳动的双手。

自梳女通常会结义金兰，互相间十分讲义气。

50年代笔者在香港居住时，家里就雇有个叫阿瑞的自梳妈姐（女佣），那时她不过十八九岁，脑后一条油光粗黑的大辫子，浆烫得笔挺的中式白上衭和黑香云纱大裤管长裤，赤脚一对街市鞋（凉鞋），这是自梳女的统一打扮。自梳妈姐，又称"一脚踢"，皆因一应买、烧、洗、烫、照应小孩等家务，她一人都可以应付得井井有条。



过去梳头妈姐以两张小凳、一碗水和一根棉线等工具替人梳头打扮和以线弓"拔脸毛"，或用"刨花胶"作梳头用。

自梳女生活俭省，一般都会几个金兰姐妹，合买一间简陋的房——俗称"姑婆屋"，专门来照顾年老失却劳动力的自梳女或留待自己老了住，自梳女间有不成文的契约：年轻的有照顾年老多病，甚至代为送终的义务。

据史载，香港有女佣，自太平天国后。当时南方的大商贾大富豪为保安全，纷纷举家南迁香港，他们当然不会自己动手做家务，于是，女佣这一行



梳头妈姐替人扮靓。摄于1963年。

业乘时而起，成为早年劳动妇女的主要职业。

自梳女佣多来自顺德。起因是因为顺德盛产蚕丝，乡下女人单靠织丝，已可自立。迫于夫权淫威，很多顺德女工宁可自己养活自己，也不愿盲婚哑嫁，便自梳不嫁。广东顺德是最早起源“自梳”之地。可见女子独立不依附男子，首先得取决于经济上的独立。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何求人格上的独立!

到了民国初年，整个中国丝业崩溃，自梳女无以维生，又不想嫁人受气，便纷纷来港当女佣，再乡帮乡、亲帮亲介绍自己小姊妹来港做女佣，“自梳住家女佣”一时成为广东顺德的“特产”。

无独有偶，上海的早年有素质的女佣，大都来自湖州及相近的南浔，那里同样盛产蚕丝。茅盾是湖州人，他的《春蚕》，很生动地反应了蚕乡的生活。湖州多丝厂，缫丝女工都来自农家女，因此她们很早有经济独立意识。随着湖州丝商来上海设厂，大批湖州、南浔妹相涌入城，上海人称之为“湖丝妹”……后来也许是僧多粥少，丝厂容纳不了太

多的女工，由于湖州、南浔一带是富足的鱼米之乡，南浔更是江南首富集中之地，是上海有钱人的老家乡，一般的湖州、南浔女子对饮食菜肴谙熟手巧，言谈举止又多斯文清雅，一时大受上海大户公馆人家欢迎，故而旧时上海一等女佣，都以湖州、南浔一带为多。不同的是，江南女子毕竟不如南国女人豪气，她们都回乡结婚了，然后再出来做女佣。一般都会母女俩、婆媳俩同打一份工，一做几十年，类似世袭。



街头梳头妈姐。

上海人称女佣为×妈，看来，都是因婚姻状态而分。未婚又如何能称为“妈”?而港人称×姐。

到了四五十年代，内地解放了，顺德女来香港不那么容易。但香港街头仍有不少穿着熨烫得笔挺的白衣黑裤、后拖大辫子的自梳女佣，大多已年届中年。

自梳住家女佣的日渐式微，主要原因除没有新鲜血液补充外。当时香港工业，特别是制衣业恰



客家村妇特有的服饰。

正起飞，年轻女性宁可入行做女工，薪水和待遇都比做住家女佣好。因此到了七八十年代，这种富有经验、自梳出身的女佣十分吃香，高价难求。在物以稀为贵的情况下，她们对东家要求苛刻：要有独立房间，房内要有电视机，每年两次大假。在70年代自梳女佣的黄金时期，她们更组团回内地观光，衣锦还乡，十分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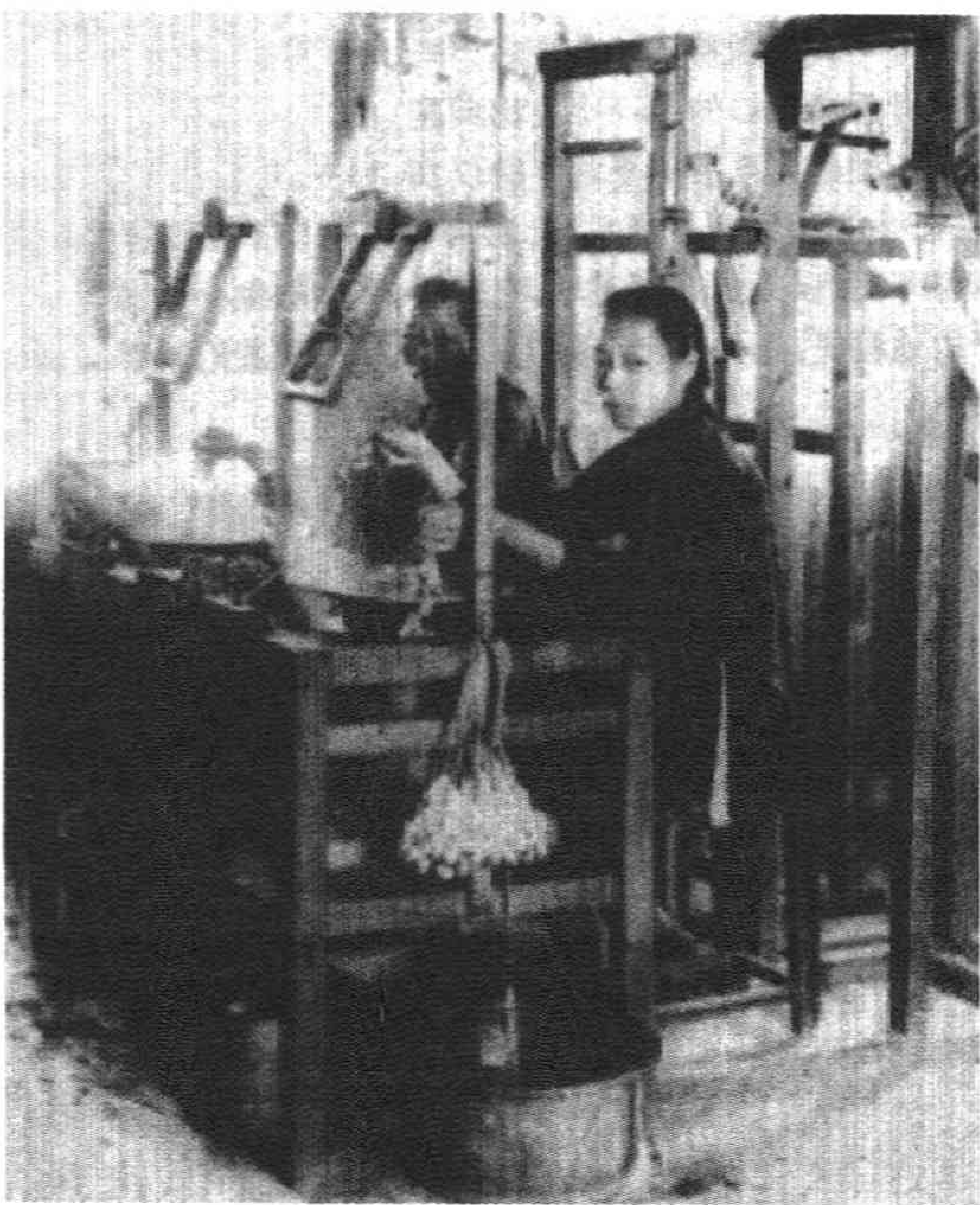
今日老一辈的顺德自梳住家女已退出社会，代之而起的是菲律宾女佣。

同样上海的湖州、南浔女保姆也少见，主要原因是当地生活质量高，女孩都不想离乡背井——除个别家庭仍保有世袭的习俗，由以往老保姆的女儿甚至孙女、媳妇来“顶代”，一般也是安徽小保姆的世界了。

不管上海还是香港，在当时普遍女性受教育和找工作机会极其少的情况下，女佣，实在可谓是都会女性走向独立自主的先驱。

让我们再回到“七姊妹”道。

早年自梳女，多为逃婚抗婚的农村妇女，如七姊妹，为当年香港七位结义金兰的自梳女，“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她们的誓言。而“宁死不嫁”更是她们的誓言。其中一位三妹，父母将她许配给一黄姓少年，她誓死不从，其他六位为“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则都不愿偷生，于是七姊妹手挽手投海自尽，投海之处，就是现今的北角。24小时后，她们的遗体浮出水面，依然是手挽手。



“新界”农民在家中煮茧抽丝的作坊。

后来，海边忽然多了七块参差不齐的石头，传说是七姊妹的精灵所化。

1890年，因填海筑路，“七姊妹”海湾被填平，“七姊妹”石也掩埋在泥土之下，但这块地名，就此称为“七姊妹”。只是当时的“七姊妹”，仍是一段泥土马路，并非现在看到的那样宽阔的柏油路。那个区仍称“七姊妹”湾。



一群客家妇女在一起玩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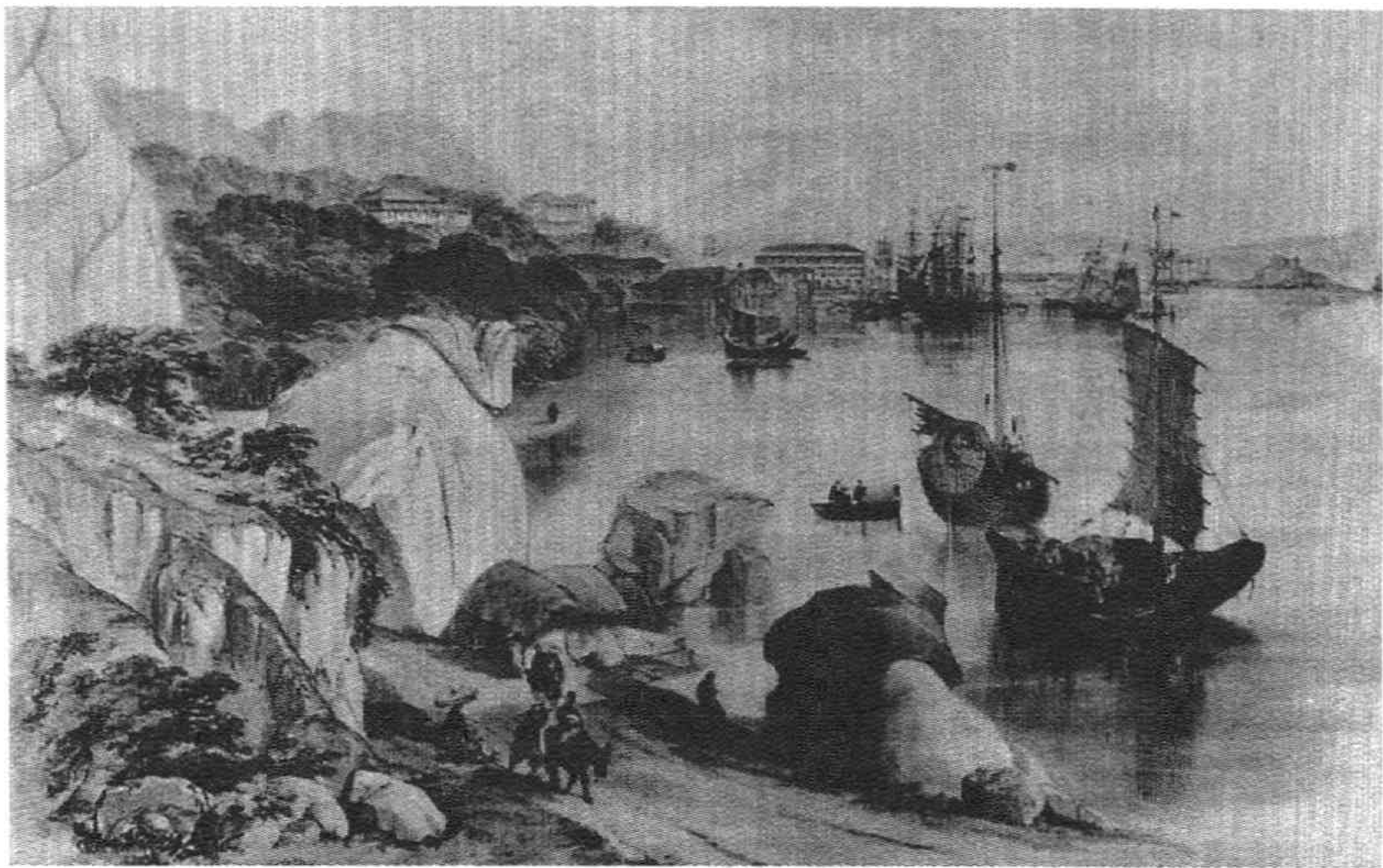
1902年电车通车，当时北角七姊妹区仍属郊区，由于近海湾，又有电车抵达，交通方便，便成为最热闹的游泳区，只是当时设备十分简陋，也没有更衣室淋浴设施。

直至1915年，香港华人游泳会才向港英当局申请在“七姊妹”搭游泳棚，内设淋浴、储物设施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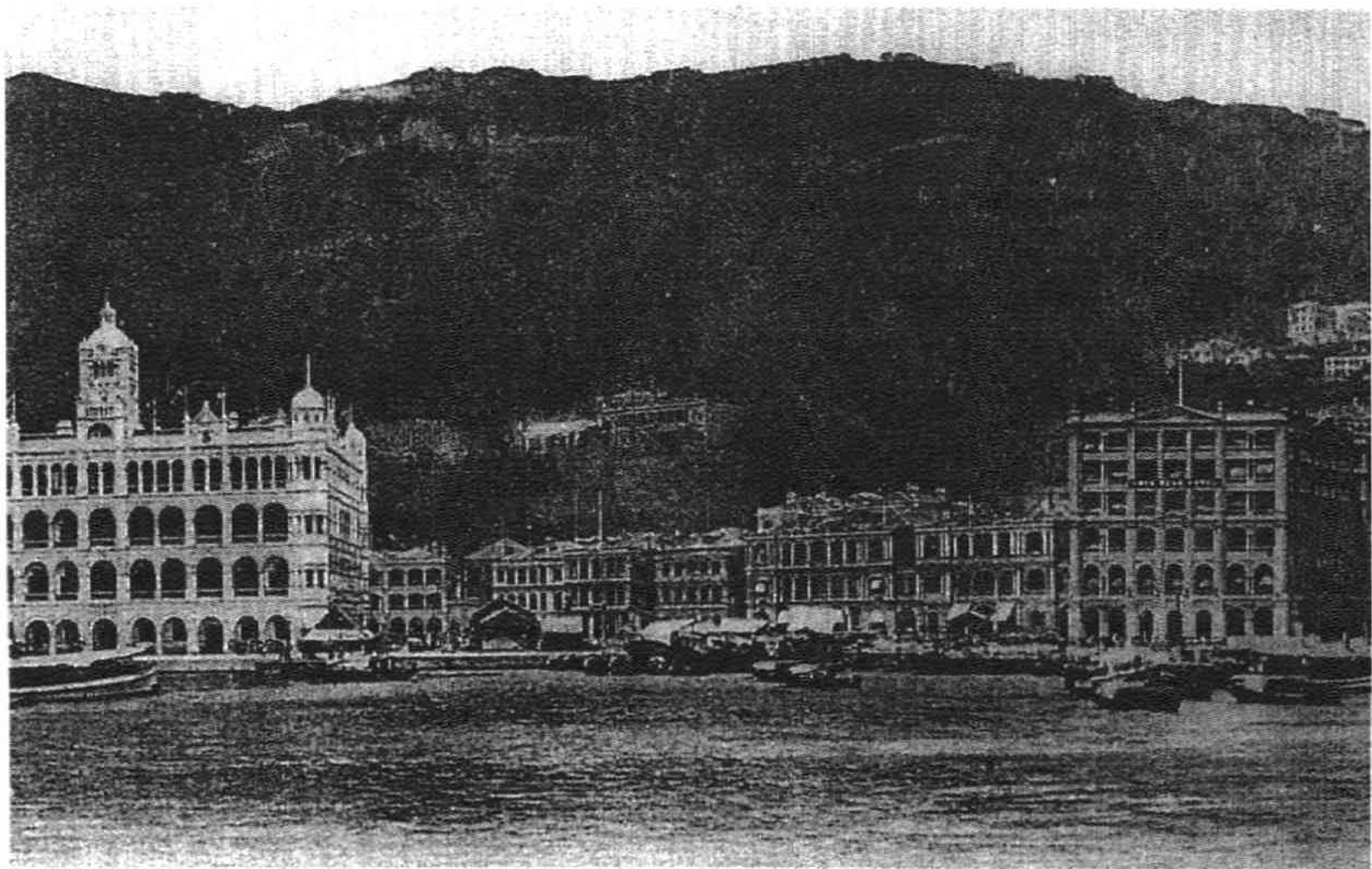
几经改进，至1929年，全港第一座用三合土和钢筋水泥建成的现代化海滨浴场，在“七姊妹”建成。因此，也掀起全港游泳热潮。

1933年在南京全国运动会上，香港男女游泳队取得出色的成绩。香港女选手杨秀琼，创四项当时全国纪录。她的妹妹杨秀珍，也获得200米仰泳的亚军。捷报传到香港，全港为之轰动，很多社团放爆竹庆祝，从此更掀游泳热潮，“七姊妹”泳区始渐热闹。

杨秀琼天生丽质，更兼泳技超人，获四项全国冠军后，一时风头无二。上海的传媒，送她一个“美



港岛海湾图景，中间位置大楼为怡和公司。摄于1840年。



1920年，香港酒店及钟楼，左为皇后大厦。



1924年，从坚尼地道远望湾仔、铜锣湾和北角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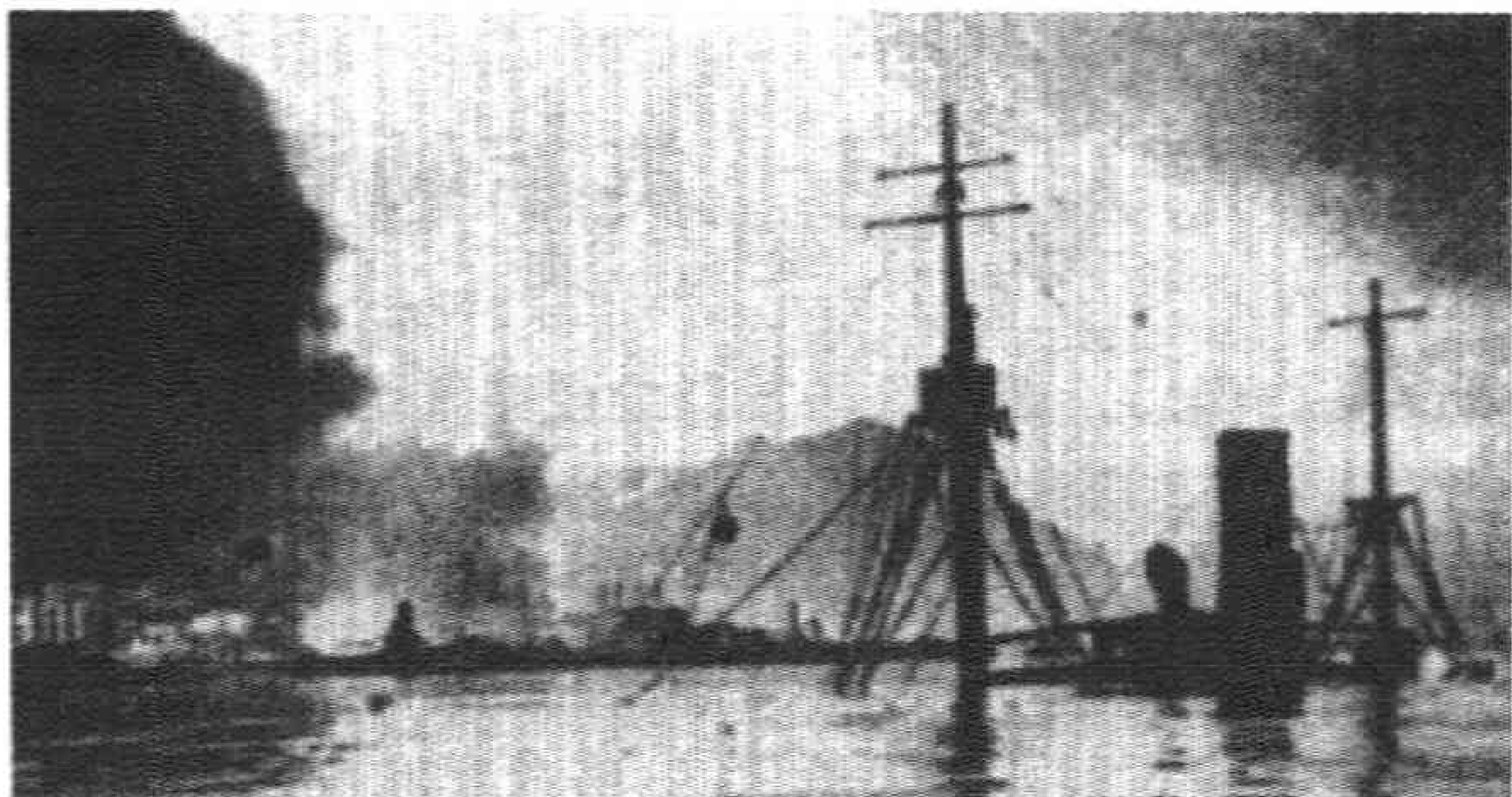
人鱼”的雅号。笔者80岁的老母亲，依然记得杨秀琼当年在上海掀起的热浪。

从自梳女到夺全国冠军的“美人鱼”，单从“七姊妹”的变迁，我们已可清晰看到，香港女人日渐从封建大男人桎梏之下走向新女性的脚印。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

“七姊妹”泳场区为日军侵略登陆地点之一。英军在这里开掘战壕建设工事，往日的游泳嬉水之池，一时成为炮火纷飞的战场，英军顽强抵抗18日，香港沦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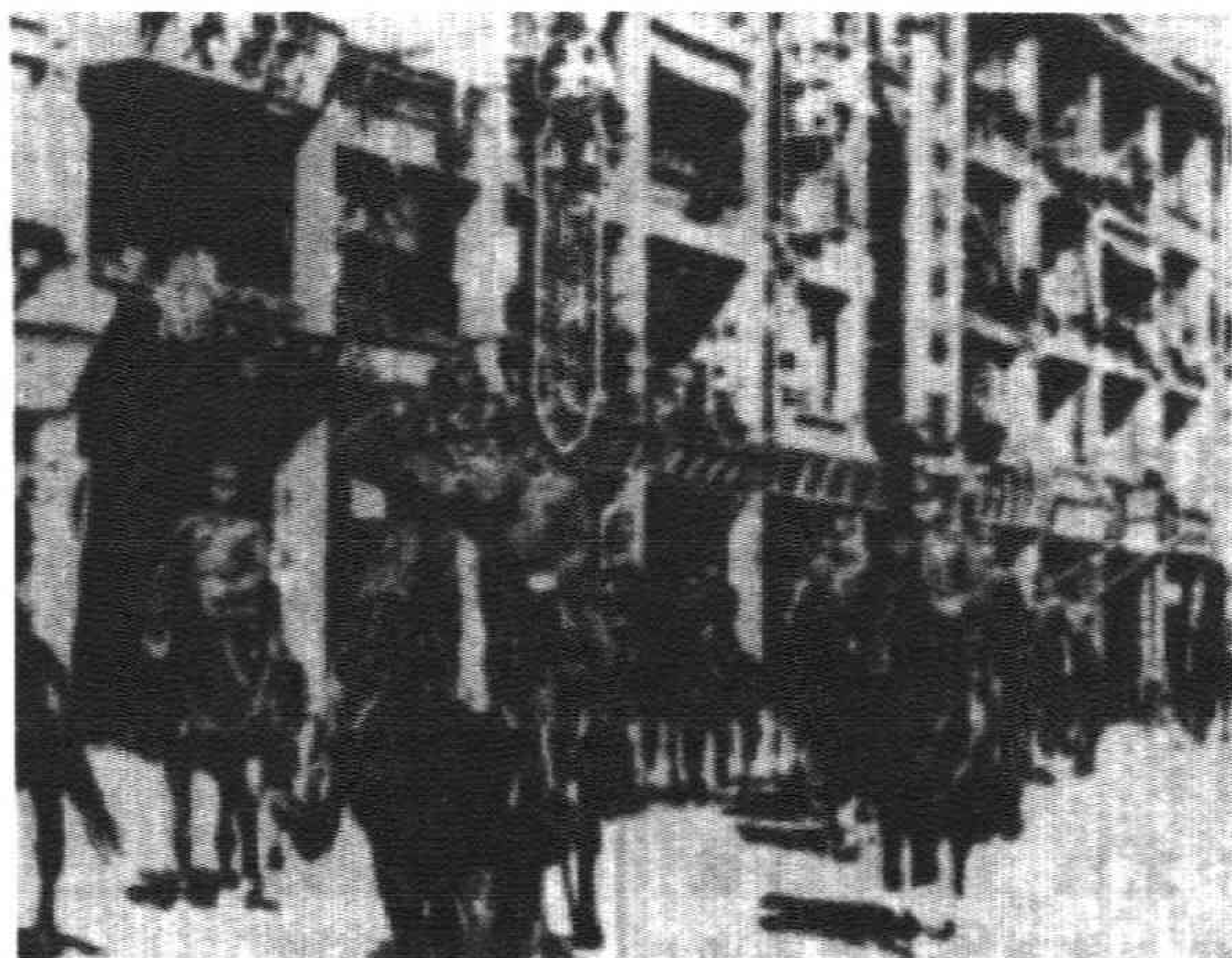
“七姊妹”泳场不但毁于战火，在原址还建成集中营，用以囚禁抗日战俘和英、美、加籍人士。现址为“英皇道休憩公园”，今日树木青葱，幽雅清静，很难再找到历史的沧桑遗迹。



日、英海军在香港附近海域激战。图为英国海军炮艇被日军击沉。

香港苦守18日，最后沦陷，开始了黑暗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战争、饥荒、贫困、逃亡……给香港一代人留下了悲怆的记忆。

二战胜利后，“七姊妹”区仍十分荒芜。一位有“上海杜月笙”之称的香港上海人李裁法，向港英当局申请以短期的租约方式，租用区内原属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游泳棚附近的地皮，在近海湾之



日军占领香港后在街头。



香港湾仔填海工程之前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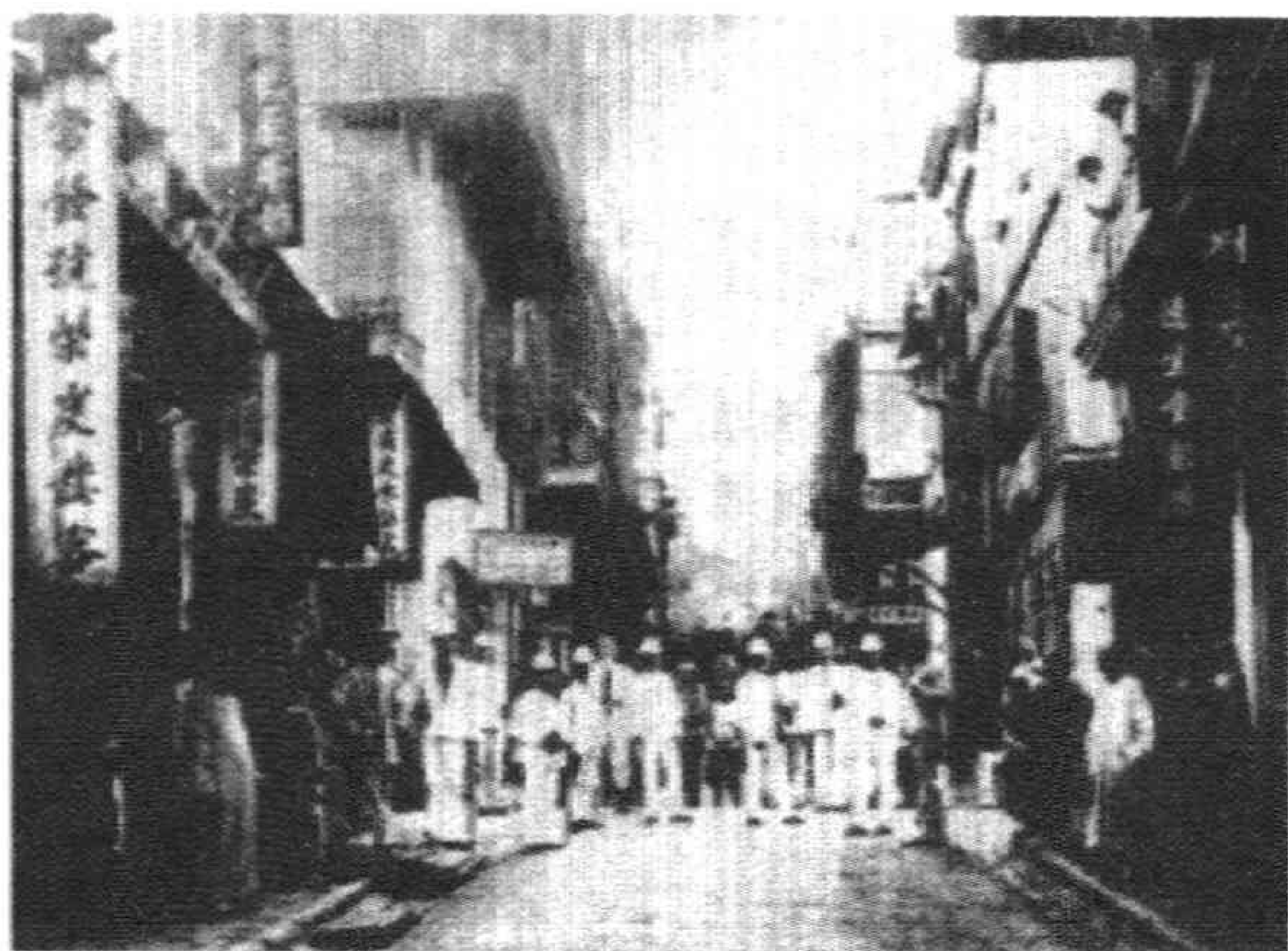
处，筑一私人高级游泳俱乐部。1946年6月23日开幕，这个私人高级游泳俱乐部，有一个如同“七姊妹”一样十分女性化的、令人遐想的名字——丽池花园。

开幕那日，李裁法举行一场游泳慈善表演，并举行慈善小姐选举，全场收入悉数捐给香港慈善团体。这是十分典型的海派宣传手法。于是一夜之间，他的“丽池花园”全港闻名，

从某个角度讲，丽池花园或是战后香港首家设施可与旧上海的高级夜总会媲美的。这里日间是纯粹的游泳场，晚上，则灯红酒绿，大有好莱坞片《出水芙蓉》的豪华辉煌之景。

或许是七姊妹在天之灵的一个善意的玩笑，这片地皮，始终与女人休戚相关。

这里先催谷出全国闻名的“美人鱼”杨秀琼，后来，又成为首位香港小姐的诞生地。其详细过程，会在本书“香港小姐”一节中详细写来。



香港洁净局帮办在街头工作。



1920年的西环。



1935 年参加全运会的香港游泳女选手抵沪时的留影。

“丽池花园”的选美只持续了两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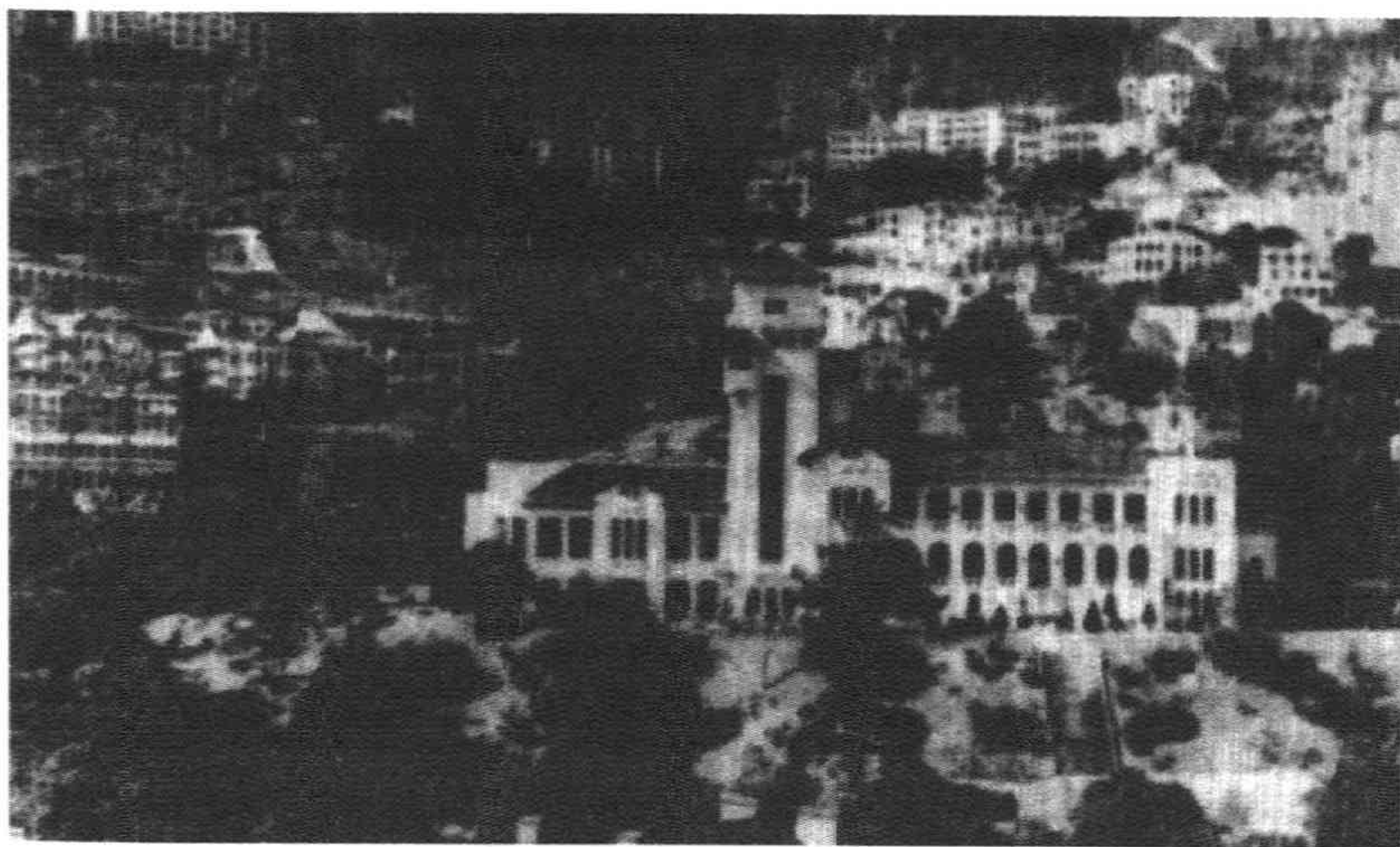
香港弹丸之地，靠不断填海来扩展市区。

“丽池花园”因政府的填海工程，终于消失。至今北角区一座旧大厦，以“丽池”为名，就是这“丽池花园”旧址，现在只是一座很普通的住宅大楼了。

原“七姊妹”区半山有一个名为“赛西湖”的山上水潭，现为一高尚豪宅区。

“七姊妹”这块地，堪称历尽沧桑，在香港众多地段中，其变迁之大，可为第一。从中，我们也可清晰看到，清末民初开始，香港如何走向大都会的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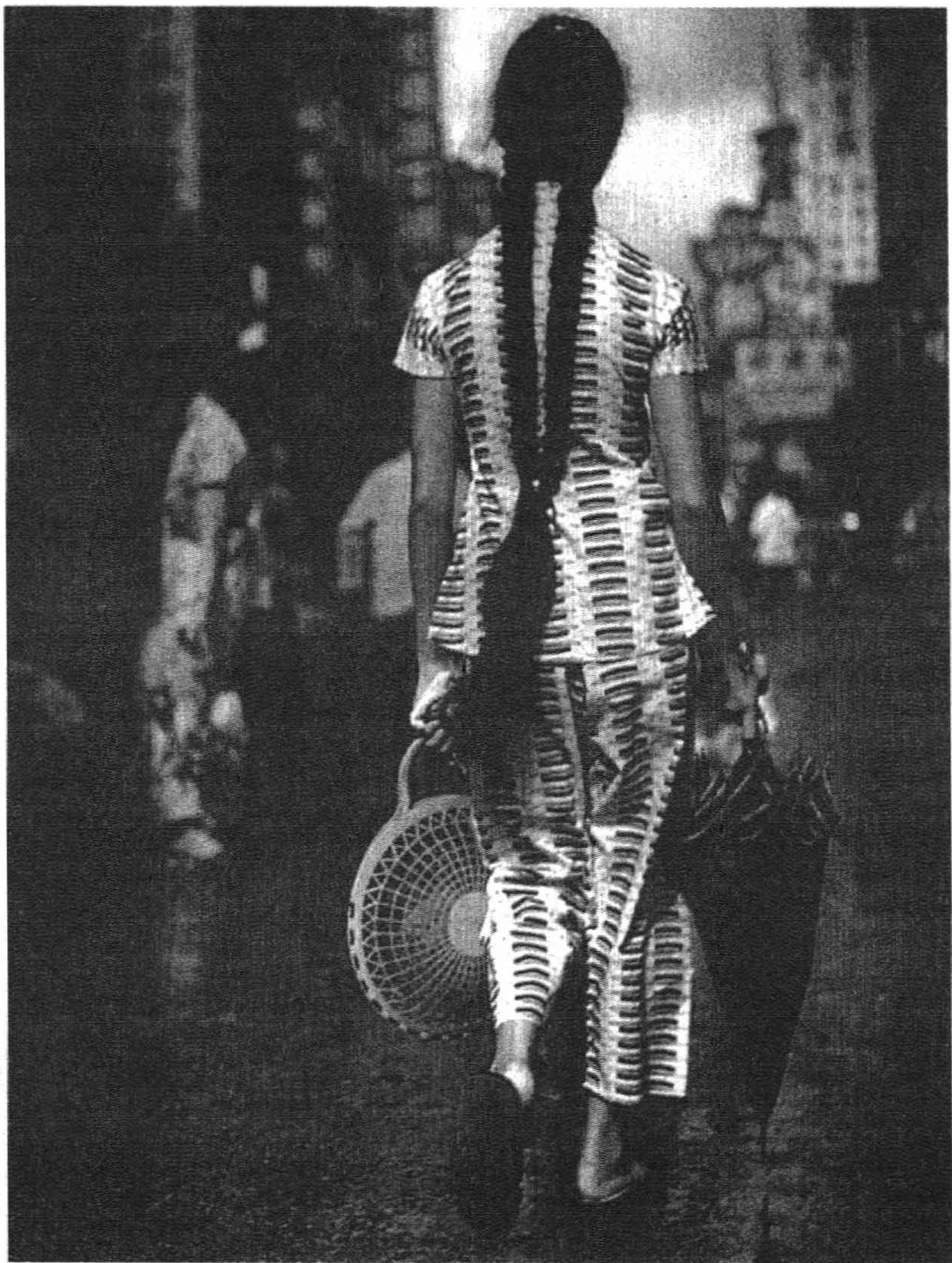
为此，特将此段放在全书之首，令读者循着“七姊妹”之路，逐个回顾“老香港”的旧日风华。



香港向山顶发展的欧洲人住宅区。



港岛西区华人村落。摄于186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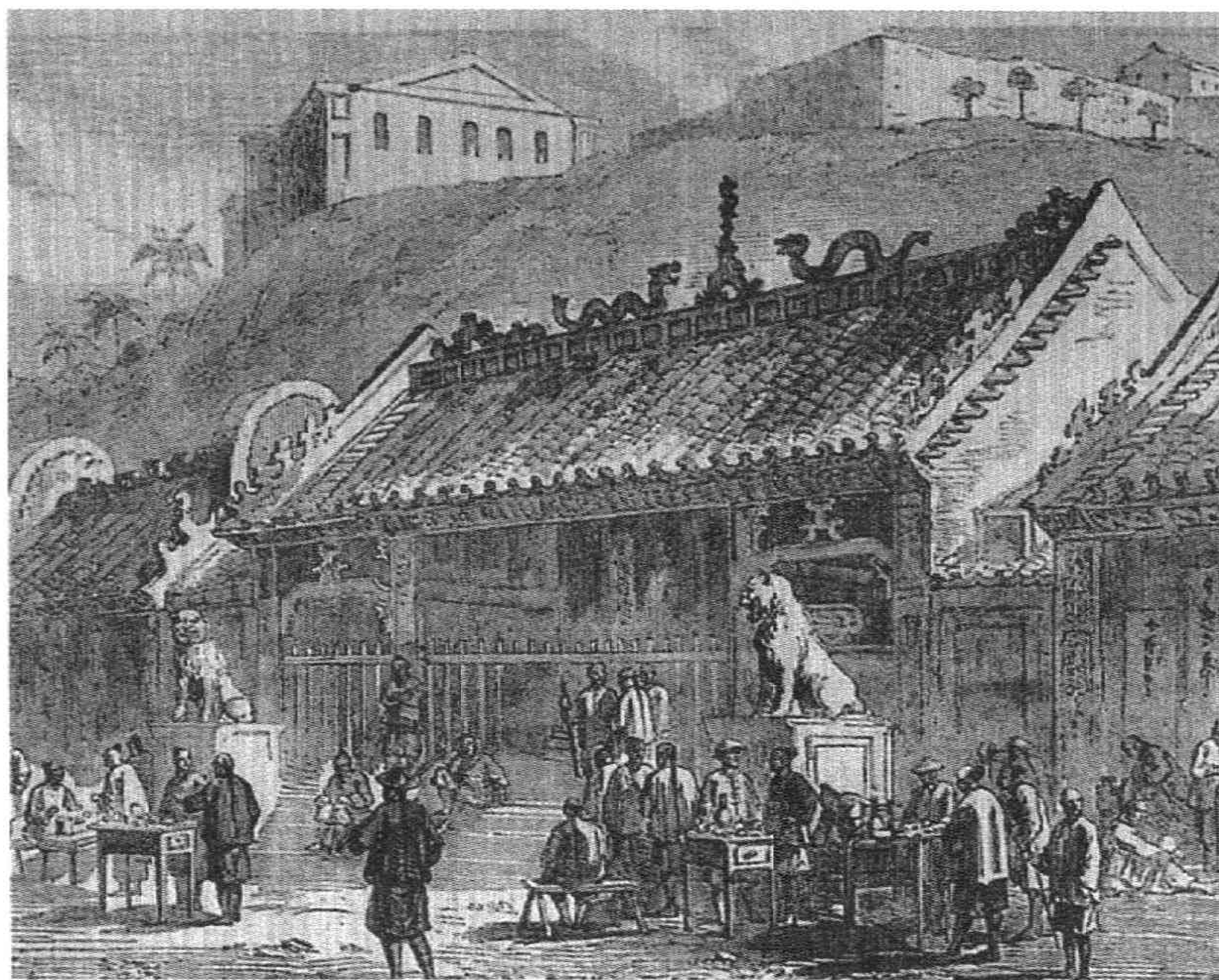


1963年街市偶拾。





尖沙咀跨海轮渡站。



文武庙图景。摄于1830年。









著名粤剧武生罗品超剧照。

粤语流行曲春秋事

中国12亿人口，最没语言和文化障碍而且能激起全球世界各地华人圈强烈共鸣的，当为粤语流行曲。四大天王引吭一曲，全球华人都可随曲一和，不论你是讲山东话、四川话、上海话还是云南话的，都可勉强卷起舌头唱几句走音的粤语流行曲：你说它是庸俗也好，格调不高也好，反正到了今日新纪元之时，相信仍是大中华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部分。

粤曲流行歌的雏形，应是粤曲歌坛。

香港最早的歌坛，是设在游乐场内。在20世纪初，香港出现的第一间游乐场，名为“太白”。游乐场内设有一座歌坛。而卖唱献艺的，则全部是妓女。



凤凰影业公司出品的历史喜剧片《抢新郎》的宣传剧照。

清末民初，香港的社交之风，要比内陆北方开放，但良家妇女要抛头露面出来唱歌，这还是不成的。因此惟有妓女来顶场。可见妓女是粤语流行曲的先驱，有了她们打开歌坛的市场，才渐渐有了专业歌伶。

初时歌坛唱的都是粤剧，有点类似折子戏，即粤剧中最精彩的唱段。而妓女一般都是能唱会弹的，因此颇受欢迎。当时没有“天后”之称，但来



早期的港版粤曲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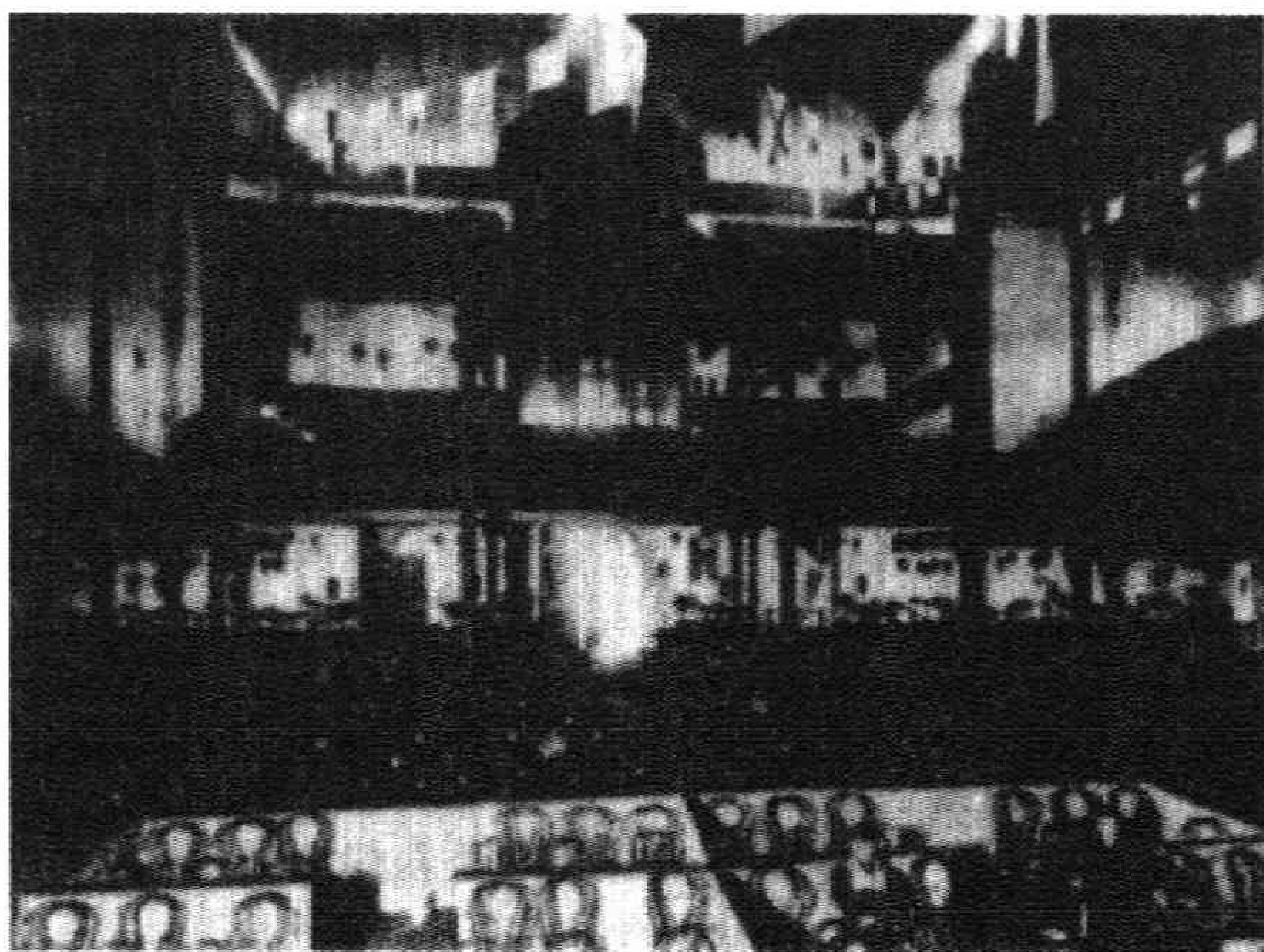
自石塘咀的红牌阿姑，是知名度最高的歌妓。

歌坛设在游乐场，注定它自一问世，就具备草根平民的血液，难怪它的生命力特强，历时百多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的政坛风云，粤语流行曲至今仍充满生机，男女老少，不分年龄层次，只要你是华人，大多能从中找到一份慰藉，就因为这份平民意识。

早期歌坛甫问世即颇受香港市民欢迎，就因为它的平民性：收费比戏院里的正式粤剧便宜，同时随票还奉送一壶茶，好比今日入场奉送一瓶可口可乐或一杯饮料。小市民是最易受宠若惊的。再



粤剧《紫钗记》是早年香港粤剧片杰作之一。



1909年香港太平戏院内景。

说小市民一般都没余钱去石塘咀召如红牌阿姑这样的名角来陪酒唱歌，如今只要花得几个铜板，就可欣赏名妓风采，也是一种满足。

进入20世纪20年代，电风扇开始普及，香港茶楼为招徕顾客，全部装上吊扇，凉飕飕的吸引大批茶客，歌坛便由露天游乐场，移入茶楼。

香港首家设歌坛的茶楼为富隆茶楼，也是首家装置吊扇的茶楼，旧迹今已无从觅寻!

1900年先施公司大楼在中环德甫道中建成之后，为迎合游乐场市场需要，将天台布置成楼台亭阁的园林景色，称为“天台游乐园”，其中也设有歌坛。其最大的不同，就是歌坛献唱的不是妓女，而是业余优秀的粤曲爱好者，令歌坛层次上升了一大步。

自民国成立后，香港女子开始有受教育的



粤曲爱好者的即兴演唱。

机会，一些社团开设的音乐部，在民间也培养了一批业余粤曲爱好者。但她们不屑于与妓女同台演出，先施公司的天台歌坛，给了她们机会。或许可以讲，先施的天台歌坛，成了早期专业粤曲歌手的摇篮。

不过，直到20年代中叶，尽管已有专业歌手出现，但其中大部分还是妓女出身的，她们通常是在25岁以上，算“老”了，但因唱得一口好粤曲，便索性离开妓院，以唱为生活收入。应该讲，她们属香港早期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的先驱之一。

当时全港设歌坛的茶楼，已有好几家，单靠妓女和部分专业歌伶撑场面，已供不应求，当时还有一批失明艺人，也加入这个行列。

我们从中看到，粤语流行曲小荷才露尖尖角之时，已是充满了商机，是市场的催谷，这注定流行曲天生就具备浓厚的商业基因。其实今日流行曲和唱片市场及歌星的炒作，可以讲其运作模式与百年前，大同小异。





▲聚集在影院门口争睹影星风采的香港影迷。

◀美国电影演员阿娃嘉娜访港时情景。



“大中华”留声机器公司唱盘广告。

歌迷追星族——舅少团

今日年轻人都有追星习俗，天后天王红星都有自己的歌迷会。

早在百年前，香港也已有专门为歌伶捧场的歌迷，称为“舅少团”。“舅少”在广东语里原意为新娘子的兄弟。以此称当时的歌迷，或者是因为那时歌伶都是年轻女性，歌迷们捧她们的场，无微不至地维护她们，以至那时的香港报纸专栏作者称他们为“舅少”，一时叫开，其中并无任何不雅的成分。

今日的歌迷，对自己的偶像明星演唱会必早早邮购入场券，热烈捧场。但早年的歌伶，常要赶场子，忠实的舅少团们不仅晚晚必来捧场，而且随着她们赶场子，十分忠诚，风雨不改。“舅少”成

员，当然是非富则贵的有闲阶级。一般舅少团有二十来人，自然大多为时间和口袋都宽裕的富家子弟。一般当时茶楼近歌坛的几张台子，一早已预定的，称为舅少团座。那时的红角，除斗唱腔斗风头外，有多少大小规模的舅少团，也是其斗的项目之一。



著名影星夏梦生活照。

一般歌伶歌罢下台，经过舅少捧场的客台，都会与他们应酬，行内人称此为“拜山”。

今日在娱乐场所演唱的歌手，也会走下台逐一与歌迷握手，想来就是来自“拜山”的旧俗。

香港电影明星探访孤儿院。



所谓百变不离其宗，今日华人的通俗音乐文化，正是从早期香港的歌坛中演变而来，通俗音乐生命之根，已一早深扎在民众心里。



香港皇后大道中。



中环大会堂（1890年）。



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曾。擅演丑生，其创造的“马派”艺术在国内外颇有影响。

用唱片推广而真正达到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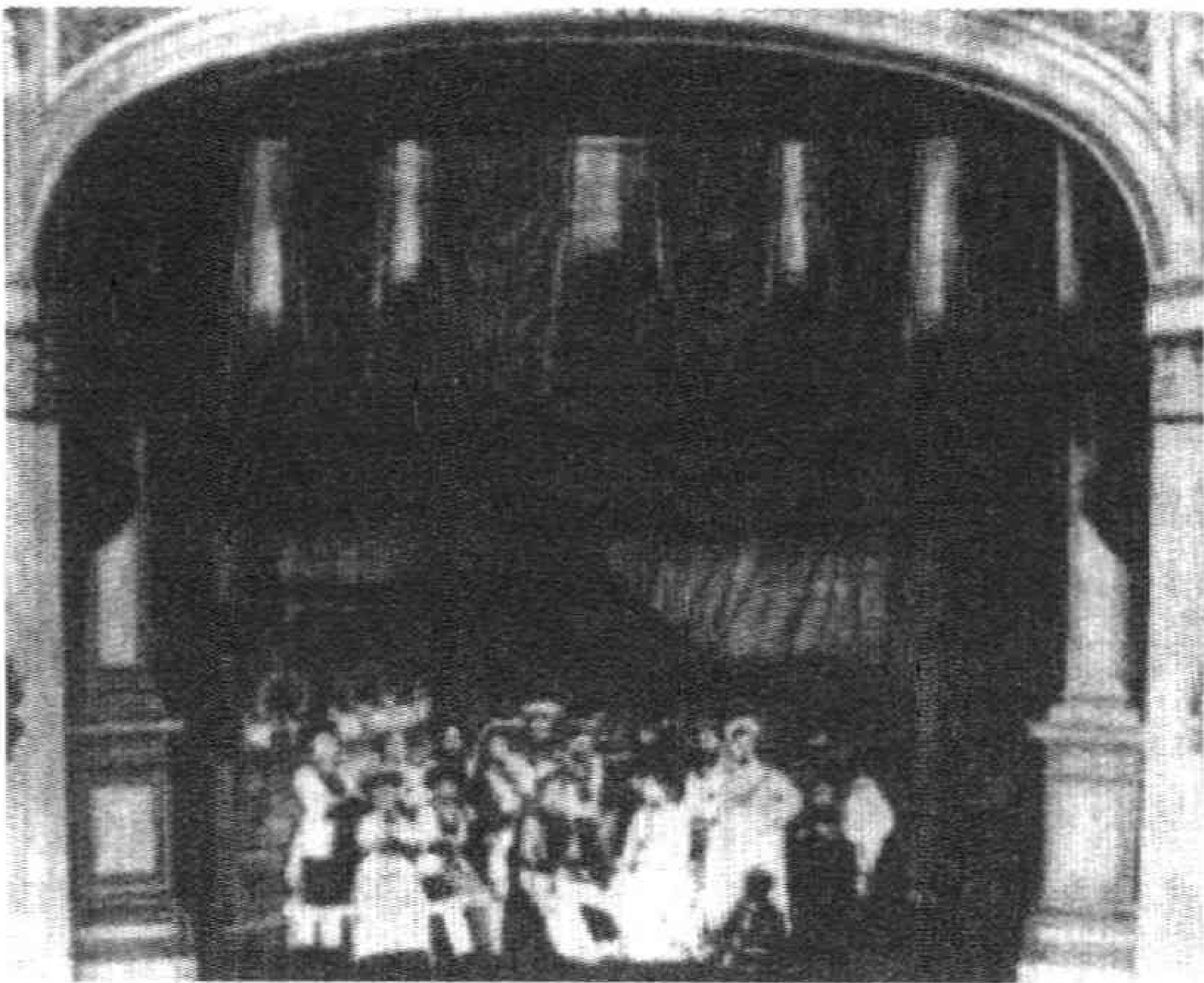
香港唱片公司在1919年，已有灌制唱片。到1920年后，规模日渐壮大。

唱片对歌伶事业影响很大。今日的流行歌星演唱会，能够连开二十多场至三十场，完全是靠录音带和唱碟的推动。

香港早期的歌坛唱家也是一样，靠唱片商灌录唱片成名。当时留声机在香港已风行，唱片因而销路大增，直接将歌坛的歌声带进家庭去，歌坛获得一群家庭听众的支持，于是，也引起家庭妇女去歌坛听歌，加速粤语歌的流行。

同时，一批新白话文人开始舞墨弄文，为自己喜爱的歌伶填词作曲，他们大多受新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不自觉地为早期歌坛的粤曲，加入西洋

音乐和白话浪漫诗文的元素，令香港早期的粤曲歌坛开始具有西方流行曲的元素，逐渐为一批青年学生所喜爱。


香港的戏剧表演。摄于1880年。

广州、香港、澳门历来是三个血缘密切的姐妹城。三地早年都有歌坛、游乐场和茶楼歌坛之设，再加三地又近在咫尺，常互相交流演出，一如今日的巡回演出，令粤语歌坛不断有新的刺激，推陈出新。

与上海30年代一样，1929年始，香港的都市流行文化开始繁荣，主要原因是，香港电台在这一年推出中文节目。电波无形中替歌坛作了义务推广员。尽管上海当时也有如金嗓子周璇为代表的国语时代曲，但粤语歌坛集省港澳三城市为一体，并延伸到全球各地华埠，再加上当时香港，连一般的凉茶铺为招徕客人，都会内置一台大型留声机播歌，令无能力的低下层市民都可以听歌，其覆盖面之广，远不是上海的时代曲所能及的。

当时香港出名顶尖的歌坛红角，要算小明星、张月儿和小燕飞三位。前两位早已作古，小燕飞仍健在，笔者一友人说，常在纽约唐人街见到小燕飞，其身姿面目，对一位已近80岁的老妇来讲，仍



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原名邝健康)，抗战胜利后在香港、澳门及东南亚一带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一度曾在香港组织真善美剧团，并参加了《家》、《春》、《秋》等多部影片的拍摄。红线女是粤剧舞台上流传最广的唱腔流派代表。

属姣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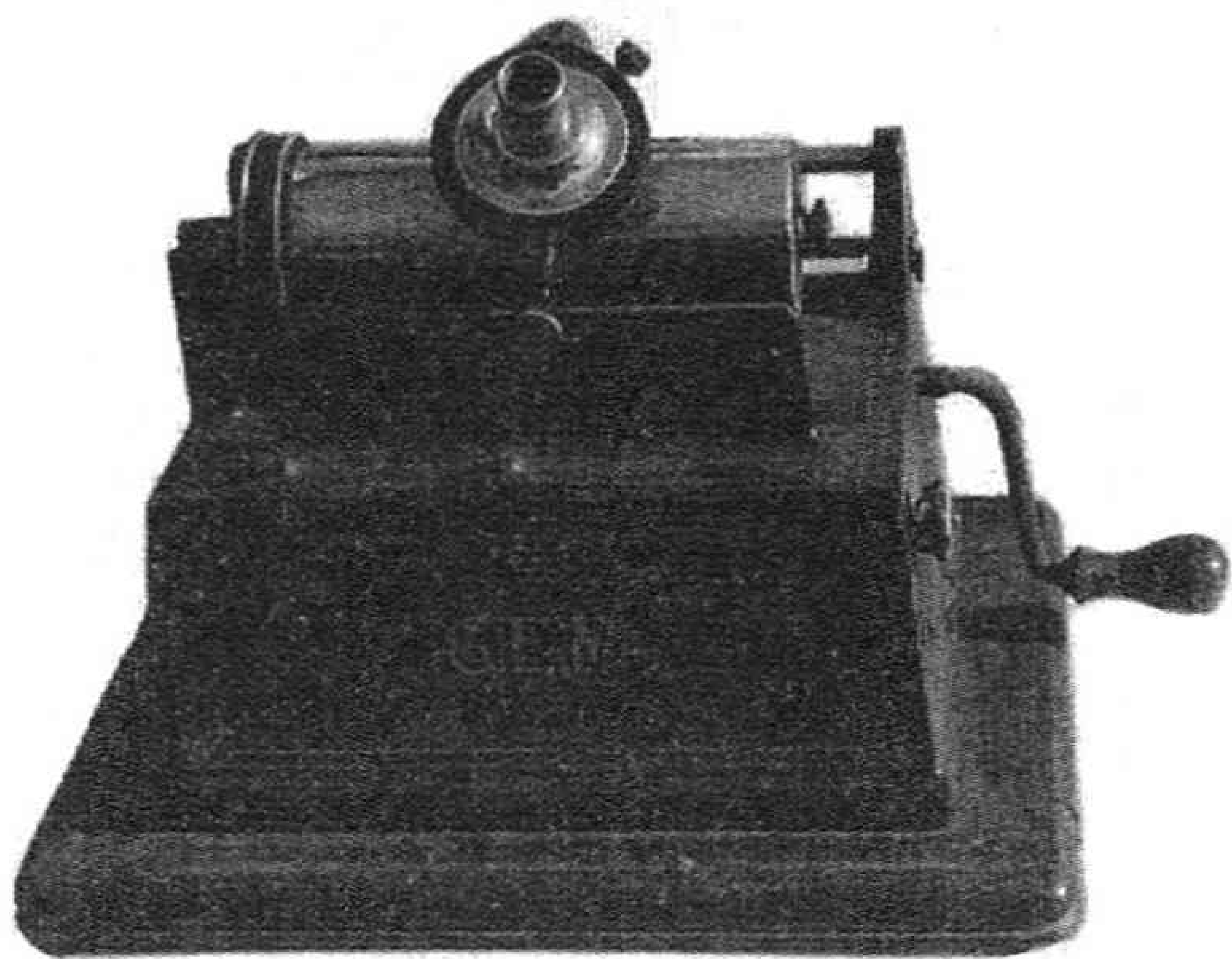
粤语流行曲的真正黄金时代，应该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新一代青年受英式文化催谷，颇易接受欧洲流行曲。其中一群音乐人认为，如果用香港人日常用语来演唱有西欧韵味的曲调，唱者更易表达感情，听者也会更投入。于是一群音乐人就发起，将西方或日本流行曲曲调填上粤语词句来演出，从而成为香港音乐人在中国通俗文化上一项最伟大的发明。

这种用港人日常口头语配以西方流行曲旋律演唱的歌曲，甫问世便以雷霆万钧之势流播，广为市民欢迎，从而成为香港本域特定的流行文化，很多经典歌曲如《情人的眼泪》、《秋水伊人》等即产生于当时。至今，粤语流行曲仍具备蓬勃的生命力，为全球华人一曲难以释怀的乡音。

电视的问世，更令这种形式的粤语流行曲加速流行。

粤曲通常以五声音阶为主，粤语流行曲曲谱，大部分也是五声音阶。因为实践证明，这种音阶既方便填词人用粤语填，也方便用粤语演唱。渐渐地，这一特点，已成为粤语流行曲的特点。

要说香港的粤语流行曲，不得不提顾家辉、黄霑。他们一个作曲一个填词，创作了许多永久传唱的乐曲。



蜡筒唱机是流行于清末民初的声音传媒之一，也是最早的有声电影的伴音装置。这种好像缝纫机的装置上有一个金属圆筒，把蜡筒套上去，再把识音触头按在蜡筒上，声音就会从触头上扩散出去。蜡筒唱机只流行了几年就被唱片唱机取代了。

流行音乐是年轻人的市场，流行乐之所以“流行”，必因其满足了年轻听众的需要。所以某一类音乐之流行，可反映当时青年的普遍心态和文化状况。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披头士为首的英国流行音乐大举进侵世界，创造了一次英伦侵袭，当时的香港，自然首当其冲。这种新浪漫音乐文化主要元素就是对美观外型的重视，新颖的衣着、发型以至化妆，都显出浪漫的焦点——强调感官——视觉和听觉的高度享受；而70年代中期兴起的电子热，令电子乐器科技愈益先进，将流行曲习以表达的那种怨哀、渺远、抽离甚至酷冷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





1920年的留声机广告。

一切将香港的粤语流行曲，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姚苏蓉、徐小凤是那个时代的两大歌后。

当时年轻人流行夹“Band”，即玩音乐。且热衷唱英文流行歌，或唱一段粤语，第二段再唱英文，甚或英汉夹杂：如“你hurt(伤害)我的心”，或“大家齐齐去happy(开心)”，“Love已经over”(爱情已去)，“My heart依然没有over”(我的心依然没有冷)……这是香港华洋交杂文化最典型的写照。

此时的香港流行曲表演舞台，早已脱离了单一的小规模的茶楼。一方面通过空中电波：即电台和电视台，传向各方；另外，在高级夜总会、高级茶楼“听歌”，已成为它们经营生财之道的主要财源。最受青年人热捧的就是可容纳千人之座的在体育馆进行的演唱会。

港片《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十分真实地反映了70年代香港流行歌坛的实况。

光阴倏忽，当年一代青春少年已步入中老年，但伴着他们度过青葱岁月的一代劲歌，终也不老。难怪每有“怀旧金曲”音乐会，仍是座无虚席。即若像已中年发福、身体大了几个号码的徐小凤每次由美返港开演唱会，昔日歌迷仍会趋之若鹜，声势不亚当今红歌伶。



一次港星们的济贫演出会。

徐小凤的造型，永远是凝定在60年代，台下的听众也大多是与她差不多年龄层次的，他们随着她的歌喉，摇着与她一样的中年发福的身躯，唱着当年他们年轻时代的旋律，如痴如醉!就在笔者撰写此章时，电视上刚推出一位在70年代红透半边天的歌伶黄丽明，五十多岁的她一身中式打扮，甫出场就引来在场观众的掌声。她即将入院做一个危险度极高的心脏手术，做手术前，电视台与她自己，特别要求再为香港观众表演一场，其深远含义，尽在不言中。

黄丽明一曲“情人的眼泪”，令全场观众眼泪涟涟……台上台下，一片欷歔，实在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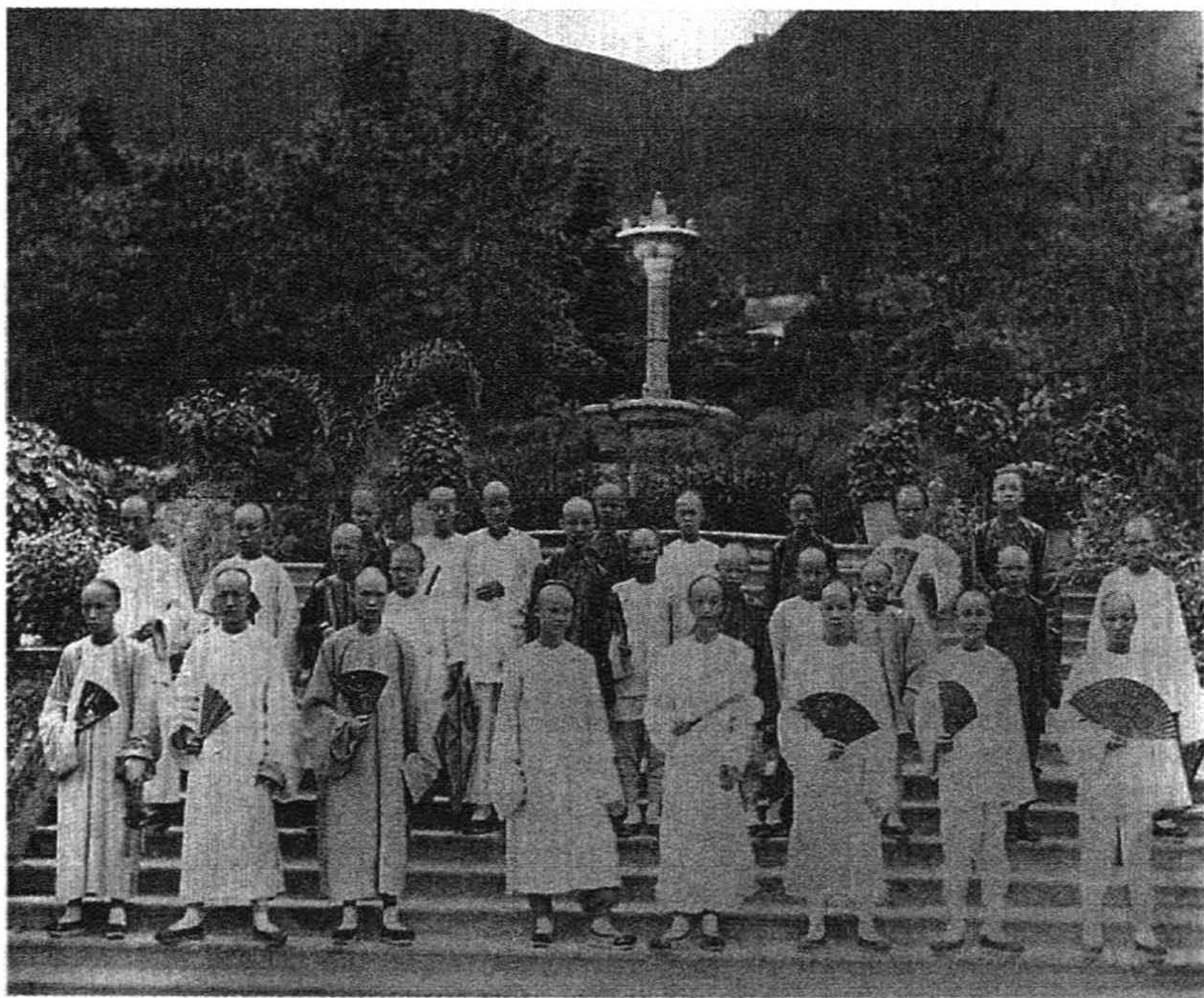
流行歌曲是都会一种特殊的语言，香港粤语流行歌曲更是近代中国都会文化和流行文化一个重大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华人文化不可忽略的一

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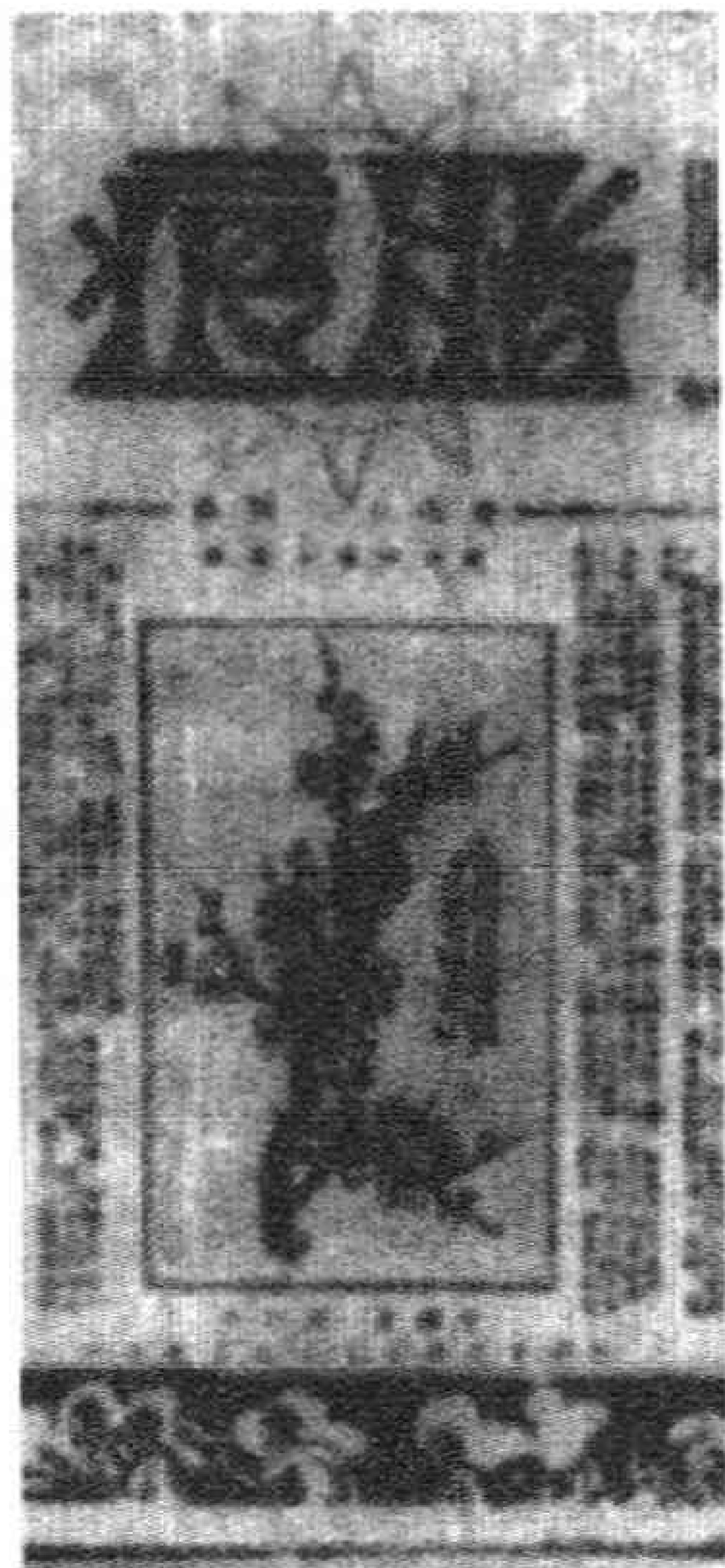
香港人听演唱会，首先要求唱的歌要是自己熟谙的，要是时代的经典。

怀旧金曲演唱会之所以场场可爆满，是因为人们与其说买张票来听演唱，不如说是来买回一点回忆！

香港市民游览植物公园。摄于1869年。







1928年香港出版的一份妇女杂志《脂痕》。

红歌伶“小明星”的殒落

正如前文提过，早期歌伶多为妓女出身，这决定她们即使大红大紫，无奈红颜命薄，整个人生仍是一曲凄哀的悲歌。

小明星，原名邓小莲，一直暗恋她的著名雅士撰曲家王心帆，为她改名曼薇，“小明星”之名，是由她的启蒙师傅给的。30年代是小明星的全盛时期，1942年农历7月13日晚，小明星在广州添男茶楼歌坛登台，一曲《秋坟》唱至“鸳魄未归芳草死……”便吐血昏迷台上，次日即过世，当时只有30岁。

◀红歌伶小明星，广东三水人，原名邓小莲，改名邓曼薇。她11岁拜师学艺，12岁登台演唱，是活跃于省港澳的曲艺名歌星。

细观小明星照片，倒一点没有“姣”味，清清纯纯的似个学生妹，只是眉眼间有股显然的哀怨，我不懂面相，但总觉得她生就一脸薄相。她短短的

水調歌頭　話星曲有感

高雅出塵表，衣薄襯身輕，神仙無此飄逸，一世更多情。爭奈前生有恨，難傳東風吹去，竟帶到今生！論落瑯琊畔，算聞自聰明。憐星眸，旋粉面，吐新聲，歌喉絕世，何用玉貌始傾城。唱到海揚塵處，搖曳姿生雲彩，腔轉入空天，度寫麻傾側，翠袖拂山青。

雷宏張侑作

余無語書

雷宏张先生即绿华词人，非小明星不娶，至今仍是孑然一身。曾撰《知音何处》、《恋痕》等词曲交与小明星歌唱。下图为雷宏张先生。



一生，除了有一副好歌喉和歌坛名气外，与情爱无缘，家庭之温暖无份。

小明星是广东三水人，母亲在妓院做女佣，当时妓女都要学唱曲的，小明星耳染目濡，自幼已懂唱曲，11岁正式拜师学唱，由于生活条件差，小小年纪已染上肺痨，后来也是死在这个病上。

只有小学二年级程度的小明星聪颖过人，她的成名曲有《前程如梦》、《秋坟》等，并自创“星腔”。



那是一种婉转、圆润的拉腔，岂但令观众陶醉，就是一班专业音乐家也惊叹其柔声细吐的神韵，不愧为一大创举。

而“星腔”的创作灵感，却是她无意中听到的一首英文歌“Broken Violin”(碎琴曲)，将此歌韵移花接木，从而融会贯通!

小明星邓曼薇女士。

细观小明星的旧照，谈不上漂亮，但楚楚动人，再加名气当红，自然引来不少狂蜂浪蝶，其中一宦海红员陈维周，是有“南天王”之称的广东要人陈济棠的兄长，愿以十万元大洋(30年代这笔款甚可观)及广州高尚区西关一座豪宅，欲纳她为第十二个小妾，遭读书不多、文化不高的小明星力拒。不为富贵金钱所动的小明星力拒的另一个动力，是来自当时有“曲王”之称的书生文人王心帆。

迫于淫威，小明星一介弱女子，心中实在是忐

忐不安，当下向王心帆求助，王以七字真言提点她：“薄命怜卿甘作妾”。短短七个字，令小明星立下主见，决不“侯门一入深如海”，遂南下香港发展歌业。

香港歌迷对小明星如痴如醉。可惜，当时没有版权法，小明星的大红大紫只是肥了茶楼歌坛老板。



林妹殊，小明星的闺中知己。亦是当年女活动家、女画家。

一曲《秋坟》是小明星的镇山宝，由挚友王心帆为她撰写。小明星所到之场，夜夜人潮汹涌。只是……曲名好像总有点不祥！

最后，小明星也是在唱《秋坟》中，吐血而昏倒在舞台，未几香消玉殒！

如果她尚健在，今年已是88岁的老妪！有时想想，在人生最绚烂之时突然停格，一如怒放的焰火，给后人永远留下那个娉婷动人的笑容，自有一种凄迷的美感！

红极一时的小明星曾两次自杀，都是为了一个“情”字。

初恋情人蔡保罗，想来一定一表人才，小明星将多年血汗如数奉给他，让他去维也纳进修音乐。岂知三年后，那个家伙拖着个金发洋太太回到香港，小明星即时吞鸦片自杀。幸好发现早给救回。

据说那个负心汉经传媒曝光后，连街都不敢出，怕被激恼的歌迷将他五马分尸。

第二位是一世家子弟，与她山盟海誓，不料最终屈服家庭压力和新娘丰盛嫁妆，另娶名门淑女。



马师曾与红线女演出《搜书院》剧照。

小明星再次自杀。

第三段恋情，则是一曲未曾开始，因此也永远不会结束的含蓄之恋——与文人王心帆的一段情。

在历尽情海折腾之后，这位红遍省港澳的红歌伶，曾婉转主动地向王心帆求爱："不如你我结

婚吧!我们应是很幸福的。他年即使我们老了，我可以教唱，你仍可以撰曲，那有多好!”一个红遍南中国和各国华埠的红歌星，对生活的要求，原来只这样简单!

只是，王心帆怯场了。

如果当初他承诺从此与她天荒地老，甘苦与共，或者小明星不会如此早死!

王心帆一直活到96岁，1990年方离开人世。比小明星多活了六十多年，终生未娶。

是因为小明星的盛名令他退缩?抑或骚客文人的秉性令他对“情”已有所惧有所疑?为了怕最终会消失，宁可一开始就不曾拥有?

如果这样的故事发生在资讯爆炸、手机可在几秒钟内就能将你从地球任何一个角落找到的今日，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呢?

写到这里，联想到邓丽君，她的名字与许多名男士联在一起……最终她去世时，仍是云英未嫁!

其实何止一个小明星，今日香港不少“天后”级歌星，她们半辈子唱的是情和爱，却仍是孑然一身，抑或她们的情早已耗尽在歌声之中!

▶ 由上至下：小明星、张月儿、白婵娟。







“前情如梦”王心帆

王心帆中年时期。

细观王心帆少年时照片，英气倜傥，很有《家》、《春》、《秋》中觉慧的气质，或者这正是早期城市新文化青年的真实写照。王心帆这一代知识分子，自小接受的价值观是要有大志有出息，要承担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尽然年少春衫薄，从中仍见到一抹有抱负的气概。

中年时的王心帆，经人生打磨，已转成一介儒雅倜傥、淡泊潇洒的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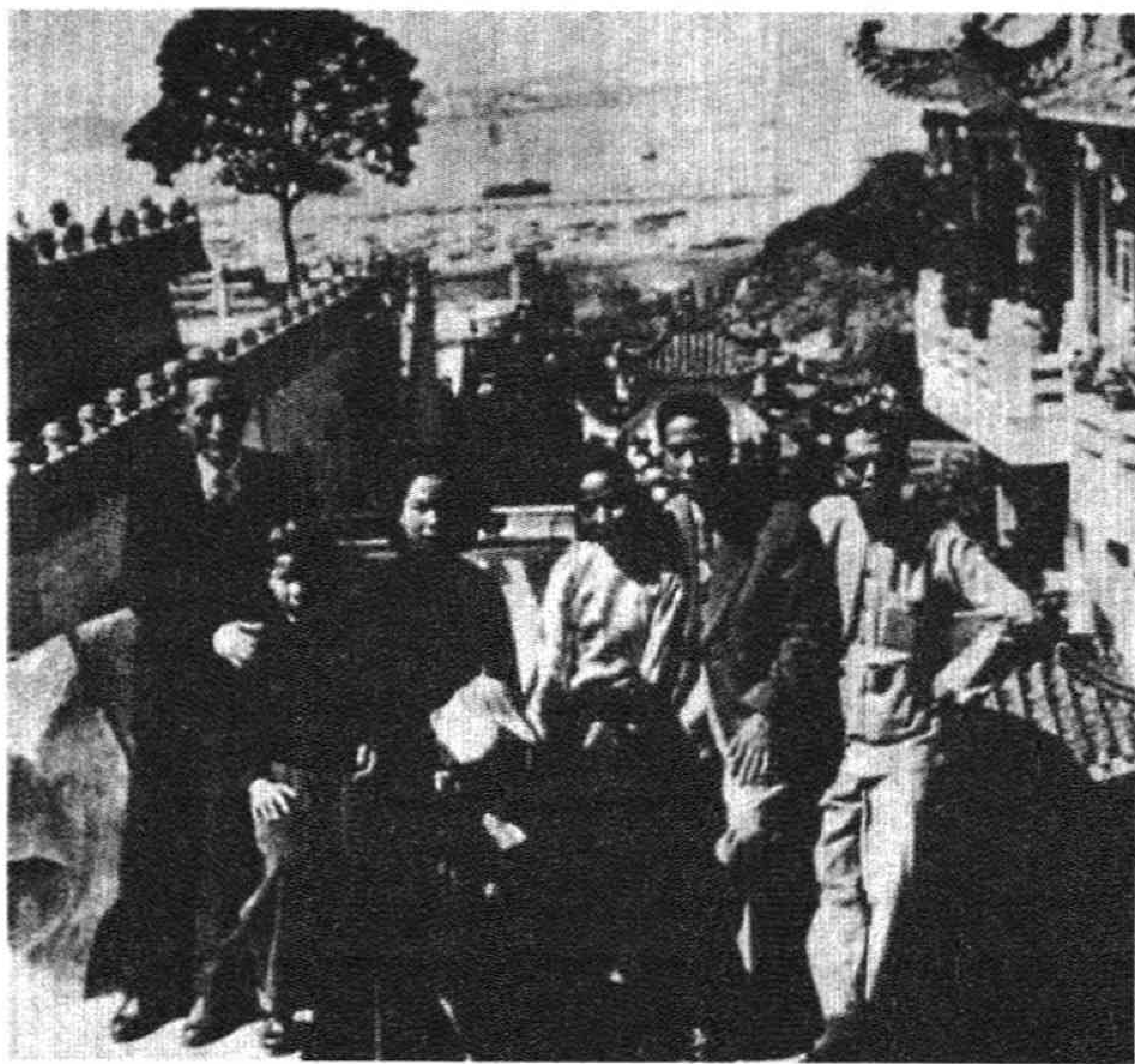
王心帆16岁开始投稿讽刺政事，编写时事新戏。讽刺盗国大贼袁世凯，场场满座。

王心帆喜诗词、爱曲艺，学生时代已自资自撰出版《梨园歌集》。

◀王心帆少年时期。

虽然他落笔柔情绵绵，似是一名风流才

子，但他本身却有一段军旅生涯，曾任过上校军阶，脱离军旅之后曾从商，后投身新闻界，间时作曲填词，舞文弄墨堪称多才多艺。



王心帆（左一）与未婚妻（左三）等人合影于虎豹别墅。

军人加雅士，相信当年的王心帆定是魅力非凡。

如同大多数文人雅客，王心帆感情丰富，至情至性，但却终身未娶。

他96年的人生，“只爱过一个半人”。一个是与他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后终因各人志向不同舍他而去，分手之际他当场晕倒，左手搁在火炉上灼得血肉模糊也不知，留下终生伤疤。

1926年他认识了小明星，从此开始不计报酬地专门为她撰歌，一共有三十余首，大都哀婉幽怨，是否这正是他本人内心深处对小明星那似在琴弦上悸动的似无又有的感情的写照？不管如何，当风华正茂的小明星在台上唱着自己撰写的小曲，他则闭目轻轻随曲击节，偶而一睁眼，与台上那对

寻觅的双眸一遇，那份共鸣、默契、甜蜜……典雅凝炼的曲词配上抑扬缠绵的歌喉，即使有情人终未能成眷属，但那谨慎地埋在心坎的爱意，把曲和唱融成一体，升华成艺坛瑰宝，一切一切，尽在曲中表！

可以讲，只有小明星才可以唱活王心帆的曲，反过来，没有王心帆的曲，小明星便没有那么众多的知音！

右一：王心帆，左一：吴一啸。



有曲圣之称的王心帆，耿直清高，儒雅淡泊。一直以文稿为生，以撰写文言小说、小品名驰文坛。惜岁月无情，再加香港报刊逐渐年轻化、时代化了，一代词人的文字，渐少人问津。

晚年的王心帆生活清俭，独自租住一个房间，一直过着孤家寡人的生活：上午在茶楼饮茶看报纸，下午在家看书写稿。富商何耀光一直钦佩王心帆的人品，拟每月资助一笔生活费给他，但清高的王心帆连政府每月发放给老人的六百余元津贴都不肯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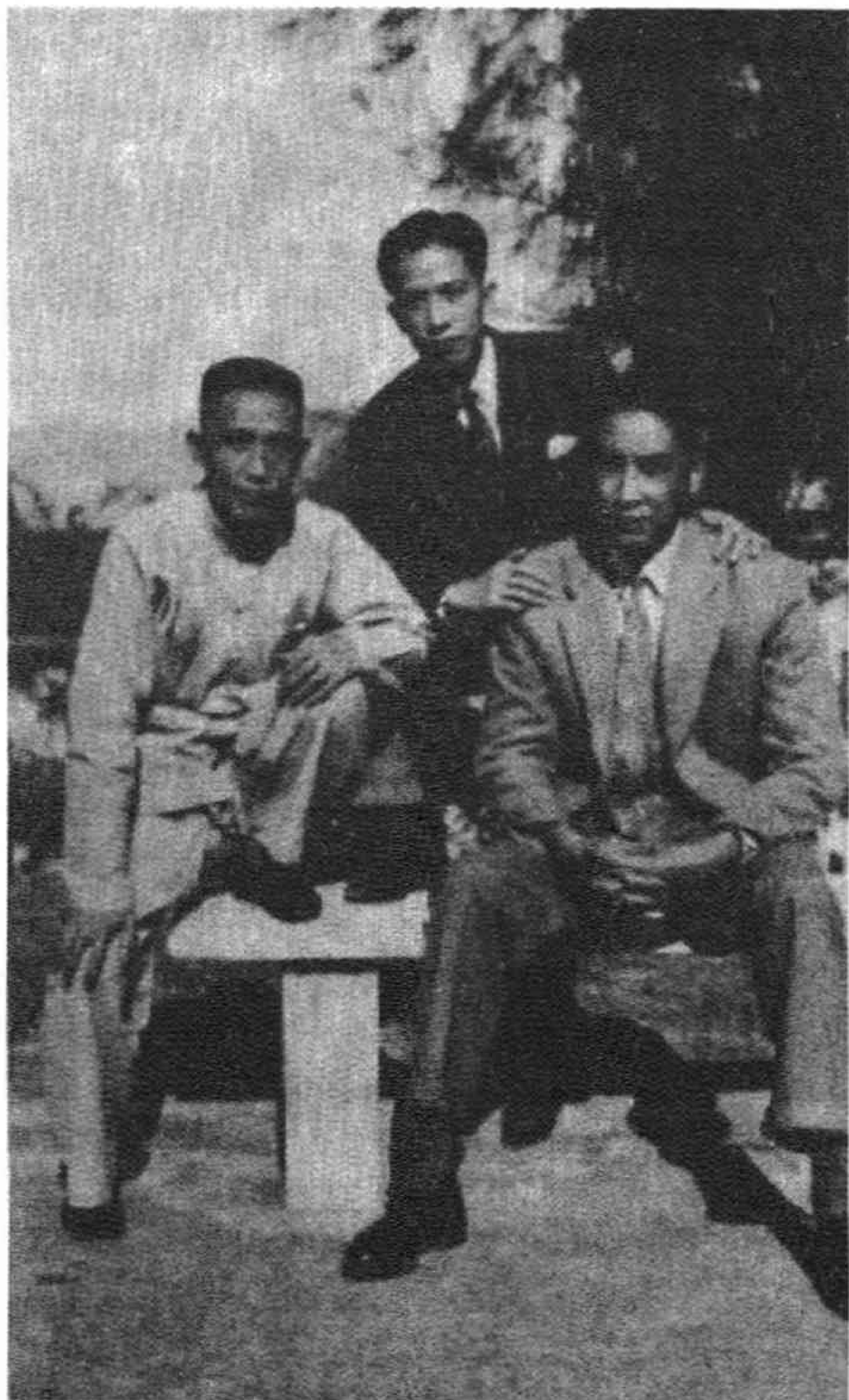
请，如何会接受他人的银钱资助?结果他只好托人购买王心帆的文字用作出书，王心帆才肯接受他的“稿酬”。

王心帆在96岁高寿仙逝。

长寿固然是好事，但有时想想，同一时代的见证之辈都纷纷离开，世事变得越来越生疏和不解，欲欷歔感叹一番都没有对象!

王心帆能健朗地活到这样高龄，除了生性洒脱淡泊俗事外，或者就是那留在记忆中的串串美好的星韵心曲。

在王心帆的丧礼上，有这样一对挽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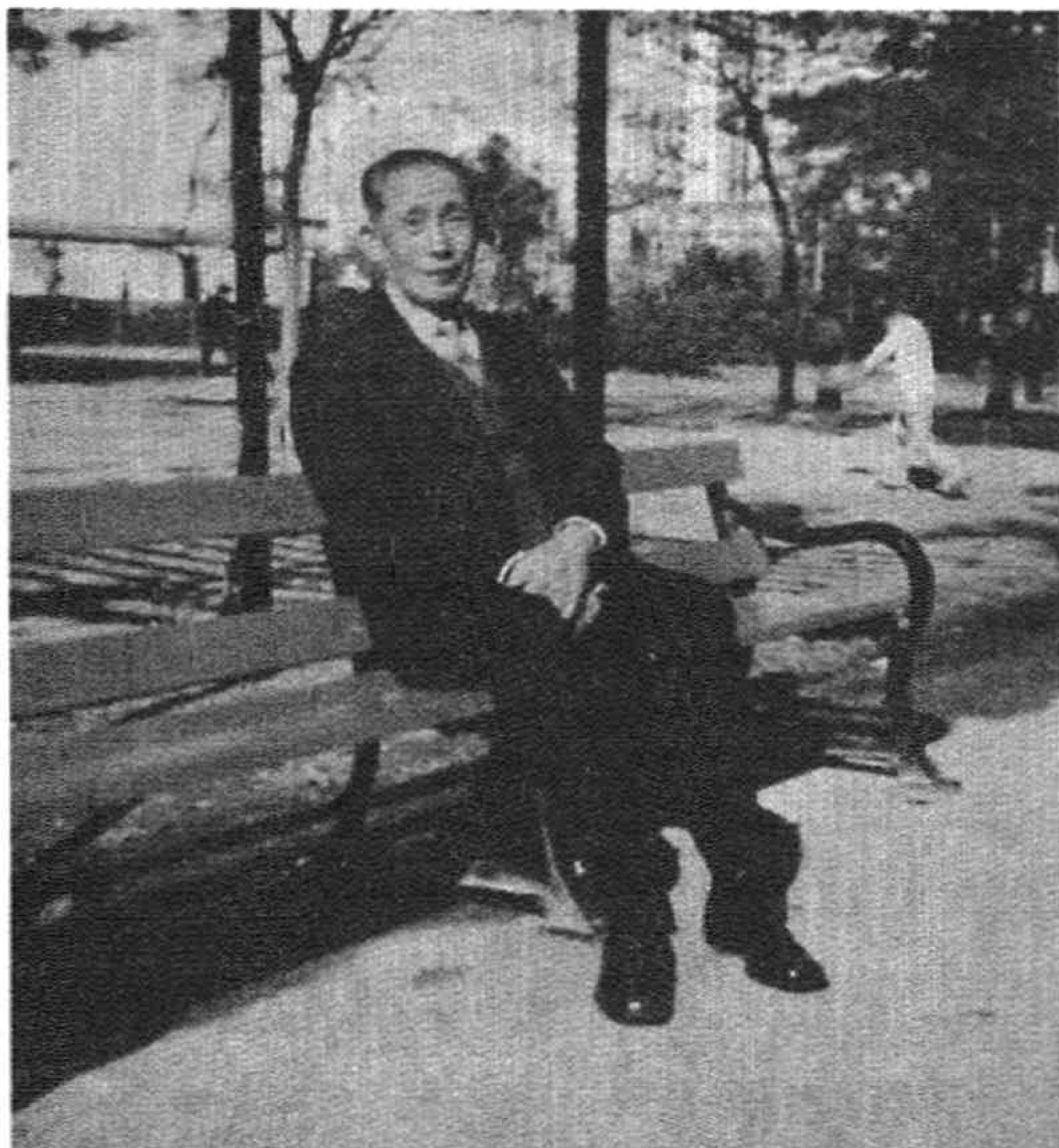


左一：王心帆。

大丈夫何患无妻风流不在衾裯负多少春宵
管城子欣然有侣心曲长萦星韵又五旬秋夕

他的灵位现安放在九龙钻石山与小明星同位。

脱离了尘世的小明星、王心帆，终可在天堂之际携手同游了!



王心帆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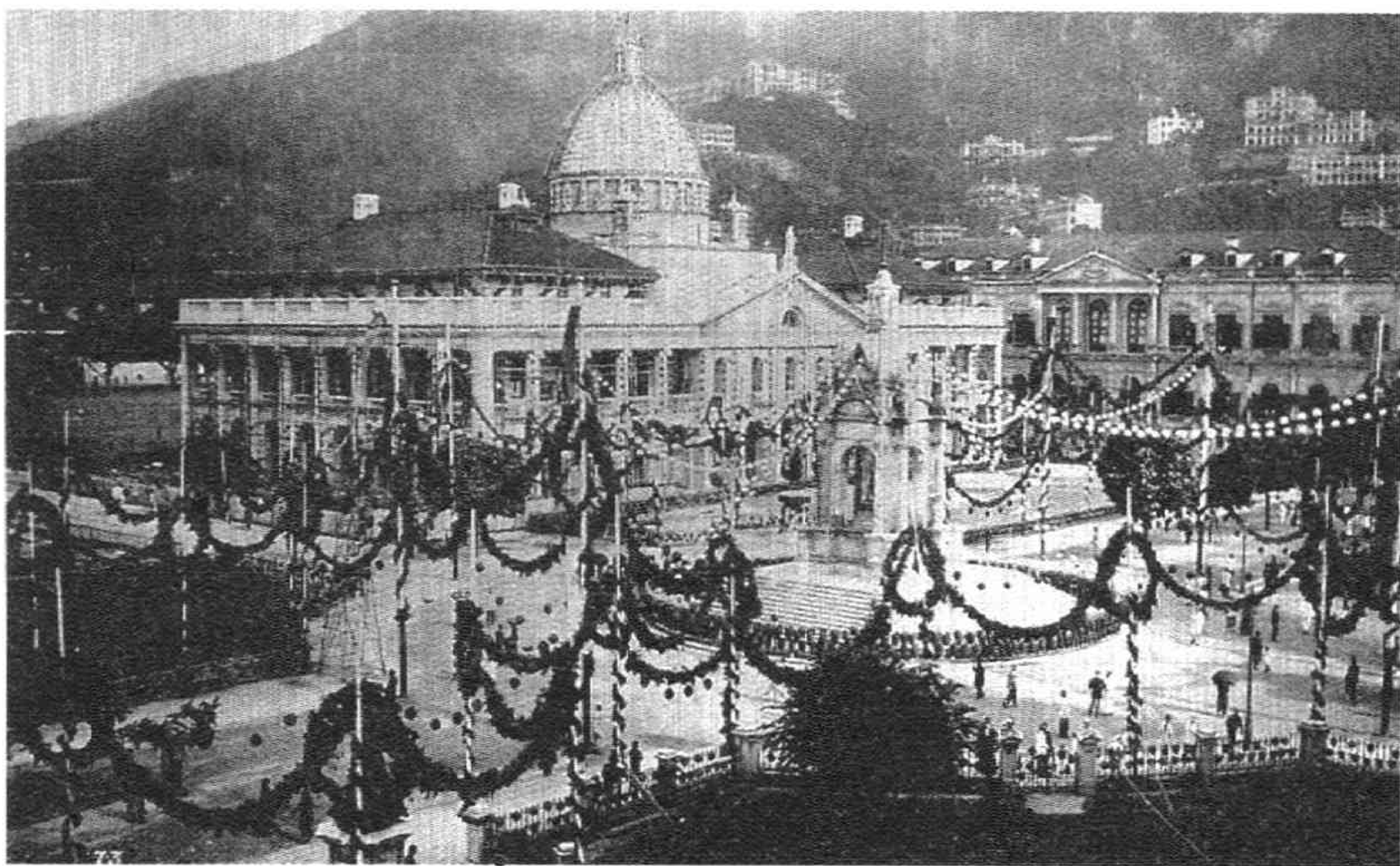
王心帆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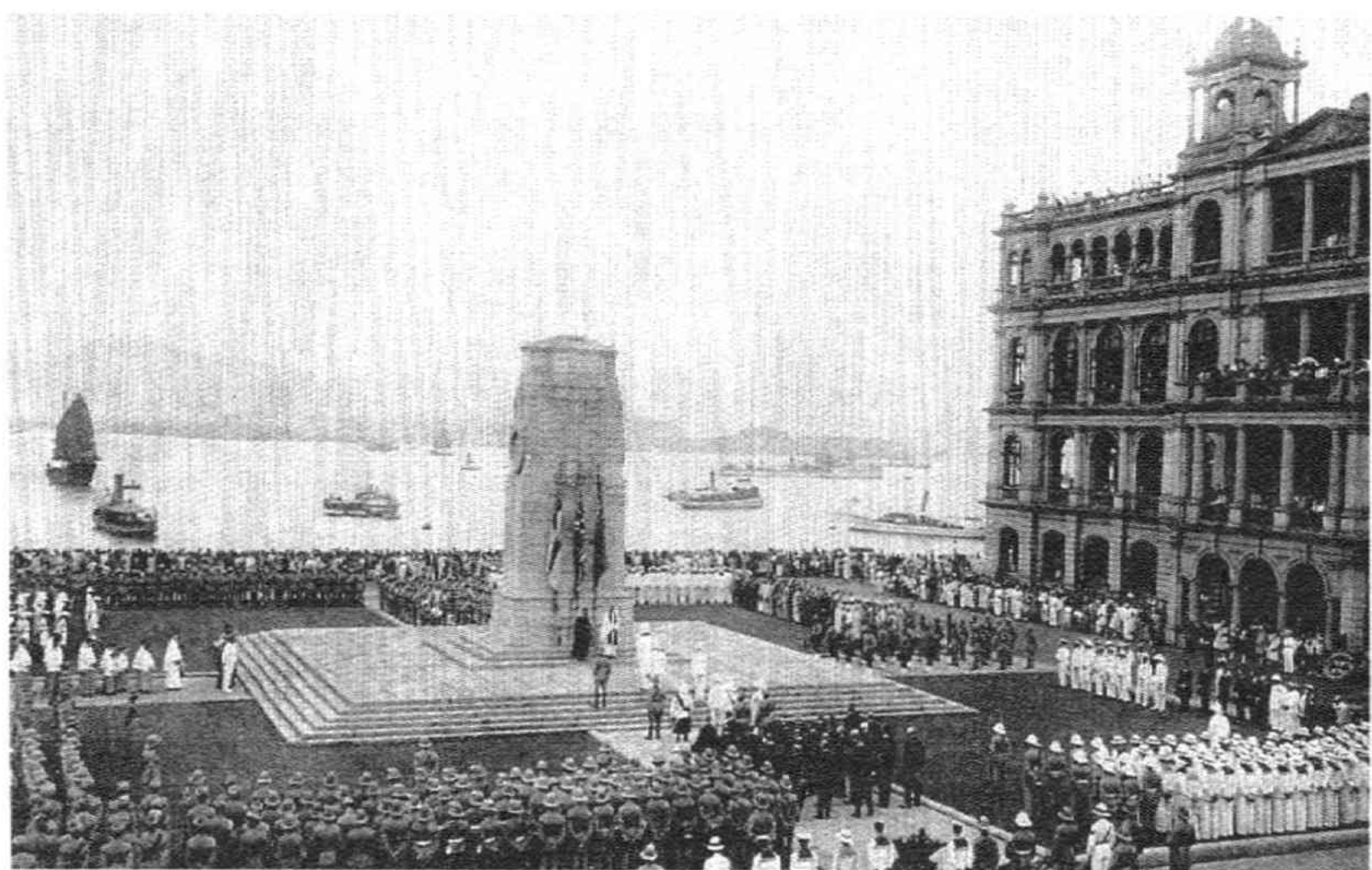


第二章





英皇广场的英皇登基大典灯饰。摄于1911年。



重光纪念日于大战英雄纪念碑前举行仪式。



影星尤敏获第六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

“香港小姐”年过半百依然年轻

城市与都会之分，不在人流的旺疏，不在建筑物的高度，……只在于，其间走出来的女人。

一个女人即使国色天香，如果生活在一个呈单线的、静止状态的、缺乏惊喜和高潮的城市，就成为庸脂俗粉，至多是一个小家碧玉，人海一星平凡的小泡沫：养在深闺无人识。相反一个都会女人，就算姿色平平，却永远知道抹上合适的口红，懂得穿合适的衣服，总有一份优雅不经意流露在其中。都会丽人之美，不在外貌，而在其感觉、经验、学识和智慧。因此，我们有巴黎女人、罗马女人、纽约女人、东京女人、香港女人和上海女人……

旧都会对男人的吸引，是“女人”和“输赢对半”的机会……都会对女人的吸引，只是一个字

——梦!单单为了这团虚幻的梦，足以会使一个青春弱女子赤手空拳离乡背井，如食了豹子胆般勇闯江湖!



50年代香港著名女星林黛旧影。

都会与大城市之分，只在一线，恰如一杯加了一片柠檬的冰水与白开水：小小一片柠檬和冰镇过的口感所带来的境界，就是“特别”与“普通”之所异!只是多了一点念头，一切都不同了!

一个制造不出时尚，没有传奇的城市，充其量只能称为大城市而无法称为都会。

30年代的上海和今日香港，是中国的两个大都会。是全中国女孩子向往的朝圣之地，是有可能攀上枝头为凤凰的一棵参天大树，而选美，相信是女孩子美梦成真的最直接、最能立竿见影的途径。

中国选美史上首位冠军佳丽，是1945年由上海公选出来的“上海小姐”谢家骅。

谢家骅是广东人，在上海出生，毕业于上海贵族女校中西女中，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著名的暨南大学创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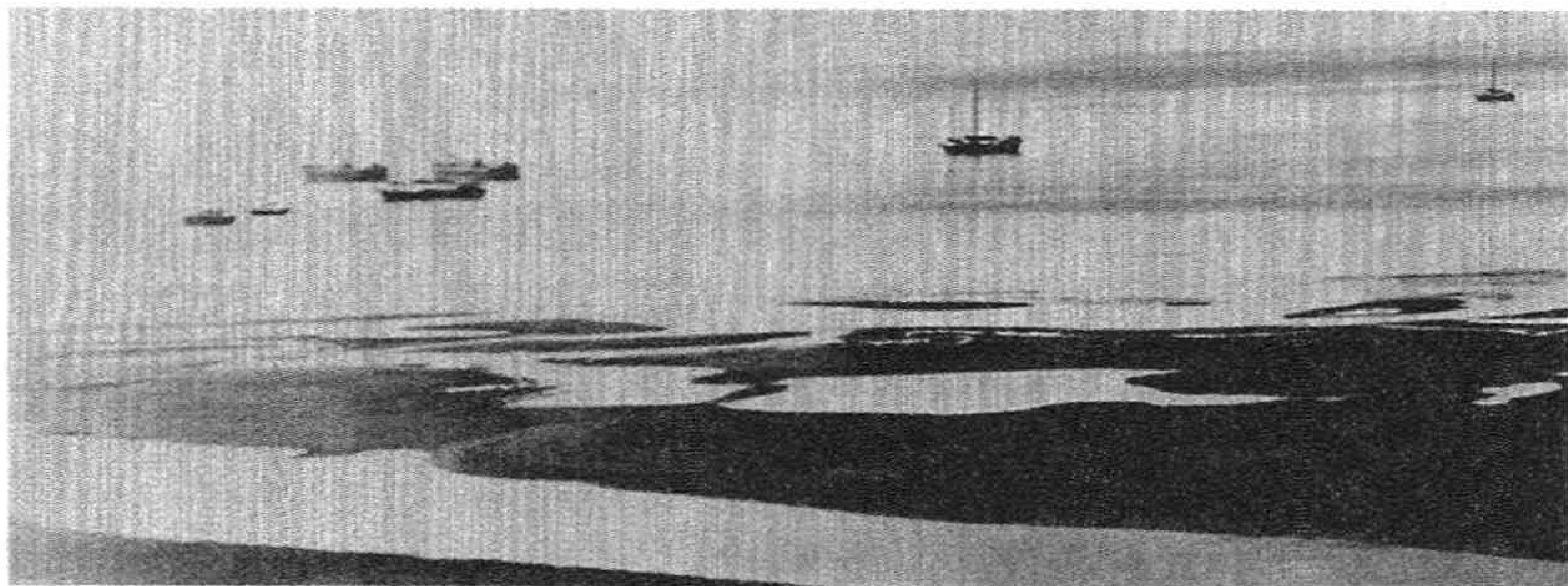
曾当选水仙花皇后的陈耐梅在港旧影一瞥。

上海不愧为东方巴黎，1945年日本刚刚投降，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上海人已开始迫不及待地要恢复旧时的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都会生活。

战后举国上下千孔百疮，百业待兴，在这时“选美”，从市场经济和社会民生的立场看，无疑是一注强心针，至少发出一个乐观的讯息：收拾心情，重建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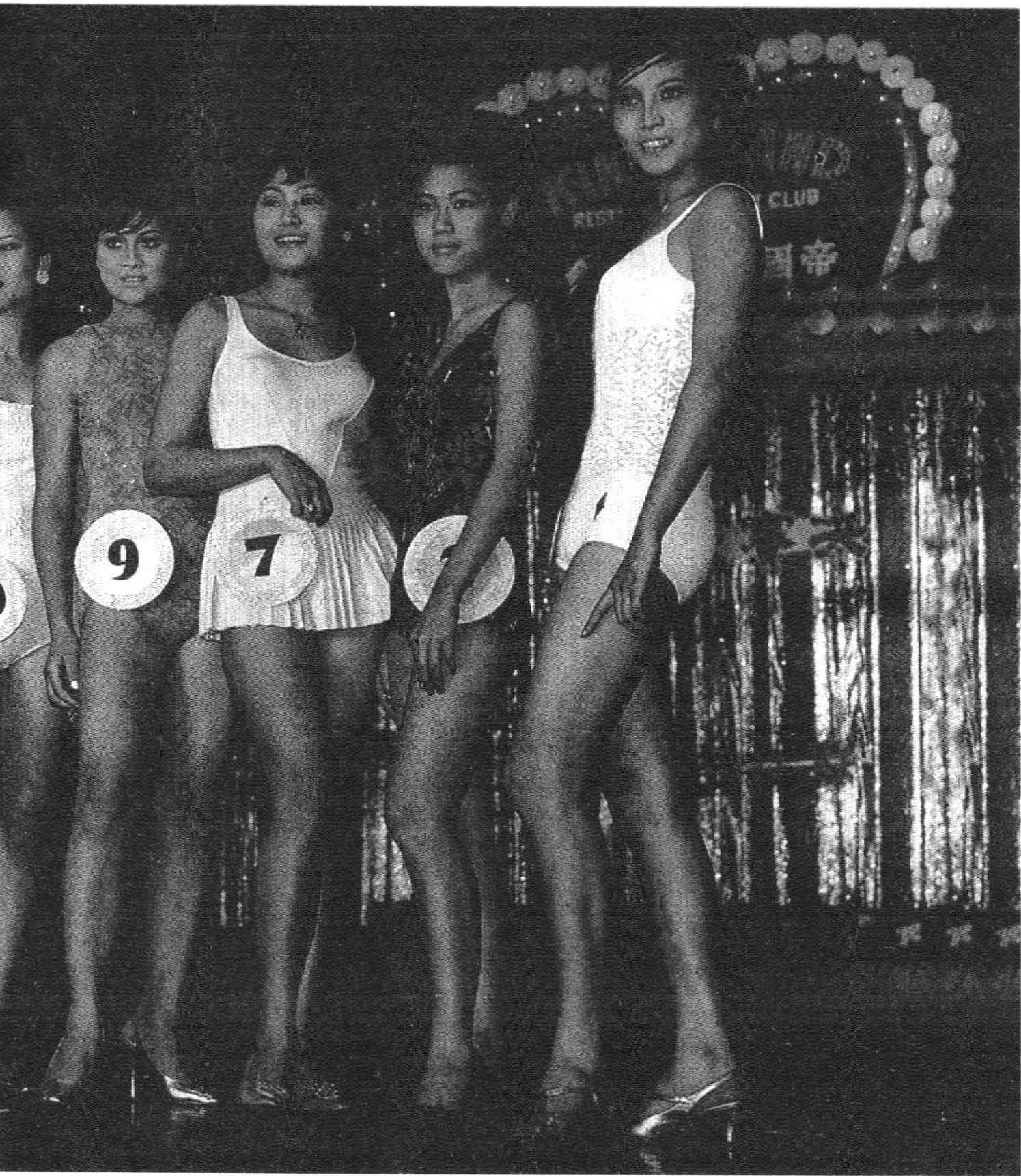
“选美”之所以能够成为都会备受关注的活动，并非完全因为台上有一簇美女在争妍斗丽那样简单，这念头未免过于庸俗。至少，“选美”活动代表一众蚁民对平和丰盛的生活的向往。

香港，作为大英帝国属土下的大都会，又岂肯让上海一家专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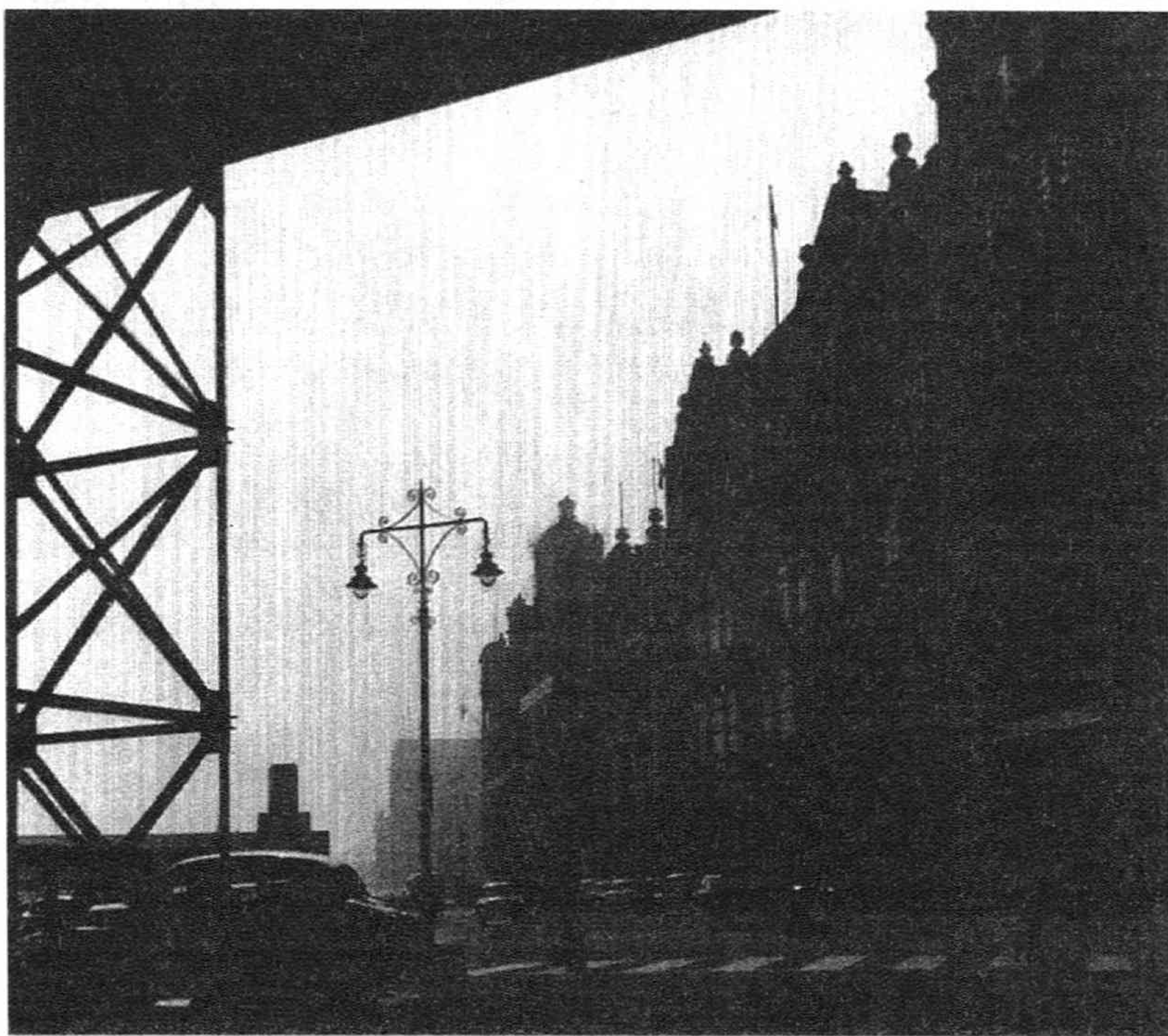


1868年西环。


19
16



香港首届选美会在丽池举行。



干诺道中。摄于1955年。



世界小姐访港留影。

首位“香港小姐”——1946年问世

香港经过三年零八个月“日据”的黑暗岁月，太需要一点升平的调剂。1947年，伦敦宣布举办“环球小姐”选美，同时宣布主办1948年的奥运会，一种从此世界和平的景象开始鼓舞人心。香港的海上闻人、“丽池花园”主人李裁法把握这个时机，宣布在香港选美。

在此之前，香港的选美，有很浓重的风月味。

如石塘咀妓院选过“花园皇后”；全港舞女也有“舞国皇后”之选。这些选美，并非以容貌、举止、谈吐为竞选条件，而只限于是否讨男客欢心。

1947年的选美，从品味与层次上，虽然仍不脱“花瓶型”味道，但至少开始努力向西方式选美的智慧型、内在型靠拢。



好莱坞女影星
斯德·威廉丝访港。

只是当时香港人思想仍很保守，所以报名的人不多，仍以舞女、交际花、女侍应等一类女性为多。

首届港姐选美，只在一个晚上，完成所有选美程序。首位香港小姐李蓝，为酒店女侍应。

首位上海小姐是来自书香门弟，贵族女校毕业。

首位香港小姐则是来自小家，且酒楼侍应小姐出身。

由此再次显示：早期上海女人的白领化和知识化比同期香港确实筹高几着。

当年共有11位佳丽竞选“香港小姐”，李蓝是最后报名的一位，却得到冠军。亚军是后来名驰港台和全球华人圈的流行曲歌后白光，季军是潘江枫。或者因为此次选美主办单位丽池夜总会与游泳运动关系密切，各参选者先后两次穿泳衣出场表演仪态，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华人圈中，此举堪属“香艳”。

当时香港小姐奖品，与今日的名车豪宅相比，可真算小儿科：只是银质奖杯一座、手表一只及一些化妆品，由当届港督夫人颁奖。

【註：首屆香港小姐冠軍應是「李蘭」。】



香港永耀影业公司出品的武侠片《黄飞鸿传》特别海报。

奖品虽少，但可以带来大把机会。首位香港小姐李蓝的生活之页，从此改写。

当选香港小姐后，李蓝即从事电影工作。从1946-1949年间，李蓝主演和参演了多部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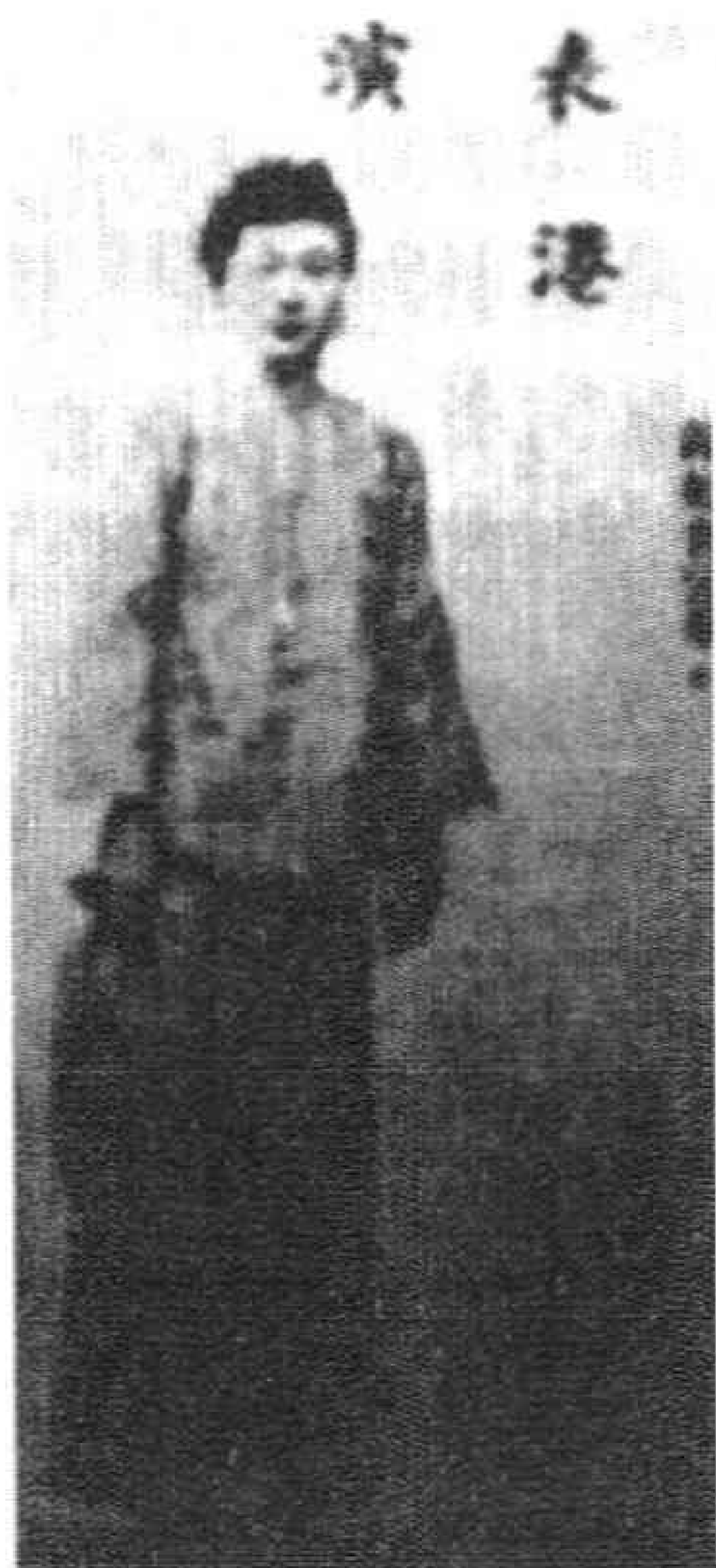
《情焰》是香港电影史上首部由香港小姐主演的香港电影，也是战后制作的第一部港产片。这是一部国语喜剧片，1946年12月12日在香港放映。经过漫长的三年零八个月“日据”时期的香港人，终于可以开怀一笑了！

李蓝还是在电影集数可列吉尼斯纪录大全的电影系列片《黄飞鸿电影片集》中，任第一位女主角。

后来李蓝息影，与一梁姓的游乐场总经理结婚，得到一个美满的归宿。

从1949年开始，“上海小姐”选举就此停止。“香港小姐”的选举，也停止了。





时装表演的海报。

首位参加国际选美的香港小姐但茱迪

1952年，复出的香港小姐选举，规模不但比以前隆重认真，而且，还与世界接轨——大会与世界选美挂上钩，即选出来的“香港小姐”，可以出席美国的“世界小姐”竞赛。

因此，笔者特地提一下，1952年的“香港小姐”选举。

此次选美仍在北角的“丽池花园夜总会”进行。

◀但杜宇导演、殷明珠主演的《盘丝洞》是上海影戏公司的最著名出品。左图为殷明珠。

有四十多人参选，经初赛复赛后，20人参加的决赛，岭南大学肄业的21岁的上海人但茱迪，夺得1952年度“香港小姐”冠军。但茱迪可谓天生丽质。父亲是中国电影界老前辈，著名的电影导演和画家但杜宇；母亲是美艳有名的中国最早的女





香港长城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宣传海报。

明星之一——殷明珠。

在获选“香港小姐”桂冠后，她便赴美国长堤参加“世界小姐”竞选。但茱迪是第一位参加国际选美的港姐，也是第一位在国际选美中获得殿军名次的“香港小姐”。

但茱迪获“世界小姐”殿军后，即和美国环球影片公司签订合约，并接受为期半年的训练，受训期间周薪为250美元，在50年代确实不薄，当时一架福特豪华车，才卖2000美元！

但茱迪曾被聘参演好莱坞光头红星尤伯连纳的名片《国王与我》，饰演国王的嫔妃。演完这部戏不久，她就息影结婚甘当归家娘，也是一个十分美满的归宿。

▶ 但杜宇（1897–1972），20世纪初来到上海，初以绘制月份牌画为业。1920年靠一架旧摄影机发迹，独自创办了上海影戏公司，集编剧、导演、摄影、冲洗于一身。许多后来的电影人才如史东山、夏佩珍、王引和英茵等都是但杜宇首先发现并扶持起来的。1926年但杜宇与麾下明星殷明珠结为伉俪。







香港小姐加冕一瞥。

选美与民生

选美历史在香港,已有半个多世纪。回顾早期(大战后初期)的香港选美,可以看到当时的选美多在酒店、夜总会或舞厅举行;而参选者的背景,可谓良莠不齐,舞小姐、女侍应的占多数。很显然,早年的香港选美,仍局限在风花雪月娱乐活动的层次,有闲阶层的“风雅”玩意。广大社会对“选美”,反应冷淡,因而令选美活动门可罗雀。这除了与四五十年代的传媒,特别如电视这样大众传媒机器尚未问世有密切关系外,更主要为昔日香港社会经济仍滞于战后的贫困有关。

当大众仍需日夜为糊口奔波,谁有闲情去关心选美?再则,在百业废芜、经济局促的社会,选美又能给入围佳丽带来多少出路和前途?

◀30年代的香港影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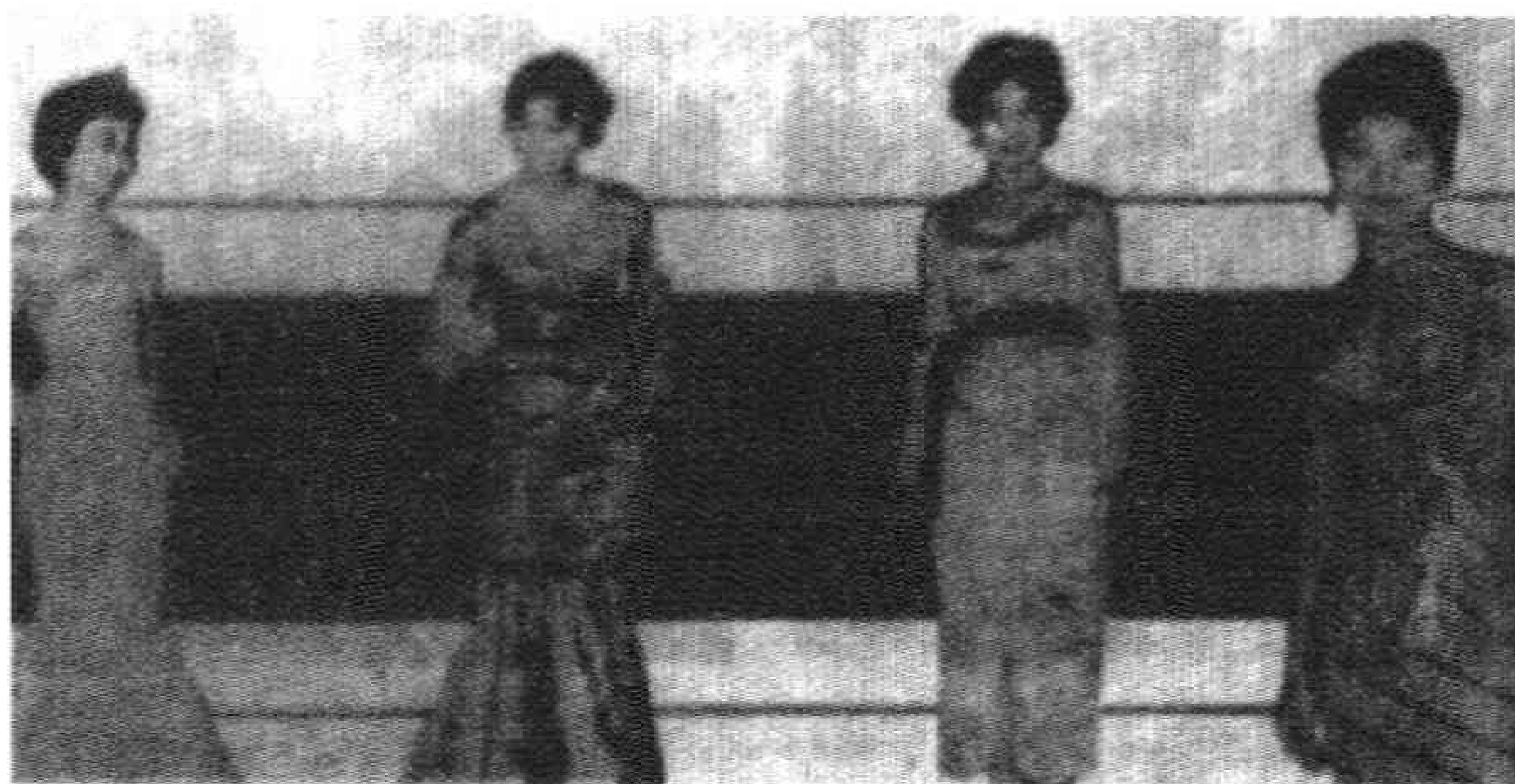
从香港早期的选美史可看到：各个时期对女人的美，有不同的审美观。另外，从侧面也反映了香港，如何从一个贫富悬殊的传统的社会，演变成今日国际大都会。

1946年首次选美之后，"香港小姐"的选举，断断续续地面临停办的厄运，1949年开始索性停了，1952年再度发起也只昙花一现，除了1954年又有人办了一次外，直至1959年，已有整整五年没有"香港小姐"问世。

直到1973年起至今，"香港小姐"每年都有推出。而且，已成全城普通市民的热门话题，在香港

1889年的香港酒店外貌。





香港礼服表演。摄于50年代。

的大众文化中占重要席位。每年进入夏季，跑马歇夏，烈日炎炎，躲在冷气房里吃薯片看电视“选美”，已成为香港市民最经济、最开心的娱乐。

电视作为文化工业，无可否认，对香港“选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电视的普及，再加上庞大的市场需要及广告商的赞助，“选美”节目载歌载舞，包装得金碧辉煌，已成为全城男女老少都欢迎的电视娱乐节目。其中最重要的是，自70年代开始，在电视台的悉心策划经营下，“选美”已脱净早期浓烈的风尘味，代之而起，是健康的现代都会女性新形象，入围的前五名佳丽，更作为香港亲善大使，巡游世界，宣传香港。

1946—1947年两次“香港小姐”选举的亚军，都曾在舞厅任过舞小姐。而1973年起历届港姐得奖者中，有来自商界、美术设计、大学等各方面的各种人才，1975年度的港姐冠军张玛莉，更荣膺1988年度香港的“十大杰出青年”。这个例子更说明今日的“香港小姐”，并非仅满足于自己的美貌，而是凭着本身的毅力、才干为社会做出贡献！





胡蝶1935年为其《游欧纪行》一书拍摄的广告照。据说，那时的导演多说上海话，演员多说广东话，但令她们大红大紫的，却不是与她们语言生活习俗相近的香港，而是上海。而在银幕上，演员又必须说北京话。

◀阮玲玉在电影《神女》中的剧照。同胡蝶一样，她也是广东人。

选美与香港电影

香港选美从一开始起，就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选美为电影输送女明星人才，已成一规律。

1959年在上海出生，在香港长大和受教育的缪骞人，父亲是著名专栏作家缪雨。她本人毕业于香港美国学校，1976年参加选美获"最上镜小姐"，是首位晋身电影圈的"最上镜小姐"。

她后来嫁与著名导演王颖，婚后定居美国。看电影、拍电影和研究电影，成为她夫妇俩生活中的最大享受。

钟楚红在1979年参加港姐选美，入决赛圈却三甲不入，但她艳丽的外型，倔强好胜的个性及聪敏的天资，令她在影业走出异彩，成为香港80年代影坛的天之骄女，最多在一年内拍过十部电影。

据资料显示，在1988年上半年，钟楚红是全港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明星，甚至压倒周润发。她最得人心的电影，就是与周润发合作的《秋天的童话》。



陈曼玲，福建人，1967年开始从影。她是国泰的当家花旦，有“国泰之宝”美称(国泰是电懋影片公司后身)。成名作是《水上人家》。1971年息影。

90年代钟楚红嫁给香港广告界名人朱君，从此息影，致力环保和绿色运动。

张曼玉是1983年度港姐的亚军和“最上镜小姐”，也是首位有“亚洲红星”之称的“香港小姐”。

张曼玉是内地观众熟悉的明星。她1964年在香港出世。9岁移民英国。1983年当选后，开始签约从事影视工作。

张曼玉主演的电影，可谓叫好又叫座。由她主演的《阮玲玉》、《警察的故事》、《宋氏三姐妹》、《客途秋恨》……深入民心。

在1988年，她接拍了12部电影，数量惊人，被影迷爱称为“张一打”。

笔者撰文之际，她刚与梁朝伟合作拍一部新片《花样年华》在戛纳电影节得到高度赞赏。张曼



陈曼玲在电影《水上人家》中，左为王琛。

玉在南韩和日本，都列为“最受欢迎的女明星”。

最美丽的香港小姐——朱玲玲。

朱玲玲是1977年度的港姐冠军，被香港传媒公认为“最美丽的香港小姐”和“港姐中的港姐”。

朱玲玲是广东人，在缅甸出生，9岁移民香港，在香港国际学校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伦敦大学教育系。

1978年嫁与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是第一位嫁入豪门的“香港小姐”。

今日她的三个儿子，已成英俊少年，她自己仍美艳如初。





李菁，原名李国瑛，上海人，香港最年轻的"电影皇后"。17岁便以主演《鱼美人》一片获得"亚洲影后"荣衔；又凭《娃娃夫人》再获"金马影后"称号。上图为《三笑》中与凌波（饰唐伯虎者）演对手戏。下图为电影《新独臂刀》的剧照。右图为李菁在《花月良宵》中的造型。




東昌行



第三章





著名的"珍宝海鲜舫"，设计遵循曲栏楼阁、画栋雕梁的传统风格，楼高二三层的舫船，金碧辉煌，灯火通明，映在海面，风光绮丽，颇受游客欢迎。



早期的华人买办。

海鲜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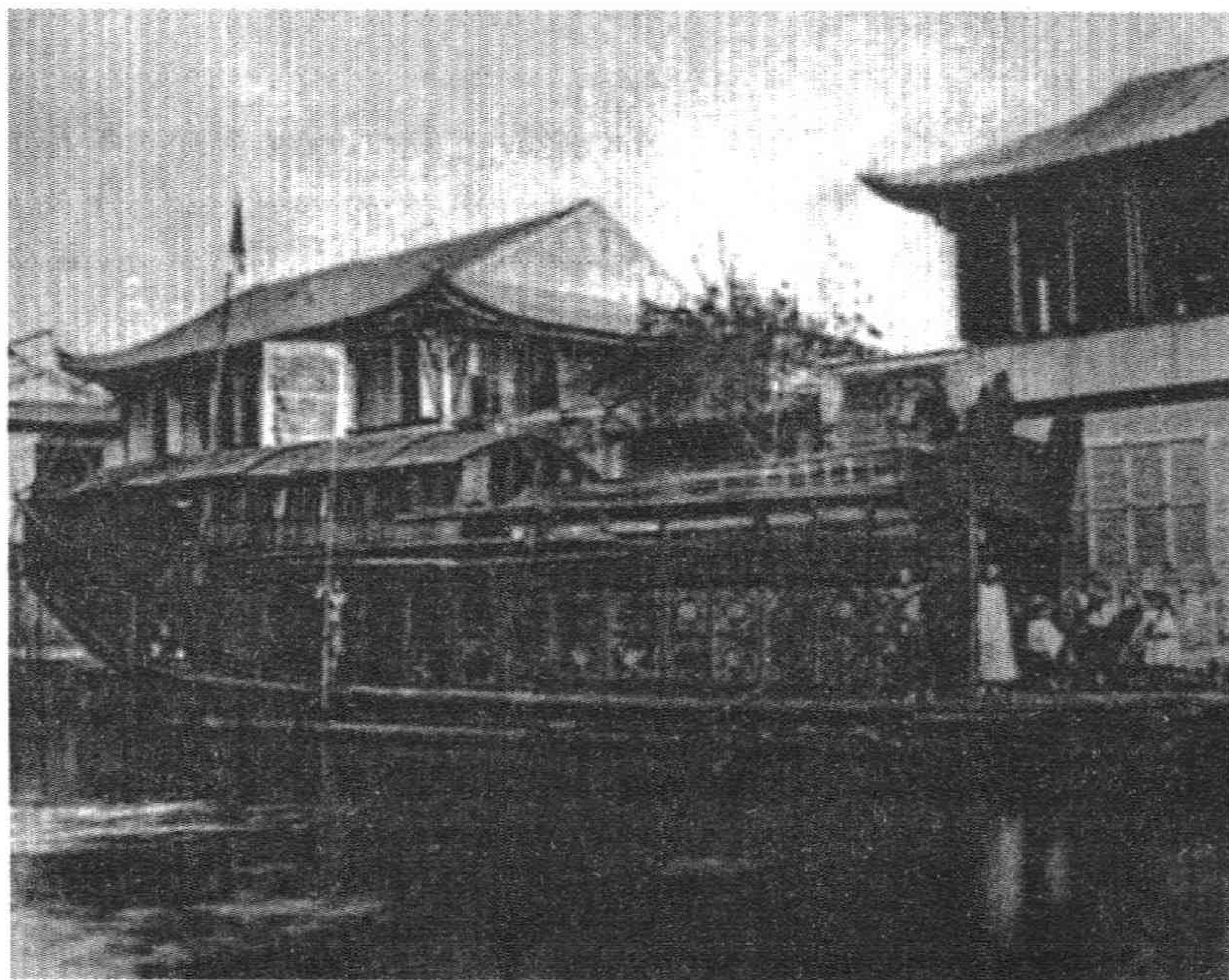
但凡去香港旅游，节目中大多会有一项去香港海鲜舫尝海鲜的。著名的如“珍宝海鲜舫”，设计遵循曲栏楼阁、画栋雕梁的传统风格，楼高二三层的舫船，金碧辉煌，灯火通明，映在海面，风光绮丽，颇受游客欢迎。舫船泊在深湾海面，另有船舶送客人。

今日的海鲜画舫酒家之设，健康又有特色。只是纯粹一种饮食经营特色。但这种画舫酒家最初，却是源自旧时的塘西花酒的模式。

香港多海湾，塘西一带本是风光之地。自晚清年间，由广州传来一种花舫，专供寻芳客上来玩乐，并设有酒宴。大的花舫，有两层楼高，设几个大厅，可摆十多桌酒席，进入民国初年，还有女招

待。后来香港开始禁嫖，妓女纷纷上岸以歌伶或女招待作掩护，花舫被更改为以酒宴为主，就成为今日“海鲜舫”的前身。

由广州传来的一种花舫，专供寻芳客上来玩乐，并设有酒宴。后来香港开始禁嫖，妓女们纷纷上岸，花舫渐变为今日的“海鲜舫”，健康又有特色。图为早期的广州花舫。





香港仔海港。摄于1946年。

酒家和花舫

广东人讲究吃。食肆在香港，可谓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处处可见。

早年香港生活文化跟着广州走。而在封建旧中国，茶楼酒家和色情业，所谓吃喝嫖赌，从来是紧密联扣，但凡此类酒家，都有摆花酒。

1846年，在妓女云集的水坑口，出现了香港开埠来第一间酒家——杏花楼，也是第一间摆花酒的酒家。

通常这些酒家，都沿海而设，岸上是酒家，海湾内有花艇。由于花艇空间小，酒家就成为嫖客和妓女吃喝玩乐的地方，即所谓“饮花酒”。

1903年政府要求凡要领牌照的妓院，全部迁离人口密集的中上环，往新填海区石塘咀(今

西环)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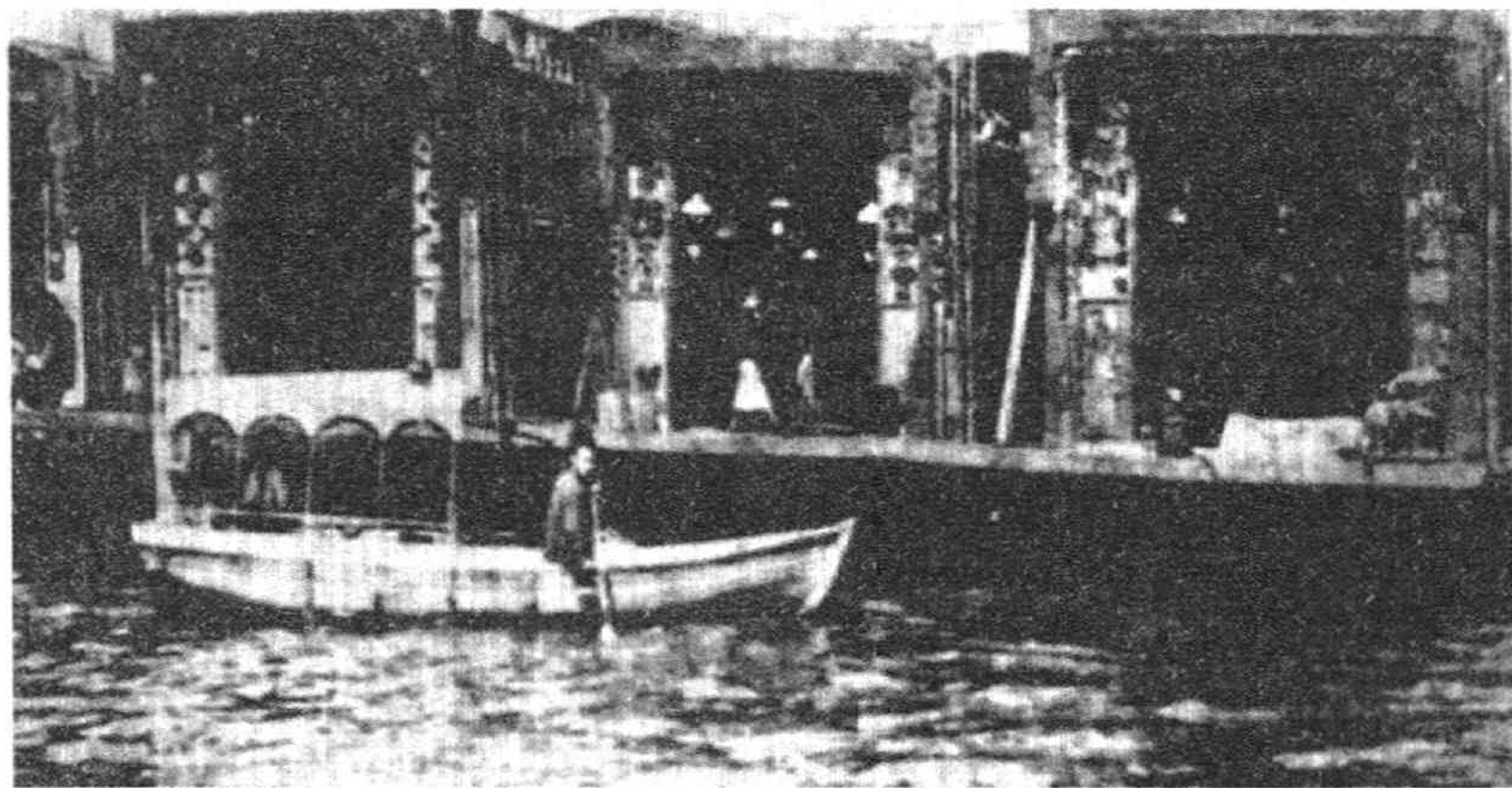
早年香港生活文化跟着广州走。而在封建旧中国，茶楼酒家和色情业，所谓吃喝嫖赌，从来是紧密联扣，但凡此类酒家，都有摆花酒。图为早期的华人买办。

妓院往西迁，为了生意，酒家也纷纷跟着迁。一时在20世纪初，石塘咀成了港岛酒家林立之地。

旧时一应餐厅都称为××馆，或××楼。最早将餐厅称为酒家的，应为当年塘西最豪华的“金陵酒家”。据云，因店老板好诗画，“夜泊秦淮近酒家”的诗句，激发他的灵感，就以“酒家”一词写上招牌。

中国称酒楼、饭店为“酒家”的，金陵酒家据说是创先河的第一家，以后此风才慢慢北延，

紫洞艇，是一种酒舫。舱内像一个长方形的厅堂，面积可容三两席酒，且装置幽雅，两面饰有玻璃窗，十分明净舒适。



直至全国。

据香港政府193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30年代初，石塘咀有酒家18家，雇用员工千余人，妓院五十多家，妓女连佣人二千多人，连带附近的花店、水果店、人力车业，都十分兴旺。

1935年香港禁娼，酒家生意一落千丈，花舫式微，酒家也迁离塘西至商业区中环上环一带，另寻客路。

昔日香港中国式茶室一角。







茶具。

女子茶室与“茶花”

在20世纪的初叶至三四十年代，香港茶楼和酒家，是有分别的。

茶楼一般以早市为主，因广东人爱饮早茶。一般做早茶和午茶。

酒家则完全依靠夜市，从黄昏六时起直至凌晨四点才散席。

早年茶楼饮茶的只有男人，女士不得随便上街。精明的老板为招徕生意，率先在茶楼设歌坛，请来石塘咀的红妓献唱，颇受欢迎。至20年代，电风扇全面使用，四座生风，更令香港的茶楼生意火火旺旺。

中国封建思想，女人只能躲在家里，不应抛头露面。因此，茶楼客都是男人。

◀ 卑利街繁盛的景象。



19世纪纸本水粉画。

1910年，西环一带，开始出现“茶室”，茶室与茶楼性质差不多，只是规模小多了，一般多是地铺一层，不设楼上。

当时西环有一家姓陈的母女，合开一间茶室，挑出“大姐茶”的招牌，此为香港历史上首家女子茶室，也可说，除“自梳住家女佣”外，香港的女子茶室，可讲是香港女性走入社会的先驱。

名媛茶室，与一般女子茶室不同。它们大都开在如跑马地一带高级住宅区，而不在上环西环一带市井商业之区。而且布置格调也较高，卖点在强调主理人身份的高贵。什么“名门遗孀，西关贵妇”或“英文书院出身”……

“涤洁”，是香港首间名媛茶室，据说是当年一



1946年的砵甸乍街一景。

位大律师的两个女儿经营的。

正当女子茶室经营火旺之际，政府认为有伤风化，下令禁止。

时至今日，香港何止有女人经营茶室，由女人经营主理的名食肆，比比皆是。比如上海籍香港人最乐意帮衬的上海饭店“留园”，泰国餐厅“金象苑”、“家乡饭店”以及布满各街头巷尾的咖啡厅，女老板多的是。

政府禁令，仍阻止不了香港女性外出工作。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15天内，省港大罢工开始，参与罢工的人数达25万，各行的营运陷入瘫痪。特别是茶楼，在当时为全港最大的服务行

业，一时无法经营。于是，当年一家“高陞”茶楼老板灵机一动，向妇女招工。结果效果奇好，非但解决了劳动人手问题，女侍应令茶楼生意更兴旺。



香港威灵顿街华洋店铺鳞次栉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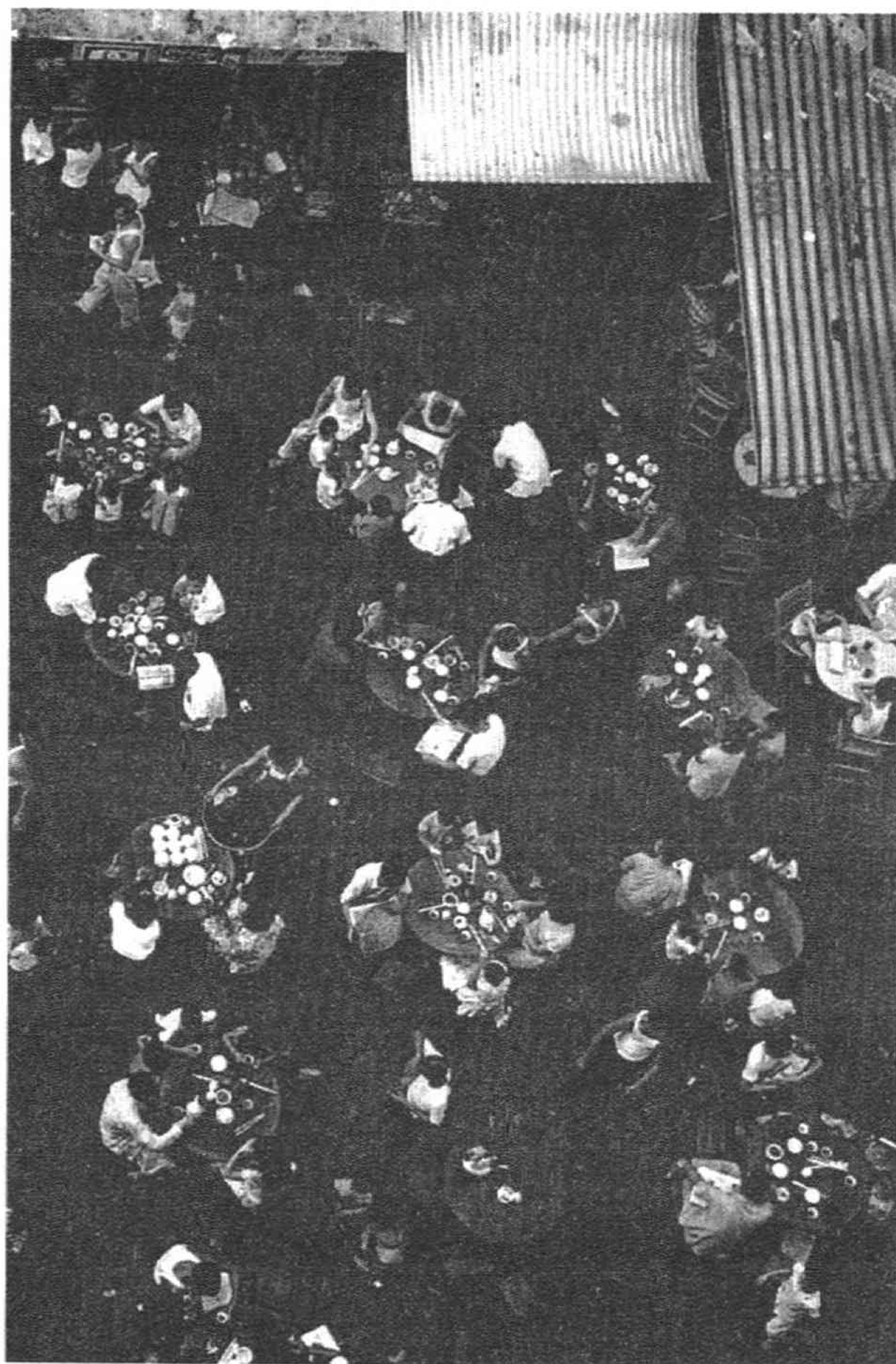
一时，三多茶楼、富隆茶楼都争相效仿。

当时茶楼女侍应月薪一元伍角，较男侍应高，但没有小账分。

省港大罢工历时一年结束，但女侍应仍继续留在茶楼。

因为茶客都为男性，女侍应大受欢迎，一些无聊之徒，发起选“茶花”，即茶楼女侍应中的选美，这大约是香港选美史上最原始的选美。

茶花罗慧芳，被评议为“年华双十，身材丰满，貌甚可爱，招待顾客，人人喜欢”，连西报记者也特地来专访。



吃早茶。

旧时香港茶楼红女侍应，十分讲义气。笔者外祖父在30年代至40年代末长居香港，曾讲起当年茶楼的当红女侍应，帮助来港的旧乡里，十分得力。据云只需一句“去香港××茶楼找大家姐阿×”，不需介绍信不需送厚礼，只凭一口乡音，这些“大家姐”即会在相熟的茶客中“找关系”，找工作找住处求学，即时搞定。因此莫小看这些笑容可掬、细声柔气的茶楼女侍应，她们在家乡，个个是观音娘娘普渡众生的福星。





身着旗袍的香港儿童。

海盗皇后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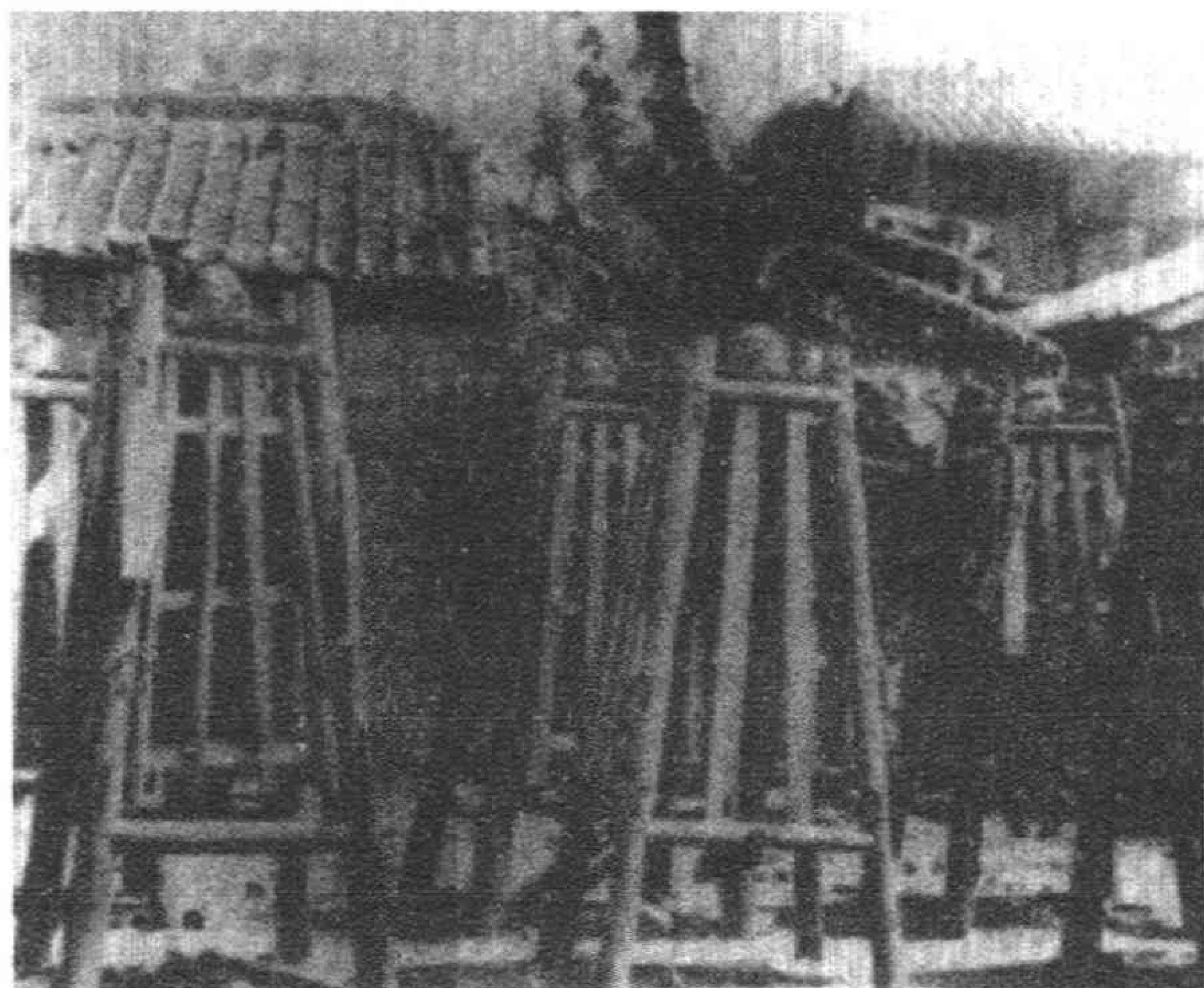
南国女子，或许因为来自天朝太平天国的发源地，姣娇之外，一旦激怒了她们，其阴毒和狠恶，远远不是男人所能想得出的。

香港是岛城，俗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香港四周海域海盗猖狂，确是事实。特别在清末民初之时，官逼民反，老百姓生计全无，铤而走险。当时清政府对海盗惩治残酷，海盗被捕，实行凌迟处死，即将海盗逐块肉割下来，死得很惨很恐怖。

有海盗皇后之称的月影，丈夫是横行香港大鹏湾的海盗，被政府水师剿捕，解上广州凌迟处死。据载身上的肉给寸寸碎剐，一时又死不了，哀号几日后才气绝。

◀生气勃勃的砵甸乍街一景。摄于1946年。

一声“为夫报仇”，月影重张丈夫的海盗旗帜，



被捕的海盗被曝晒示众。

从晚清到民初，竟成20世纪20年代香港令人谈之色变的海盗皇后。

尽管中国的黄龙旗转成青天白日，月影为夫报仇之心仍不动摇。君子报仇，十年不迟。这个海盗皇后，除了不断地抢劫、绑架、烧杀等向社会报复，一面充分筹帏、策划，充分掌握情报，伺机行动，复仇之心，耿耿在怀。

当年剿盗处死月影丈夫的仇家张国富，在大清政府改朝换代之后，仍扶摇直上，去上海做了大将军。月影并不气馁，坚信大仇迟早会得雪。终于等到上海同党传来可靠情报：张国富将卸任取水道回老家。

张国富所乘的“幸福号”客轮从上海南下，在近香港水域大鹏湾之时，月影已算准时机，在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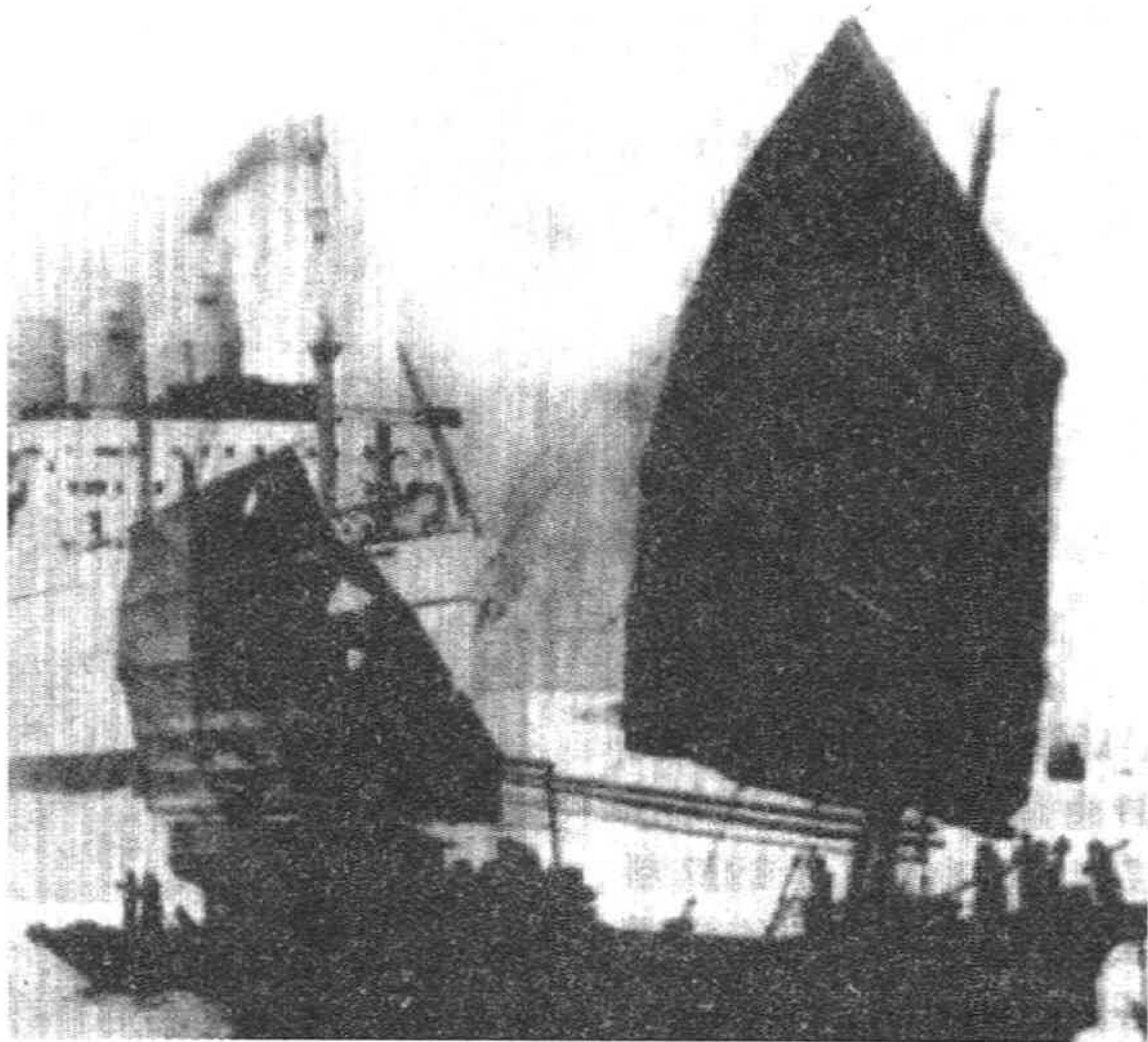


1885年死刑斩首。

的海盗船桅顶升起作为暗号的红白旗帜，此时早已部署潜伏在“幸福号”扮作旅客的内应，一声“劫船”，立时捉住张国富和他的三姨太。

杀夫之仇如何报？月影总觉得即使处他凌迟至死，也不足解心头之恨。恨极之下终于想出一种叫“养生鱼”的酷刑：渔夫捉到鱼又暂时不想它们死，便放于大竹笼里投入海中，用绳将其系于船边半沉半浮、半死半活地任船拖着走。

于是月影如法炮制：张国富被剥光衣服，海盗们用刀在他腹部剥开一道四寸长的裂口，活生生地探手入内掏出一部分肠脏，用麻绳缚住，麻绳另一端绑着个木质浮标，然后将倒霉的张国富



战云密布的港湾。

投入海中，紧绑于船头，半个身子浮沉在海面上。当船行驶时，浮标随波逐浪，扯着他的肠脏，真正的“痛入心肺”，再加咸的海水浸泡伤口，其恐怖痛苦之状，令人发指。月影如此仍不解恨，还恐将他一死了之太便宜了，浸了两天，就将他扯上甲板让他喘息几日，再扔下海里，如此反复摧残至死。

大将军的三姨太也够惨，被海盗多次轮奸后，再卖到澳门的下三等妓院，最后三姨太被迫悬梁自尽。

大仇雪恨，据云从此海盗皇后和他一帮手下从香港海域蒸发了。

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十分轰动的一个案子。有一西方作家将此改为小说，在1932年十分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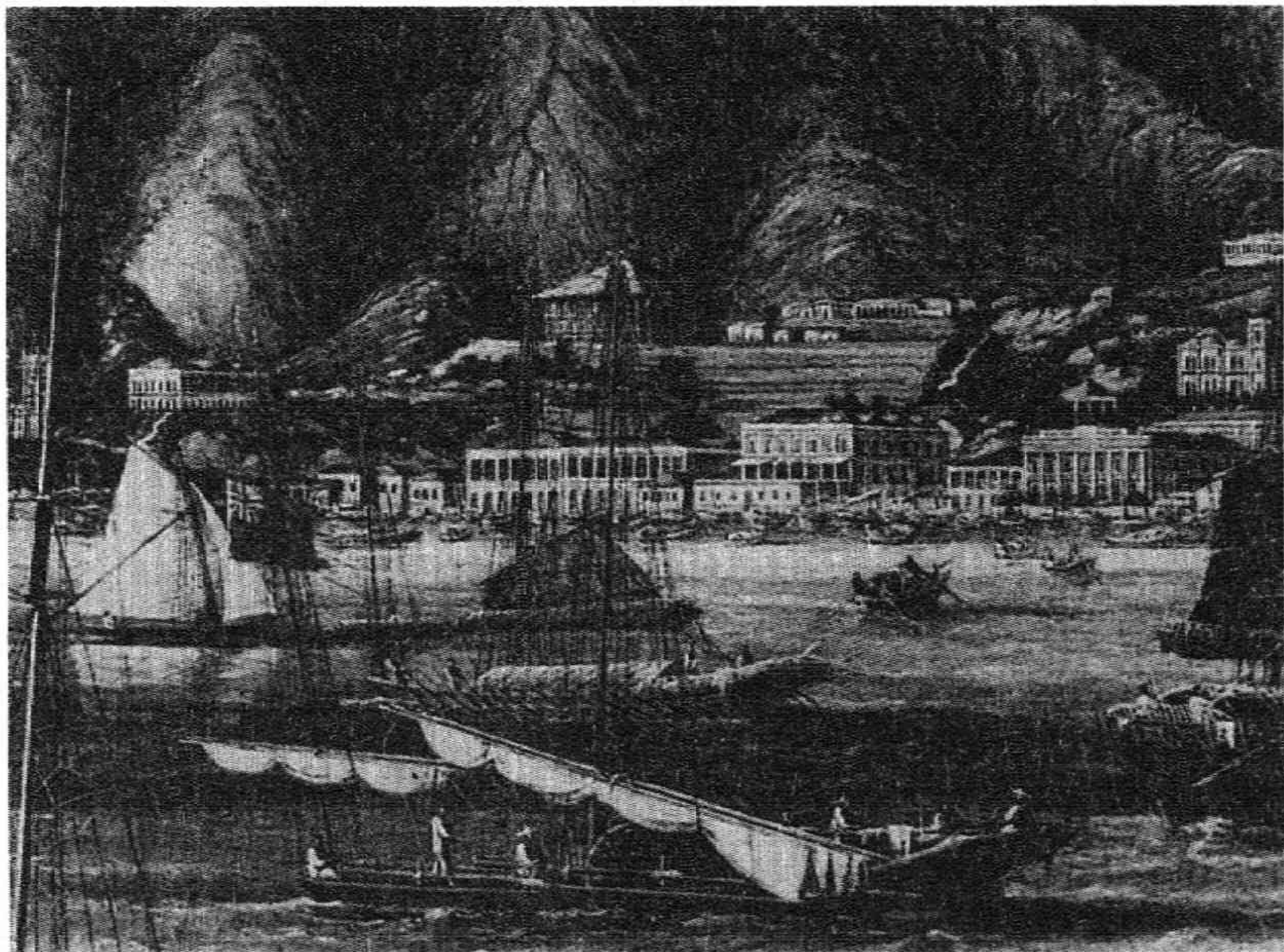
关于月影的结局，还有一个版本。

据记载在1929年9月18日，一艘大阪商会的“地厘丸”押运一批白银从汕头开往香港。船上共有乘客124名，船员中有9个日本水手，62个中国水手，3名印度水手。而假扮乘客的海盗共有11个。驶近大鹏湾时，海盗出击了。海盗策划严密，情报工作出色，首领是个女的，一身黑绸衫裤，足蹬绿色木屐，手持双枪，身手不凡，威风迫人……一时都传诵：月影重出江湖。

“地厘丸”的受劫，也是香港早年一大劫案。

据记载，海盗训练有素，火力十足，在女首领

香港海湾图景(1845年)。





19世纪末期的香港港口。

指挥下，逐一控制船上机房、无线电等重要部门。船长被劫持，呼吁全体水手放弃抵抗。而押运白银的买办，精通江湖求生之道，一定早已谙知这一带海盗出没频繁，所以一上船就独自锁在头等舱里不见人，不外出，免得被人认出。而存放白银的保险箱钥匙，也有意不放在身边。一闻起枪声，他即有所警觉，混在通舱的乘客中，终于保住一条命和大批白银。

海盗们使尽全力都打不开那个坚固的保险箱，惟有尽量劫掠其他财物，直至次日凌晨，方怏怏登上早就部署好的海盗船逃遁而去，那位双枪女盗，也随之消遁。



维多利亚港，
背景为港岛中环。

她是不是月影呢?有人推测，1929年时的月影，应已是中年，而这位双枪女将，仍是少艾年华，是月影宝刀未老，还是她的女儿?或者入门女弟子?南国女子的“姣”，此处又可见一斑。

月影，一个那样凄迷的名字，原来却是这样狠毒的一个女子。或者她其实生性好温柔好文静，是不公的生活迫得她如此!

又是那句话，怎样的环境，出怎样的女子。南国女子，特别粤西一带，生活条件艰苦，大男人主义浓厚，造就她们刻苦耐劳、坚韧自立的个性。当我写下月影的故事时，我忽然会想到“红色娘子军”里的琼花和她的女战友。全国惟一的一支红色娘子军，独诞生在粤西，或许与南国女子天生的泼辣豪犷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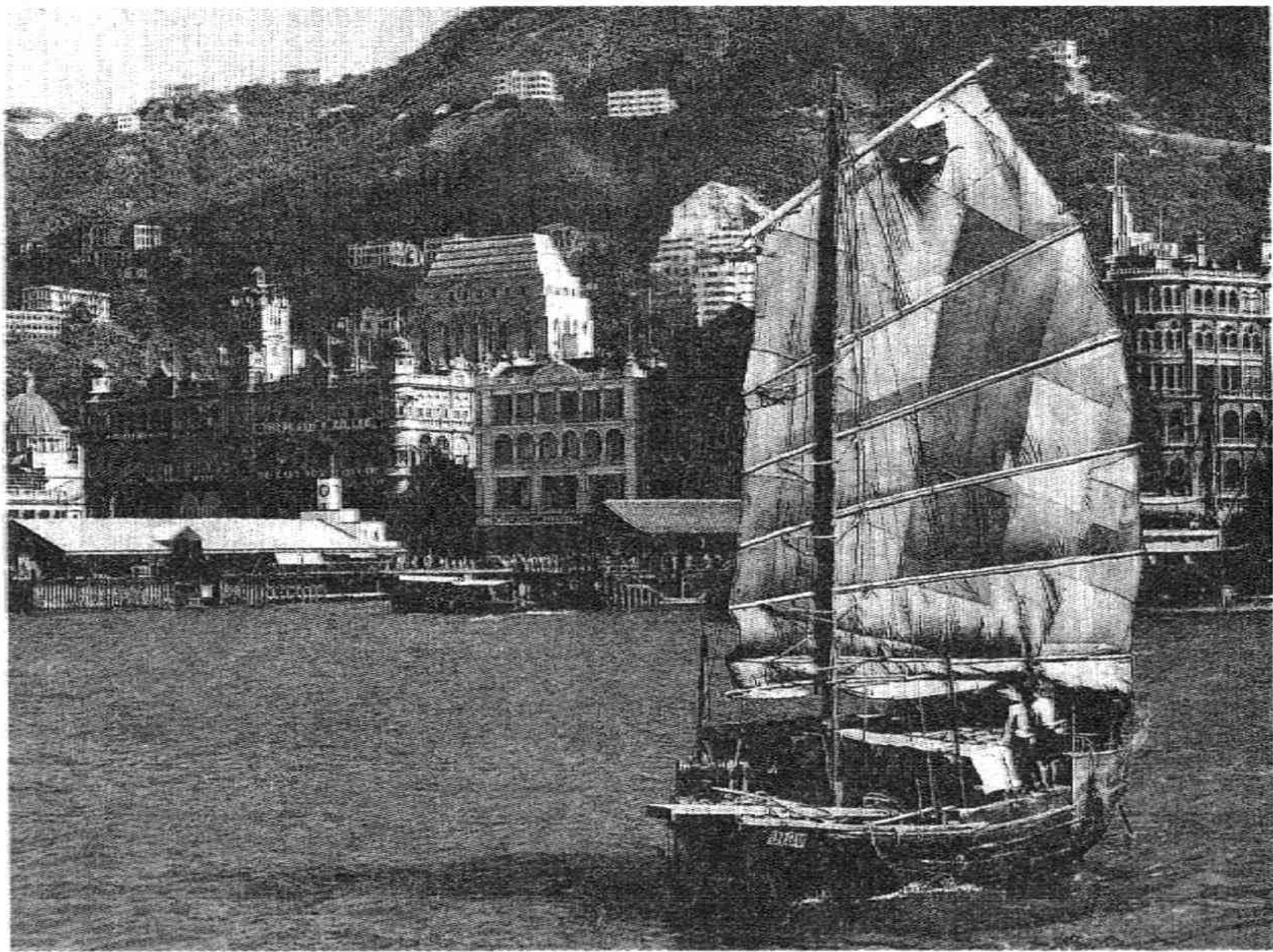
月影的结局一直让我挂念。

希望她报了仇后从此真的绝迹江湖，远走高飞至北美洲或大洋洲做华侨去，那里至少不会担心被人通缉；或者埋名隐姓买点田买间屋安安稳稳度过下半世；也有可能就此削发为尼，为死在她手下的生灵念佛超度……

她会不会如红色娘子军的吴琼花一样，带着满腔深仇大恨，率着部下经洪常青指引，走上革命之路？

30年代之后，港英政府捕得海盗，则比较人道地就地正法。但香港历来处决海盗的文件记载中，没有一个女性海盗！

渔船扬帆港海(1965年)。





1934年，大小渔船停泊在油麻地海旁。



港督府游园会一景。



香港时装表演。

舞女与“妈妈生”

香港在开埠初期没有舞厅，早期跳舞只限于西人，属上流社会专门娱乐。

一次大战结束后，尽管香港会跳舞的港人渐渐增加，但跳舞场所受物质条件限制：首先要有一流的音响设备，而一个有水准的庞大乐队，也不易组成。

直至1930年，电唱机和电子乐器已开始普遍使用在歌坛和电影配乐上，而爵士音乐在当时，甚至已开始影响到粤曲的创作，用粤语演唱的时代曲，也开始在坊间流行。

这一切无疑为香港开设舞厅创造了条件。

香港首间舞厅名为“银月舞厅”，原址在今中环大道上，由一位叶姓华侨所开。



香港半岛酒店内部一瞥。

“银月”的乐队，是从香港粤曲音乐社的乐手中挑选出来，因此演奏的跳舞音乐除了有外国流行曲外，也有粤语时代曲。这种中西合璧的跳舞音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形成香港舞场的一种特色。

至于舞女的来源，在开张前两个月登报招聘，由叶老板亲自教授舞步。当时香港工业尚未起步，妇女就业机会不多，茶楼酒家女招待成为妇女求职最多的职位。她们看到舞厅招聘广告，觉得条件好过做女侍应，纷纷跳槽做舞女去。另外，石塘咀一带妓女，因港府开始禁娼，有的转行当歌女，也有的下海当舞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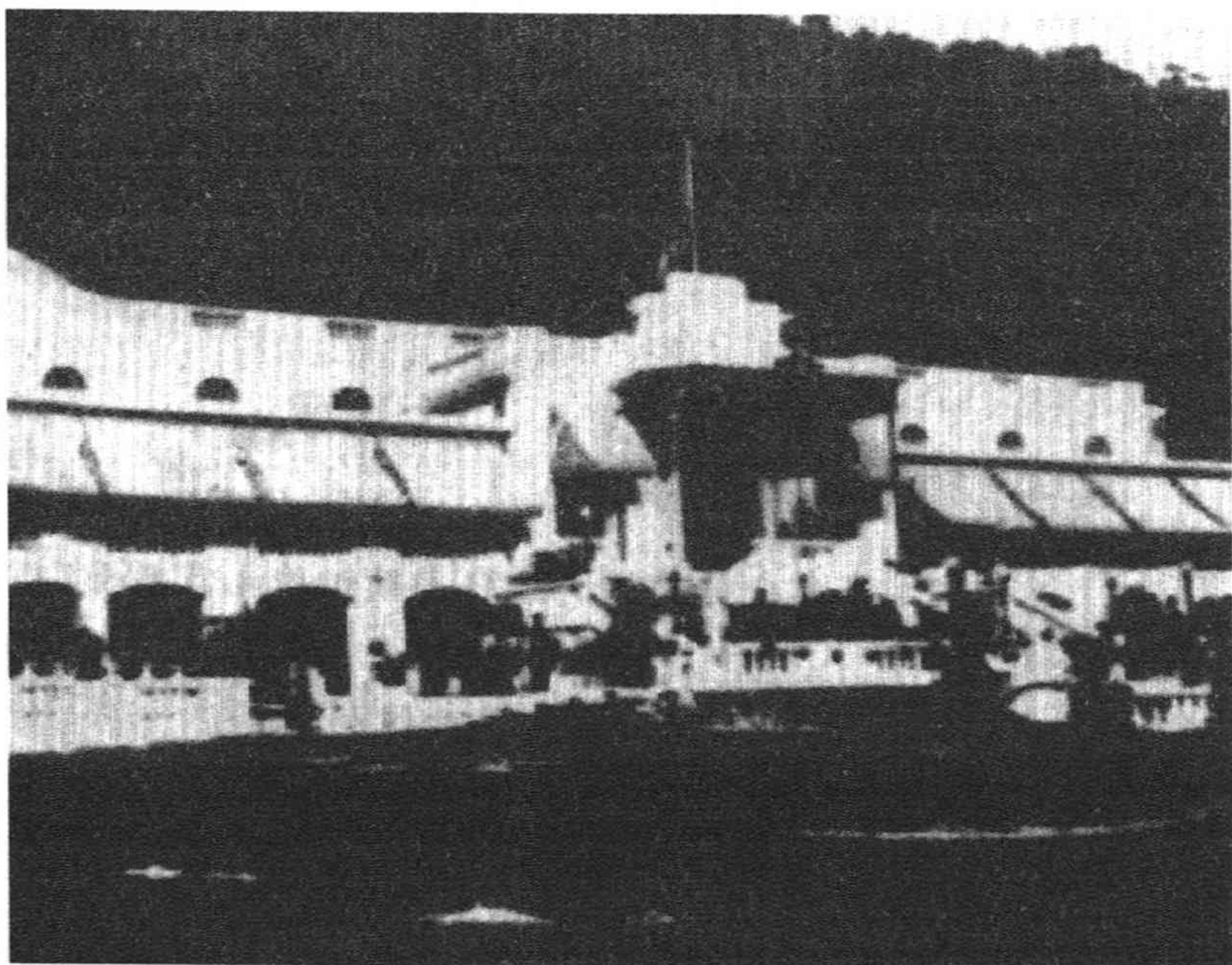
1937年“七七”事变，虽然上海租界暂未波及，但不少人为求安全，纷纷南下英属地香港，其中有大批上海舞女和在上海经营舞厅夜总会的管理人，他们的南来，令香港的舞业增添浓郁的“海派”特色，同时令舞场音乐也更丰富多元。

初时香港舞厅舞池上只有白炽灯一种，在跳

舞时没有五光十色的灯彩变化，场内仍是很光亮的。海派人士将上海缤纷多彩的舞厅文化带来香港舞场。今日的主要舞场七彩闪光的灯光效果，自1938年在香港已开始逐渐演变而成。

首家舞厅“银月”旗开得胜，一时舞厅越开越多，到1938年，全港大小舞厅已超过二十多家。

20世纪20年代建起的浅水湾酒店。



“买钟”和红舞女

为了避免舞客争舞女，舞场推出“买钟”制度。

即如舞客看中某位小姐，可以“买钟”请她坐台，陪他谈心或跳舞。自从有了“买钟”后，就有了“红舞女”。但凡拥有很多固定“买钟”舞客的舞女，就是“红舞女”。

舞场大班是“买钟”的产物。舞场大班不同于舞女大班。舞客买钟，需通过舞场大班。从另一角度讲，舞场大班为应付舞客以推销舞女，为舞客与舞女间不可缺的桥梁。



香港石塘咀是昔日的娼妓集中之地，此为20世纪初的石塘咀旧影。

夜总会的形成

香港舞业到了30年代中期，如雨后春笋，同时，石塘咀的妓院，则开始式微，影响到一些以花酒为营业对象的酒家。他们眼看舞厅越开越多，但受条例限制，不能饮酒吃饭。生意头脑一转，将酒家充当舞场，有酒有饭有舞跳，一时捧场客众多。如是夜总会开始问世。全港第一家夜总会"广州酒家"于1935年在石塘咀问世。

据史家叙述，在1935年夜总会问世之前，即1930—1935年，跳舞并无色情成分。舞女每天依时上班，与舞客只是伴舞。场内不能饮酒，纯粹只有跳舞。

自从有了夜总会，就可以将舞女带出街去灯红酒绿场所，叫"买出街钟"。

有了"夜总会"和舞场"买出街"后，舞场和夜总会真正代替了以前石塘咀饮花酒的古老的商业应酬，令香港平添浓郁的现代都会色彩。

这种现代的商业应酬，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香港的对外贸易。欧美商人以前来港订购贸易，往往只能通过洋行买办向本港华人打交道，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华人这种古老的只限于在石塘咀饮花酒的应酬场所，与西方人的娱乐文化格格不入。而舞场和夜总会的兴起，令华人无需通过洋行买办，直接可与西方商人应酬谈生意。

从此，该类地方有了个花名——“英雄地”，皆因江湖人物爱在此地寻找机会。一时，舞小姐的丰厚收入，豪客的挥霍，都成为舞海传奇，大都会的故事之源。

1947年上海舞场的一个调查统计表显示，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舞厅的广东籍舞女有103人，这群舞女在1949—1950年期间，大部分南来香港。沪港血缘关系，在此又是一证！



香港俱乐部。建于1844年。

1945年，一位西人率先在香港开设首间有现代化西方风味的大舞厅，位于中环的皇室行，取名为“百乐门”，完全效法上海的“百乐门”之名，足见海派娱乐对香港的影响。

1947年，上海籍的香港闻人，人称香港“杜月笙”的李裁法，也在北角七姊妹海湾边开了“舞池”夜总会。详情前文已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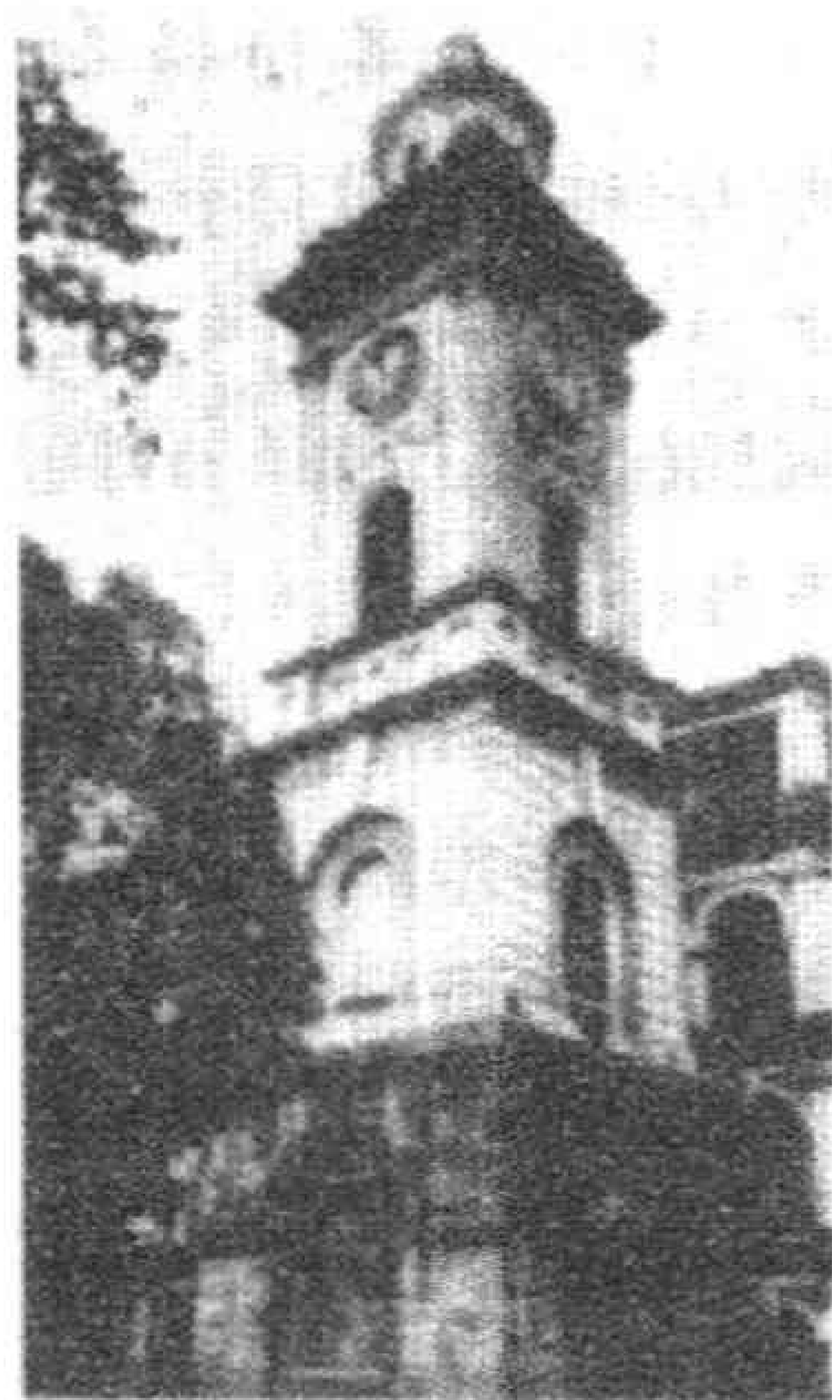
舞女大罢工

正当战后香港娱乐业又开始繁华之时，“百乐门”舞厅在1947年4月7日晚，爆发全港首次舞女大罢工，主要针对舞厅方面不但将抽税分摊在她们头上克扣她们金钱，而且还订下许多苛例条件压迫她们。

4月9日上午，舞女们选出四位舞女代表：江小妹、汪洋、陈蝶影和夏莉与资方谈判。

1947年4月9日的《新生晚报》以此标题：

百乐门舞娘罢舞
在红梅开夜会
因不平待遇惹纠纷
今日派代表谒见劳司


香港钟楼。摄于1880年。

舞女代表夏莉，受过高等教育，英语流利，这些舞女代表口才了得，雄辩滔滔，并直赴妇女运动会求助(港澳妇女运动委员会)，难怪社会惊呼：不要低估舞女的实力。

终于舞厅方面作出让步，与舞女达成协议，这段舞女罢工潮方告结束。

舞女罢工之潮平息后，舞厅方面也觉得管理舞女方法需要改善，单靠舞厅全面管理数十个舞女难免不周，不如将其划成几个组，由组长负责，

每组几个舞女，并将其介绍给舞客，这样既有利新来的没有熟客的舞女，也方便舞客挑选舞女。这个组长，就是人们俗称的“妈妈生”，即舞女大班。

初时舞女大班由舞厅职员担任，多为男性。后来一些人老珠黄的舞女，仗着有熟舞客，人脉广，在江湖上兜得转，有很多舞女自愿簇拥她为舞女大班(实际上为自己的经纪人)。舞女大班力推旗下的舞女而抽佣。

香港自70年代起，舞厅可以兼营酒吧，即在舞厅内可以饮酒，舞厅开始夜总会化。夜总会也开始供应舞女了，但今日仍沿用舞女大班和妈妈生制度，只是美其名为“公关经理”。“公关经理”这几十年仍在娱乐业举足轻重，负责管理舞女，发掘新人拉拢舞客，可以讲是夜总会的灵魂。

这种娱乐场所，通常也是黑白两道之地，任你再高尚再美丽，在江湖上没有靠山，根本无法营业开张的。真所谓江湖险恶，风高月黑。这里的“妈妈生”，也大都是江湖上有“大家姐”之称的、有来头、有威势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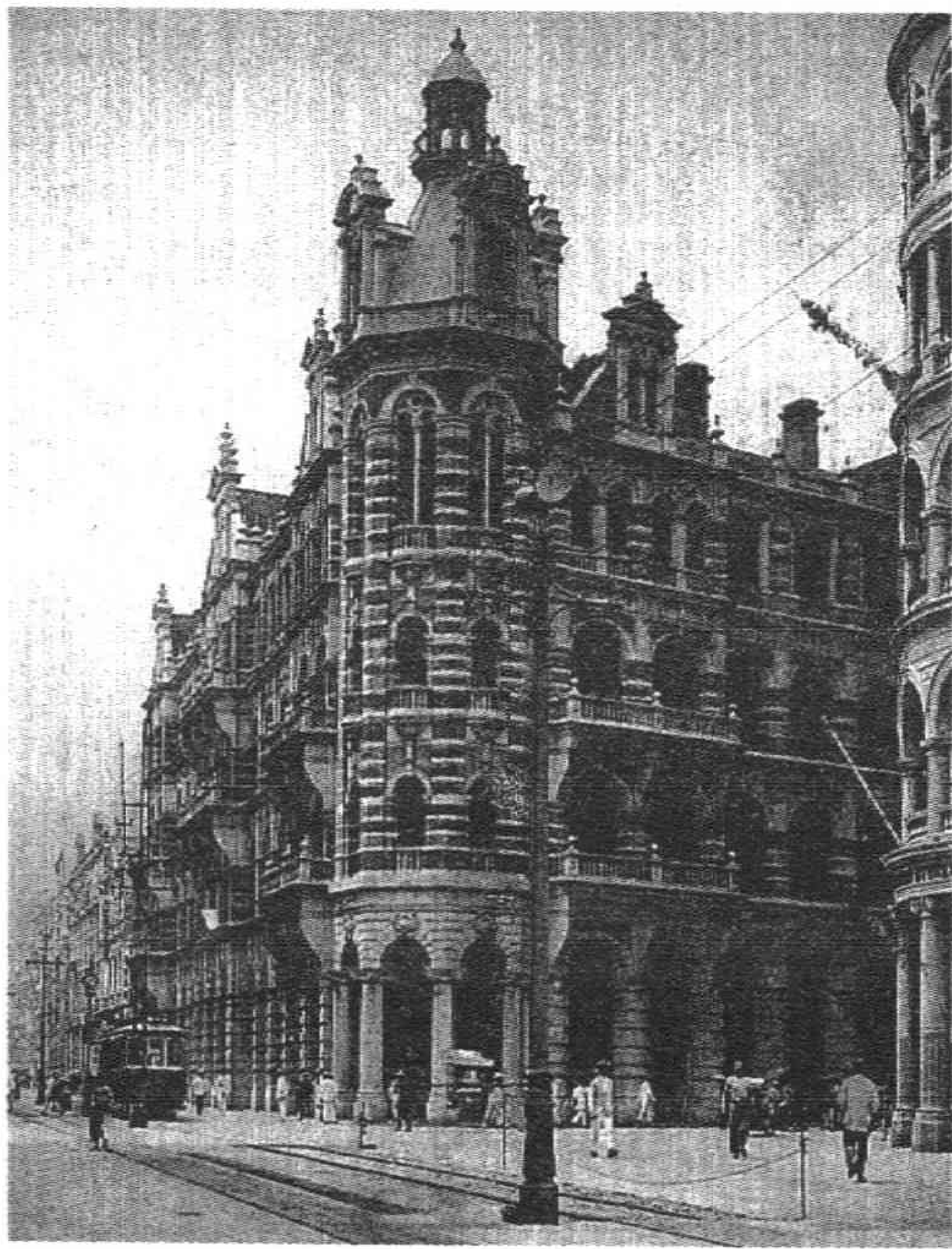
从70年代开始，一种“中式夜总会”(即有歌星及艳舞团登台表演，同时又有舞小姐伴舞)开始蓬勃，对高素质的舞女需求大增，“大家姐”显得十分抢手，各舞业出重金挖“妈妈生”。直至今日，各夜总会的“公关小姐”，仍十分抢手。

今日香港单纯舞厅已式微，惟有在油麻地旺

角一带，还保留跳茶舞，对象为五六十岁消费能力较弱、不懂英文的平民街坊“阿伯”级人士。一般消费每个人一百来元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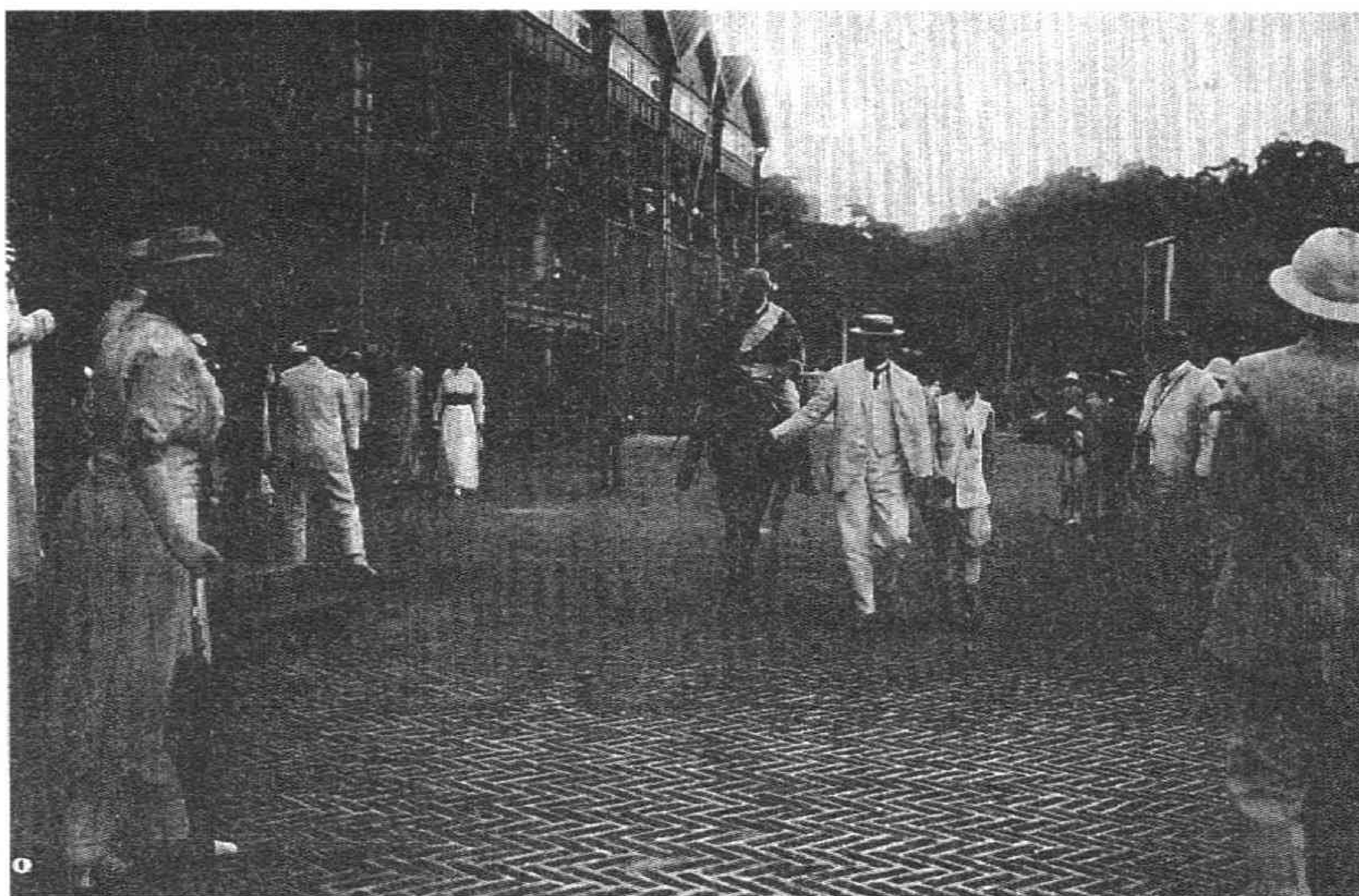
现今香港夜总会一般分中式、西式和日式(带有色情成分)三种，大都集中在尖东、尖沙咀一带，通常是商界应酬或较洋派人士出入的场所。尤其是设在大酒店内的餐厅舞厅或吧廊，令一般市民望而止步。

建于1911年的旧邮政总局，于70年代拆卸并改建为现时的环球大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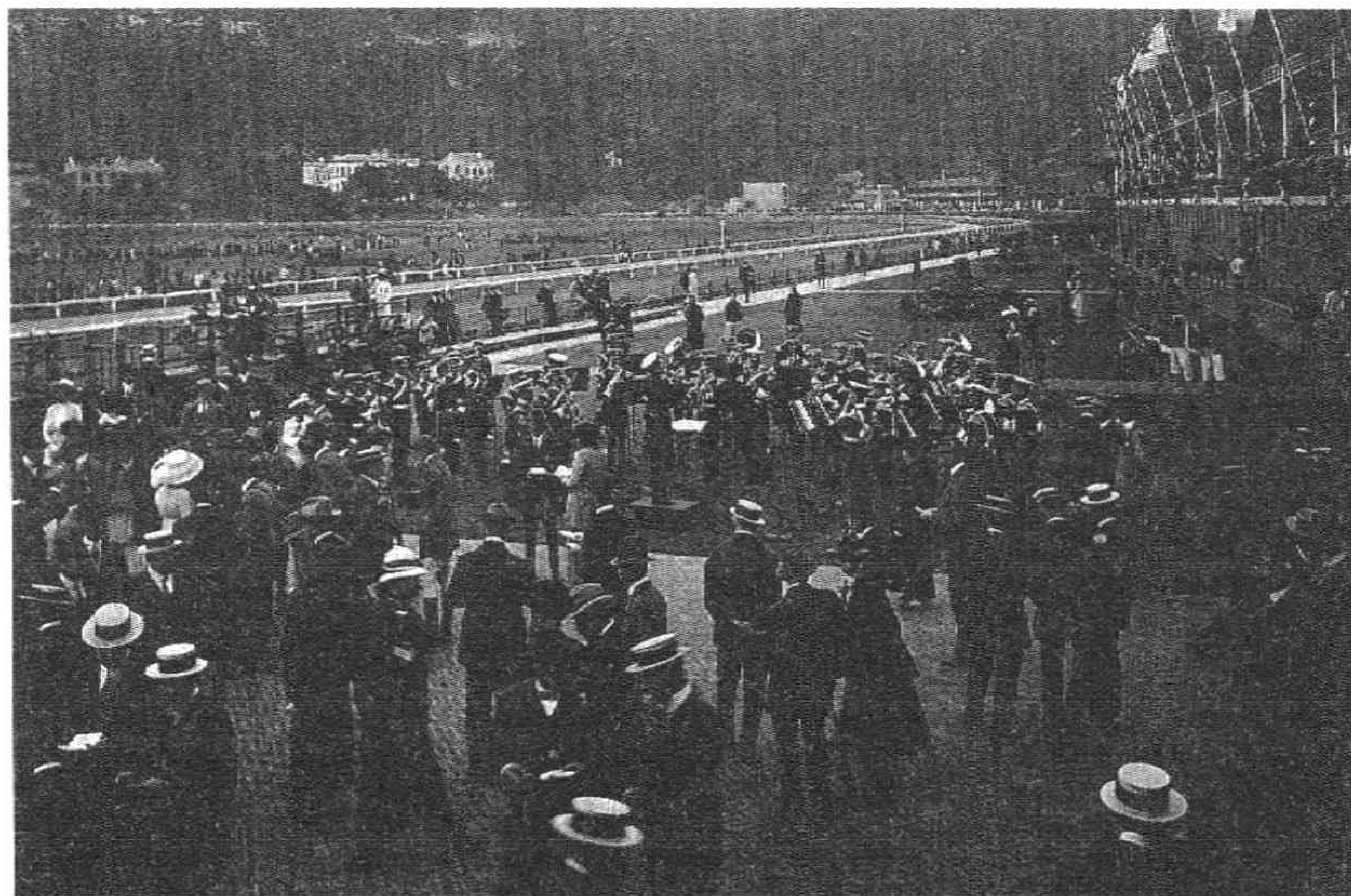


夜总会收费昂贵。一流中式夜总会最低消费人均250元港币。西式夜总会，人称卡巴莱餐厅(Cabaret)以西人和游客作对象，人均最低消费为300—400元港币。舞厅夜总会，是有舞小姐陪舞的。这里是有名的“销金窝”：服务费、坐台费加小吃饮料，数千元一掷，都算毛毛雨。

如果坐厢房，喝名酒，那消费更是惊人。一般是豪客、大公司生意应酬者来光顾。这些“销金窝”，“一掷千金”不足以形容其消费程度，一般香港市民很少涉足。



马会是香港高级社交场所，会员多为非富则贵之人。





历来骑师以外籍人士居多，近二十年来，本地骑师也不少，更有女骑师。名骑师在香港民众心目中，绝不亚于四大天王。

50年不变马照跑

在车水马龙、人流迫挤的中环，花二块钱搭电车，即可达终点跑马地。

从铜锣湾的礼顿中心，电车开始转上黄泥涌道，但见一面是绿草如茵的马场，一面是颇有气势的、大有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冷漠之情的高档店铺。这些设在高级住宅区内的店铺，通常都是门户紧闭，上门预定才接待的。

这条名为黄泥涌道的马路，名字虽土土的，层次却是高高的，尤以皮鞋店集中出名。

跑马地不止因为拥有一个马场而金贵，更以多明星和名人聚居而成港九屈指一算的高级住宅地。

但早在清朝乾隆年间，黄泥涌道现址，确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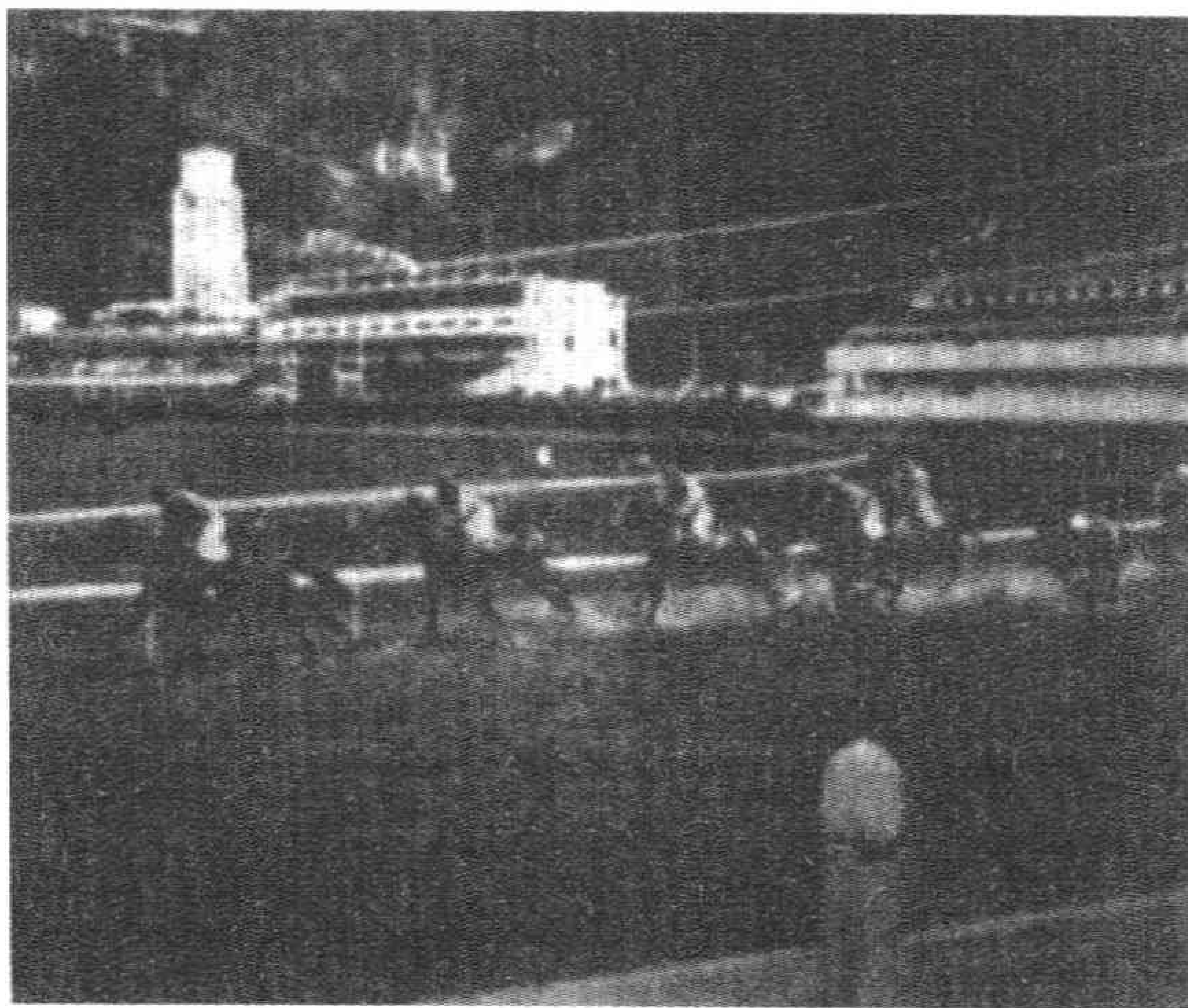
一个土土的村庄。

香港的村庄，大多依山而建。黄泥涌村后的山坡，现已成半山豪宅区，现时的跑马地、马场，原是该村的农田。因为山上流下来的涌水带黄泥水，故称之为黄泥涌。英文名称为“快活谷”，其实其来源，与快乐风牛马不相及。

香港割让给英国后，部分英军驻扎在跑马地现址的摩理臣山上。

很多英军因不适应新环境或水土不服，每天都有大批士兵死亡，就被扛到山后埋葬，当时埋葬英军的地方，一时冢墓如林。

英人就称此为“快活谷”，Happy Valley 即“极乐世界”之意。至今，香港跑马地的英文名，仍为“快活谷”——Happy Valley。



快活谷马场赛马，是香港人热衷的一项赌博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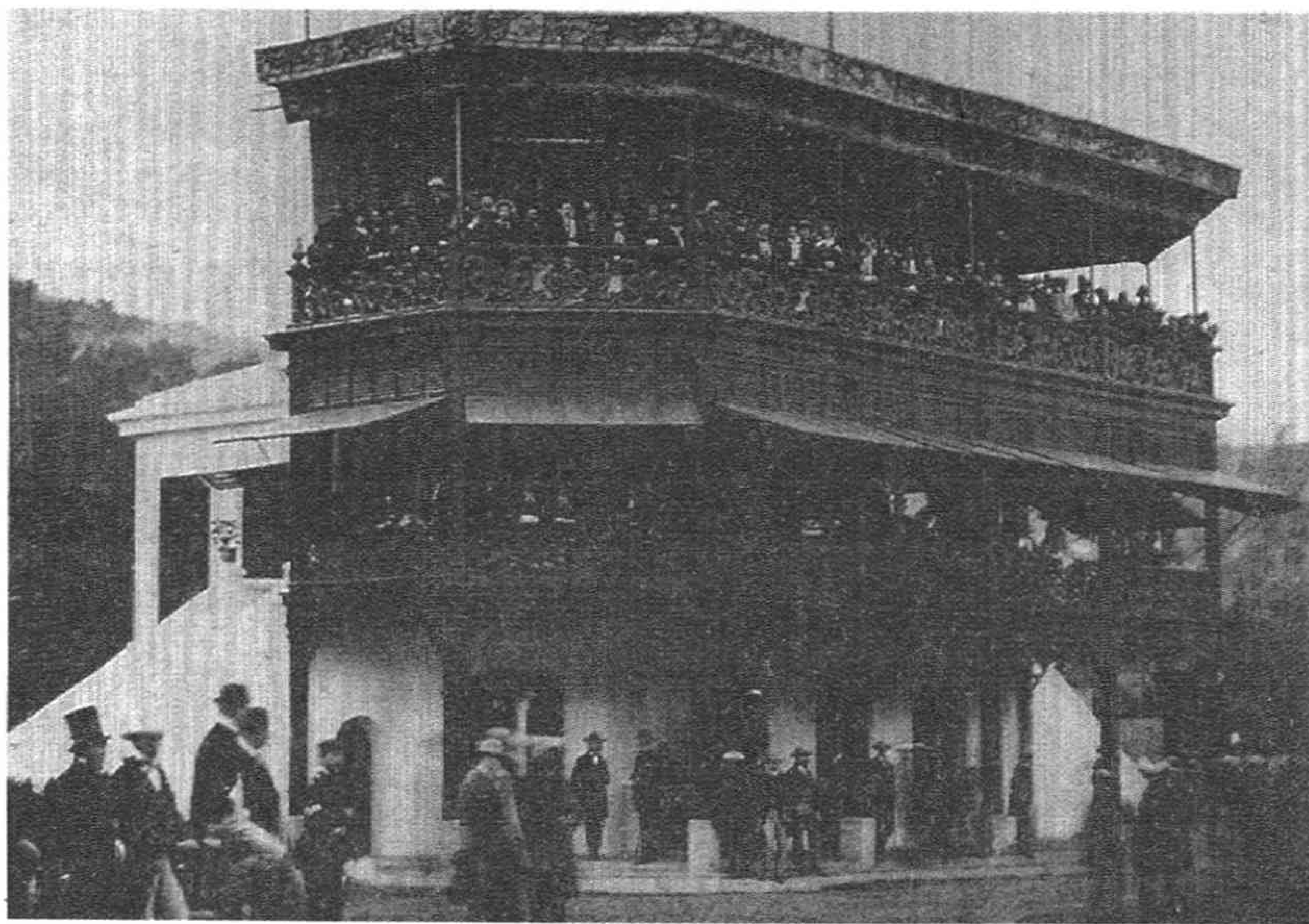
今日电车隆隆拐入跑马地终点站之际，一面是人流车流旺密的大街，一面是墓碑林立的“香港坟场”，阴阳之隔，仅在咫尺之际，也早已见怪不怪，和平共存“快活谷”。

至于跑马地区内的马场，是1845年才开辟的，

1848年建成。初时香港跑马都是在澳门举行，因为香港没有马场。

跑马地马场初时也很简陋，只是沿着黄泥涌道绕一圈，圈中心地方仍是农田，黄泥涌人每日仍可到中间的农田耕田。

当时香港跑马只是一年跑一次，它是英国人



香港跑马地马场旧影。

一种高级社交，没有赌的成分，而且只限于外国人参加，高等港人也只能在旁观看。

可以讲，从1848年开始，黄泥涌村就是坟场、马场和农村的混合体。

1891年，马场开始有了赌马。

1909年，电车开始从西环经中环抵跑马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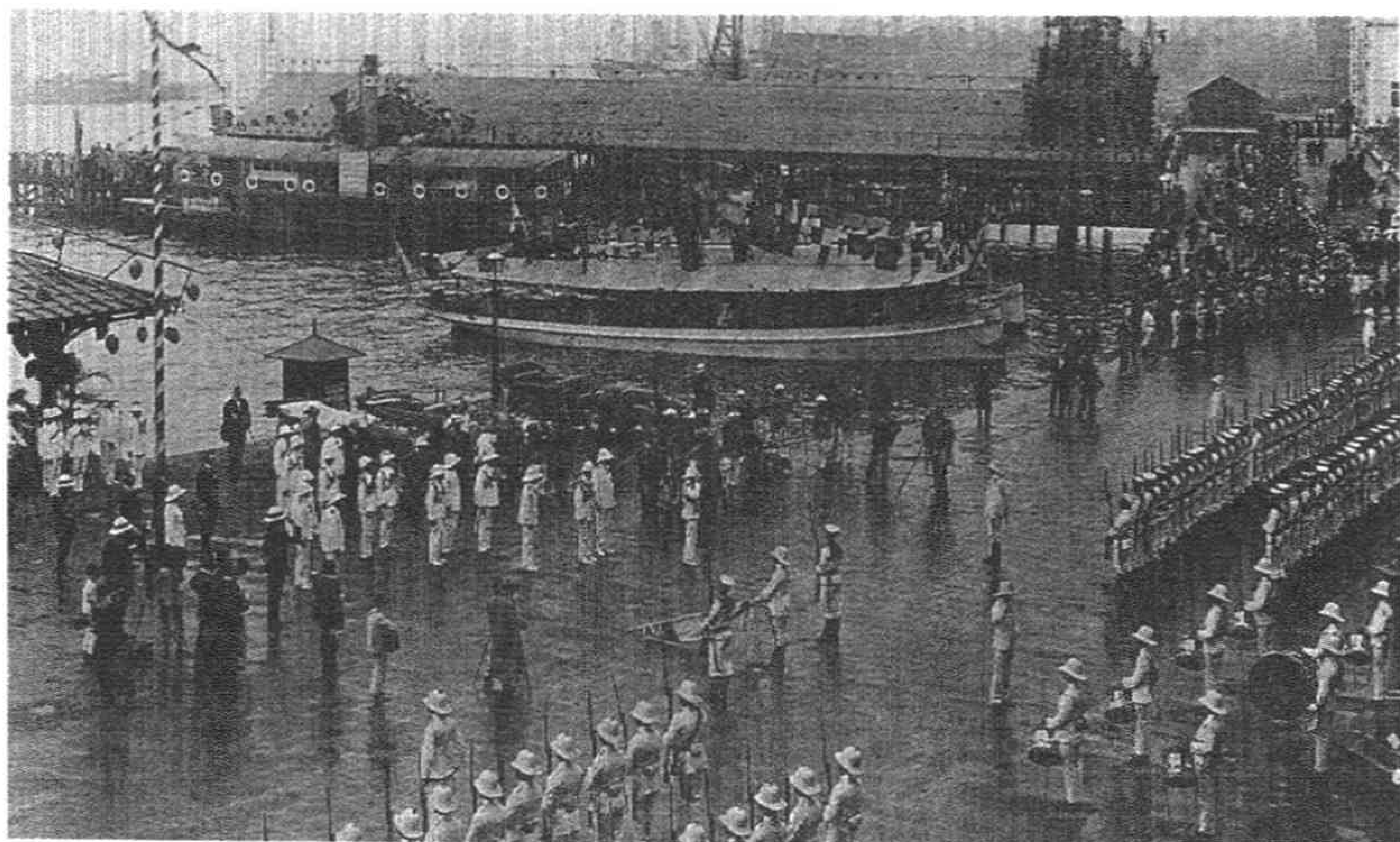
快活谷观赏赛马的盛况。摄于1927年。

跑马地开始迅速由郊区演化成市区。

1923年，港英政府正式宣布发展跑马地为高级住宅区，这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迁。

当时香港有钱人都住中环坚尼道之上，由于跑马地当年为近郊，空气清新，便纷纷从中环移居跑马地。跑马地为香港豪宅集中区域，开始慢慢形成。

1941年香港沦陷，日本军国主义为粉饰太平，恢复赛马，而且规定，所有参赛的马匹名一律取消以前用的英文名改用中文。无形中令跑马普及化。因为以前英国人管理下的马场守则，马名包括投



1922年，英国威尔斯王子亲临卜公码头。后为爱情放弃皇位。

注的售票窗牌号，全部用英文，当时香港人懂英文的不多，即使中国人被准予入马场，仍难投入。所以跑马活动仍属小圈子内的活动。一旦启用中文后，再加上当年的《香港日报》每逢赛马前，会出版半张“马经”，一时抢购而光。于是其他报章纷纷仿效。可以讲，这是香港中文报“马经”之始。

香港在“日据”时期，娱乐不多，一般小市民一旦可以从报上得知赛马资讯，立即蜂拥投入。

抗战胜利后，香港赛马会保留赛马沿用中文的形式。此时，不少上海人南下香港。跑马跑狗对海派上海人，经验老到啦，他们的南下，令赛马在香港，更如火如荼。

跑马的派彩可以很高，中头奖者大可一世享福。

有例为证：1931年头等奖十万元，在当时足够买二三幢楼。一般人做几世都做不到。香港人称之为“小刀锯大树”。

赛马正符合广大市民的“发达”心理，故而更是热衷赛马。

在五六十年代，外围跑马属非法。但政府有鉴于大势无从控制，索性从1973年起，广设外围投注站，把原属非法的形式纳入正轨。

今日香港场内外的投注都实施全盘电脑化，还可以用电话投注，一般投注最低十元。

今日香港赌马，已成十分普及的不分阶层的娱乐活动。

因香港天气炎热，由9月上旬马季开锣，至次年五月后歇夏，每周有两次跑马。因此，一个聪明的女秘书绝对不会在周三晚上替老板安排活动，因为周三有跑夜马。遇重要节日，赛马日期也会有变动以方便马迷。

香港法律是绝禁聚赌的，而赛马之赌注，十余亿港元一次赛事赌注却不禁，皆因赌马在香港，其“玩”的意义早已超过“赌”的心态。

目前香港除跑马地的马场外，在沙田另有一个马场。

现今跑马地马场跑道一圈1.4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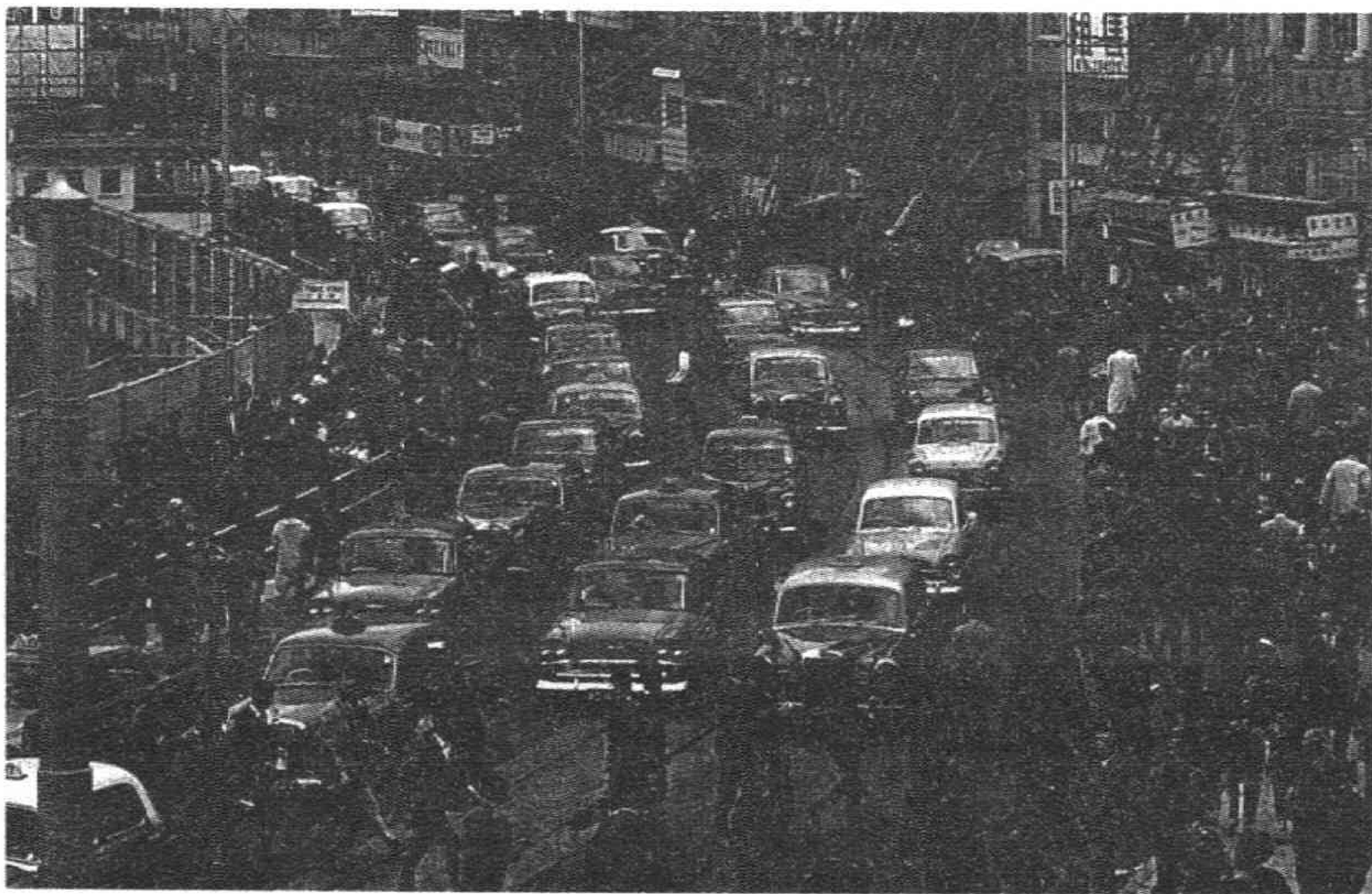
香港马会共有马七百余匹，分属不同马主，骑师数十个。

历来骑师以外籍人士居多，近二十年来，本地骑师也不少，更有女骑师。名骑师在香港民众心目中，绝不亚于四大天王。

因为港人热衷跑马，马会已成港人打工的最大雇主之一，马场、马房、马会、投注站等等，为香港人提供大量的就职机会。并因此衍生香港特有的马会文化。

马会是香港高级社交场所，会员多为非富则贵之人。另外各报章的“马经版”，又催谷出一批资深马评专家。马评专家，大约是全港拥有最多读者的作者。逢跑马之日，香港街头、地铁上的市民大多手执报纸“马经版”细细研究，也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车水马龙、人流迫挤的跑马地。摄于1965年。




VACUUM OIL



第四章





1972年九龙半岛及中区远景，前为山顶瞭望塔及缆车总站。



香港湾仔填海工程之前的情景。

百年沧桑话“天星”

“砰”的一声，木质跳板落到码头上，搭客纷纷起身下船。人簇中，有西装革履的上班白领，有穿休闲装的游客，也有穿着各自民族服装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这样的场景，已成了香港生活万花筒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图案——搭“天星”小轮过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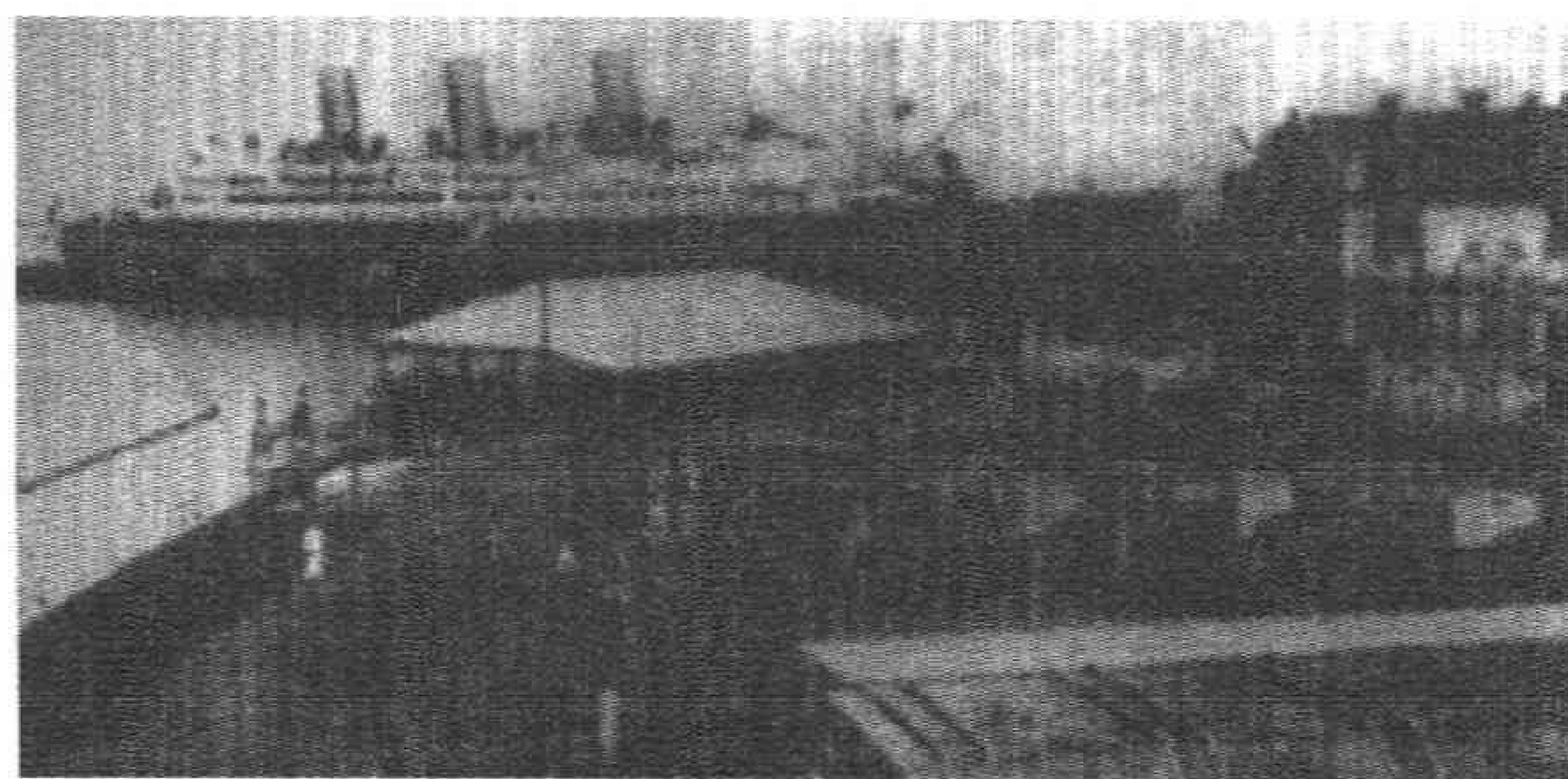
每天从早上六时半到深夜十一时半，在维多利亚港最窄狭的海面——港岛中环至九龙半岛的尖沙咀，绿白两色的“天星”小轮，在港九间来回穿梭，走了已有102年！

无法想象，维多利亚港面上不见了这些绿白小船的点缀，维多利亚港还能称为维多利亚港吗？上海外滩不见了那54座沿江的上两个世纪的老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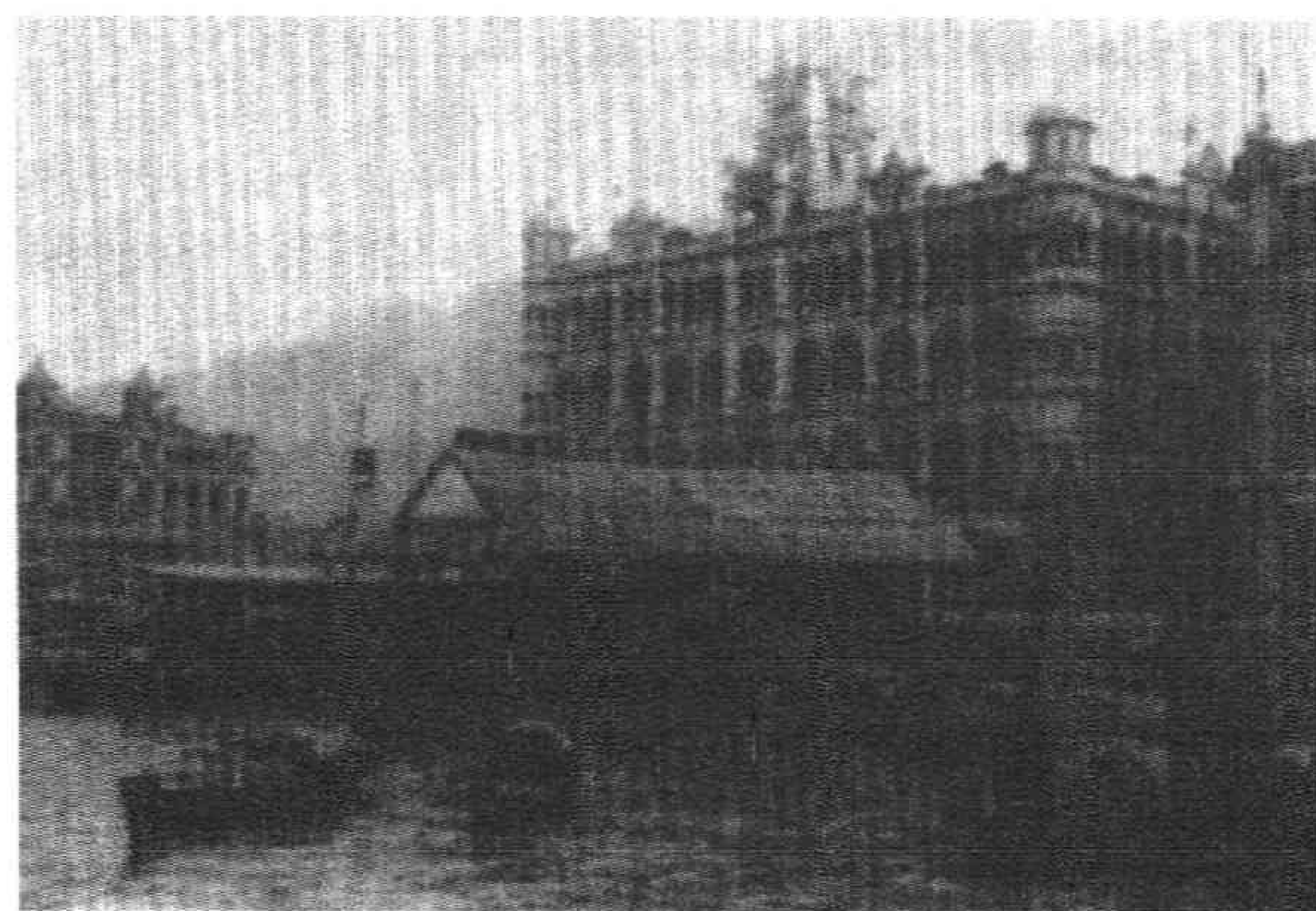
筑，外滩风采何存?

百多年来，“天星”小轮的设计一直保持原样：船身是“双头式”，就是呈橄榄形，两端都有驾驶舱，如是来回不用掉转船身。搭客只需翻转椅背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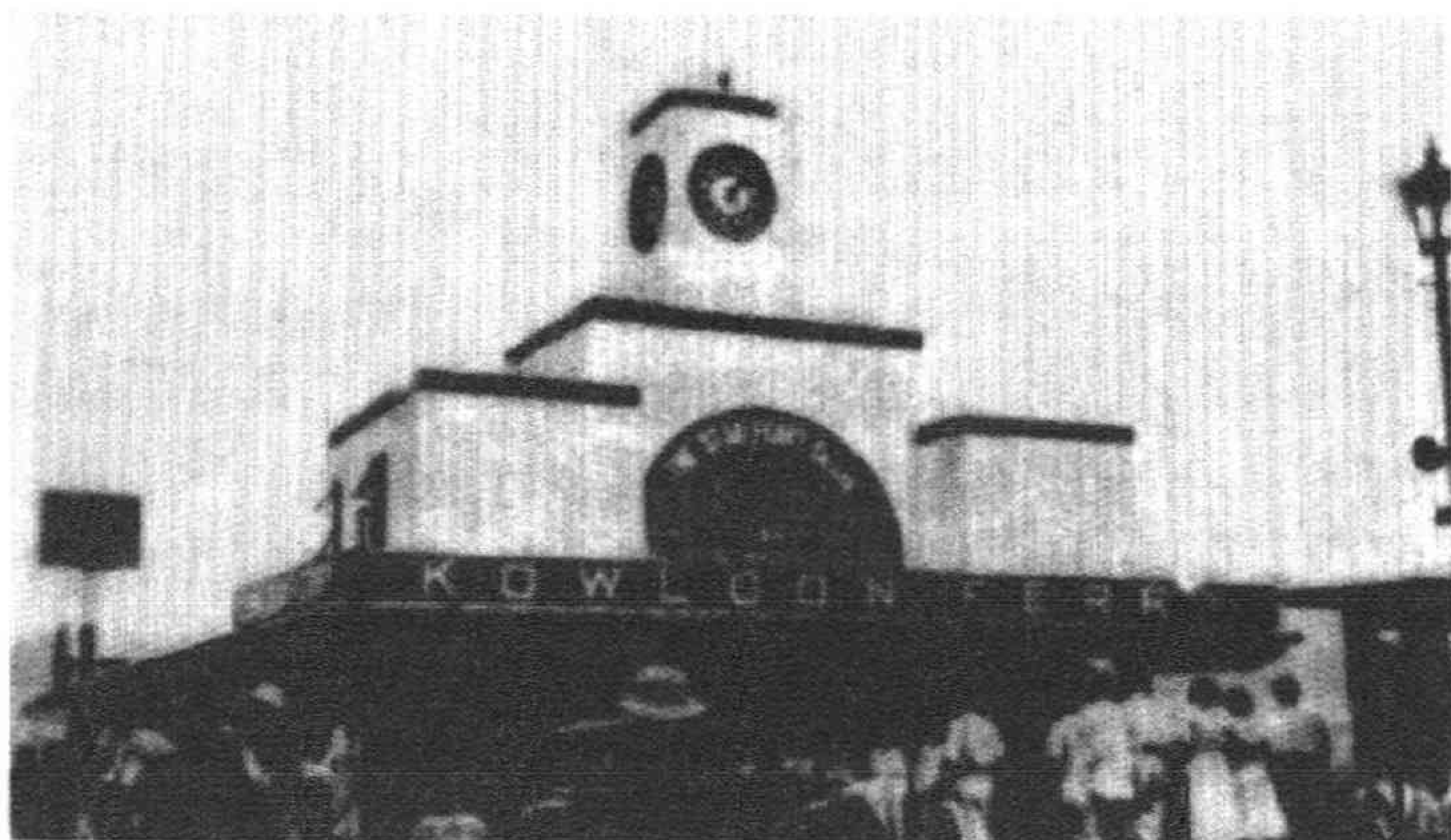
每艘小轮可载客552人，收费2.2元，65岁以上长者免费。每艘小轮配七个水手。小轮最近一次航行事故，是与另一艘“天星”小轮相撞，那是在1937年，此后一直未有事故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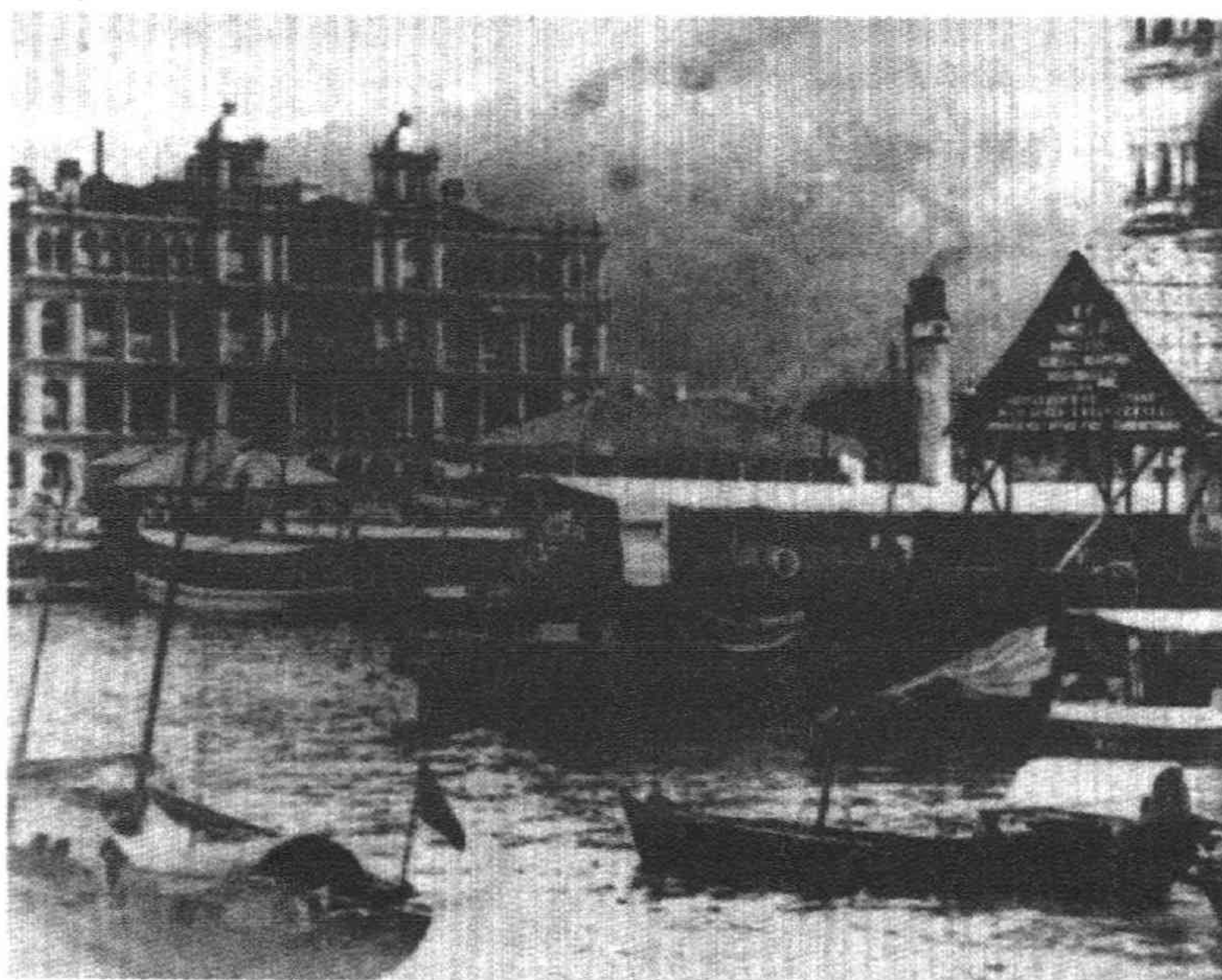
昔日尖沙咀码头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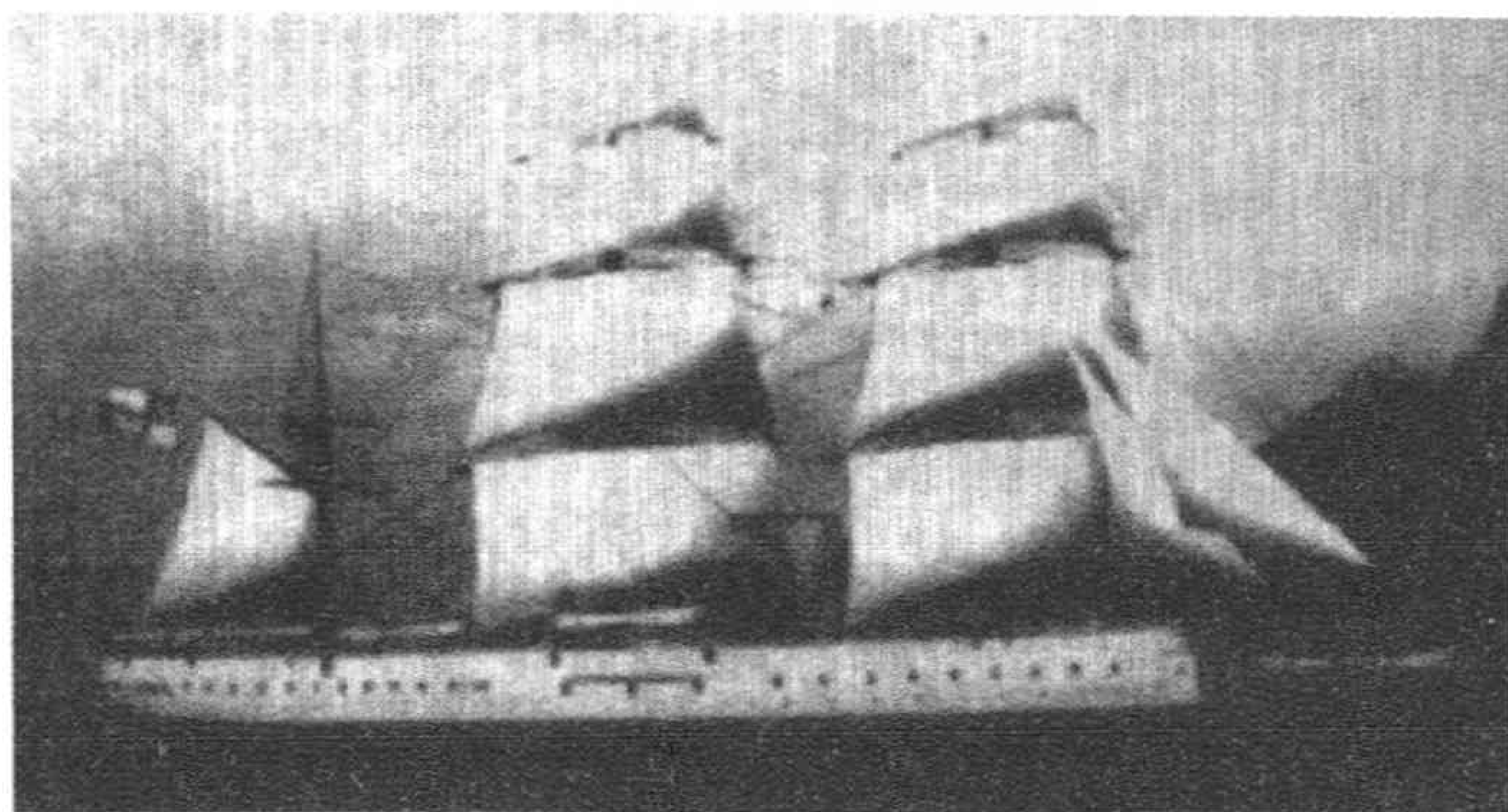
1930年时的尖沙咀跨海轮渡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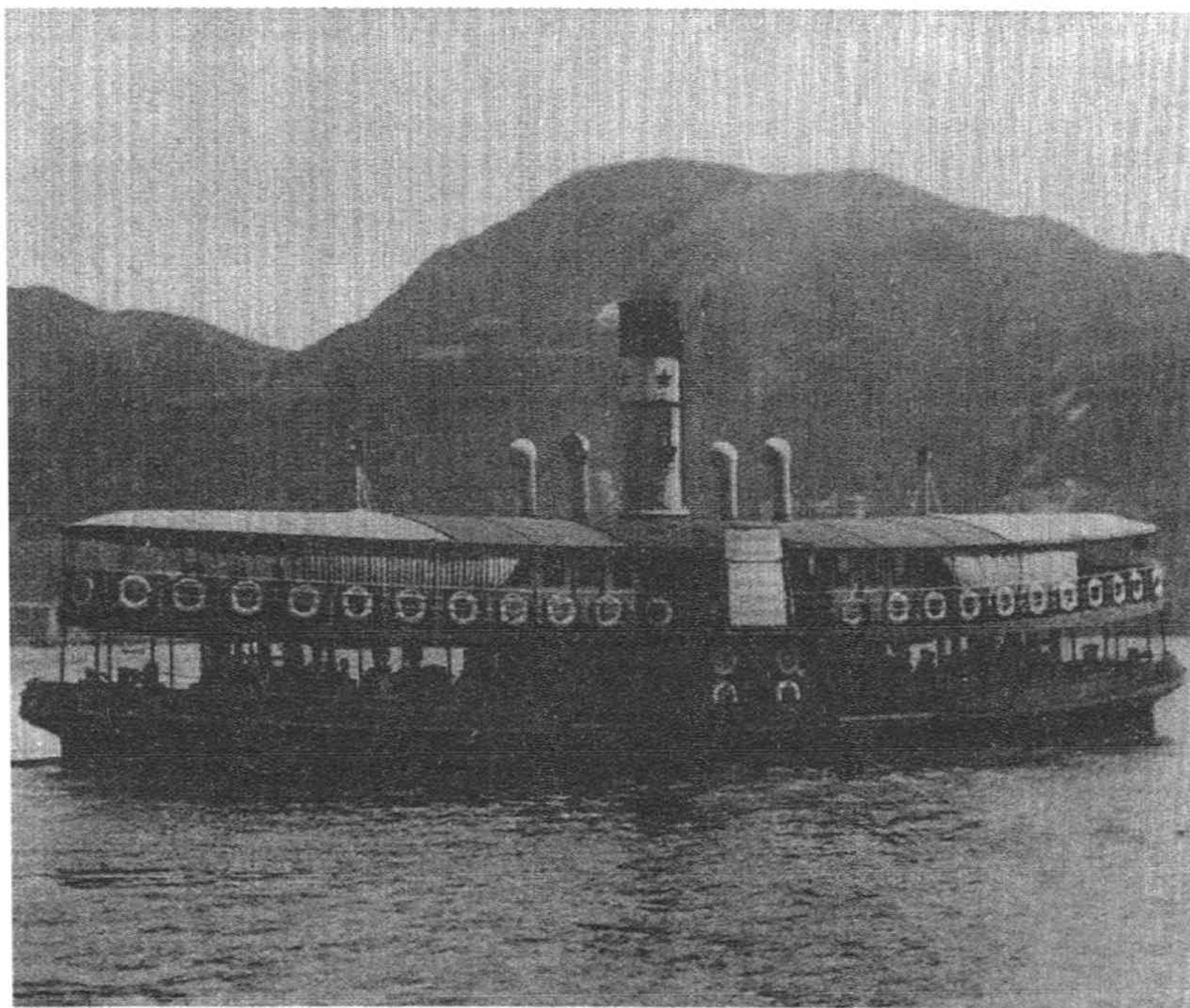
1949年时的九龙天星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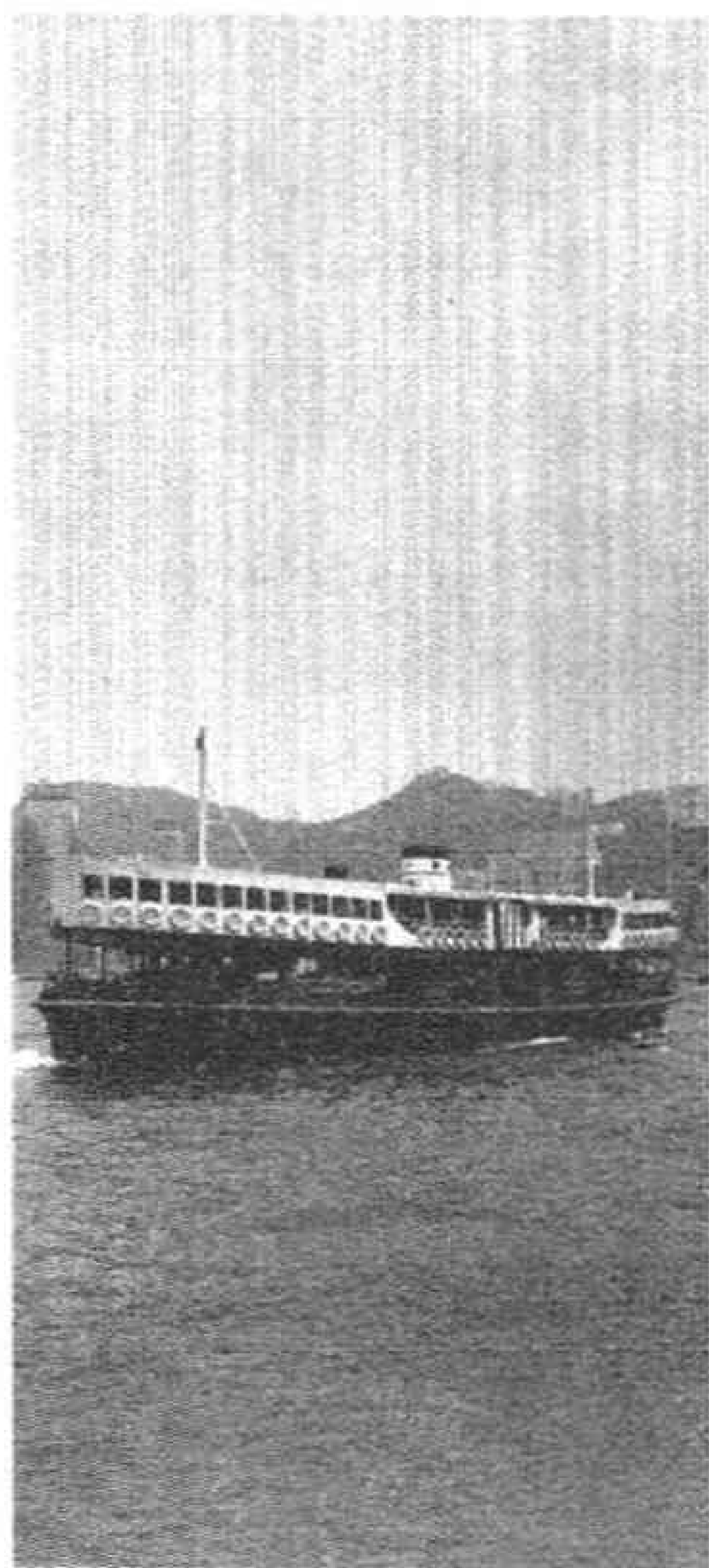
30年代香港码头一景。



早年在香港航行的汽船。



早期的渡海小轮。



绿白两色的“天星”小轮，见尽香港百年沧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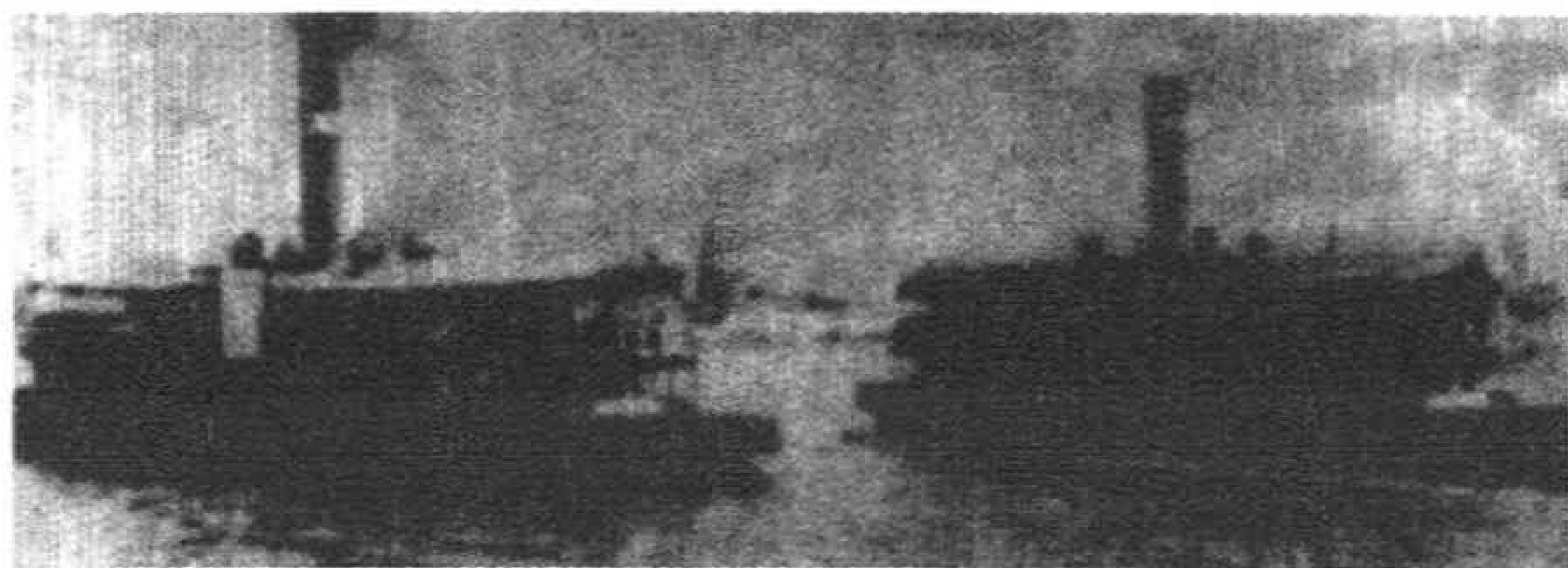
“天星”小轮

从九龙半岛尖沙咀到香港的中环之间航程为1.24公里，每程七分钟，航班间隔为五分钟，每天大概开出350班，一年约有13万班次。

如果从1898年5月1日“天星”小轮公司成立以来算起，百年来搭乘“天星”小轮过海的人次，可能已超过1000万人次。

今日香港交通设施四通八达，要过海可乘地铁、隧道巴士、的士……但“天星”小轮仍是众多香港市民首选的过海交通工具。除了收费低廉，这其中，更有一份心意情结。“天星”小轮，是陪伴着三四代香港人成长的历史见证。

“天星”小轮强烈的历史感，已成了香港的一个标志，百多年来，这些小轮在外形设计上仍保留



早期的渡海小轮。

着19世纪它甫问世时的传统：绿白两色，用桐油抹得油光滑亮的木条座椅，散发着的油漆香，令那浓厚的历史味更感性，几乎伸手可触！

我的小学时代，那时贯穿港九两岸的海底隧道尚未问世，每日在保姆带领下搭“天星”小轮去九龙上学。回上海后，整整有30年未重返香港，但日日搭乘那绿白两色小轮往返港九两地那一幕，已深深嵌入我童年记忆中。

光阴是无情的，1990年我重返香港，一切已时过境迁，往年留在记忆中的踪迹无处可觅，惟独登上“天星”小轮，闻到那股清香的桐油味，如同孩子闻到乳娘衣服上的奶香。陌生的香港，一下子温馨起来，牵起万般情丝！

同样的，外国游客，更特别将搭乘“天星”小轮作为一项认识香港万千风情的节目。

“天星”小轮已成了香港的一个标志。

绿白两色的小轮，是全世界许多人拍摄的景物之一。

当初，曾不断有人想在连接港九的中环与尖沙咀之间兴办过海渡轮服务，认为这是一个万无

一失的商机。

一位来自印度的名叫多拉伯杰斯·瑙洛基的波斯人，终于如愿以偿，开办了小轮公司。

他公司属下的小轮，都以"STAR"(星)命名，"天星"小轮就此得名。船只数目也已从初时的5艘，增加到目前的12艘。

不要看区区12艘小轮，百年来它们从不间断地穿梭在风波千樯的维多利亚港上，尽管一度为香港标志的尖沙咀旧钟楼在不断崛起的摩天楼玻璃幕墙中红颜憔悴；原在中环海边的旧港立法院楼被不间断的填海越推越不显眼，惟"天星"小轮的魅力不减，并已深深融入港人日常生活之中。

百多年来，除了战争，"天星"小轮服务几乎没有停止过。

在港九没有建起海底隧道之前，"天星"小轮

客轮刚从广州抵达香港的繁忙情景。摄于1925年。



是连接港九两地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即使挂起八号风球，除非风浪迫使小轮停航，它还是要将拥到码头的市民疏散完毕。就是今天，在八号风球挂出之后，小轮仍然会坚持航行两个钟头左右，以疏散赶着过海回家的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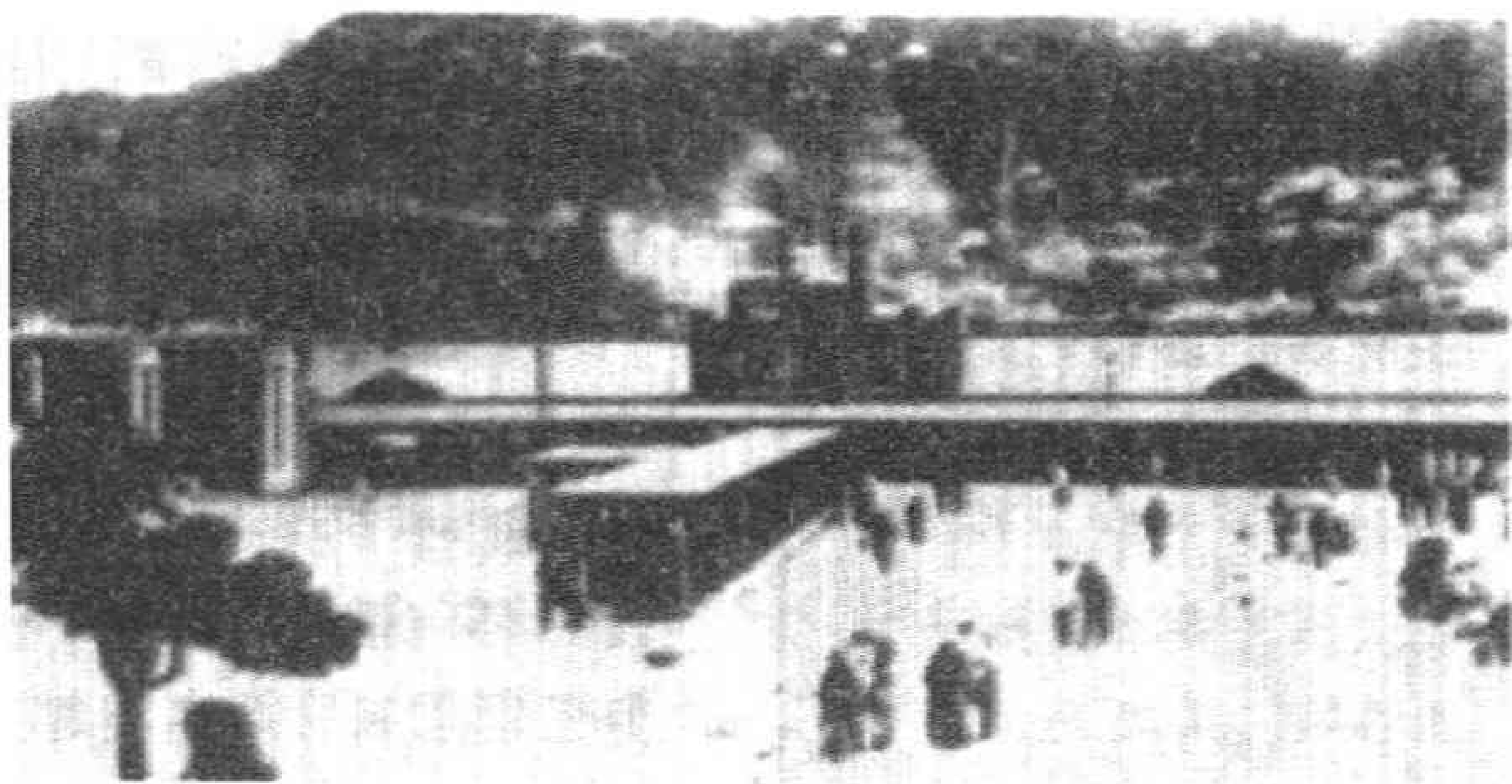
只要“天星”小轮的领航员能看到前方150米左右，小轮就可以继续航行。舵手每分钟会响一下汽笛，船首有人岸望。船上装有指南针不会偏离航道，而且会将速度尽量减慢，因此绝对安全。

在二次大战之前，小轮的头等舱(今日的上层舱位)有严格的衣着规定，这或许是大英帝国绅士文化的影响。香港天气炎热，当时冷气也不普及，因此准许男士不穿西装上衣入舱，但一定要扎领带，皮鞋一定要是扎带的，不能穿凉鞋或懒佬鞋。哇，这架势，简直是今日上海人上大剧院的规矩。

不怕你不信，在21世纪的“天星”小轮上，在晚上，你仍会看到穿盛装的、穿晚装的男女乘客，不过，他们多半是刚从香港文化中心听完音乐会回来，或刚从半岛酒店赴宴回家!

百多年来，“天星”小轮满载着香港市民的沧桑，沉沉浮浮，见证了战火与繁荣，回归的喜悦……“天星”小轮本身，就是香港的一个传奇。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英宣战，日军入侵香港，小轮在日军炮火猛烈攻击下，继续航行，直到最后一批英联邦军队撤出九龙。整个日军



昔日渡海的小轮船的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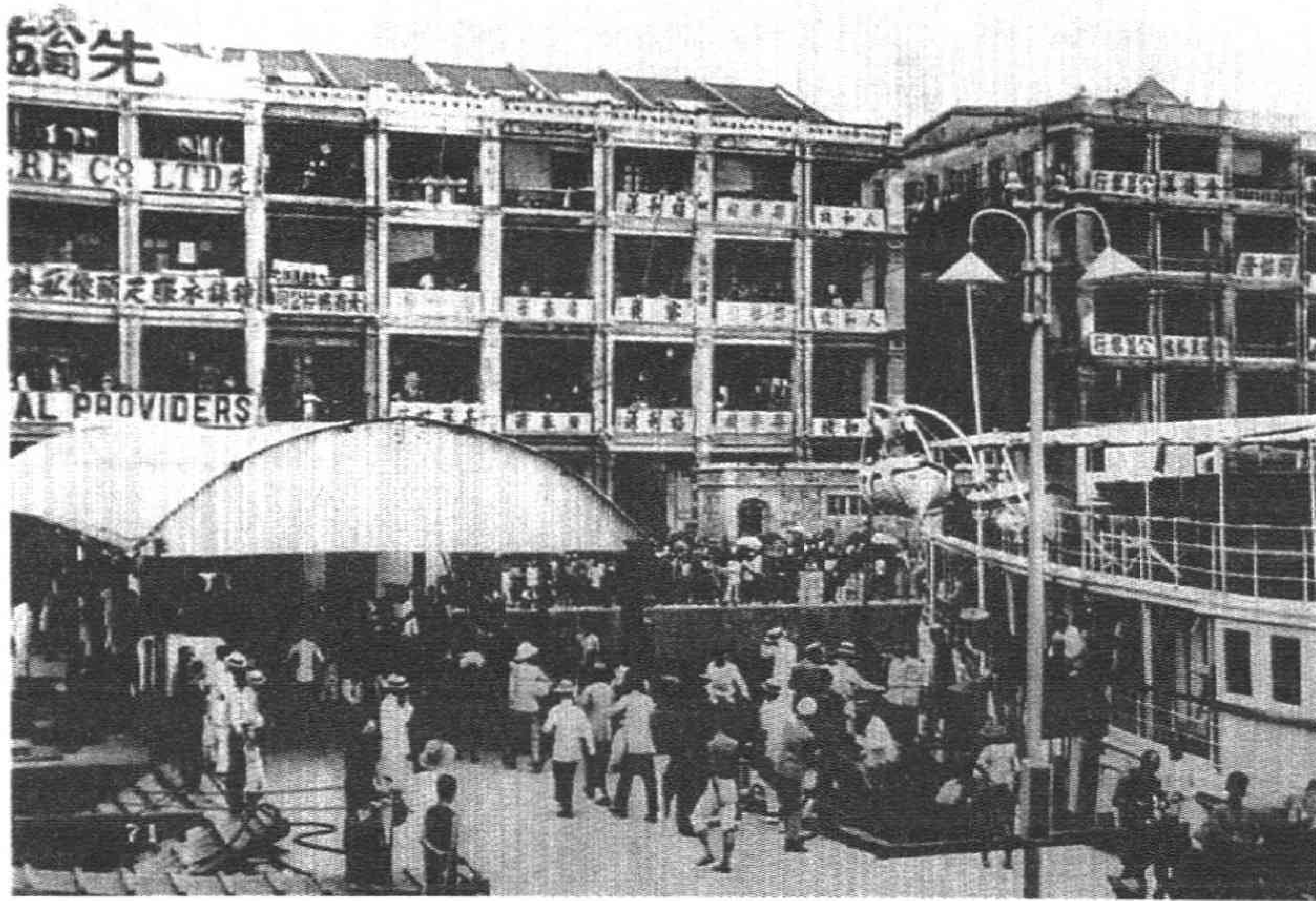
占据香港时期，小轮全线停航，这也是“天星”小轮史上惟一的一次停航!

日本投降，小轮重新复航之时，已是1945年。“天星”小轮只有两艘在港岛码头半沉半浮，奄奄一息；还有一艘，在往广州的途中于珠江沉没!这是“天星”小轮史上惨痛的一页。即使1972年海底隧道通车，香港九龙市民交际再晚，再余意未尽，也要赶上最末一班“天星”小轮，否则，就回不了家。因为地铁在这时已停驶。

地铁和两条隧道，给港九市民提供多元的过海选择，但“天星”小轮风采依旧。

现代人生活繁忙，只知匆匆赶往目的地，忘记了车舟劳累的过程，原也满载着生活的浪漫。最好是在夜间八时后，乘搭“天星小轮”过海，观看两岸争艳斗亮的霓虹灯广告和密集的蜂窝样闪光的窗口，你可以抽离出来，悠然自得地置身局外七分钟。这不慌不忙，不徐不疾，舒坦宁静的七分钟，你、船只、灯火通明的两岸高楼，在各自位子上自行修炼，互不干涉……对都会人来说，这已是一种奢侈的体现。

“砰”，船到岸了，乘客纷纷起座，重新调整好



香港的上环省港澳码头。

步伐，为投入急速的运转作好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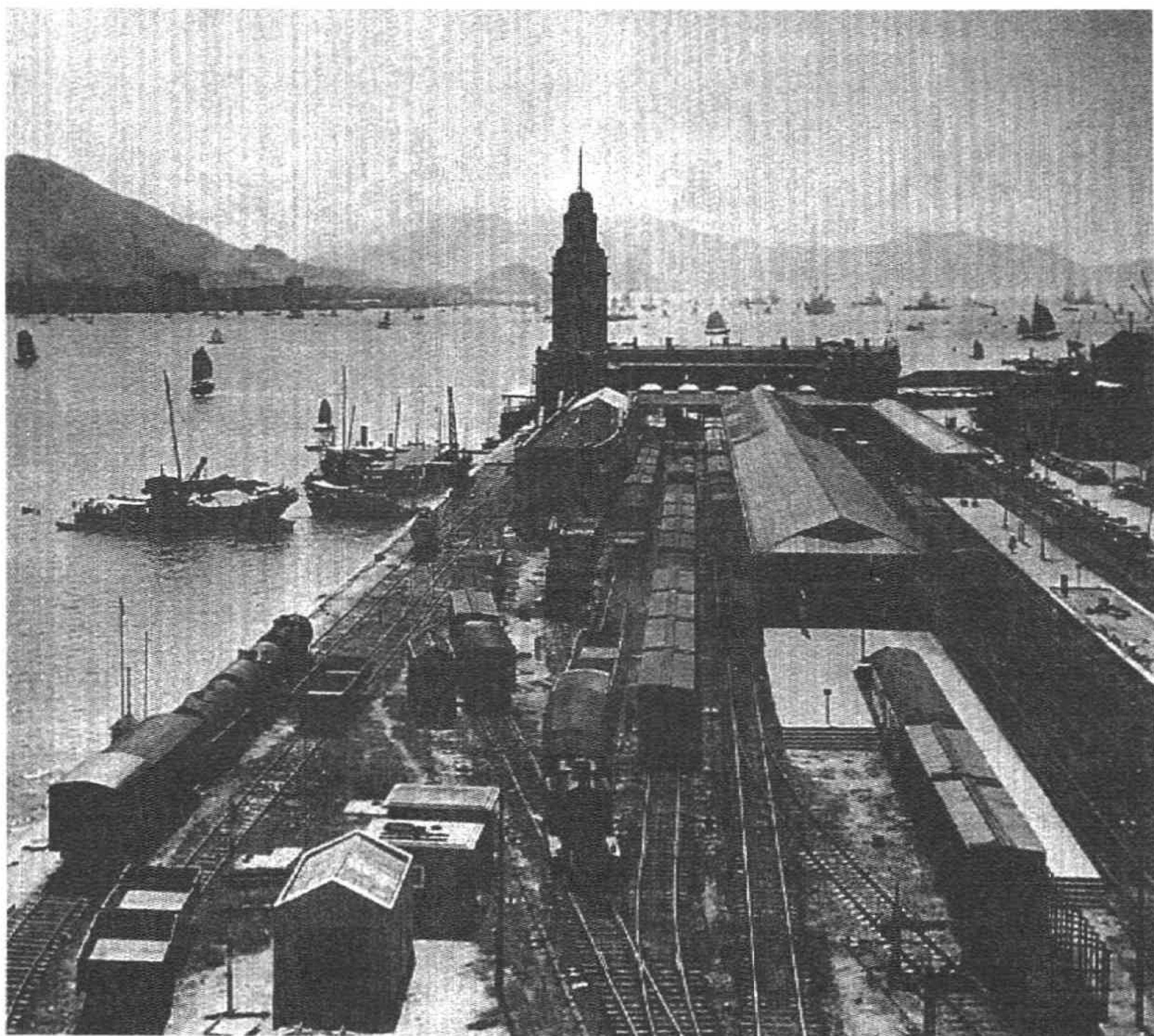
百多年来与港人同度时间、甘苦与共的“天星”小轮，面对都会的现代化和竞争白热化，以不变应万变。

1998年3月，香港特区政府批准“天星”小轮专营权延长十年，保证了公司短期的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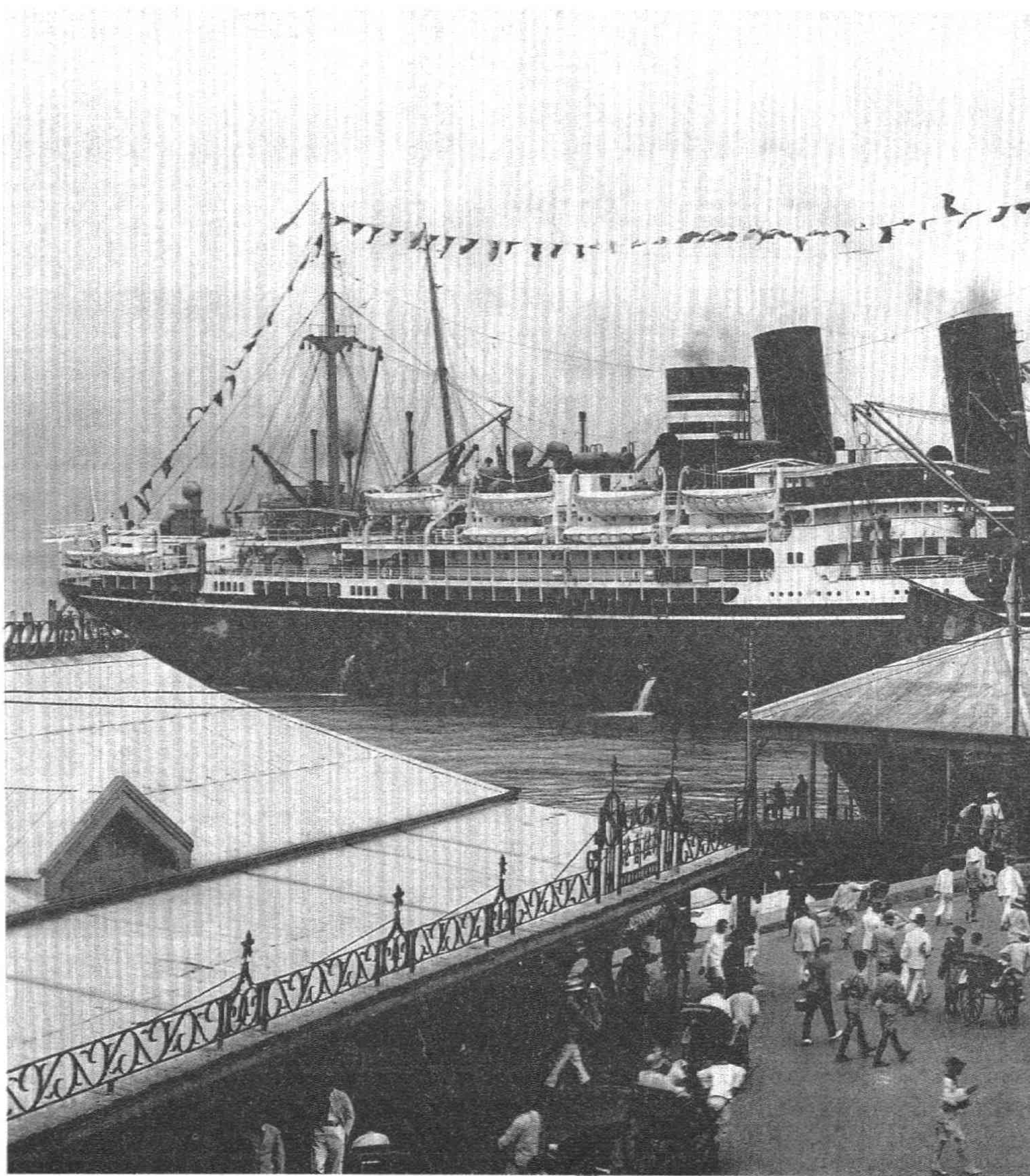
“天星”小轮公司也已明确向香港市民表示：只要公司不亏太多的钱，“天星”坚持继续服务市民。

在惟利是图的香港，这真难得。

香港之可爱，就在新旧中西都有，任君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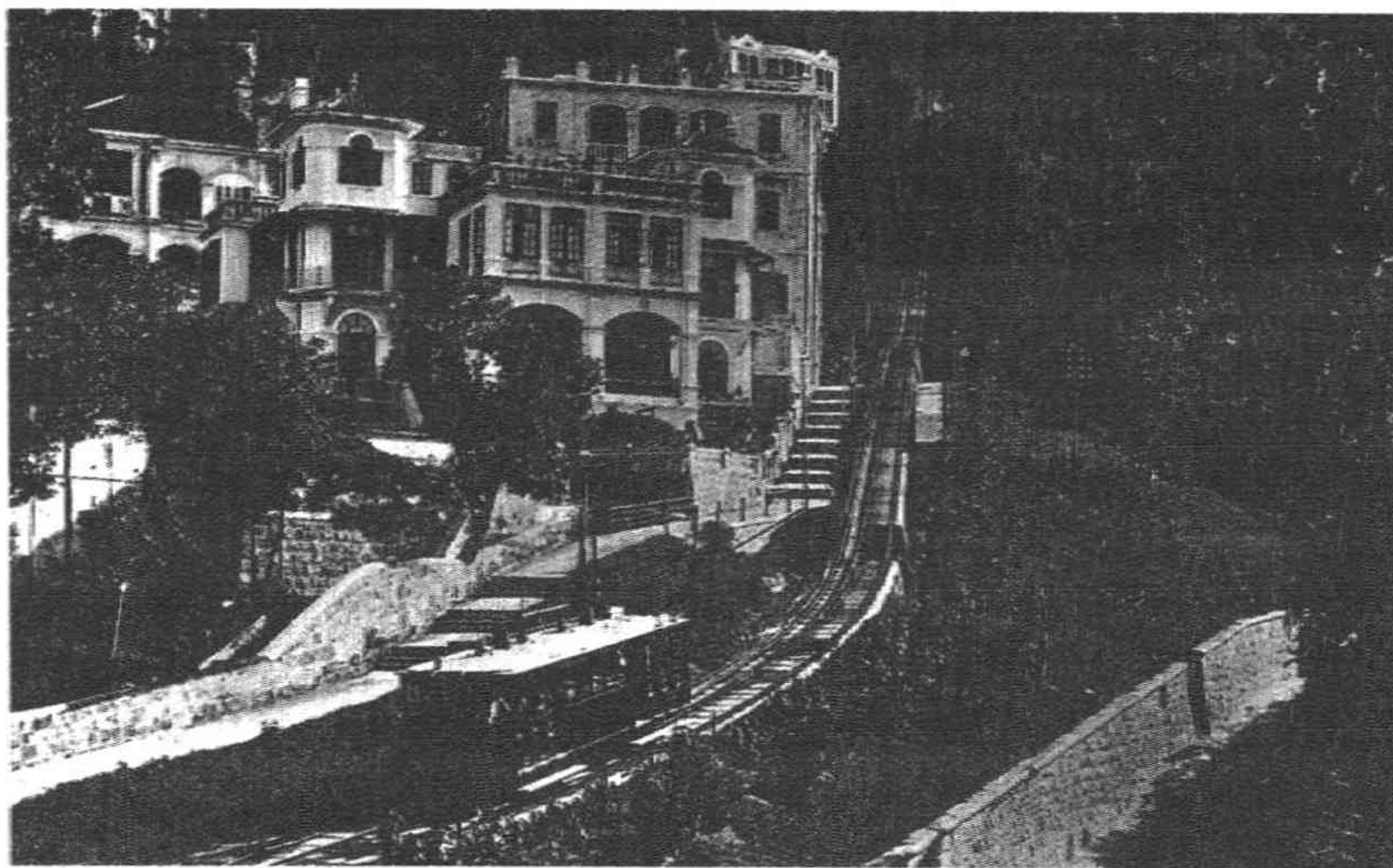


尖沙咀天星码头和火车站。摄于20世纪50年代。





日本客轮泊港，摄于20世纪初。



▲香港的电车。

▼人力车。摄于1957年。





过去香港的电车票。

黄包车和电车

今日6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对黄包车有深刻印象。作为草根阶层劳苦大众的典型，黄包车夫，已多次在中国的文学美术作品中出现：老舍的《骆驼祥子》，鲁迅的《一件小事》，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

香港的首辆黄包车，是1860年由一位传教士带来的，创意始于日本，只是较日本人力车矮小，令乘客容易上下。

香港人讲究忌讳，人力车一律油漆成吉祥富贵的黄色，因此又称为“黄包车”。当年孙中山在香港就有一辆私家黄包车，现陈列在澳门孙中山纪念馆。

香港多山，市内斜坡多、窄路多，因此黄包车



很快成为20世纪初香港重要的交通工具。自1860年引入后，迅速增加，港英政府在1863年对人力车实施发牌制度，连车夫也要领牌。

英国人讲究气派，因此港英政府会不时检查黄包车的清洁情况，如果不合标准，会吊销牌照。车夫的衣饰也很讲究，属于大规模车行的，会在背心写上车行名；大户人家的私家车，则写上家族姓氏，以显气派身份。

早期香港的交通工具——独轮车。

资料显示，1917年，港英政府统计的黄包车，已有一千七百余辆，足见在世纪初黄包车已是市

香港石板街。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民主要的代步工具。进入30年代，虽然已有巴士问世，但黄包车仍盛行，直至50年代，黄包车再也不能与其他先进快捷的交通工具相匹敌，渐近式微了。1962年，港英政府正式停止对黄包车发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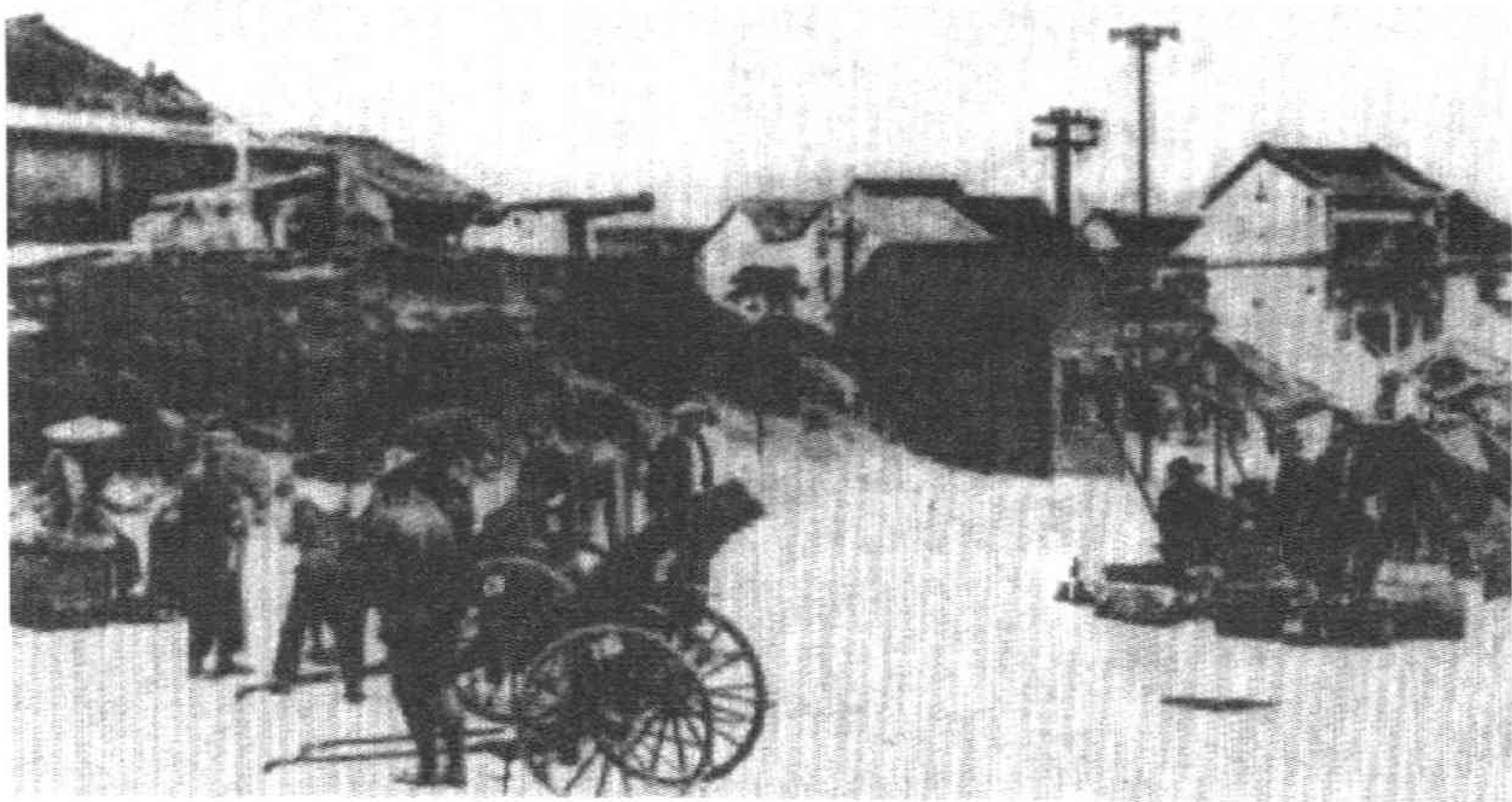
以轿代步。摄于1885年。

至1970年，香港马路上尚有170辆黄包车，不过通常只是走短程路，或者机动车无法到达的窄巷。到1982年全港只剩20辆黄包车，而且规定已不能在马路上行驶。

在等客的人力车夫。

至1989年统计，当时全港最老龄的黄包车夫





早年香港九龙寨城内情形。

为83岁，最年轻的也有70岁。

世纪之交的今日，香港仍可见到黄包车，不过全部漆成大红色，停在九龙尖沙咀天星码头上，专做游客生意，只准在码头区内行驶，全程约四百余米，成为西方人游香港的一个热门节目。

与黄包车同属古老的并保持今日还在使用的香港交通工具，当属香港的有轨电车。

在港岛主要马路，漆成绿色、黄色或赭红色款式古老的箱形双层有轨电车，叮叮当当，行走不紧不慢，已成香港一道独特风景。这种来自英国的旧式交通工具，虽然行速缓慢，而且常常会因为塞车而“脱班”延误到站，但在世纪之交的今日，仍富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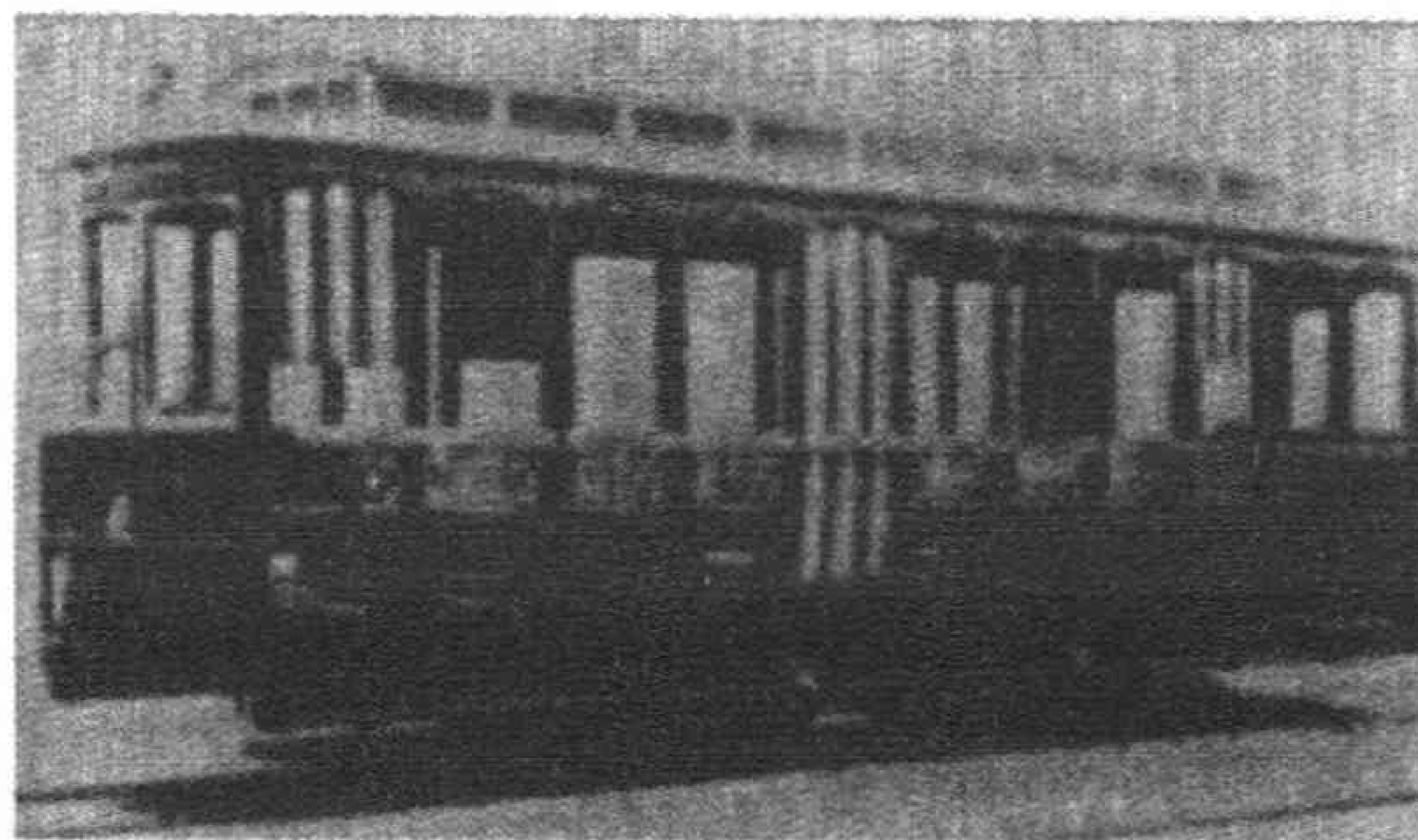
香港电车，在1902年问世，不过那时走的是



石板街上的抬轿人。



出现在香港街头的双人自行车。



早期香港的电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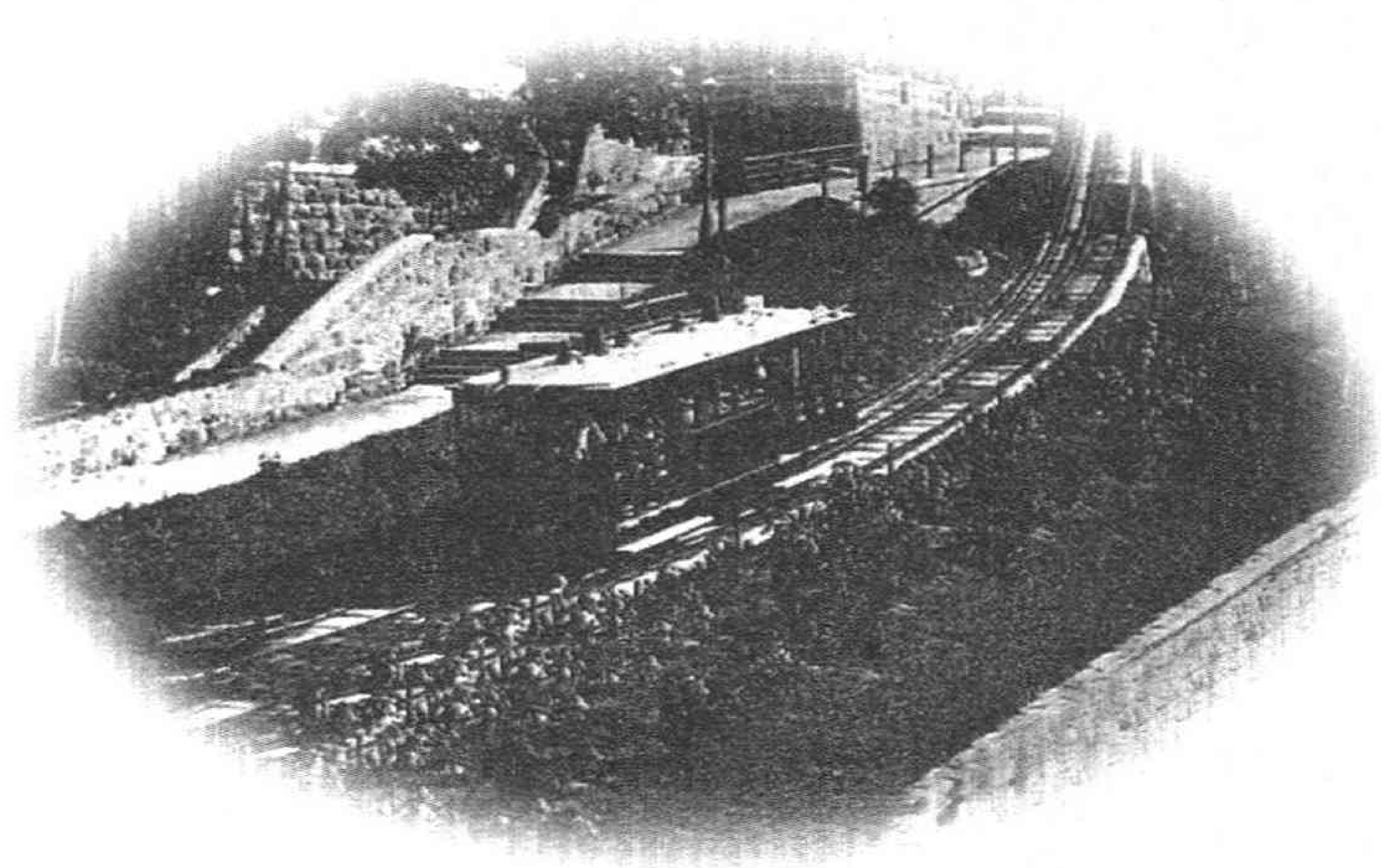
山顶路线，即为今日的缆车。

1903年开始，香港电车公司在港岛铺设路轨，1904年7月正式试车。由于当时香港的交通工具只有人力车、马车等非机动车，所以电车的问世，可谓一件轰动港九的大事。

正式通车之日为1904年7月30日，主持通车仪式的，不是港督，而是电车公司董事长之夫人，驾驶电车的也是她。董事长的儿子，则负责打铃。这也是香港早年一大盛况。

香港电车的第一条路线，是由心脏区中环至湾仔天乐里。

1906年，才开办另一条由湾仔到北角的路线。当时北角有"七姊妹"泳滩，电车的直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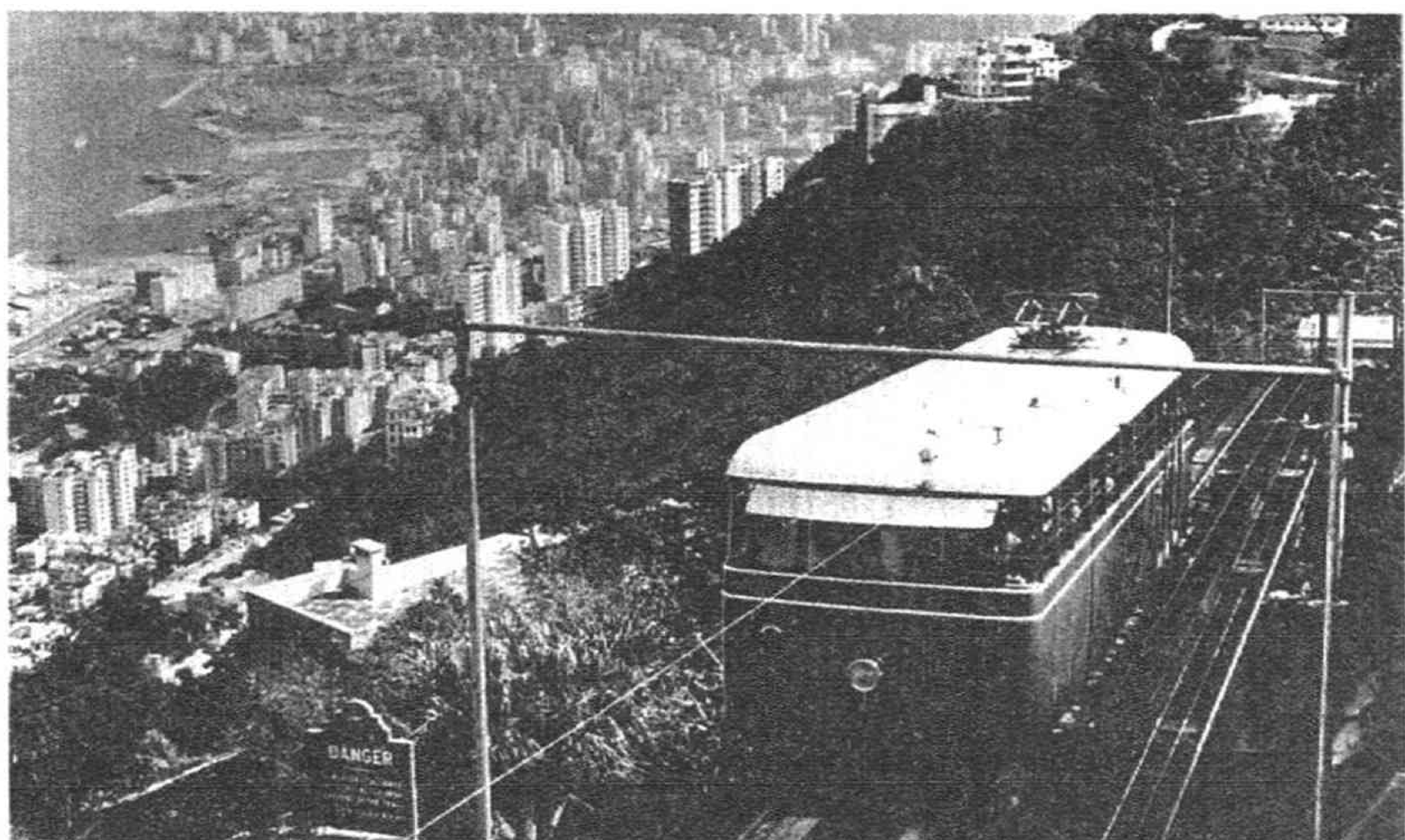


香港的电车。

令该地更兴旺。

最早期香港的电车外型，与现在的电车颇异，那时的电车，是用帆布做车顶，且是单层，车内座位分左右两排。后考虑到台风等问题，便改为今日的密封式设计，1912年，开始出现保留至今的双层电车。

早期电车分头等(上层)和三等。电车在今日，是全港收费最便宜的交通工具，无头等三等之分，成人一律二元，老人及小童六角。早年香港电车由于速度比人力车快，因此属昂贵的交通工具，那时头等六分，三等三分。当时的六分钱，已可吃三碗白粥和两根油条，因此电车在20世纪30年代前，也非一般市民可负担得起的。于是，就有了搭“霸王电车”之举：即不买票搭电车。



山顶缆车。摄于1960年。

搭霸王车，就是看着电车叮叮缓慢地在轨道行进之时，看准扶手或铁柱之类，追着电车尾飞身上去，其敏捷身手，颇有铁道游击队的味道。吸气纵身跳上车，将身子挂在车厢外，随时到站随时再跳下，如是可以不付车资，捉也捉不到。因为电车的行驶速度不十分快，因此搭霸王车的不少。往往一辆行进中的电车，车厢外如壁虎般，附吸着多个搭霸王车的，也属都市奇观之一。飞车要本事，首先要看清马路上无障碍物，再看准可以借力的扶手铁把之类，还要避过车头把守的售票员……跳下车更靠功力：一般先放左手左脚，身体慢慢放低，略弯腰肢，然后脱手跃下，着地时要顺势奔几步才能停下，眼睛要平视或向上看，否则容易摔倒。老资格的飞车一族，着地后马上大转身180度，

轻松矫健。当然，那都是些年轻体健后生仔。

香港在1915年，已拥有电车四十多辆，不过，当时的电车中，还有货车(载运蔬果牲畜)、水车(当时自来水业不完善，要运水到各处给市民使用)，后来，才改成全部载客的电车。现今，全港共有电车160辆左右。

早年电车在香港，还充担着传递信息的任务。在电视未问世、收音机和报纸尚未普及的时期，早在1921年，已有精明商人利用电车卖广告。起初只是在电车顶上加设四块木板，然后把广告放在上面，慢慢才发展成车身也满载广告。再也想不到，当时的广告主要客户竟然是药商。后来，又有人把即日重要新闻贴在车身，令市民沿途都可以见到。

由此可见，卖车身广告，并非香港现代的都市一景，其实此景早在20年代，已成都会一道风景线了。

今日香港地铁轻铁网络四通八达，细细想想，那摇摇晃晃、慢慢吞吞的电车，真的已赶不上香港的节奏，特别电车最易塞车，只要有一辆抛锚，一刹间就会大闸蟹样一串长长地卡在那里。尽管如此有着众多为现代人所诟病的缺点，但这种来自英国的旧式交通工具，至今仍有蓬勃的生命力，一众平民尤其老人家，对其更甘之如饴，故一直未能被取代。



1964年人手指挥交通。

电车站每站头相距约200米，如若不停过了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如果你偶然在时间上可以奢侈一下的话，入夜时分，登上电车上层，找一个靠窗的座位，任凭电车带你去“浪迹天下”，在叮叮当当的车铃和车轮擦着铁轨的“隆隆”声中，从金钟中环灯火通明的不锈钢玻璃幕墙组合的摩天楼群，到横街窄巷蜘蛛网般延伸开来的上环西环布满老店旧楼的老区，短短几十分钟，你已可兜兜转转从现代都会进入老香港风情，港人称此为“游车河”。

“游车河”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节目。特别在写这本《老香港》时，时不时就会去游下车河，坐在凉风习习的二层窗口，居高临下地眺望着老区纵



中环毕打街外商洋行，右为怡和大楼(1895年)。

横交错的小街，当中环办公区已曲终人散之时，华灯初上的老区正是最旺场之时，小贩叫卖与熙来攘往的人声，此起彼落，这里水果档与大排档贴邻，海货的腥味杂着刚出炉的蛋搭香，穿一身黑香云纱中装的阿伯，以一口浓重的台山口音的广东话，在沿马路的凉茶铺柜台上与人聊天，当街的那只与铺子一样老的锃亮的巨形铜茶壶上，映出对面马路理发店门口那只蓝白红三色不断旋转的灯管——现今香港理发店早已不见这种灯管了……伴着当当的电车铃声，一切从资料文字中读到的老香港风情，顿时生动起来，充满感性，呼之欲出！

工作时的高速逼得人透不过气之际，舒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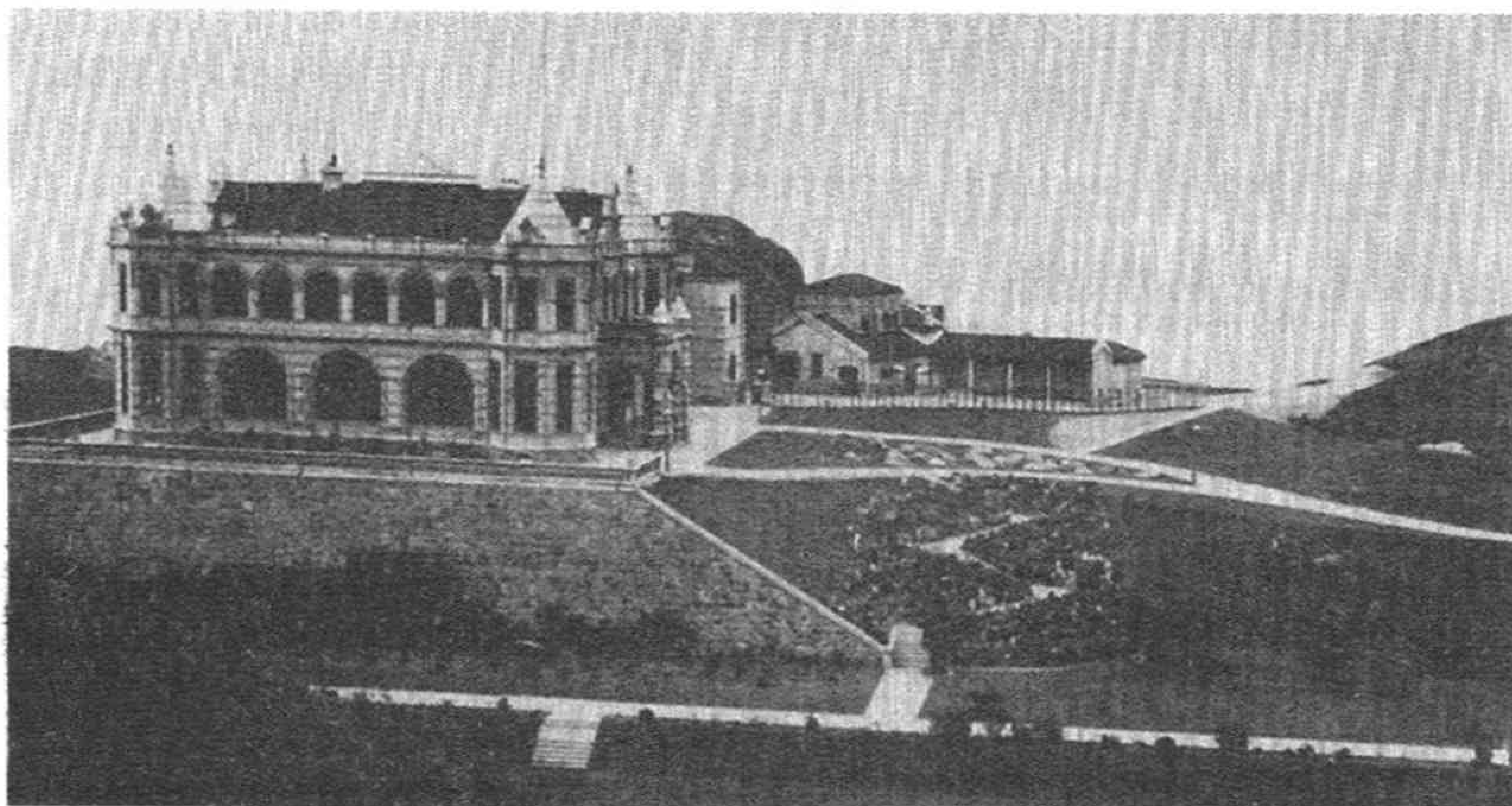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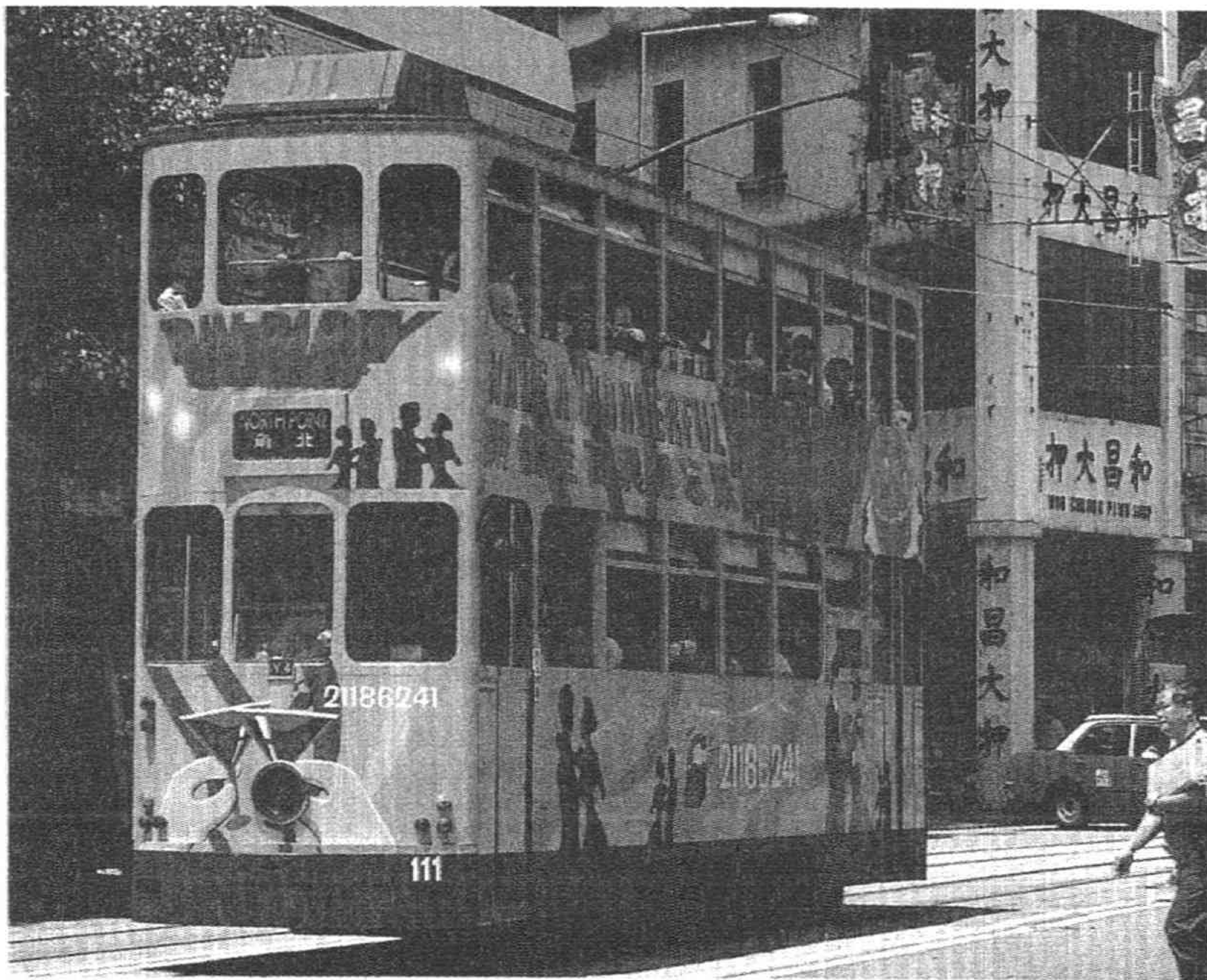
香港德辅道中街景（左为旧大会堂）。摄于1924年。

下，搭乘一程不徐不疾的电车，原来也是一种享受。

香港人是怀旧而不守旧，无论在高压生计下有多迷茫多失落，只要维多利亚港上的绿白相间小轮继续拉着长笛在港九间穿梭，港岛自西到东那条主干道上仍响彻电车的晃晃声，生活固然就

总督府（1903年）。





香港电车叮叮当当已在香港行驶了近百年。

有了规律和归属，这看似近乎荒诞，却是异常真实。

巴老1933年来港旅行，写过一篇以“香港”为题的随笔，特别提到的电车：

……

香港的两层电车引起我的兴趣……我们在先施公司门前上车，一直坐到筲箕湾，然后又搭原车回到先施公司，头等票每次一角……

车缓缓地向前走。太阳快落下去了，只有一抹

最后的阳光留恋地挂在屋顶上……我安静地坐在窗旁，像个旁观者那样，把眼睛埋下去看下面的世界。我的眼睛看见的景象不停地变动：热闹的街市、花园、学校、树木……

时过70年，在香港，花上二元钱登上电车上层，你仍能找到这份感觉。

这就是香港的可爱：怀旧，不守旧，不弃旧；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和融相处，兼容并收。

香港电车。





押
登打士茶餐廳
GOLD WELL DUNDAS RESTAURANT
青島啤酒
THE BODY SHOP
CITIZ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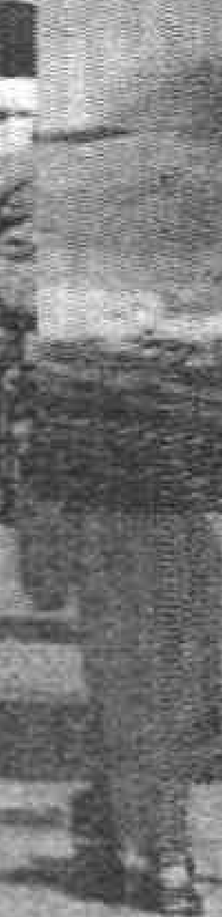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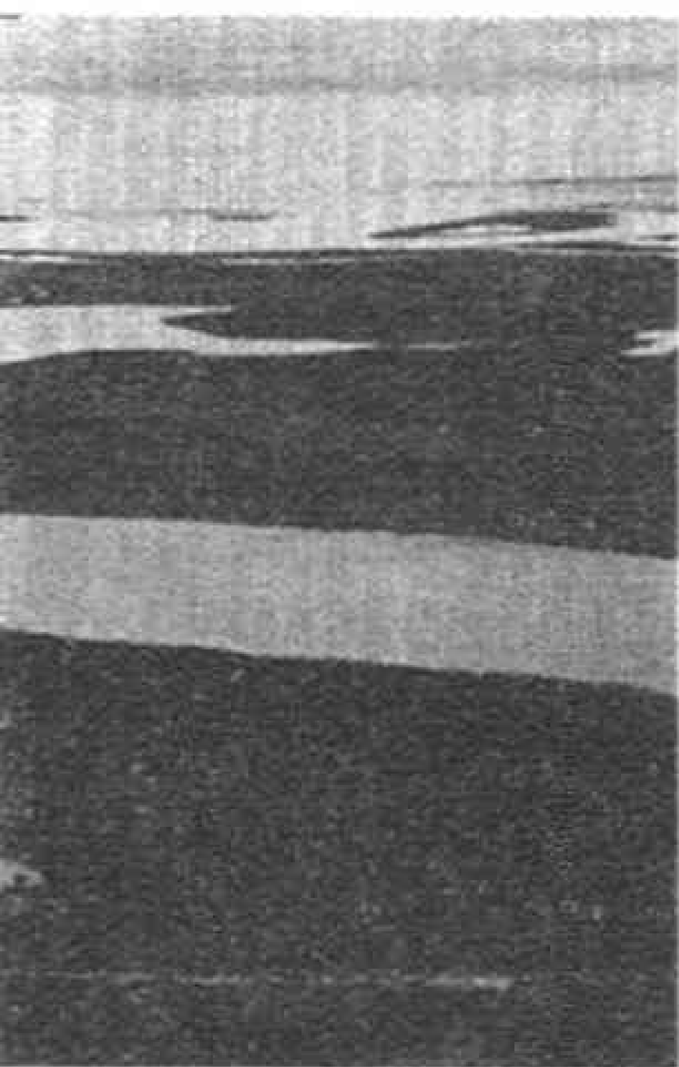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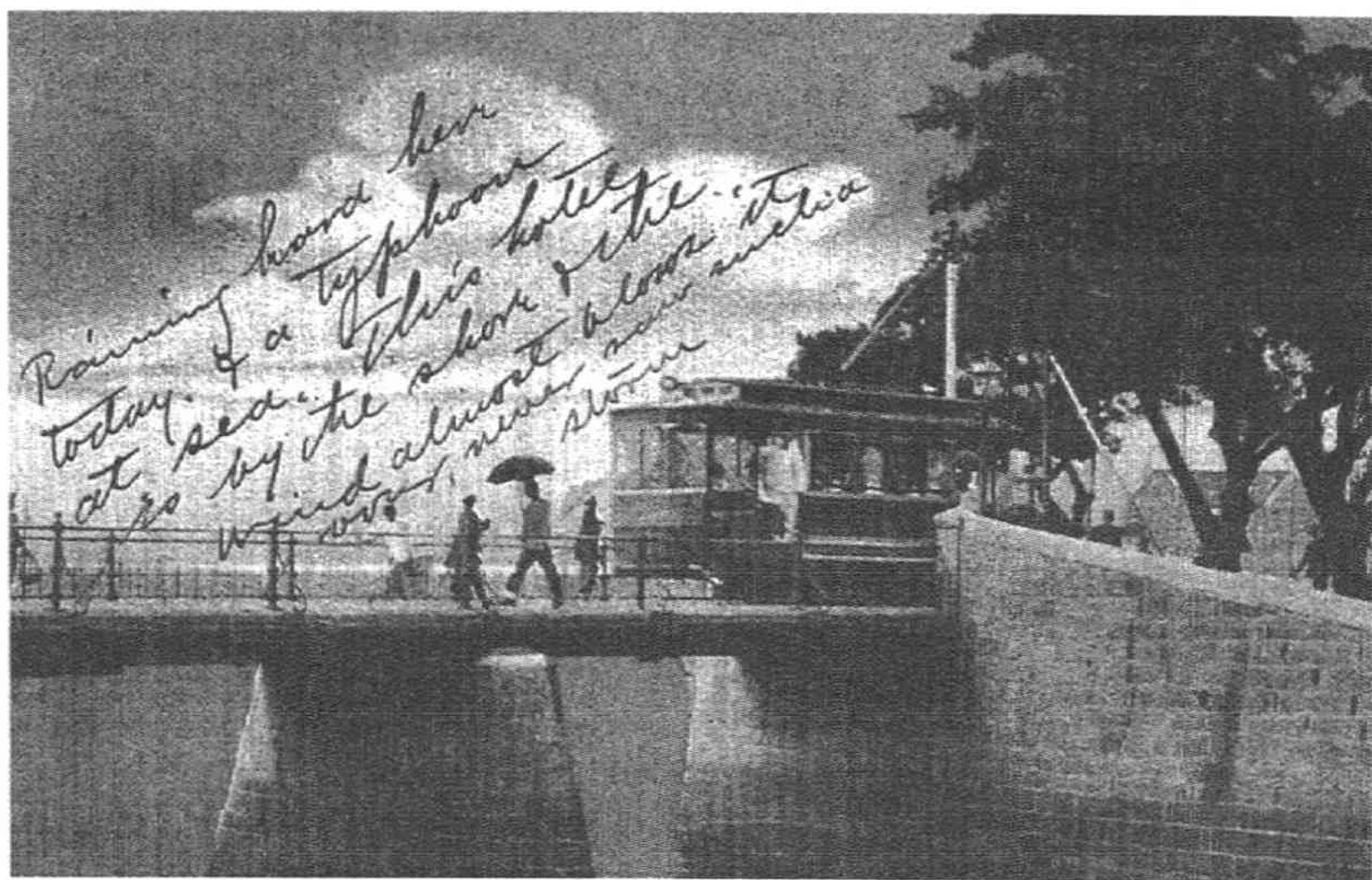






第五章





位于轩尼诗道与坚拿道交界的“鹅颈桥”。约摄于1905年。



香港街景。摄于1962年。



香港著名华人实业家富商何东。

华人经济和香港

香港作为自由港，极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港岛和九龙半岛环抱的维多利亚港，港阔水深，海港面积达60平方公里，最阔处近10公里，最窄处近1.6公里，水深9米至16米，港内可同时停泊150艘远洋轮船，吃水12米的远洋巨轮可自由进出，是与旧金山、里约热内卢齐名的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令当时英国垂涎已久，1834年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劳卑来华时，早已看出香港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商业价值，提出了占领香港的建议。老牌英资集团怡和洋行创办人渣甸也表示：如果认为我们必需占有一个岛屿或占有一个临近广州的海港，那么，香港最为适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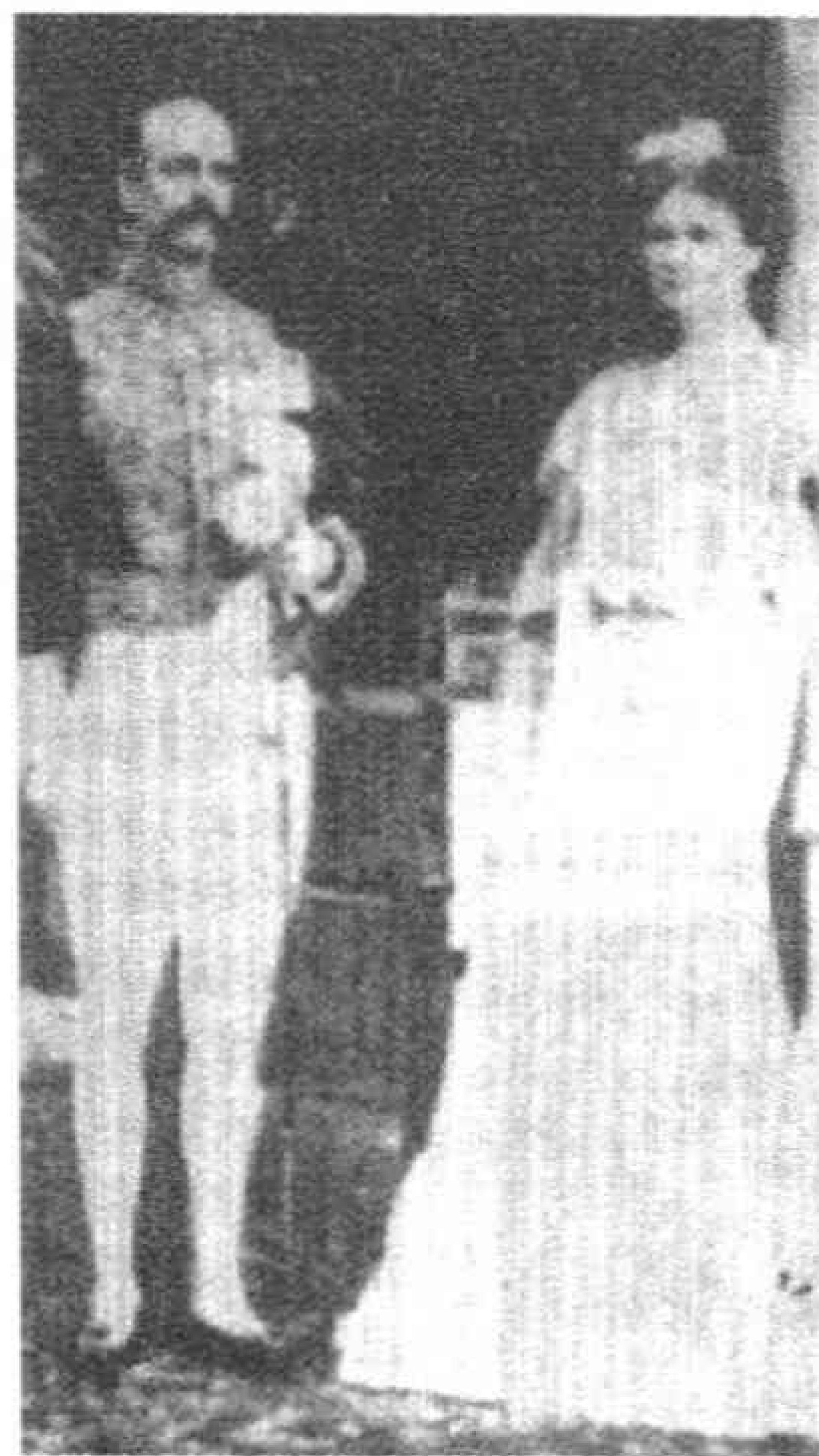
1841年1月25日，英国将军义律单方面宣布已与清政府签订“穿鼻条约”的数天后，就急不可待地率领东方远征军强行侵占香港岛，登陆地点就是今香港岛上环水坑口街附近一个高约20米的海角，并举行升旗仪式。

同年6月7日，义律代表香港殖民当局宣布将香港开辟为自由港，允许各国船只自由出入，香港正式开埠。

当时香港只是一个海岛型的渔农社会，据1841年5月15日的统计数据，香港岛人口仅5450人，主要是渔民、佃农、石匠、市集商贩和少量来自九龙半岛的劳工，他们过着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生活。

随着英军的登陆，以怡和洋行为首的一批与





右图：香港第14任港督卢押夫妇。

左图：香港怡和洋行创办人渣甸。



香港第一个华人立法局议员伍廷芳。

鸦片走私密切相关的英资洋行相继从广州、澳门进入香港，他们抢先在港岛铜锣湾到中环地段建立据点，为维护西方殖民者利益，将中环维多利亚城中心划为洋人专属居住区和商业区；东西两侧为华人区；跑马地一带，则供洋人上流社会打猎、郊游之用。

自此，中环区逐渐成为洋人居住区和洋行、银行的集中地，成为香港繁荣的核心商业区，直至今日，在“中环上班”仍是一众白领的向往。

香港在开埠后的百多年间，由一个鸦片走私基地发展为远东转口贸易的繁荣商埠，似乎又有某种错觉，好像今日香港的繁荣全仗英国引进的西方现代商业操作，从而忽略了香港本域华人的功劳。

事实上，一直以来，香港华资和英资，均为香港经济中两大资本主流，它们相互激烈地角斗，交织成今日香港的繁荣和现代化。

香港华人的经济，是与香港现代商业社会的形成同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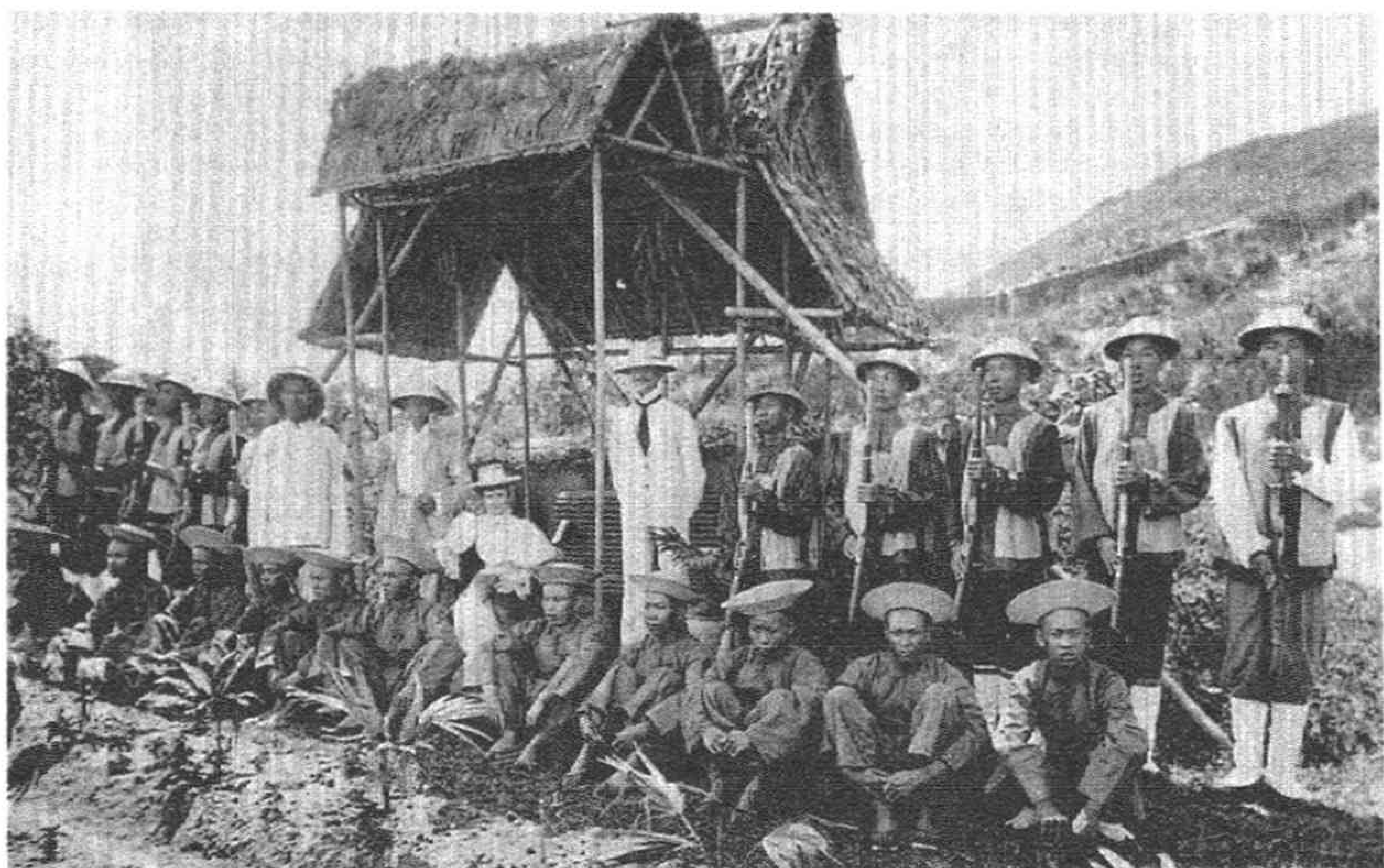
香港与上海有一点十分相似，香港真正原居民，都是从事渔农业的。如上海没有真正上海人，真正上海人是上海近郊的农民。查查上海人祖籍，都是宁波、苏州、南京，也有广东、潮州……人往高处走，一个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怡人的经济发达地，必是个由移民组成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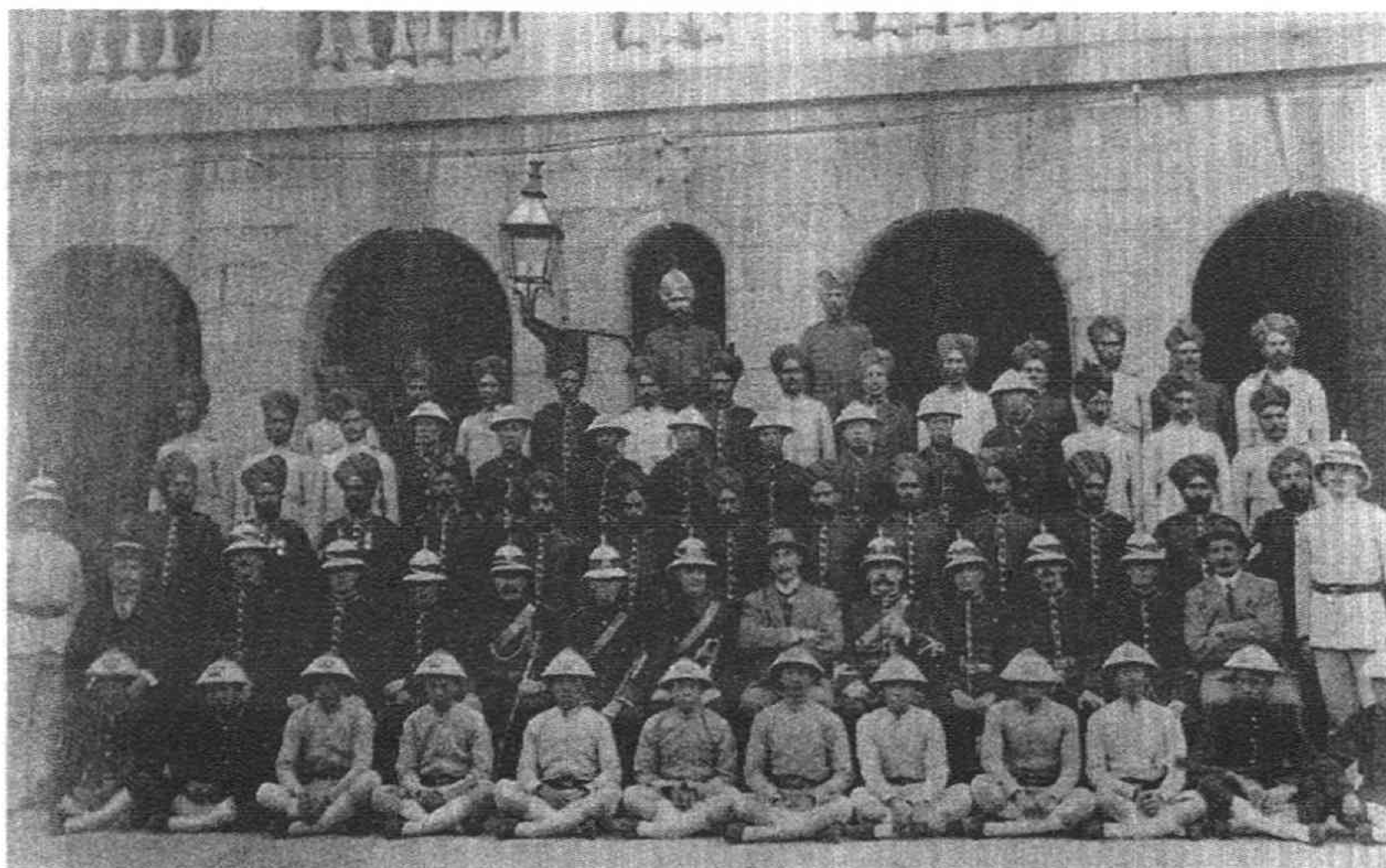
身着清朝官服香港著名的慈善机构在华三院的总理和官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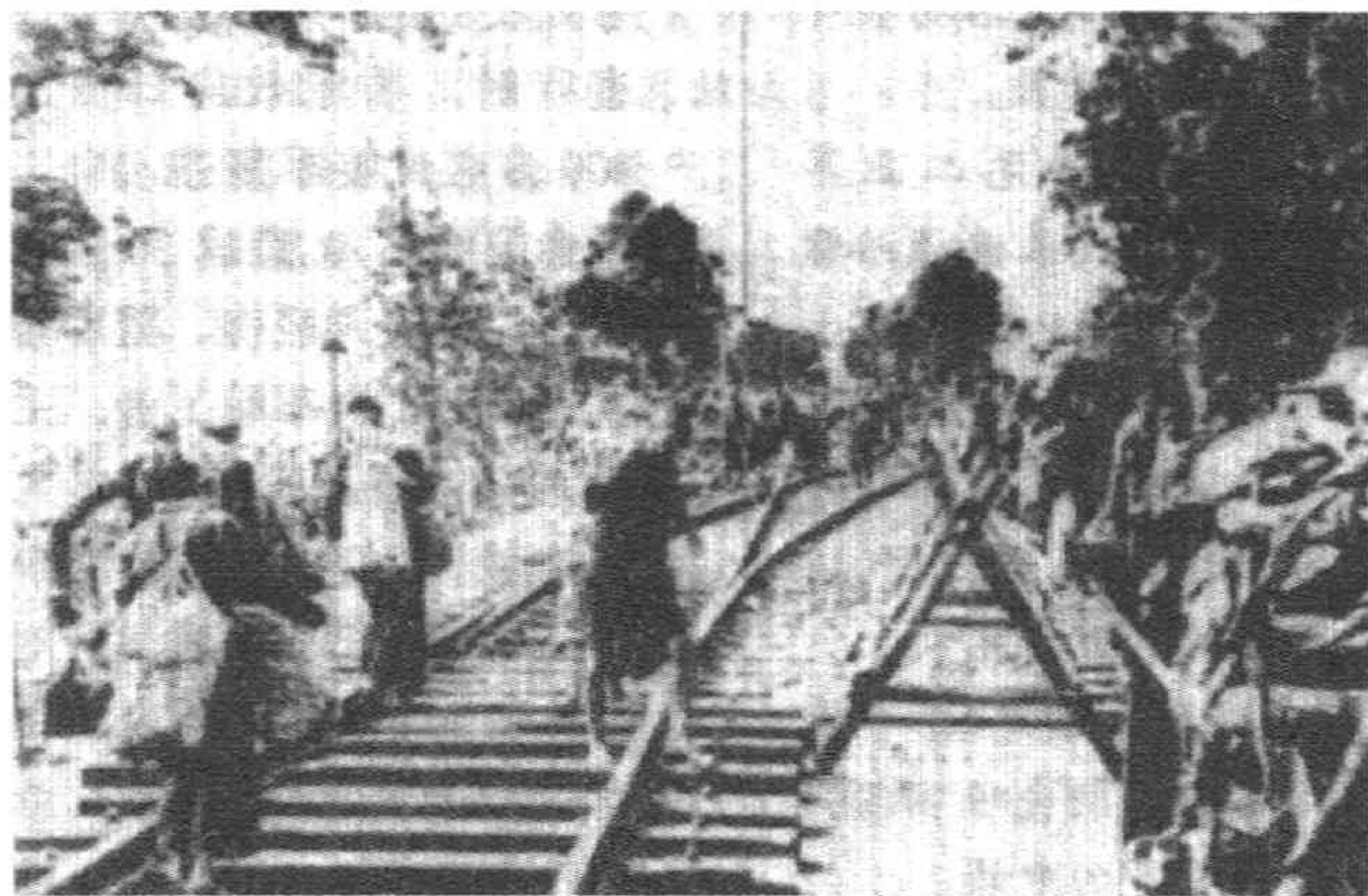
1900年李鸿章在香港。



中英边界站岗的海关官员和武装护卫（此边界线发展为现在的界限街）。摄于1889年。



1915年时期之警队。



1950年前后大量新移民抵港情形。



香港旱灾，港府实施控制供水，居民在街头等待食水的情形。摄于1963年。


新界居民籍貫證存根

过去“新界”居民籍贯证存根。

首次移民潮与南北行兴起

最早涌入香港的移民，应是广东沿海的水上艇户，俗称疍民。

他们主要为停泊在维多利亚海港的洋船服务，做货物接驳或船只补给，生意不俗，成为当时华人经济中活跃的一群。这些艇户，可以讲是香港买办的雏型和前身。其中最出名的卢景，在1850年已拥有楼房、店铺逾百间，成为当时香港华人首富。

与此同时，随着香港市政建设的展开，大批来自广东、福建沿海甚至浙江的贫民，也开始涌入香港，组成筑路建屋的庞大劳工队伍，其中的工头或材料承包人，很快成为其中的新富。

由于英人一早就划定港岛中环为洋人专属居住区和商业区，中环以东的上环和西环，自然而

然成为内陆来的新移民区，是港岛人口最密集的社区。同样的道理，九龙半岛的油麻地，早在英国人开发尖沙咀之前，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华人社区。其街市格局保持至今：沿街没有玻璃橱窗，货物就直接堆在铺口，以小商小铺为主。油麻地街道，也多用中国地命名：如甘肃街、南京街、上海街，除上海街外，街道都比较窄。



香港早期华人店铺。

上海街是填海开出的。以上海街命名，皆因在19世纪中后期，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之势，已深入人心。大批内地移民聚集在九龙油麻地，为适应社区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由华人经营的店铺如雨后春笋，以上海街上的商店最为集中，现今上海街仍保留相当一部分这种旧式传统商店，如中国传统的新娘裙，杂货山货，香烛钱币兑换店等。取名为上海街，当年的繁荣兴旺，可想而知。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广州及附近的有钱的大商家、大地主，纷纷挟资南逃香港，可以讲，此是香港开埠以来首次规模最大的投资移民潮。在此之前，香港新移民主要以苦力、工匠等贫民为主。


九龙半岛上的太子道。

这批携有资产的移民南下香港，对香港的华人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

他们的到来，令住房需求大增，新的商铺纷纷开启，香港市面呈现出开埠以来的首次繁荣。

香港地处广东珠江口东侧，濒临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位居亚洲太平洋的要冲，处在日本和东南亚诸国的航运要道上。海外华人要回老家或侨乡的，有心往异邦发展的，出入都要经过香港。

早年很多潮汕人去东南亚一带做生意，不少因地制宜就在当地成家，然后再将老家亲友接去，如是经过百多年的发展，东南亚各地尤其暹罗(今泰国)的华人社区，已发展相当完整。当时不少潮汕商家，首先想到以香港为中转基地，在每年三四月间趁南风之利，将红糖等土产运往华北各埠，货物卖清后再购入棉花、色布乘初秋东北风，开船南回，部分在本地出售，部分售往东南亚，获利丰厚。

潮州人会做生意，全国有口碑，看来渊源悠久。

1848年，美国加州发现大金矿，随后澳洲悉尼也发现大金矿，分别被称为旧金山和新金山，大

批广东农民经香港前往旧金山开采金矿。据1852年纪录，约有3万华工从香港乘船前往旧金山，当时航行于香港至旧金山之间的船只多达44艘。



1911年后的香港华人剪辫并开始流行西式发型。

华人大量移民北美、澳州和南洋，在海外形成别具规模的华人社区——唐人街。由于唐人街对中国土产货品的需求，加速了这种货物交流，俗称南北行的行商，就这样越做越旺。香港因为其地理位置的优越，自然而然成为南北行转口地。在19世纪中后期，南北行的贸易额，占了当时香港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

南北行分两大帮，南庄(专做东南亚贸易)和金山庄(专做东西方贸易)。

20世纪初，可以讲是香港南北行的黄金时代。那时南北行的业务，有的还兼营银行的汇兑业务。当时香港的华人一般对汇丰、渣打等英资银行并不信任，反而对华商开设的信誉昭著的商号信任有加。将现款存入这些南北行生息，利息又高，且存取方便，不似外国银行规矩繁多，这令南北行的生意越做越多。

港岛上环西环一带，因近海畔，沿岸都是码头林立的货物装卸区，也是省港澳轮船停泊之处。故



香港商人和劳工们落脚的中式客栈。

大批南北行，特别专做中西贸易的金山庄，都聚集在这里，随着中环区的开发，这一带也越来越兴旺，直到20世纪初，算得上可与中环鼎足而立的商业区。

上环的文咸东西街，南北行更是开得成行成市，故而一度被称为南北行街，90%经营南北行的为广东潮州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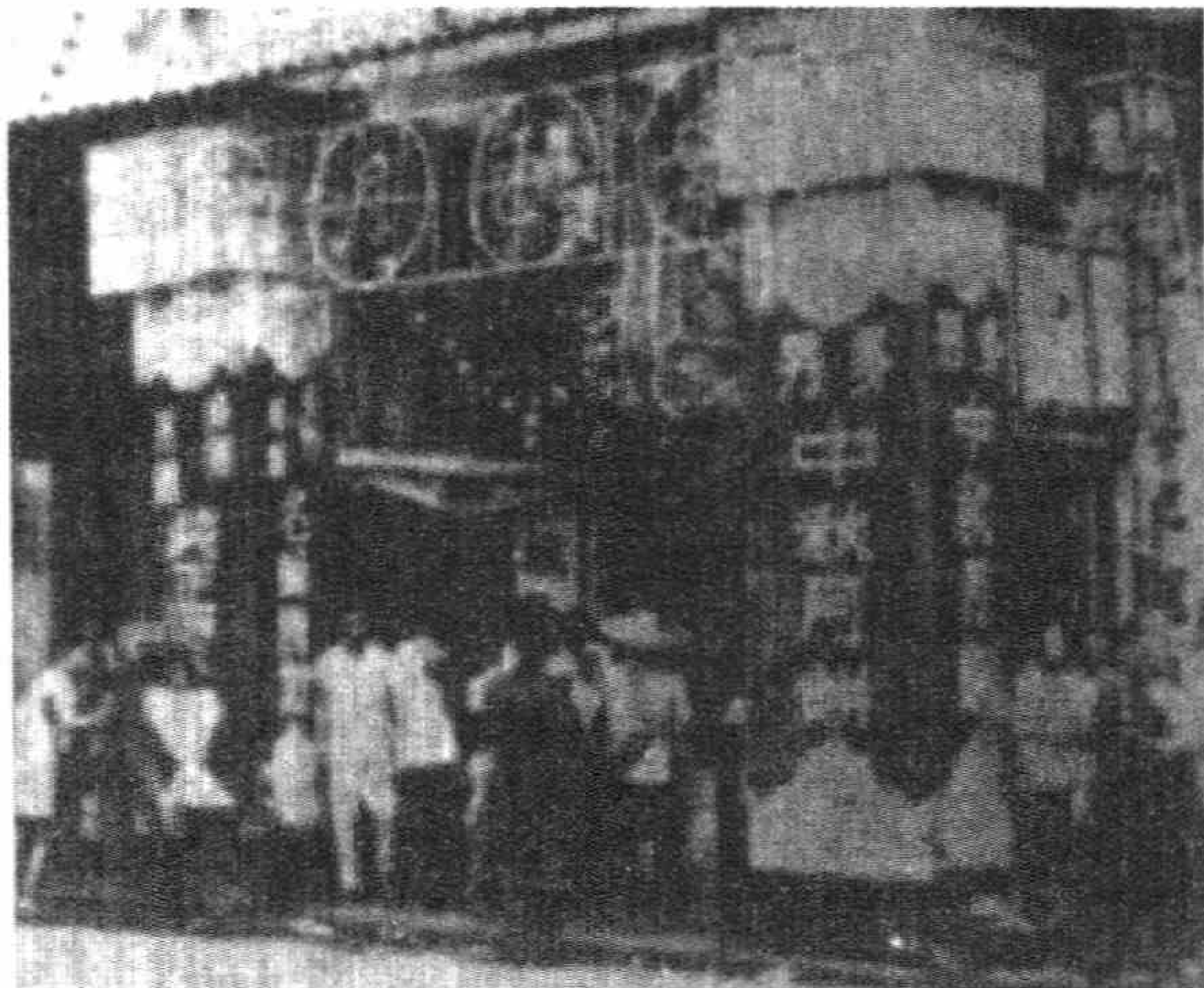
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那种较保守的经营手法，已不再适应日渐西化的香港社会，更主要是时局不好，二次大战战争风云已浓厚，大战期间更受重创，直到50年代初，因当时国内特殊的计划经济也影响了对外贸易，南北行开始滑坡，时至今日，当年称雄一方的百年老字号已十不存一，惟文咸街一家“乾泰隆”还在，可以算得上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商号。

每逢农历大年初一，“乾泰隆”就会挂出一幅阅尽百年沧桑的对联：

乾坤浩荡财源远，
泰岱峥嵘气象隆。

一个多世纪南北行的盛衰，尽在其中。

南北行当年的鼎盛，带起了今上环、西环一带



香港的多男茶楼销售的中秋月饼最受欢迎。

华人社区的繁荣。今日你只需由中环皇后大道中往西行，走过中环街市，你就会渐渐感到，沿街商铺的风貌、韵味已有显著的变化——从英式购物街渐进入传统的中式街区，街面渐渐宛延曲折，左穿西插的，皆因早期华人因利乘便，即兴起造而无统一规划。

因为香港地铁工程只到上环为止，因此反而令西环上环保留了更多的旧城区特色，经营方式大体依然故我。经营的内容，很完整地保持着昔日华人社区经济运作的特色。被港人戏称为香港的“唐人街”。

在撰写这部《老香港》时，为了寻求一种历史感觉，笔者特别地多次乘电车穿过中环、上环抵达西环!如在作一次时光隧道的穿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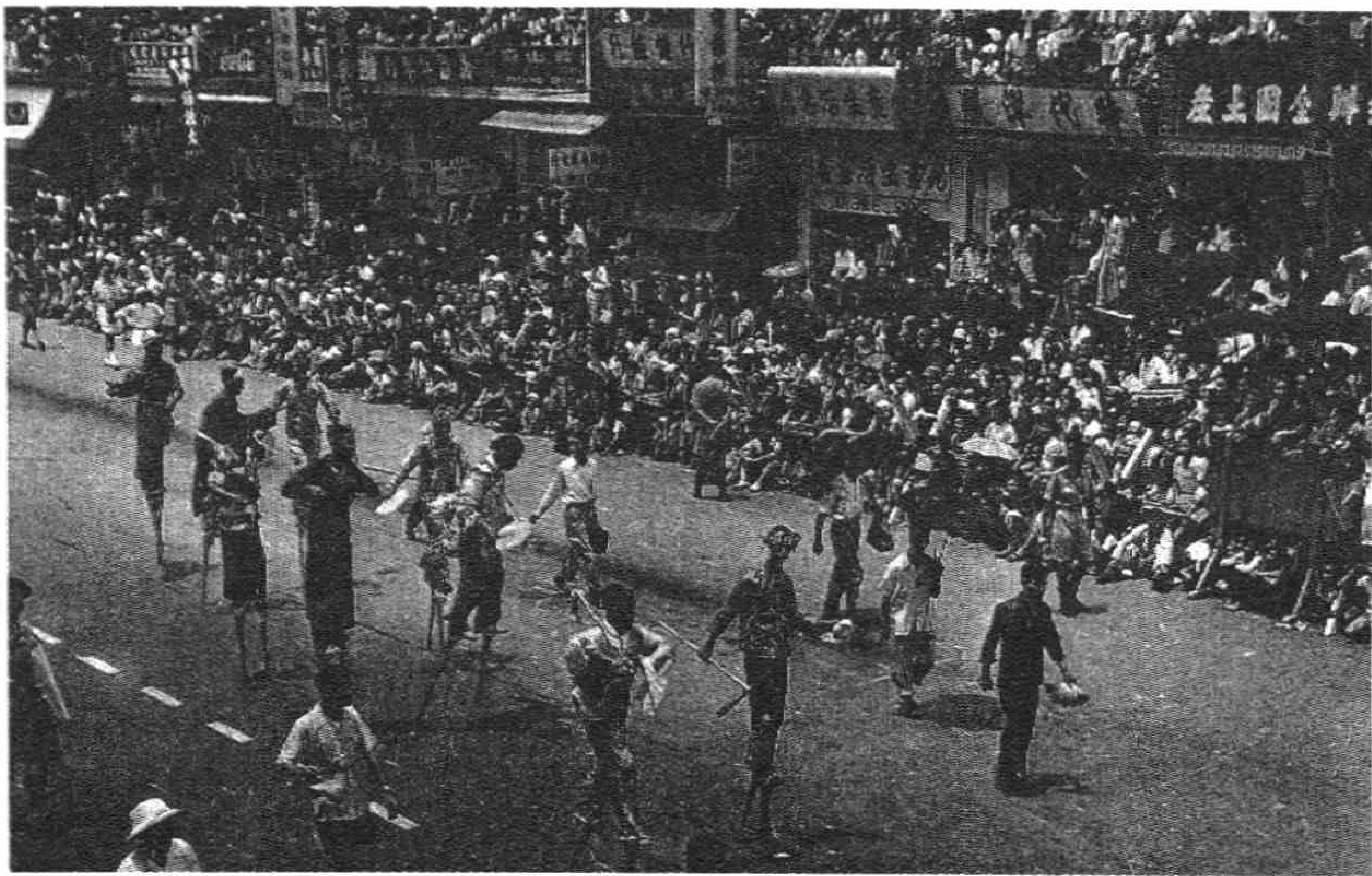
在中上环交接处，有一幢红砖方柱，拱窗骑楼，玻璃金顶拱形大门的建筑，颇似旧伦敦火车站。这是大战前的老建筑，古老外貌仍保留，内部已改造为商场——西港城商场。是许多海内外游客喜欢的去处。

这座古老的英式建筑旧日称为上环街市，想来一直是专为中环外国人作市场对象，同时，也成为西人社区和华人社区一个很显然的分界线。

过了西港城，旧香港风情更浓，沿街有好些年深月久的旧建筑。那人行道上支起粗粗石柱的骑楼，挨过排列，柱上写着该处店铺的号名：×宝号、荣×行……一看就是很传统的色彩!这里仍集中为

中环皇后大道。摄于1919年。





街头庆祝伊丽莎白二世加冕。摄于1953年。

海味、南北货等的批发铺。

据说，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黄金时期，这里满街都是潮州话和卜卜搭搭的木屐声。

近百年过去，但历史的积淀，仍浓厚不散，这里短短三百多米一条街，其土产海味品种之丰富，令你叹为观止。特别是阵阵扑面而来的咸鱼味，有人或会翻胃，但对一众潮州老香港、海外老华人，这股复杂的霉香气，就是过往岁月的余音。

一位八十多岁的美籍老华人，每到香港，总要去西环一带走一走，他祖父当年，就与朋友合伙在西环开了一家南北行，专营西药花旗号贸易，老华人得以留学美国，就全靠这家南北行。他学业有成之时，家里有意叫他回香港打理家族生意，只是他



1949 年香港街景。

已有了更大的奋斗目标。基于后继无人，到40年代中，因经营不力，这家南北行就卖给了他姓。

现今，这家南北行仍在，从那高高的石柱支起的骑楼底下，往里窥一下，只见陈设简陋，滴滴答答，一片算盘声，残旧的办公桌边，也还有客。客和伙计都是与这店堂一样的老态尽显。

桂伯(老华人)告诉我："这种伙计与客户的关系，都是几代的了。就是老板和伙计的关系，也是一生一世的。旧式老板虽然小气点，但较有人情味，把伙计当作自家人，主雇关系岂止是终生制，更有代代延续的。"

香港南北行业，历经百多年，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日本的蹂躏，现代商业运转的冲击，至今日

还能在弹丸之地、兵家必争的香港占一个位子，是不是正与这种老板仁慈、伙计忠心、宾主一家共度难关有关?

世事充满矛盾，据讲市场经济最大的阻力，就是这种终身聘用制和传统管理。

旧时老板，与伙计日日同台吃饭。今日各机构人事层层级级，雇主关系只有单一的雇佣关系……那种传统的主雇旧人情早在十多年前已淘汰殆尽!今日在西环旧店铺所看到的，尽然或只是表面现象，也能在阵阵咸鱼腥香之中，触到某种农业社会才有的温馨。



1932年香港广胜恒号面粉商登记注册的“五燕嘜”面粉商标。

漫步在西环纵横交岔的窄街小巷之间，在残旧的骑楼底下，价廉量足的旧式饭铺，开得三五成行，再加上叮叮当当的电车，真有时光倒流70年的感觉，恍恍惚惚之际，已回到早期香港华人区红尘放羁的流金岁月。

随着上环至西环一带经济的火旺，一应大小掌柜和一般平民，一日劳作之后，也需消遣消费——既然中环是洋人的天下，不如在自家地盘里玩个尽兴?



1933年香港商人李蕴崇登记注册的“李话梅”商标。

20世纪初城市有个共同的律动规则，经济的繁荣带来风月的昌盛。随着港岛华人区的不断向西拓展，正如本书前文已描述过，供摆花酒的酒楼食肆，也一溜往西发展，过半数都集中在今西环的石塘咀，成为早期华人社区最著名的风月消费场所。所谓“塘西风月”，香港最早的杏花酒楼，1846年就在这里开张。

有钱的阔老板有他们去处，升斗小民也不甘寂寞。

离今西港城不远，原先是英军驻港防卫之处，调防之后，这里凭空多出一大片空地，广东话广场称为“大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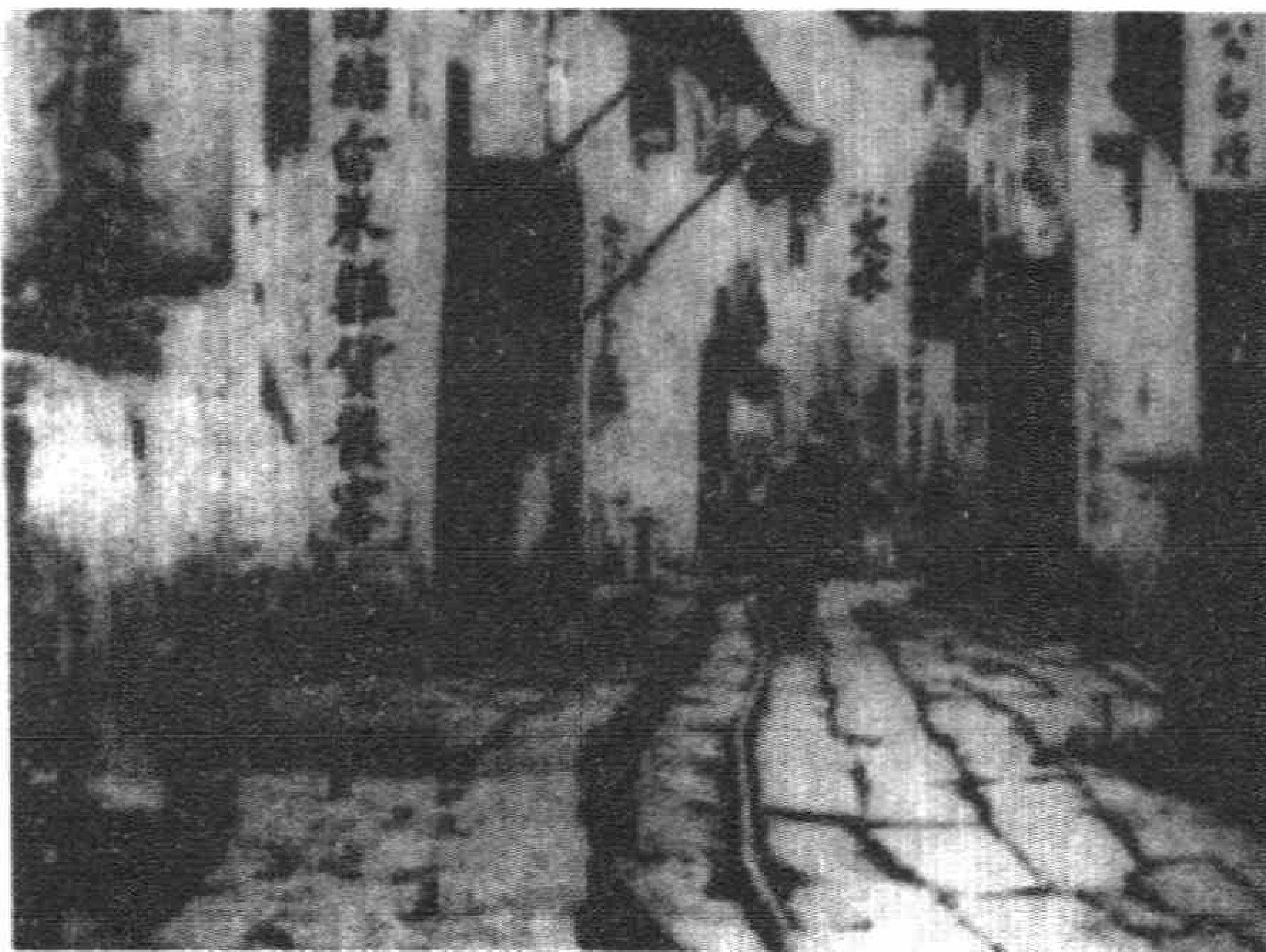
附近居民吃过晚饭后，便纷纷到此乘凉、聊天，人群越聚越多，开始吸引不少小贩，江湖卖艺人，这种来自草根的广场文化，一问世就广受欢迎。



1870年皇后大道上一家店铺。

当夜幕拉上之时，这里就挑起亮晃晃的煤气灯，一时唱曲卖艺，斗棋看相，十分热闹。由于

"大笪地"人流多，许多新奇的或滞销的商品，都会拿到这儿来"促销"。传说一位烟草商人进口十箱洋烟到香港无人理，拿到"大笪地"就一销而空，不多久就成功打进香港市场。



早期九龙寨城内的独特景观，街边子摊贩曾吸引不少西方游客。

第一代留声机在香港，也是最先在"大笪地"现身(洋人社区例外)。香港粤语歌坛的最早之地，也在"大笪地"。

进入20年代，精明的香港厂家，大量制造大功率灯炮，代替以往的煤气灯，令走江湖者更方便，"大笪地"的市面，也做得更大。

大排档也开始应运而生。反正糖水、宵夜、饭食应有尽有，价格自然便宜。这种露天街头经营的食档，因现炒现食，火旺油滚，很受欢迎。今日已成香港地道的饮食文化特色，广受本港和海内外游客的欢迎。

这类草根气息浓厚的广场文化，被港人戏称为"平民夜总会"。也是香港富有特色的一种消费文化。

直到二次大战后，香港开始快速的市政建设，

"大笪地"外围不断兴建高楼大厦，原居民纷纷迁出，昔日风光渐渐消失，直到1961年4月，"大笪地"的"平民夜总会"迁至上环新填海而成的空地上继续经营。

笔者在1991年曾去见识过一次，只是那时的"平民夜总会"，只有一个"食"的主题，其他唱曲、卖艺、算命、讲故事等已没有了。但是"小太阳灯"光亮得灼目，老板娘们，穿着传统的艇家女装束招呼客人，其市场定位，倾向游客，特别是西方游客。她们可以让你拍照，但无免费午餐，要收费的。直到1992年，这片空地被政府收回，这个富有香港街头文化特色的"平民夜总会"终于隐退！

如今的香港，仍保留有昔日广场文化，堪称"平民夜总会"的，大约就算九龙的庙街。庙街俗称男人街，倒不是因为专卖男人用品，而是因为这里历来麻雀馆、舞厅、会所、浴室等风月场所集中，

1898年时香港九龙寨城旧影。





德己笠街(1890年)。

收费低廉，多下层男士帮衬，故以男人街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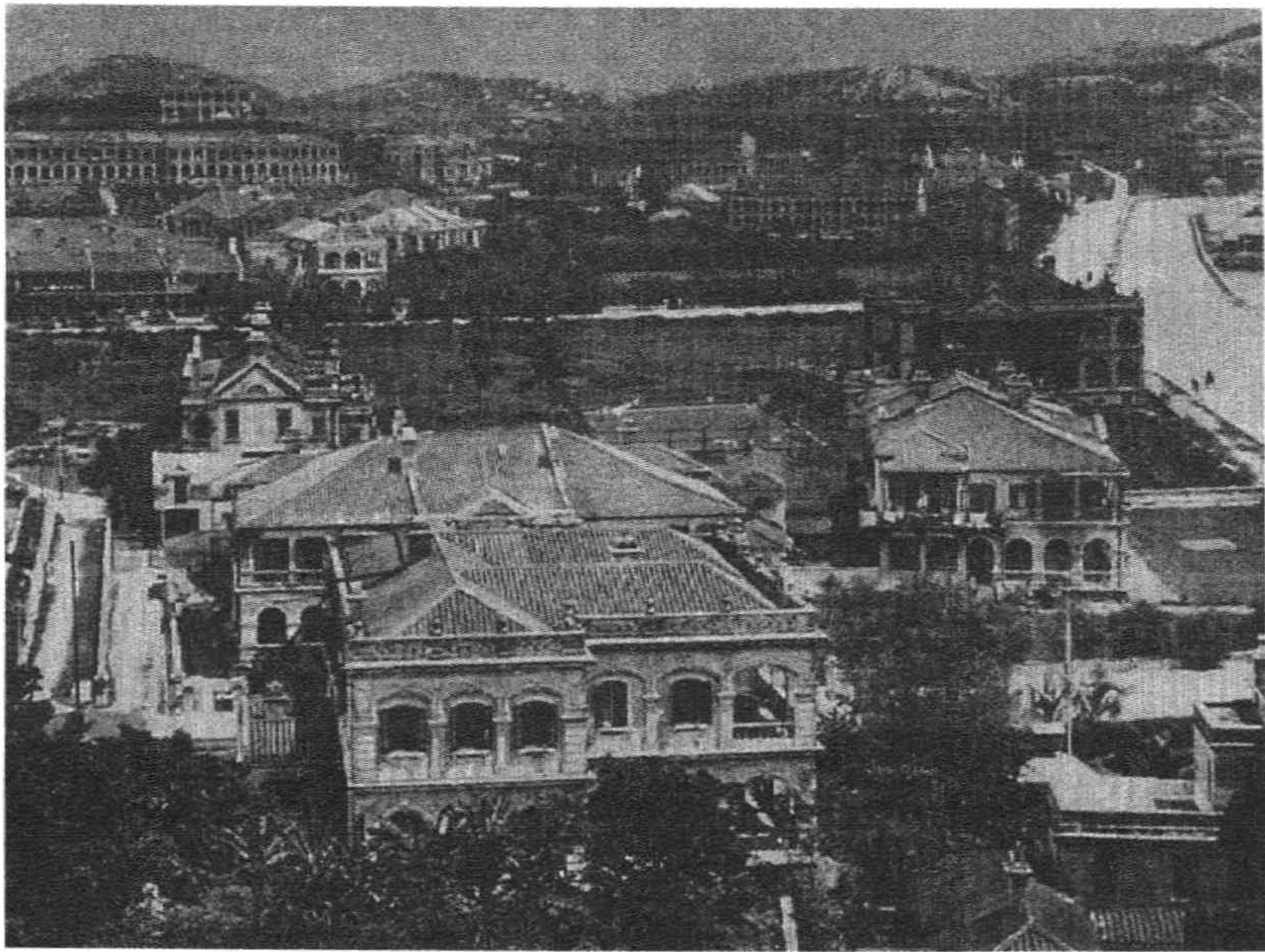
今日庙街，有点类似昔日上海的庙会，晚上六点，街边两侧摊档林立，游客和本地人都爱来这里购物，至八九点钟，人群已挤得水泄不通，说书、看相、卖艺者云集，明亮的大光灯，悠扬的广东小调，还有大排档传来诱人的香味，一时构成一幅浓厚的平民色彩，可以想象一下百年前“大笪地”那“平民夜总会”的盛况。

1999年，香港再次被世界旅行协会评为“50个人生必游之地”之一。2000年1月号的美国权威杂志《国家地理杂志》出版的《旅行家》双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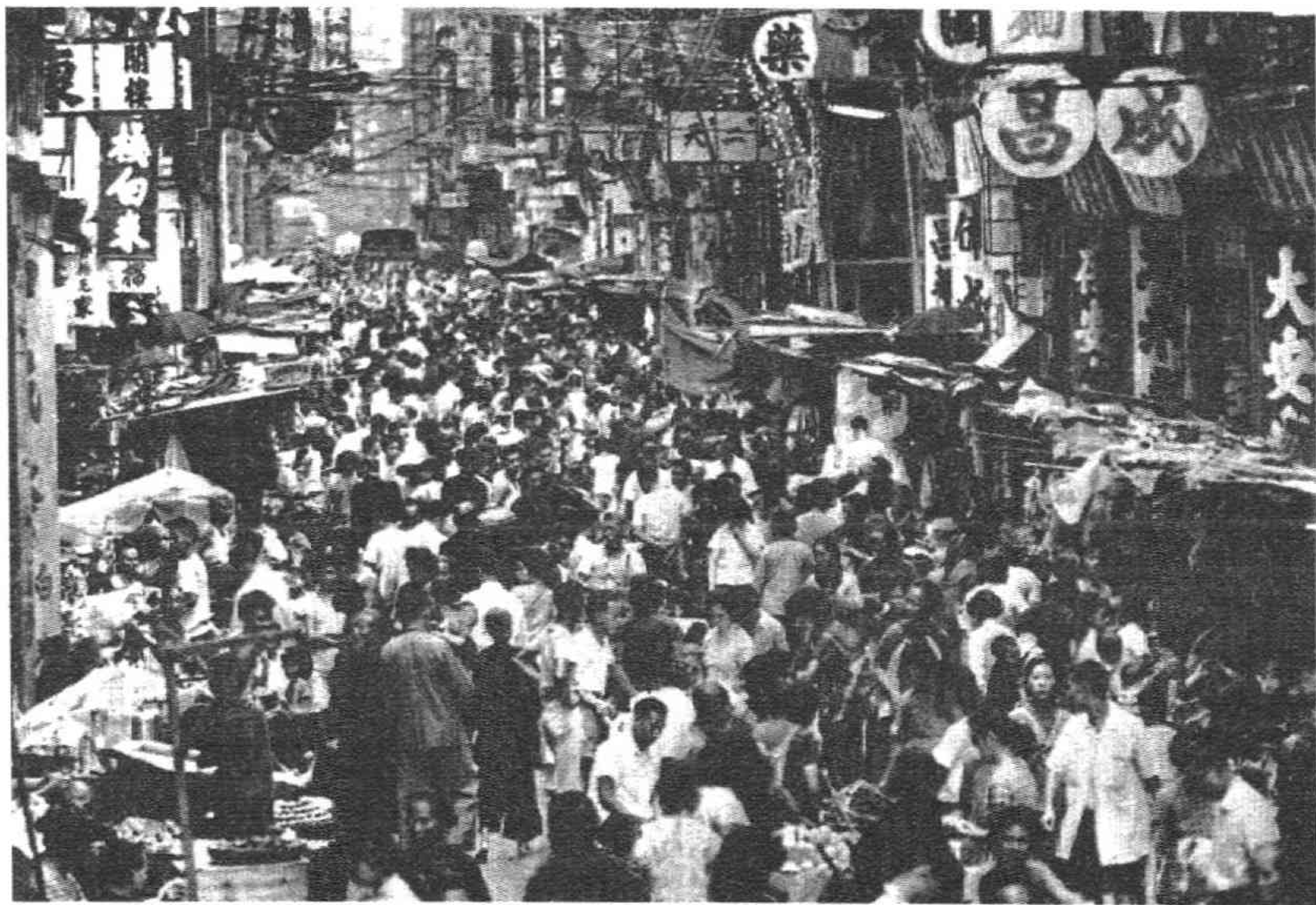
以《香港——世界最大的华埠》为题专题介绍香港，特别提到港岛西环迷宫般的横街窄巷。确实，港岛西环如香港早期华人社区一块活化石，各式传统店铺如草药店、棺材铺、米铺、肉档……今日不少只能在冻冰的超市，或者根本已绝迹的买卖，在西环仍给保存下来。

漫步在港岛西环和九龙半岛油麻地等旧区，不但会觉得是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更像在另一城市，另一世界。岁月沧桑，70年代后的香港变化，天翻地覆，难能可贵的是，竟还能那么完整地保留下那份旧时社区情怀。

尖沙咀漆咸道街景（1902年）。



香港市政对保留“老香港”还是比较重视的，港岛中西区已提出在上环区，重建“平民夜总会”，那旧时“大笪地”模式的夜间活动场所，供游客及市民享用。当然，今日的平民夜总会，注意去芜存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摄于1970年。

菁，确保环境清洁并有完善管理。

香港虽小，但她的情怀却是宽广的，如果说今日香港铜锣区是属于青春无悔一族，那么港岛西环，则属故物余情未了的一族。

今日在港岛西区沿着小街上坡下坡(港岛原为依山发展而成，因而街道多呈斜坡)，这片在七八十年前载满塘西风月烟花之地，曾是夜夜笙歌，今

日已如洗尽铅华、年华已去的女子，留下的只是平实、简单的生活印迹。

香港没有名川大山，也无太悠久的古迹，但"全球最大的华埠"，就是香港旅游业最大的金字招牌。

在老区横街窄巷、旧墙老檐之中，我们仍能感觉，或寻觅到老香港中断了的旧情、破碎了的残梦，一如歌女小明星已在渐渐逝去，如泣如诉，余情未了的歌声。

今日香港，越来越多的人入住新建大厦和新社区，新社区都是中产化了的住宅区，又称为"卫星城"。这种卫星新区很现代，很整齐，也很干净，干净得门口找不到报摊，没有大排档和茶餐厅，也

他小小年纪就要挑起生活重担(炒栗子)。摄于19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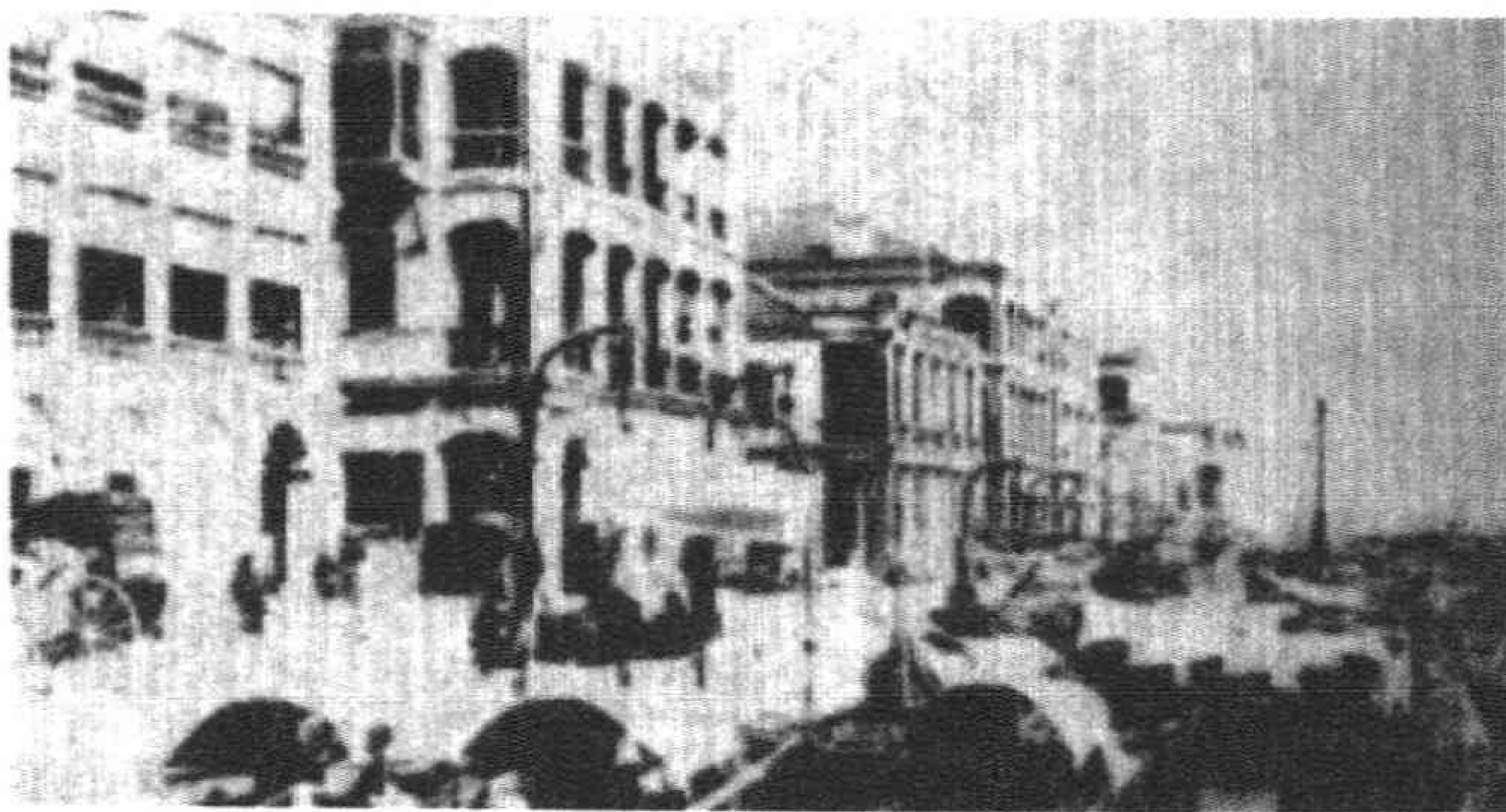


19世纪威灵顿街，当局检查疫情。

不见补鞋匠和卖花铺……新住宅社区没有街坊只有邻居、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闻声不见人，见了面也互不招呼，人与人之间，疏离感代替了昔日的街坊感。

一度世界兴起“寻根热”，“根”的情怀，中国人对此特别反应强烈。

对今日香港年轻的一代，“故乡”是一个既陌生又遥远的字眼，“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执着，他们一时很难理解。他们生在香港，长在香港，或许惟有香港早期的华人社区和街道历史，才会给他们一点“根”的启示。今日青年，



中区海旁的建筑群(左第一间是渣甸洋行，第三间是连卡佛洋行)。

"根"的意识不在宗族，而在文化。

笔者在撰写此文之际，香港正流行一股新兴的居住时尚——入住旧唐楼。

香港唐楼，一般指无电梯设施的楼龄超过四五十年的旧楼，印象总是又残又旧，楼道又黑又脏，这种旧唐楼，一般都分布在港岛湾西环旧区，九龙油麻地一带，正是早期香港华人聚集之区。

近来，一班从事时装设计、视觉艺术、广告传媒和写作等职业的文化人，正一窝蜂迁入旧唐楼住——当然，他们将其内部大改造大装修过。

香港高楼林立，大厦新楼比比皆是，他们却舍新取旧，原因何在?

阿艳是笔者一个朋友，她从事古董鉴定和在费城电视台一档介绍中国节目中做主持。她就是租住上环近西环一带一层旧唐楼。

这里很"街坊"，楼下是杂货铺、大排档和小饭铺，吵吵闹闹，市井味十足，而她喜欢的，就是这种富有街坊味的小社区：在楼上能闻到楼下的出炉面包香，买东西零钱不够可以欠一下。香港本

域气息浓厚。

她的邻居是个丹麦人，特地住旧区唐楼，也为着要体会一下“香港心情”。

当然，一般唐楼天花板较高，够通爽，很多旧式唐楼不设间格，呈全开放式，可以任你随意间隔，为所欲为。别小看这些唐楼，屋租万元上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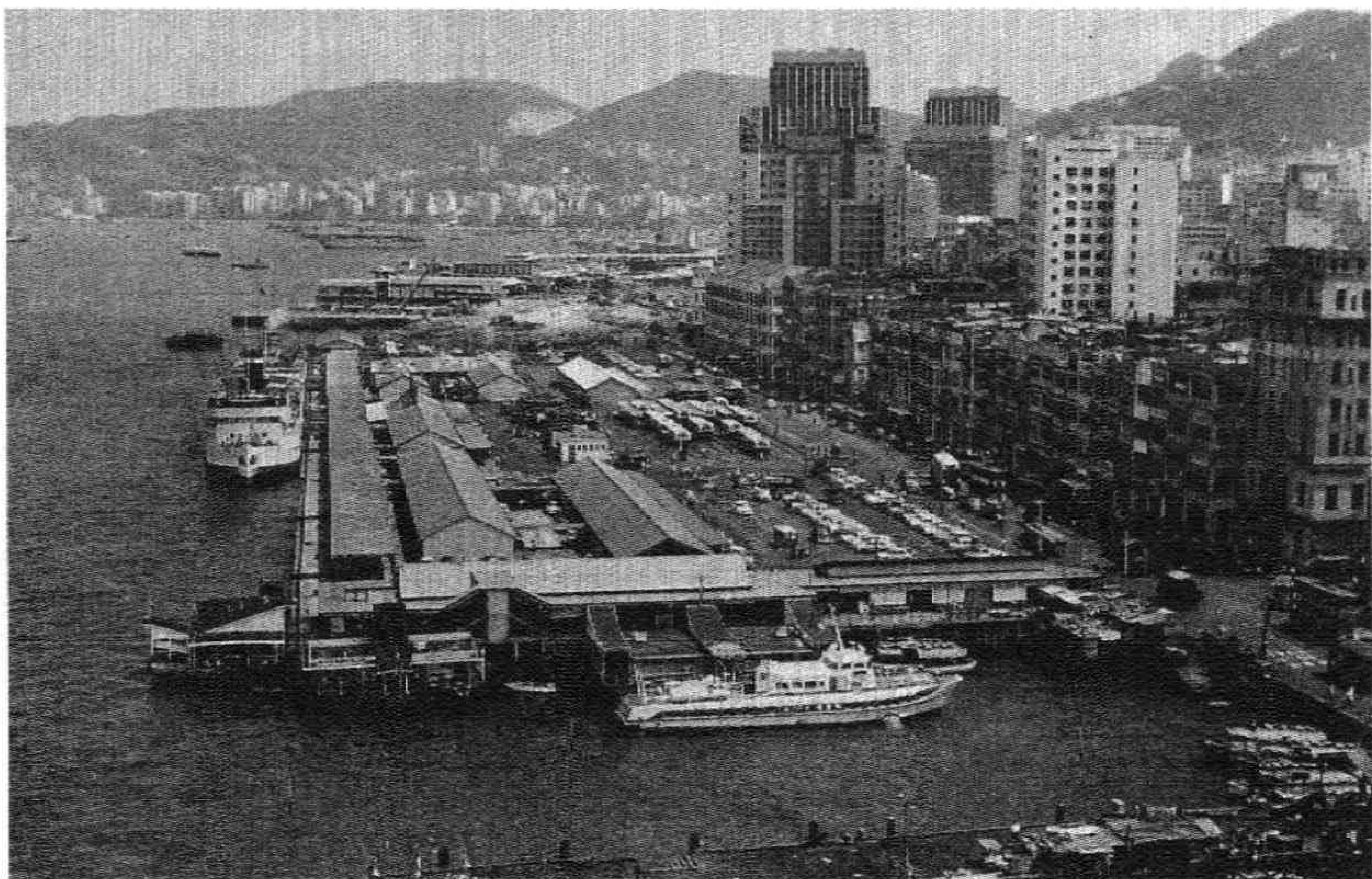
阿艳的家在五楼，从那镂花老式钢窗往下望，可以见到在街边大排档上一面读报、一面饮丝袜奶茶、身穿现今已罕见的黑香云纱中装的老人，店铺内打麻将顾不上生意的店主……很典型的老香港风情。

自1998年以来，一批有心的视艺工作者，特别有意进驻九龙油麻地旧区。香港版画协会，就设在一幢旧唐楼里，有心去追捕旧区情怀。

2000年7月一项调查显示，91%的港人喜欢光顾街边大排档，76%的港人喜欢茶餐厅(一种中西合璧的港式快餐厅)，而大排档和茶餐厅，正是传统已久的华人社区特有的餐饮文化。至今，也仍在港九旧区最集中。

香港九龙近年美厦高楼不断推出，最让港人遗憾的，就是在新的屋村社区内，令港人离不开的大排档和茶餐厅已不复存在，就是有，也是外表模仿，已不是原汁原味了。

旧区生活永远令人难以忘怀，无论它有多残黯、多落后，因为它孕育了历史。



▲旧港澳码头。

▼香港汇丰银行大厦，左为中国银行大厦。摄于1971年。







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



▲1910年皇后大道。

▼昔日皇后像广场阅兵式。





30年代的月份牌画。

香港第二次移民高潮带来海派文化

纵观香港华人经济史，可以发现，外来的华人资本，对香港的华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尤其在20世纪40年代末，大批人才和资金，由内地流向香港，特别是一批从上海移居香港的实业家，他们带来资金、设备、技术及与海外市场的关系，相继在航运、纺织、地产、娱乐等一系列重要行业占压倒性优势，与长期垄断香港经济的老牌英资财团竞争，在香港一度被称为——上海大亨。

据估计，这批南下移民以各种形式带入香港的资金，高达5亿多美金，这批资金的流入，大大加强了华资在香港经济的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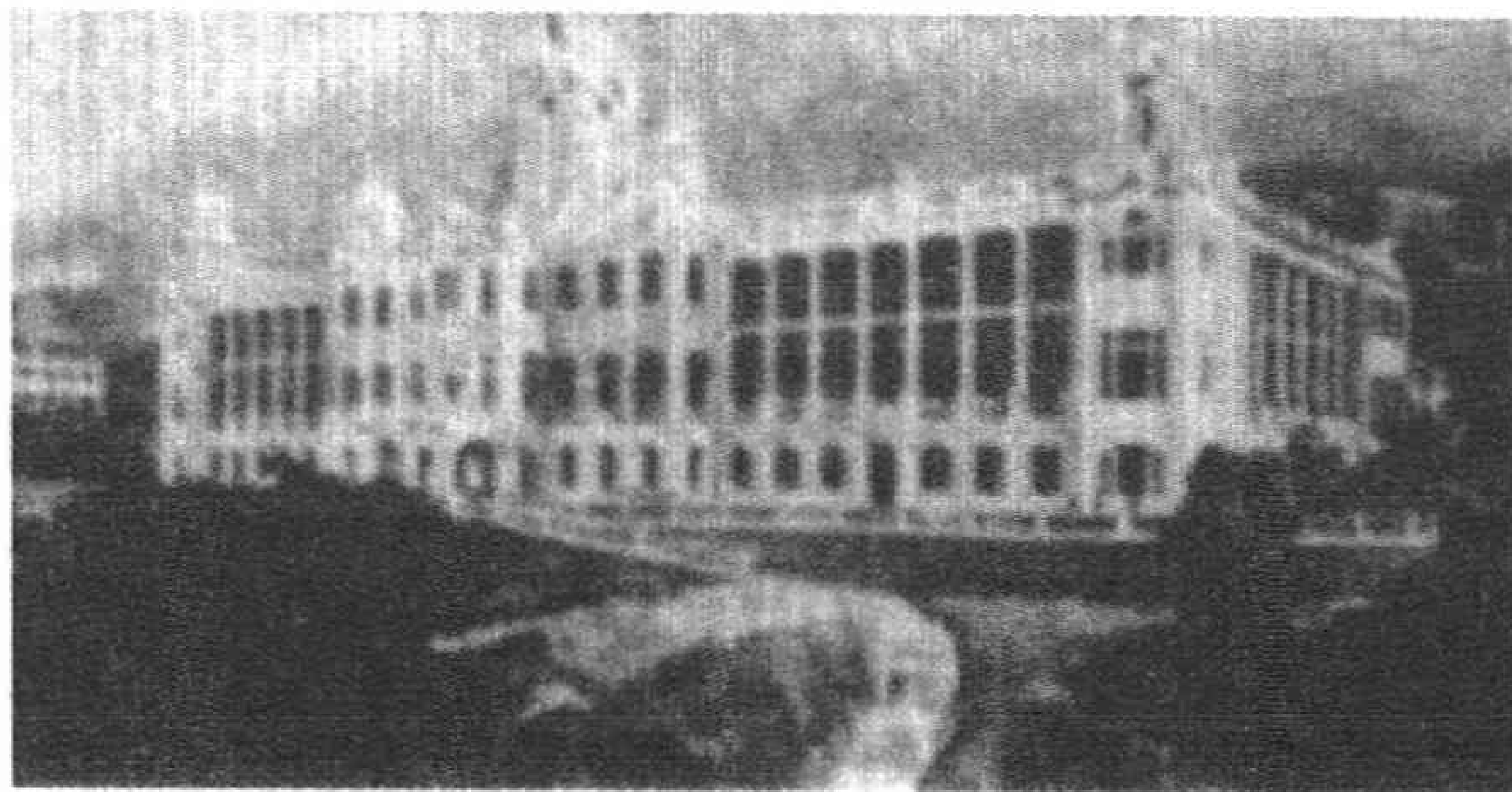
海派文化催谷香港中产阶层

大批上海大亨和内地其他殷商富人涌入香港，令香港人口一下子从1945年的60万，急增到50年代的280万。一时，香港成为所谓“冒险家的乐园”和“投资者的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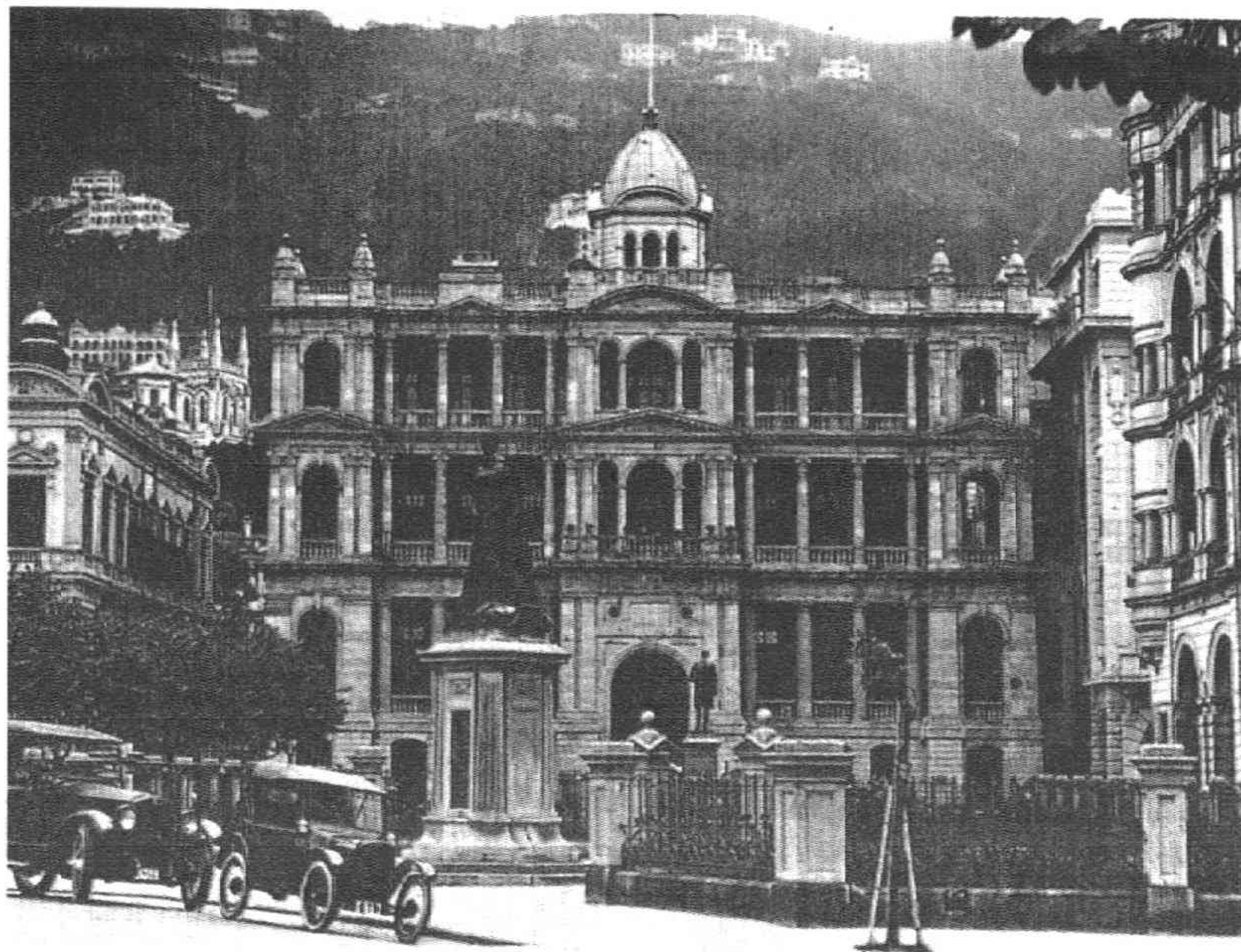
50年代笔者住在港岛北角，由于北角是当时港岛新兴的住宅区，不像旧区那样楼旧垣残，上海人都喜欢聚居在那里，于是北角一时有“小上海”之称。

当时大部分香港人(以广东福建为主)还是住板壁房，那种无下水道的石屎屋，出街一双木拖板，一身自制的中式衫装，上海人则以其一贯的中产生活传统：衣冠鲜亮，居所整洁，自成香港一个新的特殊的中产阶层。或者可以讲，在上海人大批涌入香港之前，香港的中产阶层，势弱力薄。

香港社会，一向贫富悬殊，除了一小撮“上流社会”人士外，而且老香港的上流社会，还是多以



香港大学主楼一景。



1924年的太子大厦(右)和大会堂(左)、汇丰银行(中)。

洋人社会为主，香港华人即使是如经商南北行的有钱人或海外华侨，也一般恪守粤人、特别是潮州人勤俭刻苦的传统生活。特别是当时香港高等教育也不普及，只一家香港大学，作为培养中产阶层温床的香港大学，也只有小部分华人才读得起。

一直以来，香港的上流社会，与中流及下流社会之间，有不可互相凝望的隔膜。直到上海人开始南下，金光灿烂的海派文化与港粤文化重整与融合，从而催谷了香港的中产文化。

随着上海有钱人南下，一班海派服务性行业师傅也随行——上海裁缝师傅，上海理发师傅，上



香港中区行人隧道。摄于1968年。

海菜师傅，也为香港单一的消费文化注入新的元素。

最典型的是，香港人流行穿西装，还是40年代后期由上海人引起。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香港，只有洋行买办、留学生或英文书院教师和政府公务员，才穿西装。普通香港男人，一身黑香云纱中装衫裤大行其道，通行无止，哪怕大商贾有钱人也如此，在较正式场合，最多外加一件长衫，高级点的，夏天一身麻质夏布长衫，冬天，以呢绒为质。

那时做一套西装价钱昂贵，由百多元到几百元(那时打工仔月薪只有几十元)，自然不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

上海人讲究衣着，全国出名。上海人即使一个小文员，夜里也必记得将仅有的一条西装裤压在枕头底下以保持两条锋利足可以削铅笔的裤缝。上海人南下香港，同时也带来“先敬罗衣后敬人”的观念，香港的男人这才“海派”起来，手头再拮据，一套笔挺的西装总是不可缺的。

上海西装师傅，全国闻名，俗称“红帮裁缝”。十年洋场出来的西装师傅，技巧手艺，一下子就压倒本地帮的广东师傅，特别如“培罗蒙”等上海名店出身的，令香港一班“西装友”趋之若鹜，“上海师傅”之名，至今仍名威香港，成为好工艺的代名词。

今日香港五星级酒店内设置的一些西装定做店，大多数仍是由早期的上海师傅开的，他们大都已垂垂老矣，后生一代，很少再肯子承父业，而且今日年轻香港人，也大多是买现成西装，很少有人度身订做。

笔者曾采访过一位“高和皮鞋店”老板。

“高和皮鞋店”在30年代，名驰上海，以做男士鞋及军靴出名。40年代南移香港。皮匠师傅出身的老板，已是“高和”的第二代传人。

“高和”一南迁香港，就选铺中环钻石地区德辅道，摆明是走高档上层路线。70年代希尔顿酒店大厦刚成立，“高和”就搬入酒店铺面。李嘉诚、贝聿铭、姬鹏飞，都是“高和”的常客。

90年代希尔顿酒店拆除了，“高和”就搬到中环高档商厦太子大厦至今。笔者那日去采访，伙计正在打包两双皮鞋给贝聿铭寄去，贝聿铭在“高和”有自己鞋楦，方便定制。

今日“高和”，已由老板儿子来继承，但80岁的老高师傅，仍日日坐镇工场，监工。

上海人讲究生活品味和质素，上海移民对香港社会软件的建设，从衣食住行到选美娱乐出版，可谓贡献巨大。

世界顶级名牌集团连锁店登陆香港，要到70年代之后。在这以前，香港人的衣着打扮，呈严重两极分化，讲究的，如洋人或少数高等华人，就直接在外国店铺度身订做，女士们，一般也是一身自制的中式套衫，脚下一双讲究的描金花漆木屐。如上班的女士，就索性完全西式套裙打扮。

是上海女士将旗袍带来香港。

据老上海回忆，在三四十年代，不少香港女士特地来上海订做旗袍，烫头发。

上海理发师和旗袍师傅，将香港女人打扮得更漂亮。

一直到六七十年代，上海理发室，仍大受中上层男女人士欢迎，直到70年代，一批年轻人从海外接受现代美容美发技术回港，开始推广一种既重视室内装修环境气息，又讲究现代仪器设备的Salon式理发护肤等综合服务，在这股强烈新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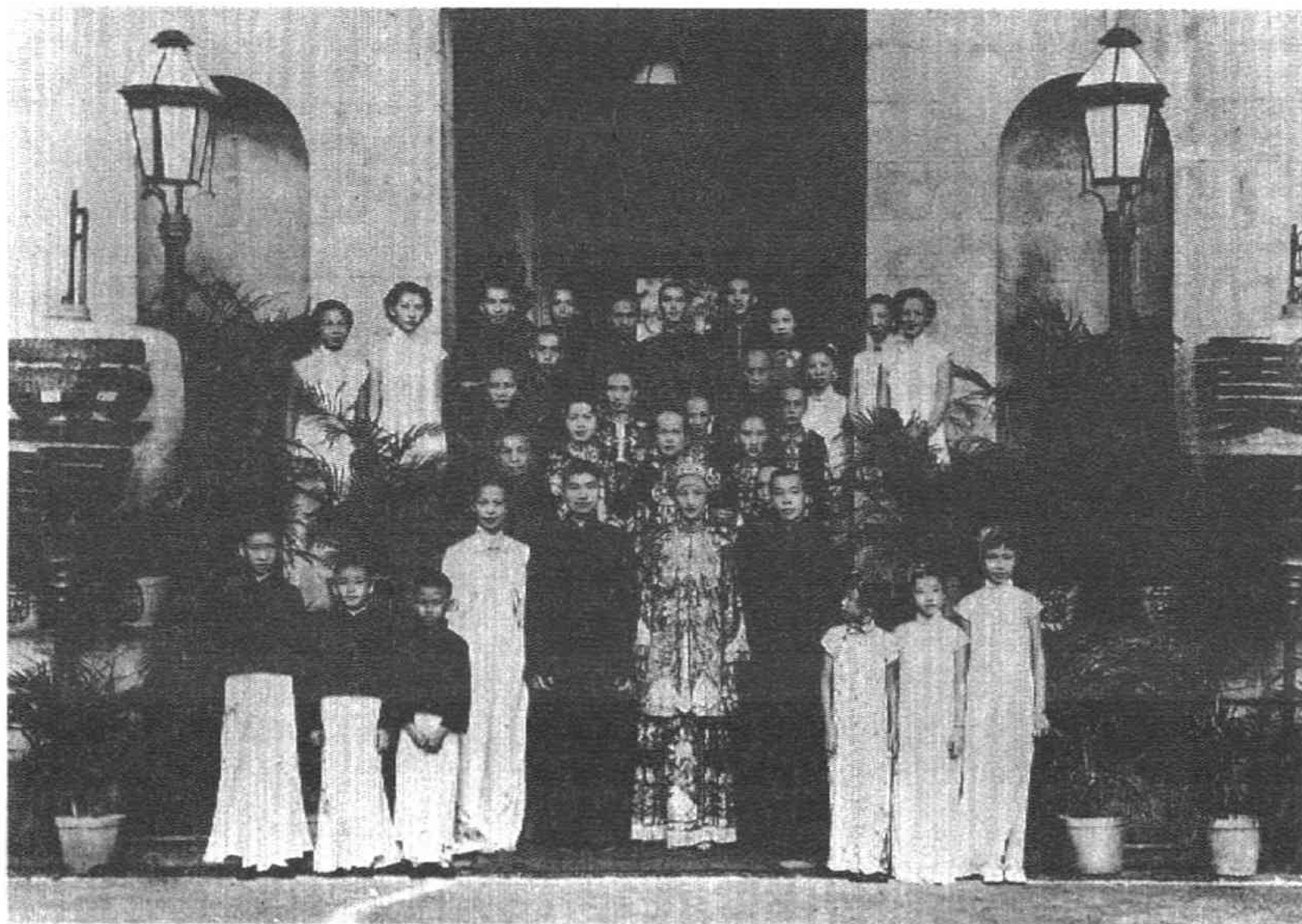
推动下，光靠一把刀的技术的香港上海理发室，开始走下坡路。到今日21世纪，更已成黄昏之业，惟有在原有“小上海”之称的香港北角，还有几家，师傅和设备一样“老”的上海理发室。

不过，不少在香港居住几十年的“老上海”，至今仍喜欢光顾上海理发室，一如笔者的祖父母。他们有一家长年光顾的上海理发店，后来因为租约问题，这家理发店越搬越远，年迈的祖父母哪怕搭的士、走几条街，也一定要到那家上海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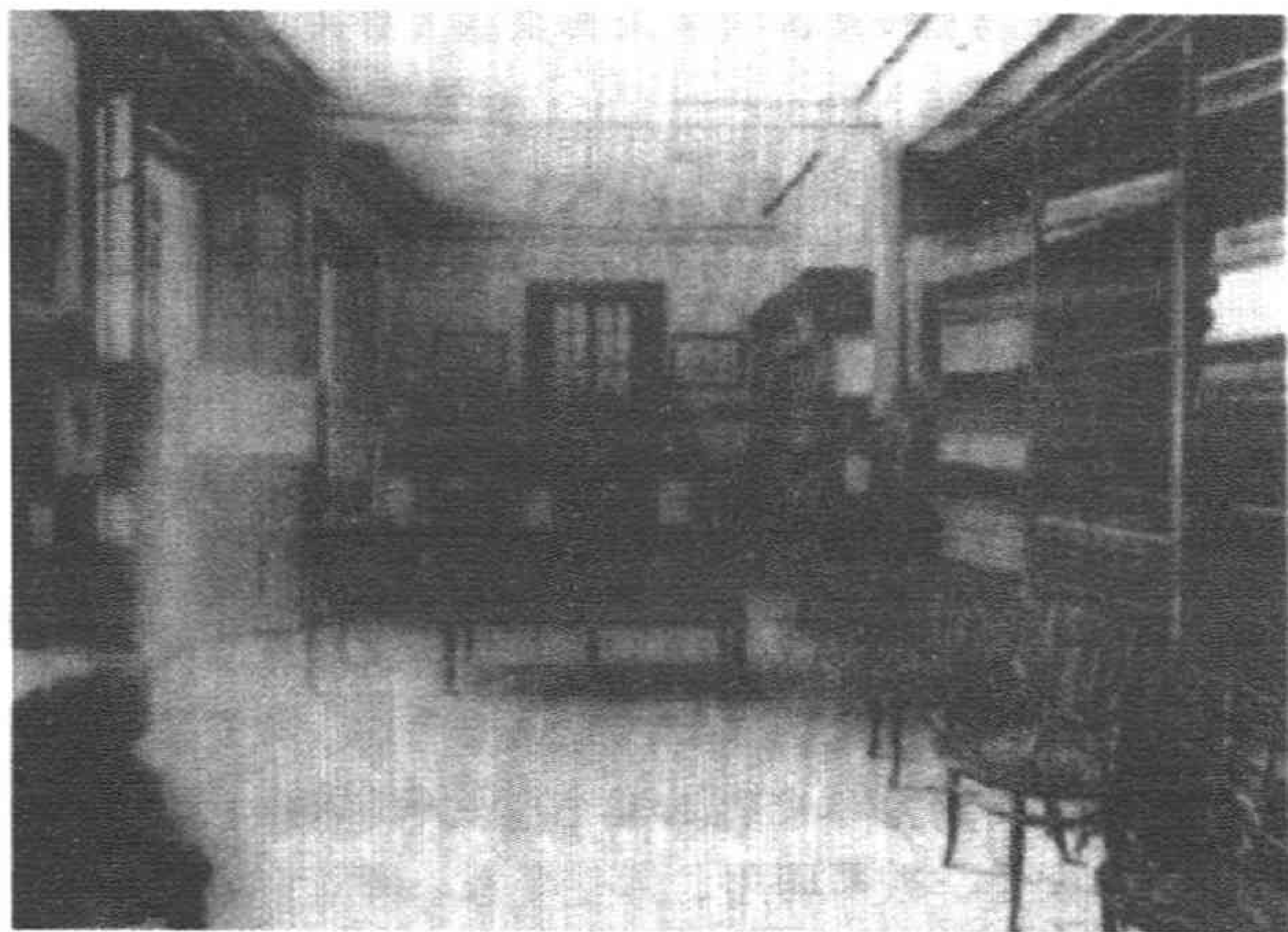
据悉，董建华现今，仍常光顾上海理发店。

而上海的裁缝刀在香港，可谓沉浮跌宕，充满沧桑。自从上海旗袍师傅大批南下香港后，香港女

结婚场景。



子服装，也开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式短打套裙已不合新一代职业女性——主要是写字间女文员——的心思，全西式时装也被冷淡，代之而起的，是那种已注入了西方女式时装概念的海派旗袍，海派旗袍吸收了西式女装的打胸裥、收腰、套装式等概念，一时广为香港白领女士所接受。时值内地因种种原因，旗袍被打入冷宫，反而在香港，这种十分国粹的女装，成为香港中上层妇女的服饰时尚。



20世纪初的香港裁缝店铺。

直至70年代，嬉皮之潮席卷全球，旗袍窄身紧袖，年轻一代觉得有束缚之感；再者，此时世界顶级名牌集团连锁店开始排山倒海抢摊香港，旗袍才渐渐淡出。不过在盛大隆重场合，旗袍仍被香港上流社会公认为华服。

香港以南北行起家、后转做地产的利氏家族，其后人利孝和夫人，数十年一直穿旗袍，当然，她的旗袍价格件件都是五位数六位数的！

随着香港"九七"回归热潮，时装界掀起一股

强烈的CHINA　LOOK(中国风)，许多著名时装设计师，如张天爱、刘家良等开始重新从旗袍工艺中吸取灵感。

商人邓永锵，90年代，特地在中环黄金地段开了一家名为“上海滩”的百货公司，其卖点就是昔日的上海生活情趣，上海30年代的流金岁月。

旗袍，也属“上海滩”的一大卖点。

为了重现上海旗袍的魅力，“上海滩”特别请来一批操上海方言、穿长衫的老裁缝，在店堂内辟出一角红木柜台，专为客人度身定做旗袍。做工当然昂贵，一件旗袍连工带料，七八千元不稀奇!

不过，今日旗袍在港人日常生活中，毕竟因有种种不便，始终不能普及。

作为美食天堂的香港，随着50年代大批移民南下，单一的广东菜已无法满足他们的口味，食肆为了迎合他们逐渐出现以上海、北京、四川等地风味为主的地方口味特色菜馆。其中上海菜(包括镇、扬、无锡口味)，在今日已发展为“上海料理”，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外帮菜之一。

起源于扬州、流传在上海的“三把刀”：菜刀、理发刀和修脚刀，随着50年代大批移民南下，也传到了香港。而“三把刀”中，惟有“菜刀”，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大浪淘沙，非但宝刀不老，反而不断光大，已完全融入香港饮食文化之中，成为美食天堂内的一块金字招牌。

或许因为“民以食为天”，且饮食潮流，不如时装发式，说变就变。因此菜刀在“三把刀”中，终究屹立不倒。

此外，香港上海菜(自然也包括其他外帮菜)，在力图融入香港社会中，可谓费尽心机。最主要是，上海菜(镇扬菜)一般重油、甜、浓、腻，而香港人则口味偏向清淡。因此，香港的上海菜与正宗上海菜，颇有不同，为迎合香港人口味而不断作了改革。

香港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广博吸受各地文化，可以讲，惟独海派文化，与港式风情最投机，最能水乳相融，半个多世纪以来，海派港风共同构成香港多元文化的主流部分。

上海大亨催谷香港经济

40年代末，素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随着大批人才和资金的南下，连带“冒险家乐园”的美誉，也给香港取而代之。

大批接受过西方教育，在大上海早已经历了创业洗礼的上海移民，为香港建立了扎实的工业基础，并在若干行业如纺织、航运等，执香港同行牛耳，一时“上海大亨”之名四起，令香港人对上海移民刮目相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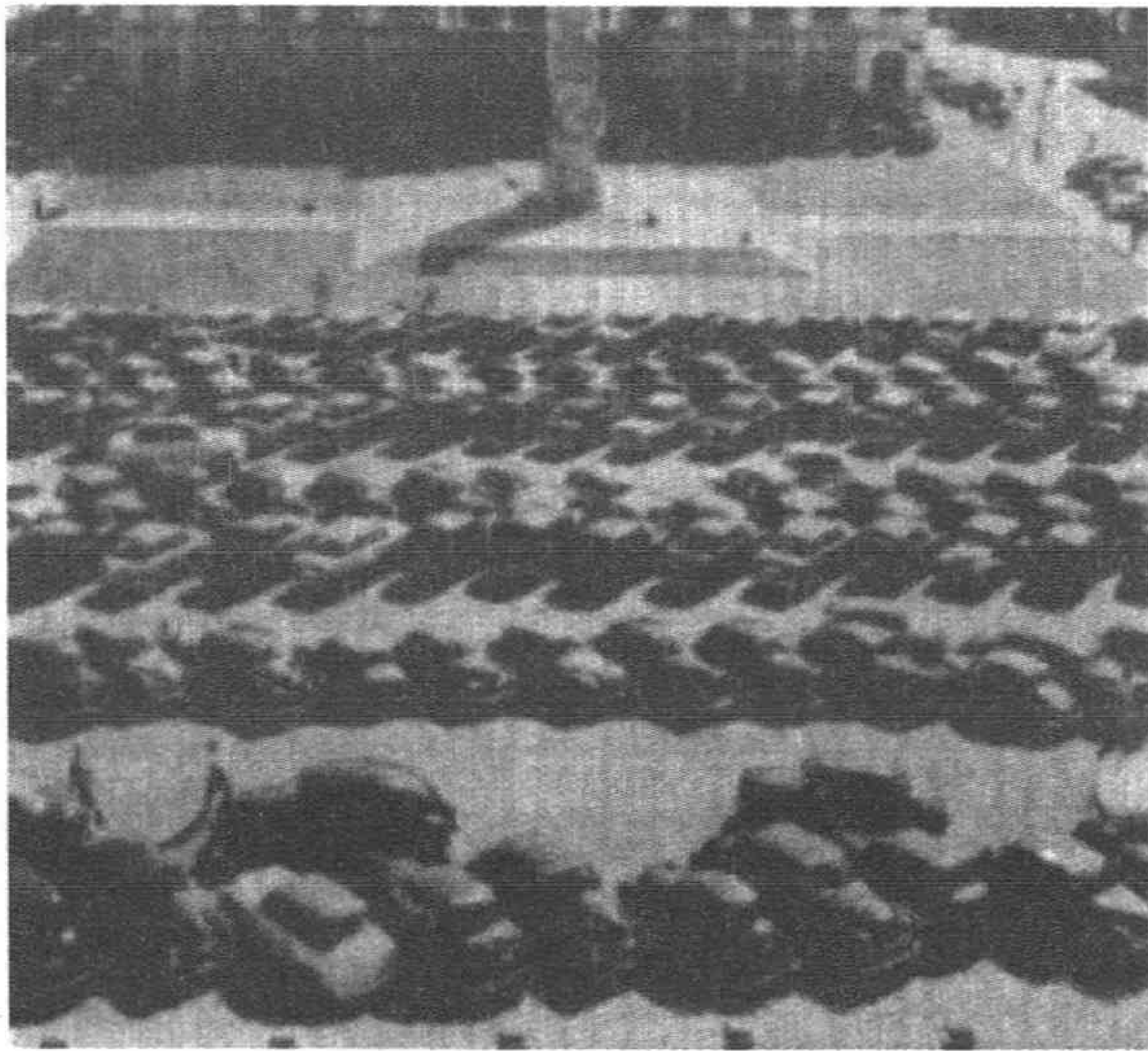
50年代初抗美援朝时期，当时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骤然受影响，经济开始倾向大衰退，传统的经济发展道路被切断。这时，上海南下的实业家，连带他们的资金技术，无疑对正呈衰退的香港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由于他们的介入和积极推行，香港华资经济迅速趋向工业化，从传统的贸易转口港蜕变为远东出口加工中心和工商并重的城市。

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0年间，香港的工厂数量，从1478间增加到16507间，工人从8万人增加到55万人。

这批上海大亨，在香港的金融、纺织、航运、娱乐、报业等各行，一度均执牛耳，甚至是"拓荒牛"。

迅速增加的香港私家车像方阵一样停泊在停车场。



他们与传统香港本地华商相比，最大优势，是这批上海大亨几乎清一色都接受过西方教育。香港上海籍纺织大王唐炳源，早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23年回沪办厂。

另一位纺织大亨王统元，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赴英国专攻纺织专业，1933年回沪办厂。

香港万邦航运集团创办人曹文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9年在香港创办万邦航运……

香港电影大亨邹文怀，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其中由上海人一手创办的香港纺织业和航运业，对香港经济影响深远。



1934年，香港国民制炼油有限公司注册登记的“飞鹰牌”油漆商标。

上海纺织大亨

如果说，上海的华资百货业的“拓荒牛”，是来自香港的百货大亨的话，那么，香港纺织业的“拓荒牛”，就是来自上海的纺织大亨。

有经济评论家认为，若用“香港纺织是上海人的世界”这句话去形容香港的纺织工业，一点也不过分。据统计，在50年代香港纺织厂中，只有一家是非上海人。

直到1978年，上海籍华商拥有的纱厂数目，占香港纱厂80%，从中反应上海纺织大王对香港纺织业发展的重要性。香港被列为世界最大的成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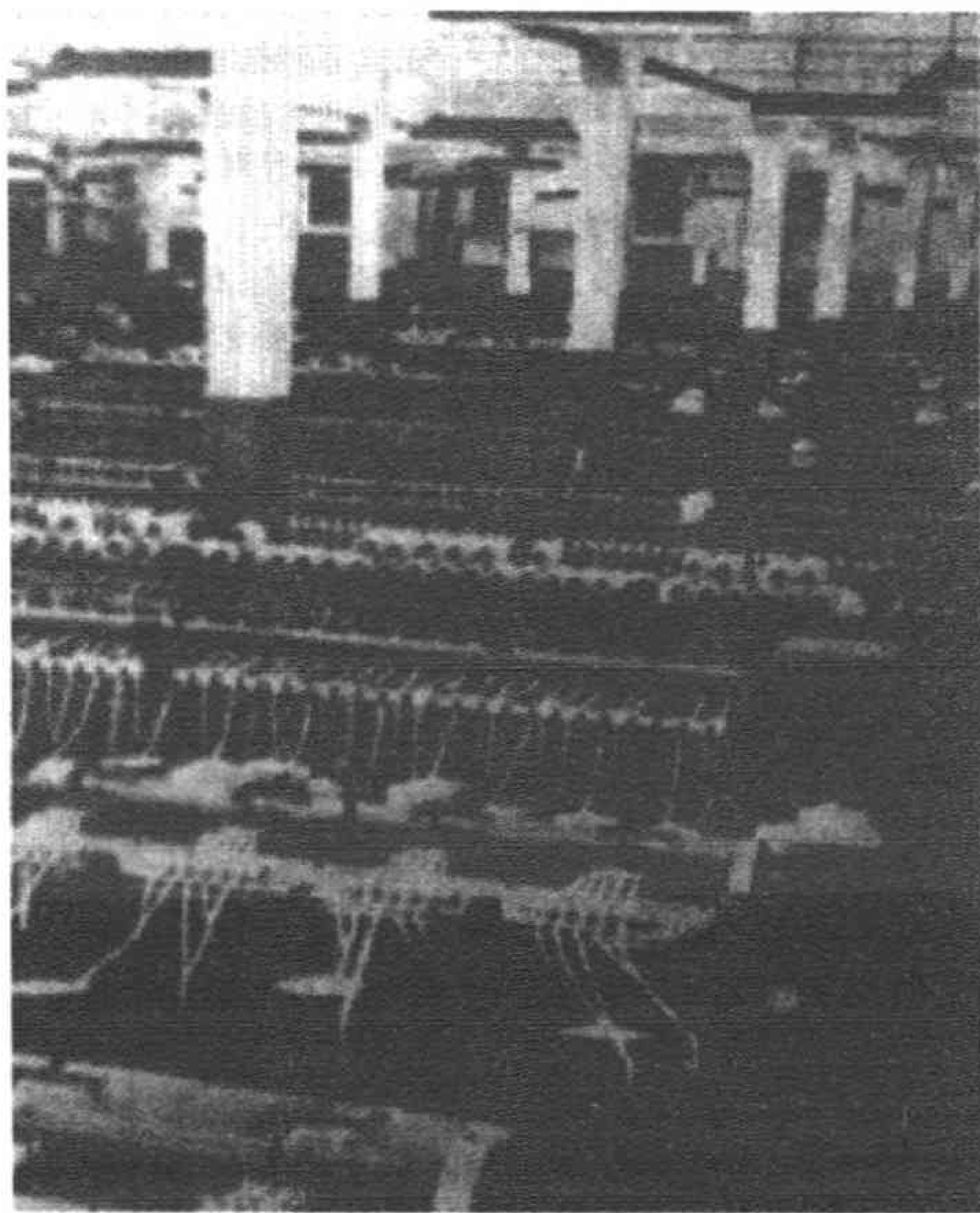
业之一，与香港本身纺织业兴旺有关。

这批上海纺织大亨在香港的厂房，在50年代，无疑是当时香港纺织业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一个纺织厂，他们不断拓展海外业务，到1958年，香港纱厂的外销市场，已从东南亚转向英国和美国。不少纺织大王，同时将纺织业务拓展到制衣业。

上海纺织大亨在香港大展拳脚之际，为香港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对于来自其他省份的人，无疑也是个福音。

特别是当时有了一批“工厂妹”。这批“工厂妹”虽然文化不高，但走入社会，见识广博，是继茶楼女招待、百货公司售货小姐后，又一批自力更生的职业女性。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香港的职业妇女，已开始由早期花瓶型逐渐演变成事业型。

香港南洋纱厂有限公司厂内一景。



据说，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工厂妹”，因实行计件制，那些年轻伶俐的，一个月拿一千多二千元并不出奇。放工后，她们齐齐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听歌消遣，俨然成香港一代新职业女性。

航运业大亨

特别要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的航运业几乎完全操纵在以英资太古洋行为首的外商手中，华商仅有数十艘中小客货轮，只航行在华南沿海及东南亚等港口。

进入50年代，香港迅速的工业化，令进出口业务大幅增加，一批上海籍华资航运集团乘势崛起，其中最著名的为包玉刚的“环球航运”、董浩云(董建华之父)的“金山轮船”、“中国航运”、赵从衍的“华光航业”、曹文锦的“万邦航运”，成为50年代蜚声国际的香港航运四巨子。他们的兴起，也是乘着天时地利之便。

当时由于战后日本经济蓬勃发展，日本的客



制衣业是香港工业的支柱之一，图为一家较早形成规模的制衣厂生产时的情形。

商，成为香港航商“抢客”的对象。香港各航运公司，几乎每天都派人去机场候客，当时，身为老板的曹文锦和包玉刚，也亲自参与“抢客”之列。

50年代香港启德机场导航设备落后，日本的班机也较旧，常常误点。据说当年曹文锦，清晨四点多便动身至启德机场，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

当日本客商一步出机场，“抢客”们就一窝蜂上前你争我夺。遥想那场景，一定颇似现今团聚在火车站边的“旅社抢客”。

包玉刚聪明机智，他一个箭步上去，先夺过日商的皮包大声招呼：“先生跟我来。”日商见皮包被抢，只好赶紧摆脱众人跟住他，包玉刚就把日商接到预订的酒店，一边备酒为其接风，一边就谈货运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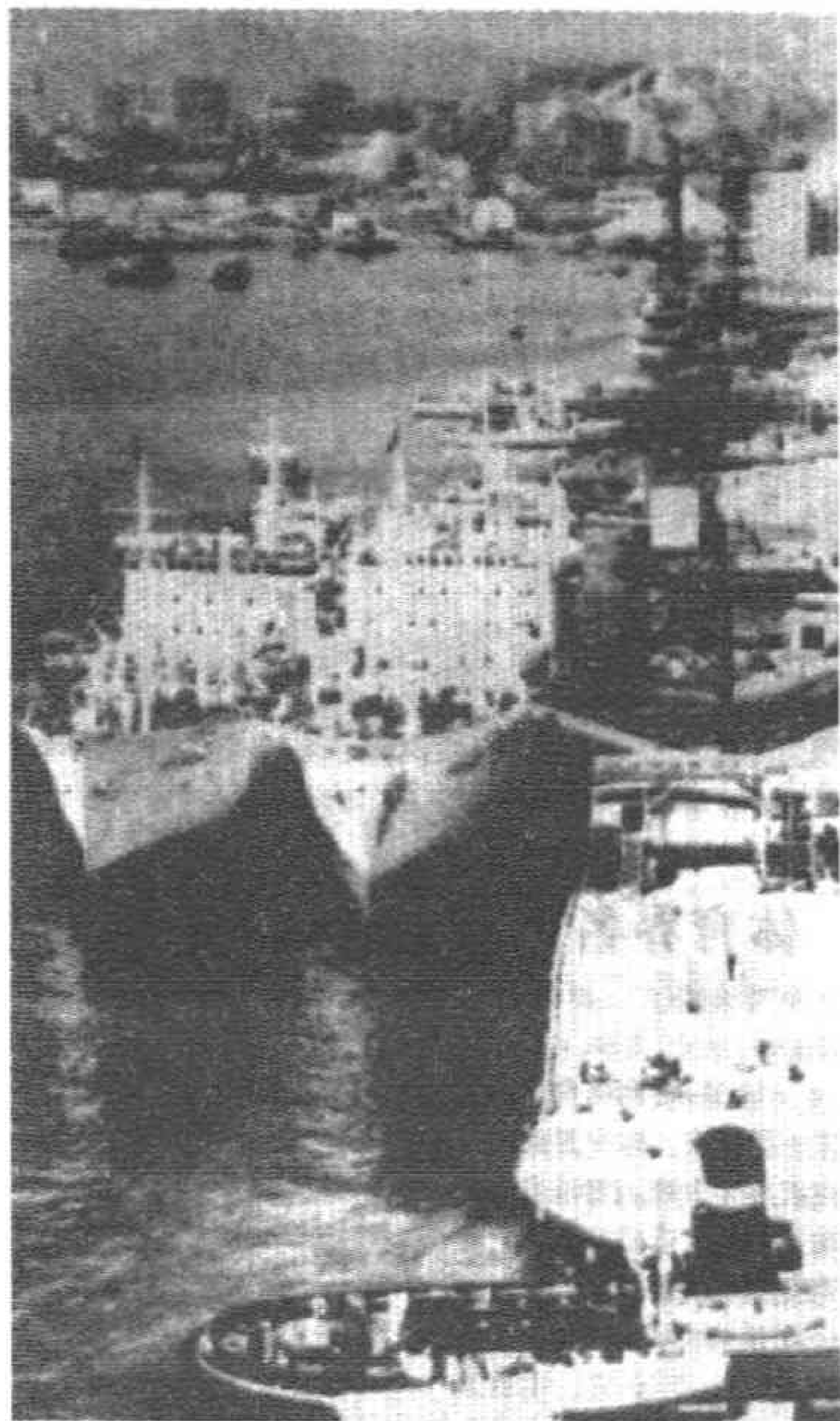
创业伊始的艰辛，因此可见一斑。

包玉刚创业之时，37岁，已是人近中年的年龄。他说服父亲，斥资70万美元，购入一艘已有27年船龄的烧煤船，开始了他的宏伟大业。

银行家出身的包玉刚，作风稳健，从不冒把握不大的风险。当时，一般船东都喜欢用“散租”形式，这种方式在航运好景时很易获利。但包玉刚不为一时的厚利所动，坚持长租政策，令他船队迅速壮大，并在80年代，成为在国际船运业当之无愧的首席“世界船王”。

回顾19世纪中期，最早开始香港航运的是俗

称疍民的水上艇户，直到今日成为世界最大航运中心之一，上海航运大亨，劳苦功高。基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详述。



红石勘黄埔船坞旧照。

解开移民结，香港是我家

一般来讲，新移民在城市中，总成为“贫困”的代名词。正如前文提到，香港本身便是一个由移民构成的社会，香港六百万人口，有一半港人是在香港以外出世的。也惟独在40年代后期南下香港的上海移民，与“贫困”似不沾边，一度“上海人”三个字在50年代的香港，成为“有钱人”的代名词。

无可否认，内地移民，对香港发展有很大贡献，在移民刺激之下，香港社会不断更新，移民提供的技术和劳力，也令香港经济得益丰厚。当然，新移民初来乍到，一时不容易找到归属感。他们来港后，仍保留以往的生活习惯，并喜欢同乡人聚居。一如早期上海人爱住北角；而荃湾，又多为印尼归侨爱聚居之地……移民文化给社会带来多元文化。

自从1842年以来，香港一直成为内地人最理想的移民地。

当初他们移民，并无意在此生根，只为避战乱或其他原因，在他们眼中，香港地方窄小，不值得留恋，他们只将自己看作香港的过客，认定终有一日可重返自己家园。他们在香港逗留的目的，只为了赚钱谋生。

这种移民情结，令老香港人不理天下事，只顾勤勤恳恳赚钱。每个移民香港的人后面，都有一段辛酸事。因为一切是从零开始的，连上海大亨也不例外！

早期香港，直到60年代之前，外国人还是高人一等，社会上的名流，也多属几个大家族成员而已。

在四五十年代香港，正如前文所提到，香港一般市民都可归入劳动阶层，当时专业人士还未兴起。

有钱人有他们的社团和活动场所：如乡村俱乐部、游艇会、木球会。一般老百姓，这种地方根本进不了。

乘火车归家的市民们。



不过，平民百姓，也有他们的社团。如各种宗亲会和同乡会，这与香港作为移民城市关系密切，到了40年代末，大量移民南下香港，这些宗亲会、同乡会的作用，就更为重要



香港人中秋节习俗与内地人一样也喜欢中秋观灯。

了。60年代之前的香港移民，仍属十分封闭保守。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在内地时一样一尘不变，只是换了一个生活环境。他们喜欢同声同气的乡亲一起聚居，听他们自己的地方戏，吃他们自己的地方菜，甚至进自己的学校，如福建中学、苏浙中学……即如海派上海人也不例外。可以讲，那时的香港，没有本域文化可言，有的只是各省市移民从内地带来的生活方式。

直至60年代末，香港经济开始腾飞，一般市民的生活开始从贫困趋向小康。更重要的是，移民的下一代，开始进入青春期或成人期。对他们来讲，香港才是他们的家，而父母嘴里的“家”，同乡会、同宗会里的老家，对他们是遥远而陌生的。他们只认同自己在其中长大的香港：香港给了他们教育，给了他们机会，他们的根，已深深扎在香港的柏油马路上。

不过，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每逢长假日或旧历年，回乡探亲的，在罗湖关仍排成长龙。

香港与内地，毕竟血脉相连，自开埠至今的一百五十多年，香港成为众所公认的“东方明珠”，其实也是全国各省份移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1919年7月18日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大战和平纪念日庆典活动。



港岛上环文咸街景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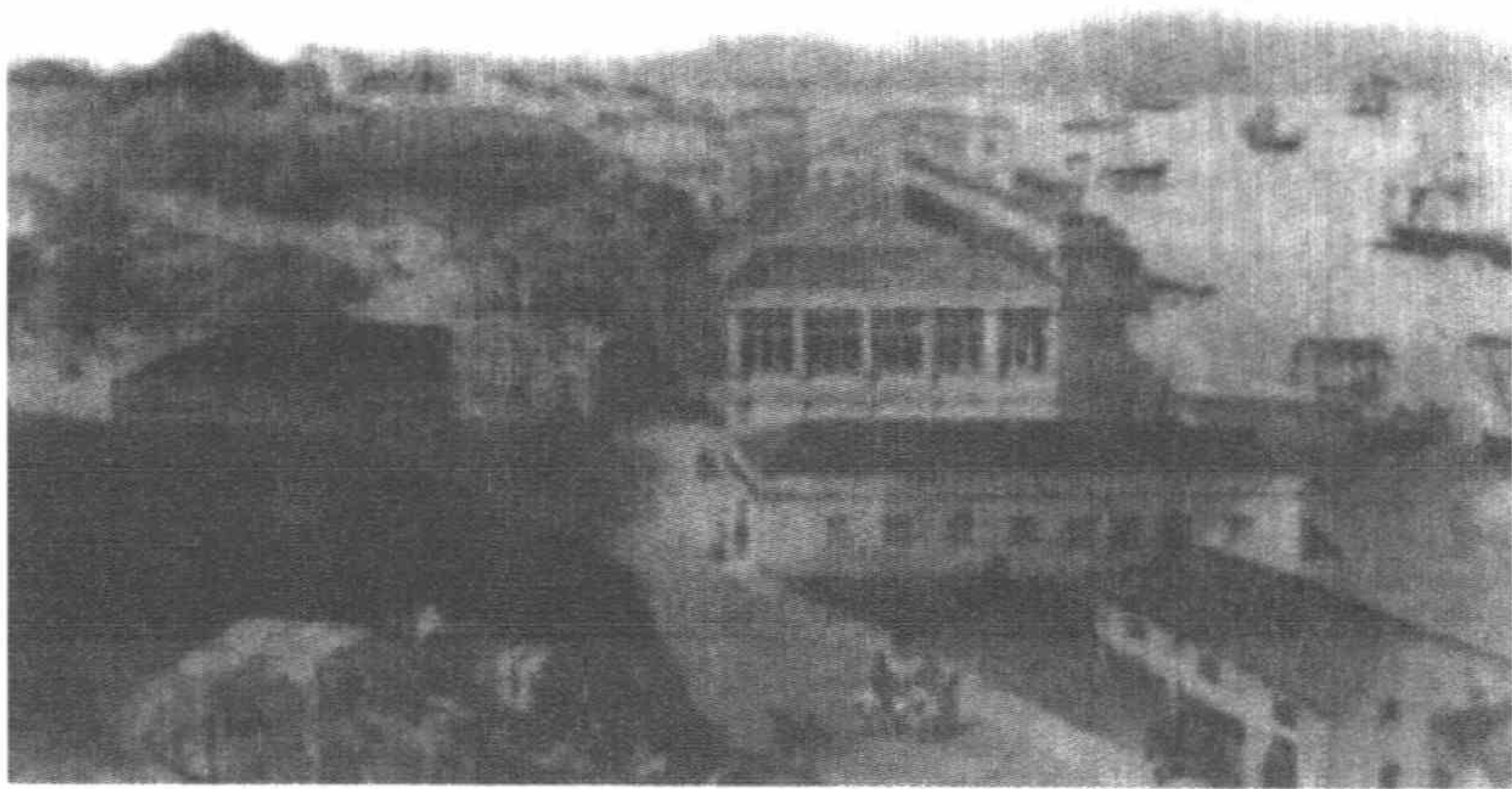
早年刊登在香港报刊上的广告。

中国百货公司的先驱

香港一直被称为购物天堂，除了因为她是免税自由港外，更因为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天下美物美食尽可聚集。

时至今时今日，香港的百货业，可以讲超过世界水准，应有尽有，并且已由单一的购物主题发展为吃、喝、玩、乐多元多种。可以讲，中国百货公司的先驱，是始于香港。

1850年香港开埠之初，一位来自英国的船长名A.Lane，随船运来一批日常用品卖给香港市民，没料到这种舶来品生意甚佳，便决定在洋行洋人集中之地中环，与另一同伴N.Crawford合伙开了家名“Lane　Crawford”(连卡佛)的店铺，从而成为香港历史上首家百货公司。今日，“连卡佛”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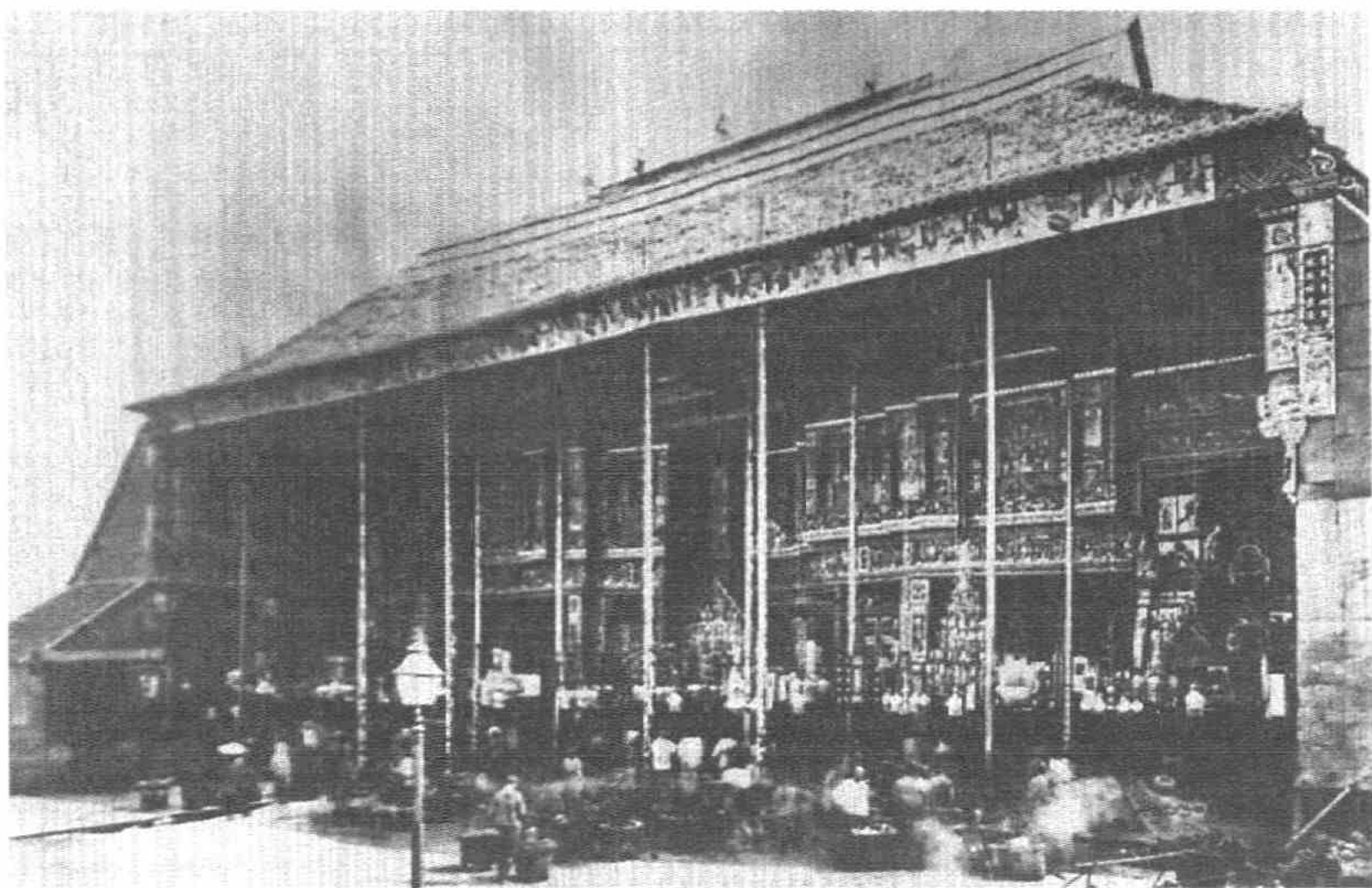
香港中环景色旧影。摄于清末。

全港九已有多家连锁店，专门代理世界各国顶级名牌。"连卡佛"，今日已成为昂贵、奢华的代名称。"连卡佛"的名字，常与城中贵妇名媛、明星名人连在一起，一般中产一族，绝少问津。

开埠初期的"连卡佛"，因为是外国人开的，因此一般华人，纵使有钱的，也极少敢涉足。

香港的普通市民对洋货特别崇拜向往。精明的商人看准这个市场，首家华资专卖舶来品的百货公司，出现在上环海旁，名字是相当传统的中国名："义生发"。

因为是中国老板，令顾客更觉亲近，没有语言阻碍，生意兴隆，"义生发"索性向旧金山、檀香山直接进货，生意越做越大。就是在19世纪后期，



香港华商展览会。摄于186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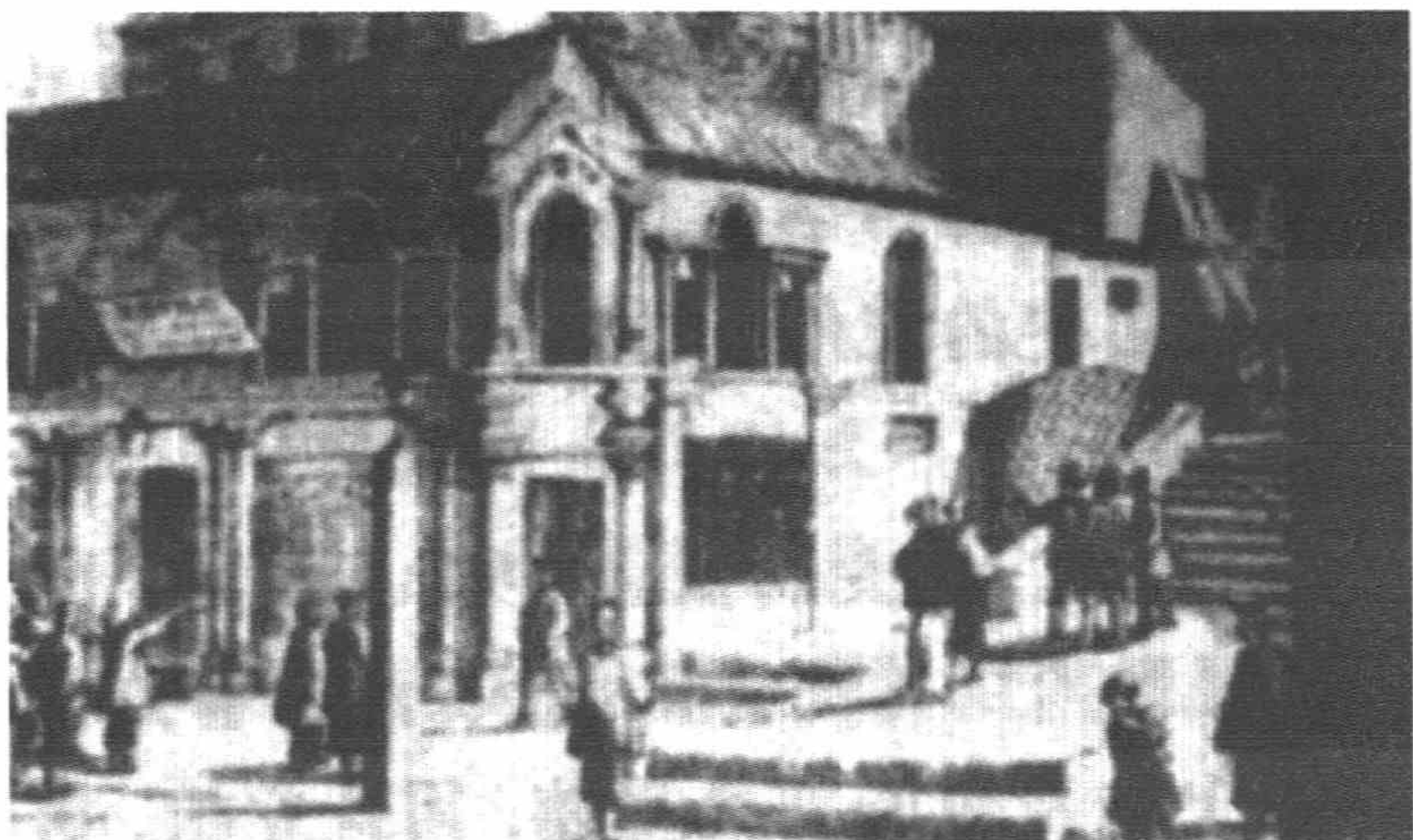
其经营方式，还是离不开南北行那种传统经营模式。

不过，香港百货业的真正崛起，应始于20世纪初期。

当时香港人口已逾三十万，并已成为远东转口贸易的港口，对生活用品需求，无论是质还是量，都令百货市场趋向成熟。此时，一批澳洲华侨将西方经营百货的先进观念引入香港，先后创办了先施、永安等一批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在香港的诞生，标志着香港的华资企业，开始进入现代企业集团化运作，带动了香港一批华资家族财团的崛起。

先施、永安、大新和中华是当年并称的华资四



香港裕盛办馆旧照。

大百货公司。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先施、永安已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企业集团。

华资百货公司在香港的崛起，标志着香港华资现代企业集团的萌发，从而为香港"购物天堂"的美称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在20世纪初，十里洋场上，没有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百货公司。

香港是一个靠移民繁荣的城市，一点不假。

中国移民、海外华人，以广东籍人为主，他们在接受了西方现代的先进观念及积累了一定资本后，首选生活文化相近的香港作为发展基地。

香港先施公司，是全国最早的华资百货公司，1900年由澳洲华侨马应彪创办，至今仍为名副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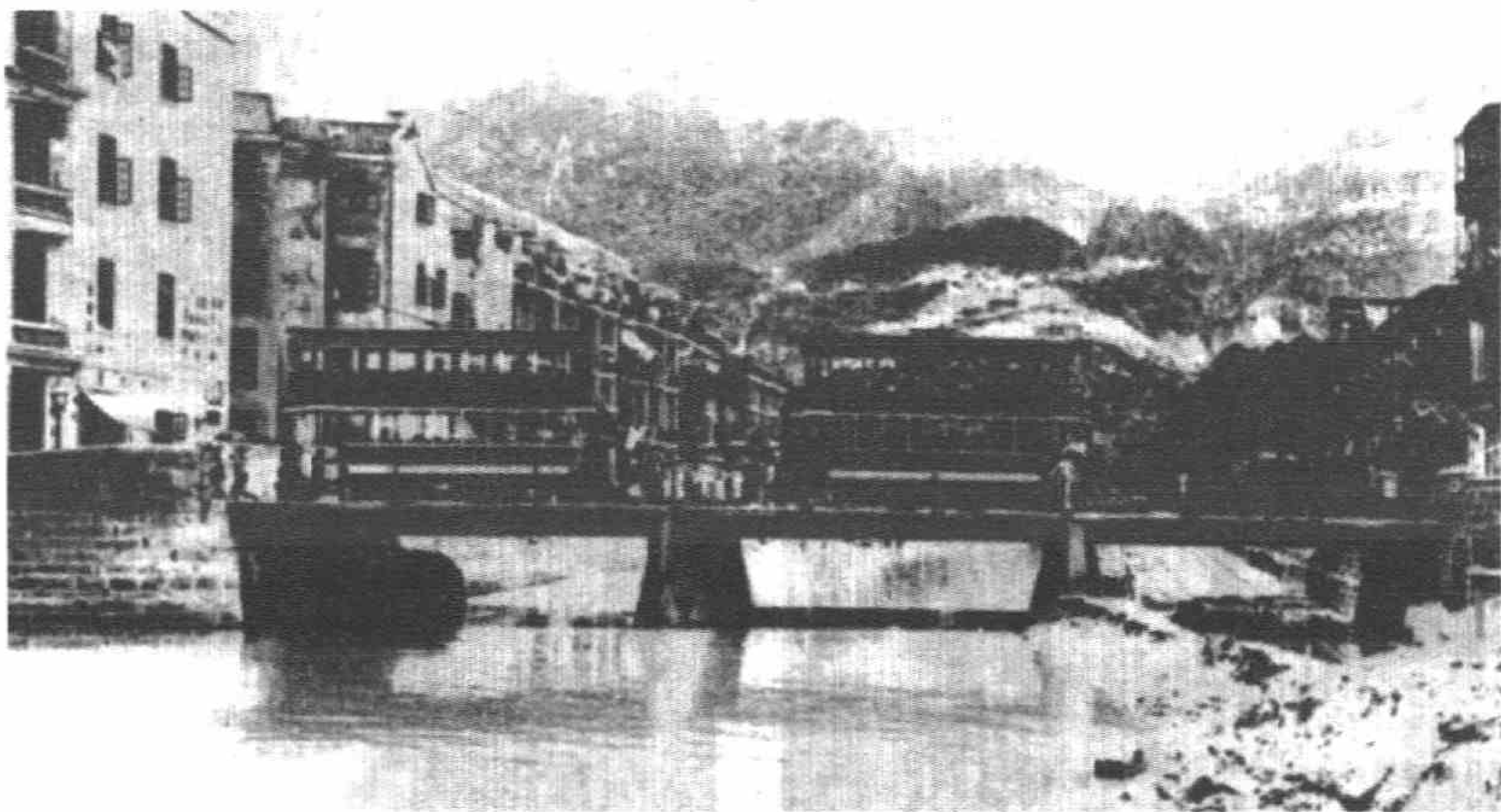
实的百年老店，前不久，刚刚趁“百年之禧”进行了一系列的推广宣传活动。

“先施”之名，取之《论语》的“中庸”篇：如果未能以诚实之道施于人，则难取信他人。“先施”英文名为Sincere，英文中也作“诚实”之解，正好与中文名“先施”音义相同，可见起名之时，已煞费苦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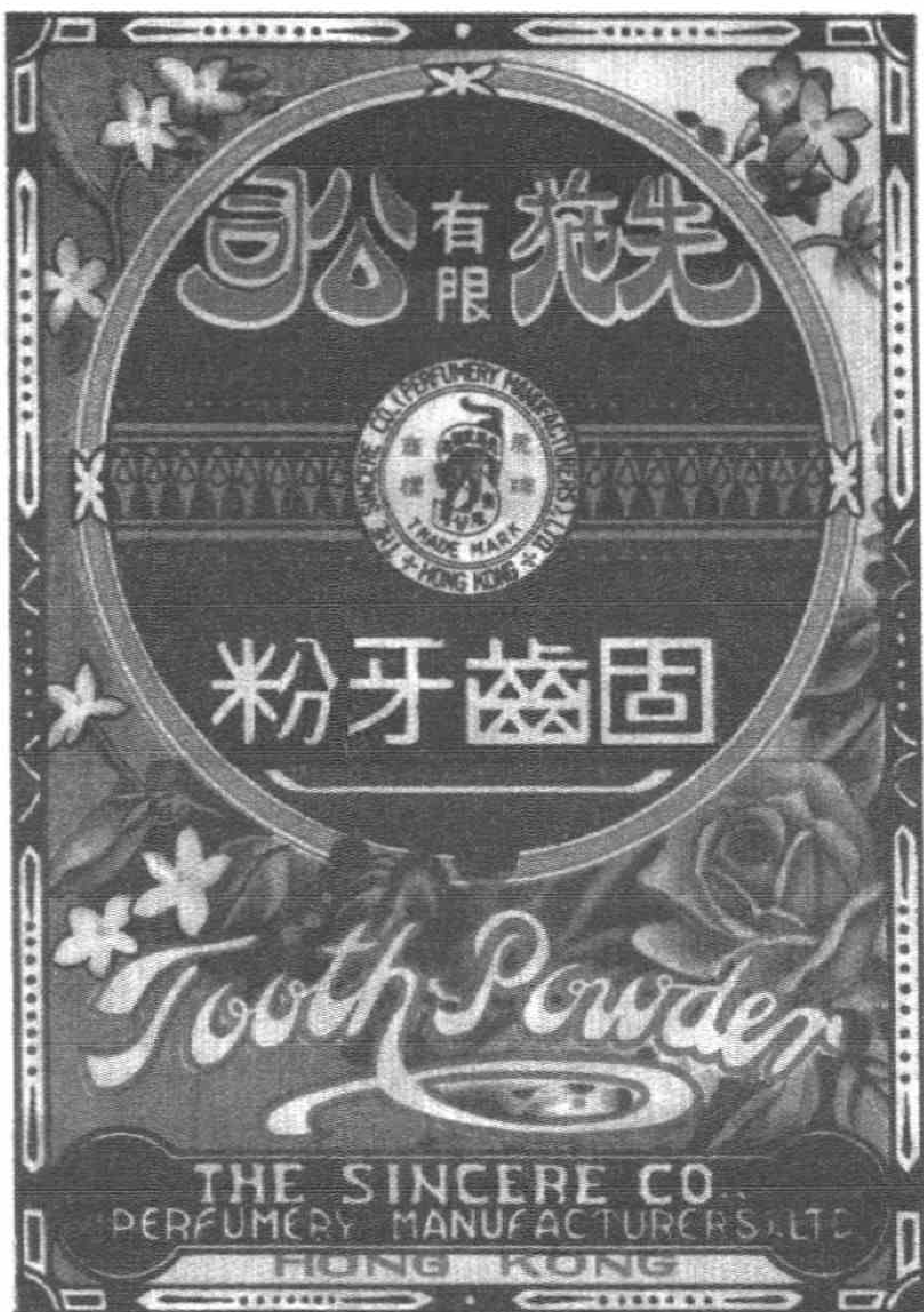
马应彪作为创办人，取“先施”为名，正是反映了他的经营思想。华人之所以能在异国他乡的澳洲顽强地生存下来，且拓展事业有骄人之处，相信就在于海外华人，善于洋为中用，中西合璧，各取其精。

马应彪为广东中山人，小贩出身，19岁离乡背井赴澳洲做华工。1892年，与友人在悉尼华埠合办永生公司，经营中国土特产，生意十分兴隆。

香港鹅颈桥旧影。



据马应彪家族的后人回忆，在那段时日，马应彪每天上班都会途经一家百货公司，见到内里顾客摩肩接踵，场面红火，留下深刻印象，便刻意留心他们的经营手段。相信他立志办一家中国人的百货公司之意念，自那时已开始萌发。



先施有限公司1928年注册的牙粉商标“虎牌商标”。

1894年，马应彪从澳洲移居香港，独资开南北行，经营转口生意。

此时香港的华商，以南北行为主，经营方式还是农业社会那样：商品均无明码实价，做生意讲情面，看人脸，顾客与老板每做一单生意，就要不断减价，费时费劲。

马应彪决心将西方先进的经营方法和宗旨引入香港，创办“一口价”公司。当即马应彪与另外几位澳洲华侨蔡兴(后参与创立“新新公司”)、郭标(后创办“永安公司”)等共筹得资金2.5万银元，创办了先施公司。



1900年时的香港皇后大道边。

1900年1月8日，位于港岛高级区域的中环皇后大道中172号，先施公司正式开业。

先施一诞生，即打破华商的只开地面铺，且铺面窄小黯暗，不讲究门面和装潢的旧传统，门面华丽气派，令客人一进门就自觉身价不菲，有宾至如归之感。

先施百货从地铺到二三楼都是商场，地铺售日用百货，楼上摆售衣料成衣等，式样繁多，琳琅满目，纵使不买，进去逛逛，也令人赏心悦目。

先施百货作为中国历史上首家华资百货公司，为中国传统零售业带来两大划时代的改革。首先，顾客光顾先施，不论购物多少，都会开具发票，并可凭票退货，且首创“一口价”：不讲价，不还价。先施的另一惊人之举，是打破当时中国旧式庄行一律灰色短打小伙计站柜台的惯例，学习西方聘请售货小姐。

香港虽然开埠早，但华人社会仍是封建意识起主导，特别在20世纪初，中国还是大清天下，女

子抛头露面出来站柜台，轰动整个香港。

先施公司开业当日，马应彪太太亲自率领数位售货小姐迎送顾客，一时，连九龙的市民也纷纷搭船渡海，闻风而至，将整个公司挤得水泄不通，需警察维持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香港街头处处悬挂着协约国国旗。

先施百货首创聘用售货小姐，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商业领域，而是孕育出早期中国首批职业女性。虽然仍带有浓厚的花瓶色彩，但毕竟是女子踏入社会、自力更生跨出的第一步。

自此以后，各大百货公司开始纷纷仿效。若干年后，售货小姐也渐渐被社会认识和接受。

1917年，先施在中环德辅道中环先施公司原址，兴建一座楼高6层的商厦，作为先施总行。新大厦仿效美国纽约百货大厦的设计模式，店内南北两端均设有电梯直通6楼，楼顶就辟为游乐场，开设饮食部、茶点部，晚上还有听歌跳舞。

先施又率先引进纽约刚时兴的彩色霓虹灯招



昔日香港皇后大道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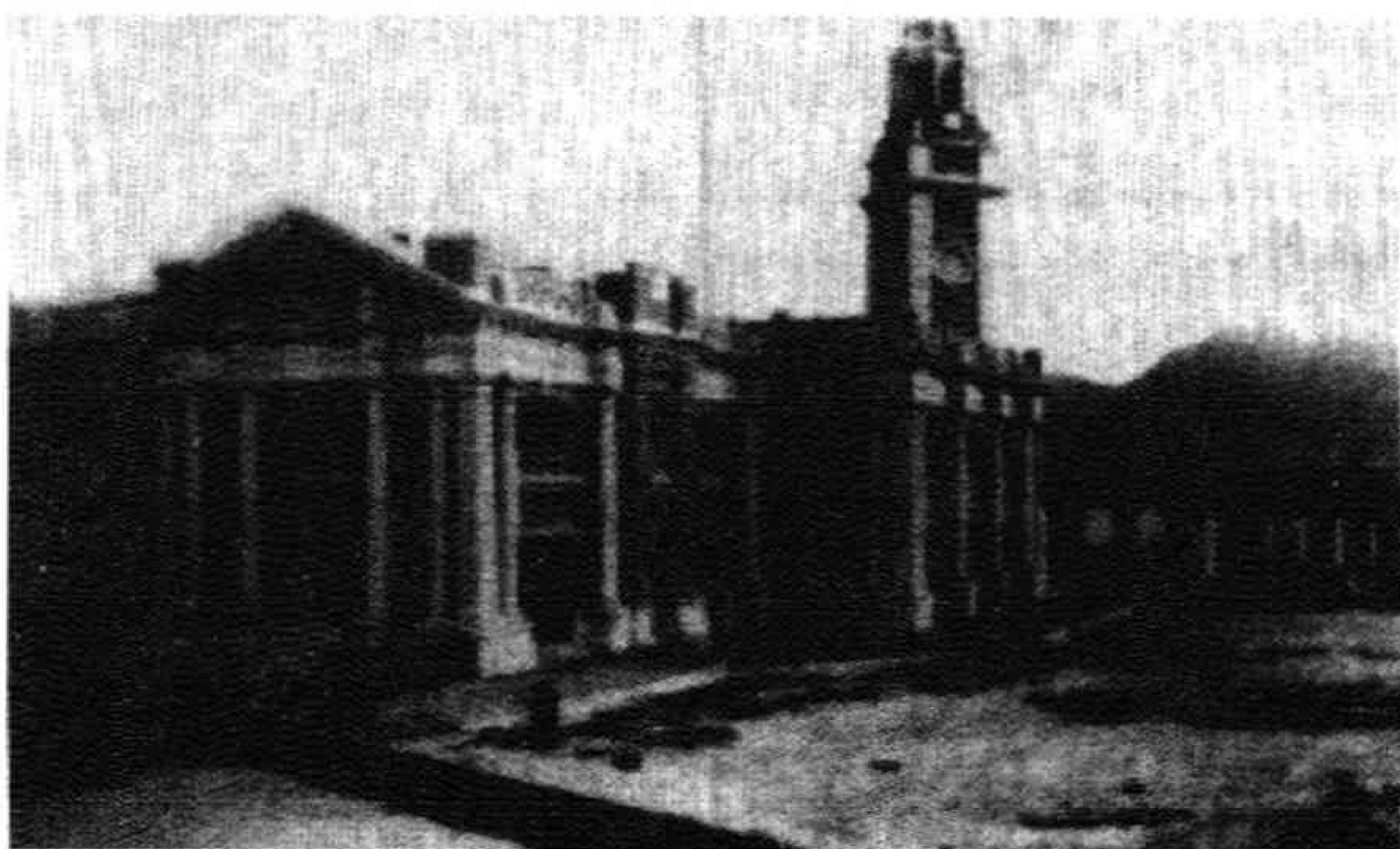
牌，每当入夜，五光十色的灯光将先施门面点缀得缤纷璀璨，令先施成为当时港岛中区的主要购物娱乐中心，亦为港九中上层人士心中所喜。

永安公司是继先施公司之后的全国第二家大型百货公司，创办人郭乐、郭泉，也都是澳洲华侨。初时两兄弟主要经营水果批发，1907年，郭乐眼见同乡马应彪在香港开设先施公司搞得如此成功，便也跃跃欲试。1907年8月28日，永安公司成立。初时店铺仅一间门面，员工仅十余人，与“先施”相比，规模差远了。直至20世纪30年代，“永安”已后来居上，发展成为永安集团，成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并且，“永安精神”已成一种现代管理的代名词。

永安百货的宗旨为：“以统办环球货品为鹄的，凡日用之所需，生活之所赖，无不尽力搜罗”。因此货品样样齐全。到1931年，永安在中环德辅道中的百货大楼，门面已由四间增至三十余间，占地约4千平方米。至今世纪之交，永安总部大楼，

仍雄踞在中环区，与一条横街相隔的先施，针锋相对，亦敌亦友，竞争激烈。

30年代中期，永安百货已发展至货仓、酒店及地产的跨行业大型企业集团。特别是地产物业，日后大幅升值，为集团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资产基础。



广九铁路尖沙咀车站旧影。

1960年永安创办人郭泉在其晚年自述《四十一年来经商之经过》里说过："余观察东西通商大势，深感香港在国际贸易上地位之重要，商业之兴，地价与日俱涨，势所必然……"此番话反映出，郭泉早在七八十年前，已开始悟到香港地产大有前景，可谓高瞻远瞩。

郭氏兄弟以英商企业为楷模，经营管理基本上是仿效英商企业的经营模式，除了仿效"先施"聘用女售货员外，还设有德育、智育和体育部，分别负责对职工进行品德教育和业务训练。公司各部门行政管理，都是澳洲或美国的华侨出任，这批人在公司都有投资，既是股东又是行政管理者，他们带来西方观念和文化，对永安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百年来"先施"和"永安"，作为中国百货业

一对“拓荒牛”，旗鼓相当，难分伯仲，互相间竞争激烈，呈白热化状态。这种激烈的竞争，给广大消费者带来了无限福音，令市场充满生气。写到这里，想到多年前听到的有关一个鱼贩的经验之谈：有人问鱼贩，为什么他的鳝鱼经过长途贩运，仍条条如此生猛有力?他答道，好简单，你要在黄鳝中加入几条黑鱼，多了异类的加入，黄鳝时时处于戒备状态，紧张待变，因而令其虽经长期颠簸，仍生生猛猛。这个鱼贩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

百年来，先施、永安各自出尽奇招，各自也在争斗中，立稳香港，先后进军内地，形成跨地域、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共同迎来21世纪。

有趣的是，今日全球闻名的时装王国Joyce Ma

香港湾仔轩尼斯道(194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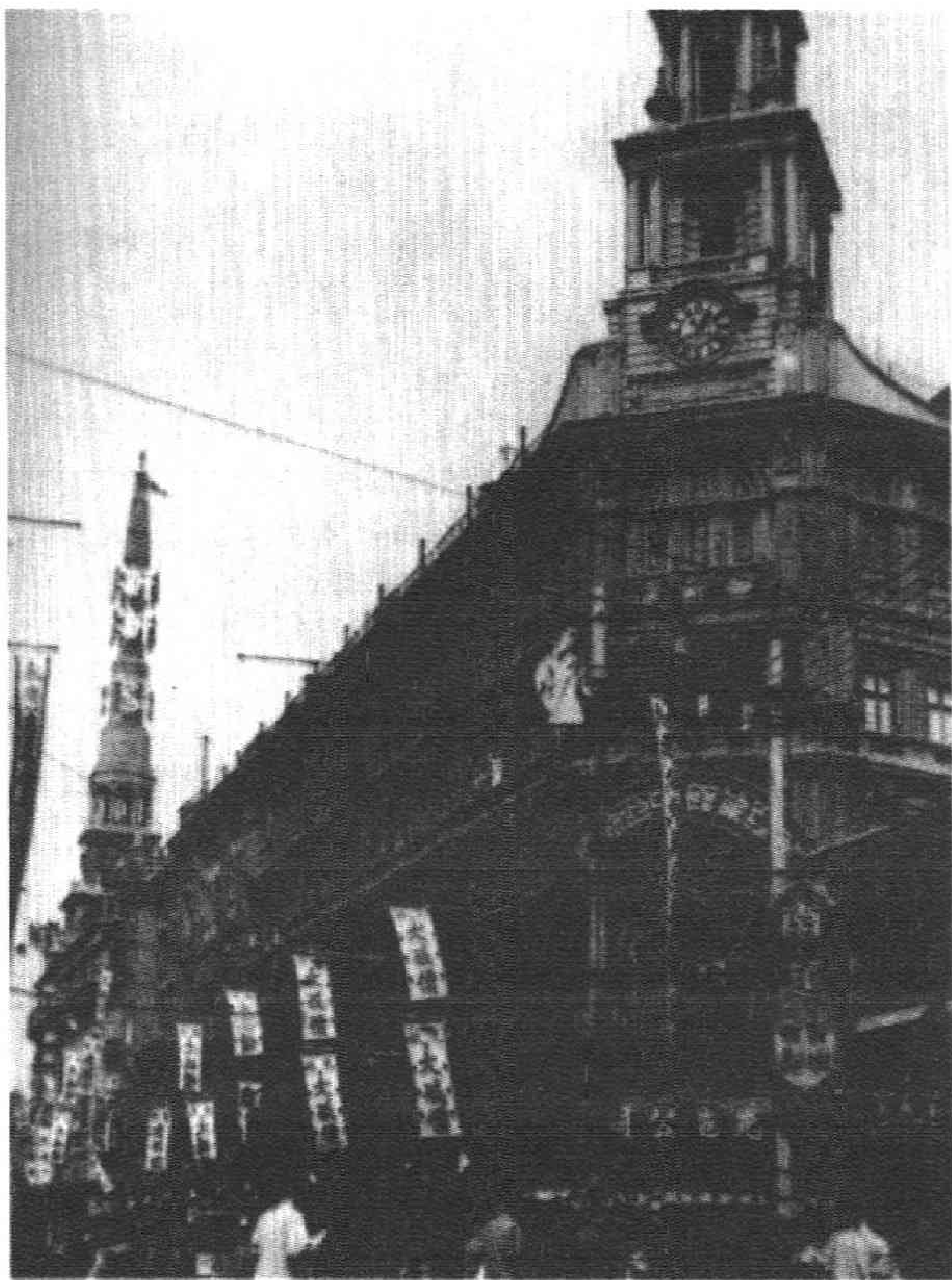


大新公司位于西堤，1918年由澳洲归国华侨蔡昌、蔡兴等集资创建。有“九重天”之称，成为当时广州市独一无二的综合性大楼。1938年毁于战火。1954年重建，易名为南方大厦。

的创办人郭马志清，作为“永安”的第三代传人，她嫁给“先施”的后人，也是“永安”的劲敌，并在80年代，创立香港首家专门代理世界顶级名牌、走高档市场路线的百货公司：Joyce。也属香港百货史上一段佳话吧！

正当先施、永安在香港各自雄踞一方时，由于在20世纪初，香港人口仅数十万，当时的市区也只局限于港岛中环和九龙半岛，其经济繁荣程度远不如内地的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先施”一马当先，在1910年，公司董事局认为，向人口稠密的广州、上海拓展时机业已成熟。

1910年初，先施在广州广为集资，在闹市长堤大马路购入约4000平方米地皮，兴建一幢五层



上海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

高的商厦，一切完全参照香港先施总部模式。

1917年，上海先施公司正式开业。

成立当日，全国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南京路上，在一片鞭炮声中，整幢先施百货大厦张灯结彩，楼顶高高飘着先施的旗帜，老板马应彪亲自剪彩，宣告上海先施公司成立。上海先施的设计，也完全参照总部的模式，顶楼设有游乐场，并附设有旅馆。上海不愧为“东方巴黎”，开办后生意滔滔，营业额和利润很快超过香港总部。

1920年，先施向海外拓展，在澳门、新加坡、日本、英国等地都设分支机构，以百货为主业，业务遍及海内外。

先施劲敌永安也不甘落后。虽然进军内地迟



了一步，但进军上海，永安却比先施走得快。1913年，永安开始筹建上海永安公司。

俯瞰上海南京路，中心建筑是大新公司（今市百一店）。

据说郭氏兄弟对店址的选择，十分谨慎，同样在南京路上，究竟是路南好还是路北好?结果派人分守路南路北调查，结果发现路南人流明显比路北多，结果选中南京路南侧，有意无意之间，正对着劲敌先施在筹建中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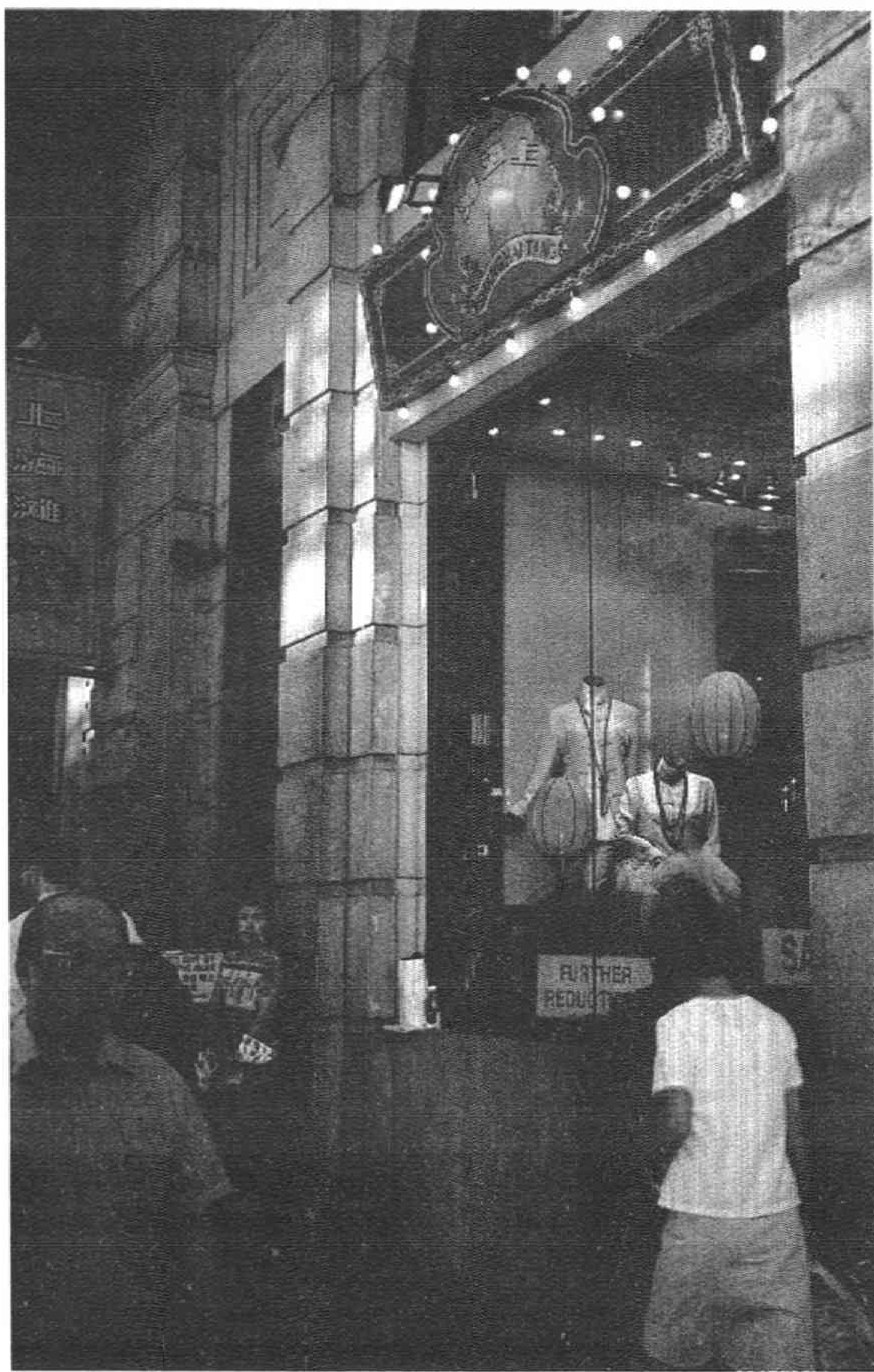
1918年，永安先声夺人，高姿态开幕，开幕当日，人潮涌动，开业仅20天，就将计划销售一个季度的存货，售出大半。

为了加强与劲敌的竞争，永安率先在商场显眼处立起耀眼的霓虹灯标语：顾客永远是对的。这

大约是中国五千多年的工商业中，首次有这样的口号出现。

永安的方针是：顾客只要叫得出商品名，公司就设法满足需要。如是，成功建起了独特形象：凡是上流社会所需，永安公司内应有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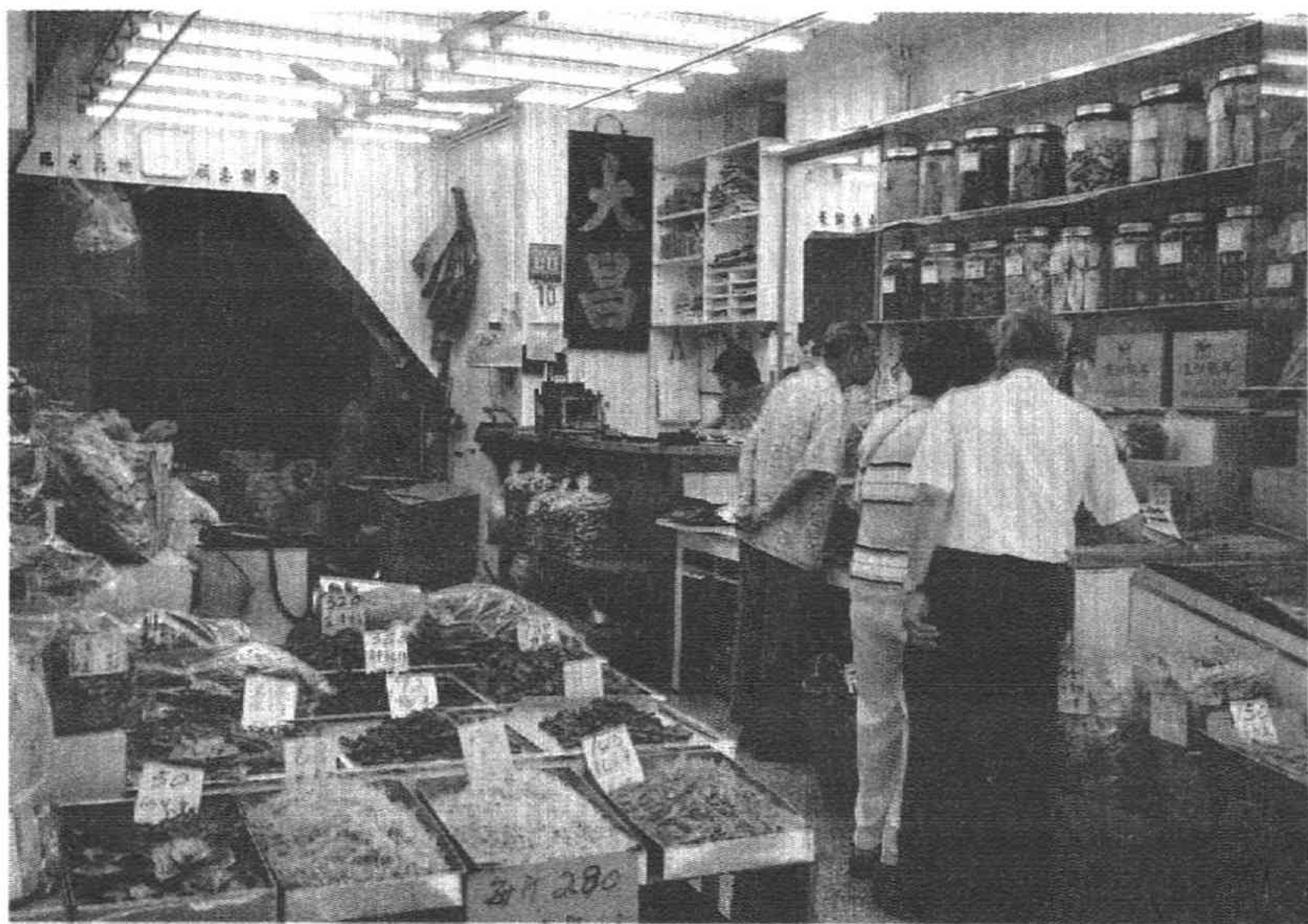
以20年代上海的流金岁月作市场卖点的"上海滩"百货公司。



永安另一独特的经营手法，为首创送"折子"，即对社会权贵、殷商富户和各国领事送上购物时无需即时付款的折子(相当于现时的信用卡)。一时，永安"折子"，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些新锐的经营手法，后被众多的百货公司仿效，沿用至今。

由于经营得法，上海永安从开业到30年代初，发展顺利，利润高达47.55%，在当时的华资企业中相当罕见。

沪港双城，虽无



西环南北行，现在仍恪守传统的经营方式。

血缘，且方言、文化等背景殊悬巨大，谈不上姐妹城，却可以讲是一对恋人城。

沪港双城，可谓门当户对，郎才女貌，一旦相互产生情愫，激起感情火花，就会派生出一个全新的生命——一如先施、永安在积极拓展上海市场之中，为华资企业在中国近代经济派生出众多现代商场管理法。永安、先施，作为中国百货业的先驱，也标志了香港华资现代企业集团的萌芽和走向成熟。

百年时光，弹指之间。

当年香港的百货巨业，经时光洗涤，先施、永安，仍坚持不倒，不得不佩服其多年打下的坚固基



香港开埠以来首家英资百货公司"连卡佛"在中环的旗舰店，1850年由两位英国船长开办。

础。今日香港乃至全球，购物文化与百年前相比变化巨大，首先是：商场——又称购物中心，替代往昔的集中的百货大楼。

相对旧时的永安、先施，今日购物中心，尤如一个小社区，人一进去，吃、喝、玩、乐，可以在里面消磨整整一天。

先后庆祝过自己的百年华诞的香港先施、永安，也可以讲是硕果仅存的香港两大华资百年老店，为迎接集团的第二个百年，力求洗脱"老牌"形象，从经营到包装，迎合市场年轻化，并根据香港市场推崇东洋口味特点，适当日式化，以留住年轻人的步子。

跋

想让更多的读者饶有兴趣地了解“老香港”，保持本书的可读性是一个前提。因而在与程乃珊女士商讨具体写作时，我尽量让她去关注民生状态，用丰富的日常细节描写，使读者真正走进“老香港”。香港离我们既近又远，通常的印象是经济起飞带来的繁荣，少有人关注当地人的日常历史。程乃珊女士，不辞辛苦，走街串巷，亲临现场采访了许多未被人注意的“老香港”，她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效率令人敬佩。

应该说明的是，一部“老香港”的历史是永远也写不完的，往昔的岁月，总是渐渐消逝在人们的记忆里。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关于“老香港”日常世俗生活的读本，是现代人对逝去时光的凝望、对记忆失落的打捞。在我看来，重温人间日常生活的言哭歌笑也许更能贴近历史，有以小见

大之功，亦未可知。它的出版能够折射出历史真实的光和影吗？能够让人切肤，让人扼腕，让人感悟奋进，让记忆战胜遗忘吗？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程乃珊女士，出生在上海，幼年曾在香港度过，80年代成名于上海，90年代初定居香港。如今往返在沪港之间，且写作勤而不辍。她笔下的“老香港”自有一种别致的韵味，是她自身感触的记录和整理。但愿她的文章能够唤起读者各自心目中的“老城市”。

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他们的慷慨相助是对文化的敬重。严尔纯先生提供了部分照片，也在此一并致谢。

顾华明

2000年8月29日写于南京

编 后

20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老城市》家族又添了五位新成员，即《老北京——变奏前门》、《老苏州——水巷寻梦》、《老杭州——湖山人间》、《老昆明——金马碧鸡》和《老香港——东方之珠》。这样，《老城市》这套书迄今已出版了十四册（其中，《老北京》为三册。另外还有《老上海》、《老天津》、《老南京》、《老西安》、《老重庆》、《老武汉》和《老广州》。

本来，由于编辑力量所限，我们曾打算调整出版计划。但后来，读者来信来电话，询问这套书新的出版计划，或向我们提供出版线索，有的还将珍藏的老照片寄过来……所有这些，感动了我们，也鼓舞了我们。经过反复的商量，编委会遂定下今秋再推出上述五本。

前几年人们就预言：21世纪将是网络的世纪、读图的世纪。而这样世纪的图书，当然会有别于前一世纪，其主要特点就是“图文互动”，而不仅仅是以前的“图文并茂”。过去所谓的“图文并茂”，即指图与文俱佳、都好。但图和文结合的紧密程度，却无法量化和不好要求。现在的“图文互动”则不同，不仅要求图要紧密配合文字内容，还要作为一种新的文本形式——即图本的形式，出现在书中。图片不再是以往配角的插图，而且是和文本并行不悖的主体。图与文互补、互衬、互为依托，密不可分，“互动”起来。看这样的书，有一种情景感，有一种“上网”的快感。

的确，《老城市》这样图文互动的书，出版难度很大。对于编辑来说，实际上要用“古老”、静止的传媒形式，去适应和赶上瞬息万变的光电和网络的时代。真可谓，“不是夸父，偏要追日”。而我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像“嫦娥奔月”——既要组名家文本，还要找图片，撰写情景性文字，每张图片还要修复、位置一一定位……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样做了，读者喜欢。作为出版人，还有什么能比书受到读者的欢迎，更高兴的呢？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0年9月20日

著　　文　程乃珊
图片供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严尔纯
　　　　　刘　震
图片编文　顾华明
版式设计　顾华明
版式制作　陈　燕
责任校对　赵　菁
　　　　　刁海裕
责任监印　张在健

出版发行　江苏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9 × 1230mm　大32开　印张7.5
版　　次　200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4-1142-4/J・1139
印　　数　1-14000册
定　　价　23.00元（平装）



OLD CITY

OLD HONG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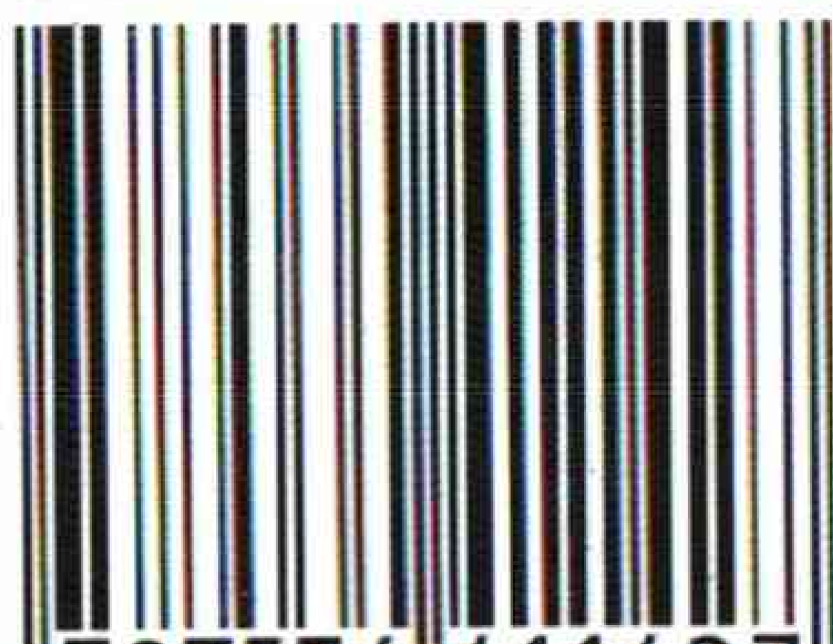


OLD CITY

老香港

东方之珠

责任编辑
顾华明
整体设计
顾华明





ISBN 7-5344-1142-4
J·1139 定价：23.00 元